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三本

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

第四分

定價新臺幣壹佰元正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永裕印刷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98號
三民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三本

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

第 四 分

目　　錄

胡適、趙元任同楊聯陞討論「某也」的信……楊聯陞
Some Recent Sound Shifts in Chaozhou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Nicholas C. BODMAN
Latin *dormiō** ……Eric P. HAMP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TING Pang-hsin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Mantaro J. HASHIMOTO
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杜正勝
濁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學調查……陳仲玉
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宋光宇
附載
趙元任先生著作目錄……李壬癸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 臺 北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五十三本

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

第四分

目錄

胡適、趙元任同楊聯陞討論「某也」的信……………………………楊聯陞……585—613

Some Recent Sound Shifts in Chaozhou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Nicholas C. BODMAN……615—625

Latin *dormiō** ……………………………………………………Eric P. HAMP……627—628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TING Pang-hsin……629—644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Mantaro J. HASHIMOTO……645—659

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杜正勝……661—709

濁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學調查………………………………………陳仲玉……711—745

清境與吉洋——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回
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宋光宇……747—794

附載
趙元任先生著作目錄…………………………………………………李壬癸……795—809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 臺北

复旦大学图书馆
报刊 藏

胡適趙元任同楊聯陞討論「某也」的信

楊 聯 陞 輯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三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L. S. 兄：

謝謝你的有趣味的信！

人名帶「之」字，是詞尾，無詞性可說，承你許爲「獨是通論」，我很高興。

六朝人名「之某」，可能是類似的用法。（可能是「羲之」「彪之」，人覺得實在不太通！所以把「之」放在姓與名之間，連姓讀就成了「劉的遴」「杜的偉」，稍不通了！）

「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一說，我的原意只是像我們家鄉的「叫名」。我名「穈」（音門）長輩當然叫我「穈」，而外人往往叫我「穈官」。此爲廣東最著名的Howgua，原亦是「官尾」。故我疑「王羲之」原名「羲」，而大家子弟衆多，單名就叫成了「羲之」，其時音或近於「羲的」，以後就用「羲之」了。叫名之外，不妨另有「小名」。

「之」名與道教無關，似無可疑。王羲之與郗愔同奉天師道，而郗家不取「之」名，楊羲、許謐、許翽、顧歡、陶弘景等都不用「之」尾的名字。（羲之奉天師道，當然在他已名羲之之後。）

關於「由也」、「求也」的「也」字，我認爲名的尾聲，而老兄認爲特提的助詞，略似日本は，其下「大抵是一小頓」。

老兄似未細細比勘「賜也」諸例，故說「親暱名詞似應可作當面直接稱呼，而論孟似無其例」。請你看看這些「當面直接稱呼」諸例：

①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②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③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③ a 賜也，非爾所及也。

④野哉由也！

⑤賜也賢乎我（從皇侃本）　我則不服。

⑥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　c. f.「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⑦由也，汝聞六言六蔽乎？　c. f.「由，誨汝知之乎？」

以上見論語，皆「當面直接稱呼」。

至於「也」下作一頓，似是我們後世人太受語尾「也」字影響之故，其實必不如此。如下諸例：

①公西華問（引見前函。此中「由也」「求也」……皆不必作一頓。）

論語此類例子多，我特舉公西華問一條，因爲此條文法最完全。

②檀弓：「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③檀弓：「參也聞諸夫子也。……」

「參也與子游聞之」。

④檀弓：「伯高之喪，……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也」字古音當與「它」相同或相近。高本漢擬爲 dia/ia/ya。如「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之句，似魯語的「伋也」「白也」，與晉人的「羲之」「獻之」甚相近，其尾音都近「的」？

我把你的信寄還給你，你看了可以連同我的信一併寄給元任先生一閱，並請他合併批評。

「問管仲曰『人也』。」我主張句絕。其意謂「他是個人物！」故下面說他奪伯氏邑，而其人沒齒無態言。孔老夫子對管仲是向來佩服的。

(1956 March 13)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楊聯陞的回信

胡先生：

多謝您三月十三日的信。

您所謂「大家人家的小名」是指您家鄉的「叫名」之類。我是誤會了您的意思了，以為小名一定是「輕暱」之稱（與敬而遠之相對）。這種「某官」一類的叫名，可算暱而敬之或敬而近之的「中稱」。如我們在康橋的中國同學，有一陣相稱為「某公」。還有舊式或稱人字曰某翁。類似之例頗多。自然各種中稱或中間性的稱呼，其遠近不必全同，但其為中，一也。

關於人名下加"也"作直接稱呼，我上次信說，「論孟似少其例」是未檢書而隨口瞎說，該打之至！

「也」在名詞之下是語尾（suffix）或助詞（particle），似乎是一個講語法的問題，不易定論。馬氏文通卷九，傳信助詞「也」——「也字助實字」云：

> 凡實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則辭氣不直下而其字有若特為之揭出矣。助字之助實字者，惟也字，餘只助句助讀而已。而實字借助於也字者，不一其類。公名有助以也字者（孟，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本名有助以也字者（論　賜也，非爾所及也……）其餘實字有助也字者，要皆藉以停頓而引起下文也。

前面總論傳信助字「也」說：

> 古人有謂也字三用，有用於句末者，有用於句中者，有用於稱謂者。蓋近之矣（按，此當指劉淇助字辨略卷三）愚謂字所助有三：曰助句，曰句讀，曰助讀，曰助實字。以視所謂三用者，較為涵蓋。

我主張盡量用統一的講法，也是取其簡易可以較為涵蓋而已。

您的「某也」表親暱說，我還是不能無疑，並不是說「某也」不能表親暱，但須從口氣表現，單說「某也」是不够的。（如口語「老張啊」可以表親暱，也可以不表）人自稱用「某也」，似可用為反證。如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曾申對使人說話，似無自用暱稱之理。又某也下接動詞"聞"之例不少。如論語「丘也，聞有周有家者……」孟子「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檀弓「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好像是說「我呀，我是聽某某說……」。

您舉檀弓「伋也妻白也母」一條，極妙！意思恐怕就是伋之妻，白之母。就我初步檢查“某也”似不用於“之某”“之如何”之前，（“由之瑟”恐不能作“由也之瑟”）。可能是兩個助詞文法作用相通（如日文之は與の）而頓挫之有無相反，故不連用也。這個信稿連您三月十三日的信，前四頁，我三月十四日信一頁，已經一併寄給趙先生了。給您請安

學生楊聯陞上 1956. 3. 16.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聯陞兄：紐約大雪，至十三寸半，兩日不能出門了！

我們的信交岔了。這些信都送給 Y. R. 先生看看，也許可以得一個定論。我最後信上說，我對於「也」字之爲「詞尾」或「讀尾」，都沒有成見。——即有「成見」，也不過六、七天以來的「成見」，不是牢不可破的！

親昵，小名，都是我用字不妥，請勿拘泥。我的意思只是說，魯語單名加「也」，似與晉人單名加「之」，同是便於叫喚，其作用等於名的一個部分，等於「二名」，不必看作助字，或代替一小頓。如「主詞」之下作一小頓，猶可說也。「夫由賜也見我」，「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逕作「二名」看，爲最簡易。若作一小頓，似反費事了。（所謂「便於叫喚」，包括「便於自己呼名」，如「赤也惑」，「丘也幸」。）「野哉由也」，「小人哉樊須也」，似合於「x哉y也」公式。但「吾與點也」，似又當別論。我則以爲「參乎」，乎字是一小頓的尾聲，與「賜也」「由也」「參也」不同。「由，誨汝知之乎」，「由也，汝聞六言六蔽乎」，「由」與「由也」完全相同，故我覺的「由也」＝「由」，都只是名。

Y. R. 先生給我一個 test，我以爲「伋也妻」「白也母」一例，似最合於他的條件。老兄所謂「極妙」之例也。且看他老先生以爲何如。

我前信於此一個 test 之外，嘗指出「x也」之用在 all “cases”，此似是一個「較爲涵蓋」的 test，老兄以爲何如？

※

柯立夫先生的提議，我可以辦，但乞將　　原文及小注抄給我，可省我去跑圖

書館一次。華裔學誌的現在編者及地址，也乞示知。

匆敬祝

雙安

適之

1956. 3. 20. 夜

前幾天略翻左傳，也有「僑也惑之」(Nom)「吾父逐鞅也」(Obj)，「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obj or pren) 諸例。似不限於「魯語」。

※我們家鄉稱「某官」，官字去聲，確似你所謂「暱而敬」的中稱。「新婦」稱「新人」，人讀作銀 (hien)，「新郎」稱「新郎官」，官也讀去聲。那就全是親暱的口氣。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一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楊公：

五月二、八日的信，都收到了。多謝。

今早元任兄飛到，我們飯後在我寓中閑談，他也看了這些信了。

關於「新」是美號的問題，我也想寫一篇短文，把我們往來通信的材料綜合起來，作一個系統的敍述。例如王充正說篇的話，必須與白虎通「號」篇對看，方可明白此兩說的歷史地位。因此，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可以用中文寫一篇文章，寫成後當先寄給你看。(但不必在清華學報發表。) 我給你的幾封信，如可以寄還我作參考，最好。還得請你將趙甌北那篇文字，叫人抄一份給我。此文大概三、四天可以寫成。

關於「賜也」「由也」一類的「也尾」字問題，我今天對元任說，最好這一大些材料都歸他老先生去整理寫一篇短文。他說，他是發問的人，我是答問的人，也許這文字應該由答問的人去寫。總之，我們還沒有結論。

我也把討論「新」號問題的大要告訴他了。

四月底，我收到 Univ California 的校長的信，說 U. C. 請我作 "a Regents' Professor in the Dept. of Philosophy for the Fall Semester of 1956-57"，這事起於數月前趙公與一些 U. C. 的中外朋友的一個「陰謀」，現今居然成爲事實，我只

好接受了，大概須在 Berkeley 住四個月（九月——一月）。四個月之後，我可以去臺灣走一趟，小住兩、三個月。

寅恪在嶺南學報發表之文（此文見於第幾期？乞示知。）我並未見過。可見我的誤記不出於此文，似是由於一個很粗心的概括印象，或是多年前寅恪或孟眞口談留下來的印象。其實寅恪之說不能成立，因爲例外太多。（寅恪又似不曾明白崔浩、寇謙之都不是「天師道」，乃是「反三張」的。）

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已近八、九册。他的最近兩部書是「俄羅斯的民間故事」及「烏克蘭的民國故事」，已够可憐憫的了。（但序例裏尙無肉麻的話，也沒有引證馬列諸大神。）你信上說的周遐壽的兩書，我還沒有見到，當托香港朋友代爲訪求。

匆一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五、十一

你信上提及王莽傳中另「有一處提到別的美號」，又引匈奴高句麗的改名。莽傳中元始元年正月羣臣「陳莽功德」，已說及「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于周。」太后詔尙書具其事，後來太后「策」曰，……『故賜嘉號，曰安漢公……」此是美號的一個例子。

又莽「居攝」之前，太后詔云，「……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地理志：「武功，莽曰新光。」此亦是「美號」之一例。

適之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楊聯陞的回信

胡先生：

多謝您五月十一日的信。

趙先生這次大約不來康橋，但聽說六月裏可以來。我們很歡迎。找您到 U. C. 的

「陰謀」成功，大家同喜。也許您可以借演講的機會再整理思想史稿吧。

寅恪先生文見嶺南學報十一卷一期（1950，110-134），抄上兩頁備覽。陳先生所謂天師道，似是泛稱，不限於五斗米道。「崔浩與寇謙之」這篇文章裏勝義甚多。哈佛的一册，缺 127-130 頁（誤重 115-118 頁）。如哥大等處有，將來應該設法借覽。

「賜也」一類的問題，我覺得還是不宜專就人名後之「也」立說。至少要討論一切名詞（或類似名詞）後之「也」。如詩經「無使尨也吠」，左傳「尨也可使無吠」，左傳「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學子之賜……”」詩經「女也不爽」「士也罔極」等，都要照顧到才好。

（只用此一段，中略）

您可以寫「新號（新莽國號）」一文，最好能給清華學報。　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上

一九五六、五月十四日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楊公：

（中略）

偶看聊齋志異，在陳雲棲篇（卷 3 ）見此兩句：

……果爾，則爲母也婦，不爾，則終爲母也女。

留仙有意學檀弓，故有此文法。此雖是後來人仿古的語法，但可以爲老兄前次（May 14）來信所說“最好能兼顧一切名詞（不限于專名）後之「也」”的原則添一例子。

我原無“限于專名”之意。原來的問題，只是“賜也”一類的“也”是“讀尾”？抑係“詞尾”？所謂“詞”，原指專名，但在詞性上“專名”與“一切名詞”是同等的。如“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在聊齋裏可以套作“爲母也歸”“爲母也女”。老兄以爲爲何？

may 28，1956

（聯陞按，聊齋志異尚有一例：「霍女」（卷十一）（女）一日謂黄曰「今爲君

謀，請買一人，爲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伋爲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此處「妾也兄」似當解爲「妾之兄」。則「母也婦」即「母之婦」，「母也女」即「母之女」，蒲留仙似爲此用。）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楊聯陞的回信

胡先生：

多謝您八月十三日的信。（中略）

高本漢說人名後加「也」是記錄口語，我完全贊成。又說這種「×也」不拘一格（Case）也是對的。不過我覺得他把這個用法限制在專名之後，因此說與其他的可與日文 wa 比擬之「也」全無關係，有些欠妥。

馬氏文通卷九有一段，我已前抄過，再抄一次：

這裏公名，本名與其他實字之助以也字者，並無一定的分別。您舉的聊齋的仿檀弓之例，也表示蒲留仙認爲這個型式公名本名通用。「要旨藉停頓而引起下文也」這裏要注意"要"是"大要"，因爲"伋也妻"之"也"不便停頓，是例外，但其他之例要停頓還是可以的，我覺得此例之重要性，不宜過於誇張。

馬氏云「凡實字之注意者，借助也字」我覺得也是對的。這次在倫敦與西門(W. Simon）先生討論到這個也字，曾檢出高本漢文閱讀，西門覺得這個「也」一般作用是 emphatic, 伋也妻就是伋的妻，重讀伋；白也母就是白的母，重讀白。其他實字後"也"亦復如此。高本漢說，不能與日文之 wa 相比，是不對的。日文之 wa 可在 de 之下作 de wa，在 ni 之下作 niwa（聯陞按在 o 之下則變 oba），只無領格之例而已（Schindler AM 短文，與西門意見相近而嫌狹。）高本漢只說這是口語，而不說意思或口氣上可能有何分別，是欠周到處。

今天又與周法高兄略談，他說，如果照胡先生所說，"也"與"他"有關，倒是件有趣的事。音韵上的像並非不可能，只可惜古漢語的"他"都只作其他解，他作彼解，最早見於後漢，不易解釋。我說，從意思上說，這個"也"與近代口語（國語）用的"他"（或其他代名詞）倒有相似處，如「白也母」可以說「白也他娘」「孩子他娘」（或其他代名詞）不說「孩子他的娘」，「回也不愚」相當於「回呀他不傻」「謂

我士也驕」就是說「說我這個士（小貴族）他很驕傲」，「師與張也孰賢」是「師同張他們倆呀誰好？」不過從語音說，「也」恐怕還是近於“啊”。（下略）

給您請安

學生聯陞敬上

195 年八月十七日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胡適給楊聯陞的信

楊公：

謝謝你的長信。此後「從天而下」的機會怕又不太多了！

昨天周法高李定一兩君來，我託他們帶一小册老子給你，因爲其中有關於「想爾注」的幾頁。

上週末衞挺生先生（字深甫，哈佛老畢業生，卽作「神武天皇考」者）來，我托他帶一册影本先父「鈍夫年譜」給你，轉交何炳棣兄，不知已收到否？

關於「×也」問題，我此時沒有時間討論，法高或可略述我昨天談的話。我覺得你不免過分的堅持「停頓」之說，故要我「不可過於誇張」「伋也妻」「白也母」一類「終究是罕見之特例」。我則以爲檀弓此條，一句話裏而此例四見，故不得視爲罕見之特例，更不得視爲「例外」。

「停頓」之說，我以爲不够說明兩個現象：

①「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似「×也」與「×乎」有別。

②「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12)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歟？」(5)（皇侃本、高麗本有「也」字。阮先校勘記說「由下有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太平御覽 467 所引合。」）「由也」作一個名字，似勝于「也」一小頓，「與」又一大頓？

故我還覺得「×也」在當時口語裏只看作一個「名字」，用在私名爲多，也用在公名如「母也天只」之類。

但這不是我今天寫信的動機。

百忙中偶檢四部叢刊續編裏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此是元統三年（看卷

三 P. 59）最後改定刻本。其中句讀標點最謹嚴，特別是卷二，P. 20 引「館閣校勘法」，及「勉齋（黃榦）批點四書例」，及「續補句讀例」(P. 23-25)。此書想你已見了。若未檢此影元刻本，千萬乞一檢閱，因為這是最詳細、最講究文法象例的句讀例法！（最有趣的是此中居然說明「大學之道」何以是句！原來「句」有兩大用處：一是「舉其綱」，一是「文意斷」。「舉其綱為句」！葉雙舉的例正是「如大學之道在……」！書中到處有此等例：

朱子論孟集纂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

「大學之道」原來與「朱子答汪尚書書」同是舉其綱！除此一例之外，其餘句讀條例是很了不得的明白詳盡！故值得報告給您。

匆匆敬祝

雙安。

適之

一九五六、八、廿四

敬乞告周策縱先生：我收到他的長信了。連日實在太匆匆，不能作答書，怕也見不着他了。我決定卅一日飛了。他的信，俟將來答他。

適之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趙元任給胡適的信

迪也適之：

眞巧的得，我正在 (Mar. 16) 說"如果找到'由也'後頭來個'之'，再來個名詞，那就'也'字一定是詞尾而非讀尾了"。馬上楊公（中稱也）寄來你的信 (Mar. 13 p. p. 3-4) 引：

"檀弓：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好像是答我的問似的，楊公 (Mar. 16) 說"您舉檀弓汲也妻白也母一條極妙，

意思恐怕就是‘伋之母’‘白之母’，他又說“可能是因為兩個助詞的文法相通而頓挫之有無相反……故不連用也。”這個理由的用勁處我還琢磨不大出來，可是我想到兩個方言的文法作參考：先說兩個助詞或詞尾碰頭，就省去一個：在粵語凡助量詞（AN）碰到嘅（‘的’）後者省去，例如粵語你啲錢聽起來好像是說‘你的錢’，其實說的是‘你的些錢’，其中相當於的的嘅字省去，而粵話的啲乃是‘些’的意思，但在一般情形之下，虛字相遇並不省去一個，兩字相切倒是很常見的。

還有一個方言文法現象是厦門語單字小名後常加啊，跟由也的也有同樣問題，可惜我沒找到像伋也妻之類的例。

至於也字用作頓尾，這是直接稱呼助詞，有時似乎可以又作頓尾又作直接稱呼助詞，跟白話啊字一樣的行為（日文的は可是只用在頓尾）

伋也妻，白也母如果是魯語的伋之妻，白之母，這倒是件大事情，這沒甚麼不可能，可是在（魯語）其他句法中，也字不知道還有領格的用法沒有？

也 dịa 與 之 t̂ịəg 怕音不太相近，倒是的 tiek 與之還近一點。

這些問題從也字出發，但引起的問題不少，希望不久發現一個厦門某啊 e（的）某的例，或者文o裏某也之某的例——哪一天，此頌

雙祺

附筆　　元任

cc: L. S. (M. F. T.), T＝Theorist, M. F.＝? 可問 Iris

*錢音似北平陽平也是假的粵音，相當與北平陽平的錢是低降，變成高升調是一種所謂‘變音’，其功用相當語捲舌詞尾，猶云‘錢兒’

再者㶣之與㶣的不同處：的字有此用法而之子無之！（因無之不等於沒有的，而等於沒有這個也）

附　　錄

邦新我兄

蒙史語所不棄，叫我為趙元任先生紀念論文集寫一篇文章。這是義（誼）不容辭的。現在找出一九五六年我同胡趙兩位先生用三角通信式討論古漢語中“某也”（特別

是人名後也字）的信，依時間次序是胡先生給我三月十三日的信，我三月十六日回信。胡先生三月二十日的信，五月十一日的信。我五月十四的信（只一段有關）胡先生五月二十八日的信。我八月十七的信。胡先生八月二十五的信。中間有趙元任三月二十日給胡先生（廸也適之，平常是廸呀適之）給我的副本，末后寫的 c. c. L. S. (M. F. T) T＝Theorist, 我知道 L. S. 是我的 initial, M. F. T. 還是問了 Iris，才猜出是由 Lucky Strike(L. S.) 香煙廣告 M. F. T. means fine tobacco 改的，Theorist, 承他老人家賜贈，實在愧不敢當，至多是胡說的理論家罷了。（此等處可見先生之幽默）

這些信請斟酌覆製作爲紀念趙胡兩先生之用，胡先生去世已二十年了，我受他們二位提携指導之恩，眞恐畢生難報了。

七一（1982）七、七

方桂先生法高兄同你們諸位其它專家，都歡迎跋語。

我只想加一注即“也”上之人名不限於一字，諸樊，餘味等皆是。

（趙先生的兩頁，大約得描描，才能覆製 L. S.）

又：謝謝你的有趣味的信！

人名（常）「之」字，是詞尾，若詞性而說，承你許為「極是通論」，我很高興。

六朝人名「之某」，不能是歎似的用法。下一字的第某在姓與名之間，不能是「羲之」「之」通！所以「逸」姓，該不說了。也似之「謝」用「遺」「燒」稱的「條」，錯不通了！

「大家人家子弟的小名」一說，我的原意只是像我們家鄉的「叫名」。我名「傑」（旁門），長輩常叫我「傑」，而外人往往叫我「傑安」。此如廣東最著名的「[illegible]」，原只是「山台」底。故我疑「王羲之」原名「羲」，而大家子弟要多，單名就叫成了「羲之」，其時當或近于「羲的」，以後就用「羲之」了。叫名之外，不好另有「小名」。

「之」名与著述藝術，似甚可疑。王羲之與郗愔同奉天師道，

而嵇康不取「之」名，杨羲，许谧，许翙，顾欢，陶弘景书都不用「之」底的名字。（羲之奉天师道，当然在他已名羲之之后。）

回乎「由也」「求也」的「也」字，我认为名的尾声，而老少认为特提的助词，略似日本话，其下「大抵是一小顿」。老少似未细细比勘「赐也」诸例，故说「魏晋名词似应予以当面直接称呼，而论语似无此例」。请你看看这些书面直接称呼：

请例：

①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②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③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3) 賜也，非爾所及也。

(4) 野哉由也！

(5) 賜也賢乎哉，（從皇侃本）夫我則不暇。

(6) 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比「參乎，吾道以貫之」。

(7) 由也，汝聞六言六蔽乎？　比「由，誨汝知之乎？」

以上見論語，皆「當面直接稱呼」。

至乎「也」下作一頓，似是我們後世人太受「語尾也」字影響之故，其實不然。如下諸例：

(1) 公西華向（引見前孟）。此中「由也」「求也」……皆不必作一頓。）

論語此類例子多，我特舉公西華向一條，因為此條文語最完全。

(2) 檀弓：「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伋則安能？為伋○也○妻○

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

③檀弓：「參也聞諸夫子也。……」

「參也與子游聞之。」

④檀弓：「伯高之喪，……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

「也」字古音當與「它」相同或相近。（高本漢擬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如「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之句，似像讀的「伋他」「白他」，與跟大的「義」「獻」甚相近，其尾音都近的？

我把你的信寄還給你，你看了，可以連同我的信一併寄給元任先生閱，並請他合併批評。

「問管仲。曰，『人也』。」我主張句絕。其意謂，「他是个人物！」故下面說他奪伯氏……，而其人沒齒無怨言。孔老夫子對管仲是向來佩服的。

（1956 March 13）

1956.3.20

紐約大雪，至十三寸半，兩日不能出門了！

聯陞兄：

我們的信交叉了。這些信都送給你先生看看，也許可以得一些定論。我最怕信上說，我對于「也」字之為「詞尾」或「讀斷」，都沒有成見。——即有「成見」，也不過三七天以來的「成見」，不是牢不可破的！

說呢，小名加「也」，我的意思是說單名加「也」，似與陪人單名加「之」，同是便于呼喚，其作用（四）等于名的一部分，不必看作助字，或代替一小頓。如主詞之下作一小頓，就可說也。「夫由賜也見我」，「不為作一小頓，似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作「二名看，更為簡易。所謂「便于呼喚」，包括「便于自己呼名」，如「參也魯」，「近也事」。反費事了。

（都是我用古本古文，請你……）

（單名加「也」）

我們家鄉稱「某官」，官字去聲，似你們稱「嗯阿爺」的中稱。「新娘」稱「新人」，人讀……（三三）；「新郎」稱「新郎官」，官也讀去聲。那竟全是親暱的口氣。

「賜有由也」，「小人我求沒也」，似合于「某也」公式。但「戚」與「默也」，似又當別論。我所以要「參乎」，乎字是一小頓的尾聲，與「唱也」、「由也」、「參也」不同。「由，誨汝知之乎」，「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由」與「由也」完全相同，故我覺得「由也」與「由」，都只是名。

H.R.先生給我一个樹，我以為「很也畫」「自由母」一例最合于他的條件。

老兄所謂「標好」之例也。且看他以為何如。

我前信于此一个樹之外，尚指出「又也」之用在以 "Chess"，此外是一个「敬為德蓋」的樹，老兄以為何如？

*

楊宜夫先生的提議，我可以办，但乞將 Rilke 原文及小注抄給我，可省我去跑圖書館一次。華齋學誌的現在編者及地址，也乞示知。

即頌

教祺

適之

一九五六，三，廿夜

前幾天晚翻左傳，也有「隱也惑之」(Nom.)「吾之適鄭也」(Voc.)，「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Acc.)諸例。似不限于「魯語」。

COPY

Y. R. CHAO
1059 CRAGMONT AVE.
BERKELEY 8, CALIFORNIA
MAR 20 1956

趙也頁之！——

真巧的很，我正在（Mar. 11）說"如果找到'由也'後头來个'之'，用來个名詞，那就在'也'字一出之詞尾而非詞尾了，"馬上楊家（中和也）的來信（Mar 13, pp. 3-4），引：

"檀弓：'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

好像是答我的問似的。楊家（Mar 16）說"您舉檀弓汲也妻白也母一條甚好，意思恐怕就是'伋的'、'白之母'。他又說"可能是用為兩个助詞的文法相通而頓挫之有与相反……故不適用也。"這个理由的用助處我還琢磨不大出來。可是我想到兩个方言的文法作參考：先說兩个助詞或詞尾碰在一起省去一个：在吳語〔助量詞（AN）碰到嘅（'的'），後者省去。例如吳語'你的錢'聽起來好像是說'你的錢'，其實說的是'你的些錢'，其中相當於'的'的'嘅'字省去而吳語的嘅乃是'些'的意思。但在一般情形之下，應當相遇並不省去一个，而合併的是很常見的。

還有一个方言文法現象是廈門話本字小名後加'仔'，跟那'也'的無有同樣問題，可惜我沒找到像'伋也妻之'類的例。

[illegible]

文他娘
孩子
文他大哥

他這兩本書
嘅
（不由人自起了我們的個小事光來）

至于無ㄧ用作疑尾這一点，據我所知是
助詞，有時似乎可以又作疑尾，又作直接稱呼的助詞，很合於"無"一樣的行為。
（日文的"ね"可是只用在疑尾。）

您也寫"白也毋"，如果是客語的"無"之意，
"白無毋"，這倒是件大事情。這处甚麼
不可能，可是在（客語）其他句法中"無"
字不知道還有這樣的用法沒有？

"無" dia 和"无" fing 聲音不太相近，
倒是"無" tiek 和"无"靠近一点。

"無"問題從"無"字出發但引起的
問題不少。希望不久發現一个廣州
某無啊e（的）某的例，或者文獻裏
某也之某的例，——哪一天。此頌

研祺

弟師附學　　元任

cc: L.S. (M.F.T.)

T = Theorist
M.F. = ? 万同 Asia

有些義之與義的不同处：的字有些用法而無字無之！（因無之不能於後加的而無論後加多少个也）

楊公：

五月二八日的信，都收到了。多謝謝。

今早元任之飛到，我們便及在我寓中閑談

他也看了這些信了。

關于「我是美字的問題」，我也想寫一篇短文，把我們往来通信的材料綜合起来，作一个系統的叙述。例如王充正說的話，必須与白虎通「考」篇對看，方可明白此兩說的歷史地位。因此，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可以用中文寫一篇文章，寫成後寄给你看。（但不必在清華學報發表。）

我給你的幾封信，可以寄还我作参考，最好。還請你将趙甌北那篇文字，叫人抄一份给我。

此文大概二三天可以寫成。

關于「婦也」「由也」一類的也字問題，我今天对元任說最好以這次材料都歸他老先生去整理，寫

1956.5.11

[illegible]

[illegible] Univ. of California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 Regent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or the Fall Semester of 1956–57." [illegible]

[illegible] Berkeley [illegible]

[illegible]

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已近八九冊。他的最近兩部書是「俄羅斯的民間故事」及「烏克蘭的民間故事」，已夠可憐的了。（但序例裏毫無肉麻的話，也沒有引證馬列諸大神）你信上說的周遐壽的兩書，我還沒有見到，當托香港朋友代為訪求。

匆匆 敬祝

双安。

適

五三，五，十。

你信上提及王莽傳中尚有「要提到別的美号」，又引出如高句驪的改名。莽傳中元始元年正月群臣「陳莽功德」，已說及「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託号于周」。太后詔尚書具其事，以來太后「策」曰：……「故賜嘉号，曰安漢公……」此是「美号」的一个例子。

又「莽居攝」之前，太后詔云「……以武功縣為安漢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方[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一例。

[illegible]

是不為白也毋"，在聊齋裡可以套作"為母也婦""為母也女"。先生以為如何？ Page 2

May 28, 1956

楊公：

謝謝你的信和Reprints兩篇。此兩篇已在HJAS上讀過了。

右腕小傷至今未愈，已約骨科醫生May 30去驗看。此時寫字還不方便，故不能作文字。

偶看聊齋志異，在陳雲棲篇（卷3）見此兩句：

"……果爾，則為母也婦，不爾，則終為母也女"

留仙有意學檀弓，故有此文法。此雖是後來人仿古的語法，但可以為老兄前次（May 14）來信所說"最好能兼顧一切名詞（不限于專名）後之'也'"的原則添一例子。

我原無"限于專名"之意。原來的問題，只是"賜也"一類的"也"是讀斷？抑係"詞尾"？所謂"詞"，原指專名，但在詞性上"專名"與"一切名詞"是同等的。"留仙"[illegible]女妻者[illegible]不懂 page 2

[illegible]按，聊齋志異另有一例：霍女（卷十二）"女一日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偽為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良家子不難致也。"黃不可。此處"妾也兄"似當解為"妾之兄"，則"母也婦"可解"母之婦"，"母也女"即"母之女"。蒲留仙似如此用。

楊公：

謝謝你的長信。此後，這類從天而下的机会怕又不太多了！

昨天周法高李定一兩君來，我托他們帶一冊《老子》給你，因為其中有函子，想你佳的發覓。

上週末衛挺生先生（字深甫，哈佛老畢業生，即你「神武天皇考」著者）來，我托他帶一冊影本吳文「錢夫郎譜」給你，轉交何炳棣，不知已收到否。

函子「父也」問題，我此時沒有時間討論，這篇或可略述我昨天談的話。我覺得你不免過分的堅持「停頓」說，故要我「不可過於誇張」，「伋也妻」，「白也母」一類「終

究是罕見之特例」。我則以為，檀弓此條，一句話裏面此例兩見，故不得視為罕見之特例，更不得視為例外。

「信賴」之說，我以為不夠說明兩個現象：

⑴「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似「吾也」與「予乎」有別。

⑵「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⑿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⒀ 「皇侃本、高麗本有『也』字。阮元校勘記說『由下有也字，亦與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太平御覽467所引合。』」「由也」作「名字，似勝于「也」類，與「又一大類」的。

卷三
看史59

故我還覺得「也」在当时口語裏的一个虛字，用在私名爲多，也用在公名，如「毋也天只」之類。

但這不是我今天寫信的動机。

前在中偶檢得「四部叢刊續編」裏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此是元統三年最後改定刻本。其中句讀標点最謹嚴，特别是卷三，頁20以下，引「館閣校勘法」，及「勉齋（黃榦）批点四書例」，及「續補句讀例」（p.23-25）。此書想你已見了。若未檢此影元刻本，千万乞一檢閱，因爲這是最詳細，最講究句讀的句讀例法！（最有趣的是此中居然說明「大學之道」何以是句！）

「句」有兩大用處：一是「挈其綱」，一是「文意斷」。

原來「挈其綱為句」！「葉」所舉的例正是「如大學之道在……」！書中到處有此等例……

朱子論孟集注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

（我們今日要用「冒號」：…」。）「大學之道」原來與「朱子答汪尚書書」同是「挈其綱」！

陳先生一例之外，其餘的讀條例是很了不得的明白詳盡！故值得報告給您。

匆匆敬祝

雙安。

適

一九五六，八，廿四

敬元先生周策縱先生：我收到他的長信了。連日實在太忙，不能作答書，怕也見不著他了。我決定廿一日飛了。他的信，候將來答他。

適

SOME RECENT SOUND SHIFTS IN CHAOZHOU AND 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S

Nicholas C. Bodman

Professor Chao Yuen Ren's broad scholarship in so many aspects of linguistics, attested in his numerous works of outstanding value, has provided a most challenging model of excellence;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nguistics especially are much indebted to him for stimulating contributions, but will miss him also for his warm human qualities and inimitable wit. It is fitting in honoring the memory of this eminent linguist that an offering for this volume can, at least in a small way, make use of data that Professor Chao himself gathered many years ago, but which have remained unpublished until now. They form a part of the *Liang-Yue Fangyan Diaocha* 兩粵方言調查 of 1928 and 1929 that A. Hashimoto described so well in 1970.[1]

These materials are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dialect of Chaoan 潮安 (now usually called Chaozhou 潮州)[2] that was described had a pair of distinctions where modern Chaozhou has but one category. The present-day dialect has the

1. In her article, ***The Liang-Yue Dialect Materials***, A. Hashimoto tells of the plans of publishing these materials (of which only the Guangzhou 廣州 and Taishan 臺山 parts had hitherto come out). Unfortunately, none of these plans were ever realized. What I deal with here is a very small part indeed that was written in one notebook. A. Hashimoto 1970. 38 mentions that two speakers are recorded for the Chaoan materials. Professor Chao himeself has a brief paragraph (1975:5) on his unpublished notes (reprinted in 1976, Dil's collection of Chao's essays, p. 28-9). In December, 1981 I wrote Professor Chao for information on the Chaoan notes, including the status and location of the speakers, thinking perhaps that they came from an outlying village, but Professor Chao could not remember. Since then, I have tried to obtain the original notes to have another look, but up to now no one seems to know where they are. Despite this lack of some pertinent details, I have decided that it was still worthwhile to discuss the Chaoan notes in this short paper.
2. Although Chaoan and Chaozhou refer to the same place, when discussing Professor Chao's material, I shall use his term, i.e. Chaoan; elsewhere the modern name Chaozhou will be used. The term Swatow (Shantou 汕頭) which is the nearby seaport for Chaozhou was the name used by Western writers, such as the missionaries who compiled dictionarie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p to the present. (See References). However, these foreign writers usually said that they were using the prestige dialect of Chaozhoufu as the standard speech of the area.

final that is often written as-ɯŋ, and the Amoy (Xiamen 廈門) dialect likewise has a similar final, the syllabic velar nasal usually written as -ŋ with no preceding vowel symbol.[3] In the Chaoan dialect that Professor Chao recorded, -uiŋ (after all initials except labials) and -uŋ (after labials)[4] contrasted with -ɯŋ which occurred after all initials. Some Southern Min (SM) dialects, such as that of Zhangzhou 漳州 maintain a similar contrast to this day.

The lexical list from which I have abstracted the pertinent examples,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order for the most part, consists of three parallel columns in a narrow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the three dialects of Wenchang 文昌 of Hainan Island, and of Chaoan and Jieyang 建陽.[5] All are SM dialects, but Wenchang is more distant from the other two, and also more conservative: it has -ui corresponding to Chaoan -uiŋ (Chaoan -uŋ after labials), and -o where Chaoan has-ɯŋ. Of course Chaoan and Jieyang are very closely related. I reconstruct Proto-Southern Min (PSM) prototypes of *-uiN and *-oN; there are other forms of SM that preserve a distinction in these categories. The feature of nasalization that occures with several vowel finals is represented where it occurs in modern dialects and in reconstructed forms as N. Like some other SM dialects,

3. Since Chaozhou has the final - ɯ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this final written phonetically as -ɯŋ; /however, Li 1959 renders it as -ɤŋ, and Choy 1976 simply as -ŋ, a syllabic velar nasal. For dialects like Chaoyang 潮陽 and Amoy that do not have the high back unrounded vowel ɯ, nor even a schwa, it is only appropriate to render it as -ŋ. My own usage here is to use the digraph ng when transcribing. This phoneme in Amoy may occur after any initial. When occurring with zero initial or with h-, as in ng² 'yellow' 黃 or hng² 'garden' 園, -ng alternates between the full velar nasal and a value where velar contact is not quite attained, in this case sounding more like an indeterminate nasalized vowel. In SM the velar nasal has somewhat of a parallel with the syllabic labial nasal: this is much rarer, occurring only with zero or h- initial, as in Amoy m⁶ 'not' 呣 or hm³ 'marriage go-between' 媒.
4. The Chaoan final-uŋ also goes back to PSM *-un as in ꜀huŋ 'cloud' 雲. The general Chaozhou final in such words is -uŋ. In Chaoan labial initial words from PSM *-uiN and standard Chaozhou today agree in having -uŋ.
5. Jieyang, where Chao's notes have -ɯŋ, is analyzed by Dong Tonghe as -ŋ; Norman (who writes Kityang for Jieyang) follows Dong in this transcription. As to the Wenchang forms, there are many gaps in Chao's list, but fortunately the few forms he has agree well with more complete descriptions as found in M. Hashimoto 1960 and especially Woon 1979; other SM dialects of Hainan differ hardly at all. See William S. -Y. Wang and Norman, H.-P. Zhang, and Y. H. Zhang in References.

Wenchang has lost this feature of nasalization.[6] Table 1 follows with the items I have abstracted from the Chao list; I have added the PSM reconstructed finals and a few elucidating notes.

TABLE 1

PSM *-uiN (<**-ueN)

	Wenchang	Chaoan	Jieyang	
斷	‘dui	ᶜtuiŋ	ᶜtɯŋ	‘break off’
算	tuiᵓ	suiŋᵓ	sŋᵓ	‘to count’
園	꜀wui	꜀hŋ	꜀hĩ̂	‘garden’[7]
勸	---	k‘uiŋᵓ	k‘ɯŋᵓ	‘coax, persude’
拳	---	꜀k‘uiŋ	꜀k‘uŋ(L)	‘fist’[8]
卷	---	kuiŋᵓ	---	‘scroll’
晚	---	ᶜmuŋ	ᶜmɯŋ	‘late’
飯	---	puŋᵓ̲	pŋᵓ̲	‘cooked rice’
本	---	ᶜpuŋ	ᶜpəŋ	‘a volume’[9]
門	꜀mui	꜀muŋ	꜀məŋ	‘door’

6. A. Hashimoto 1976: 2-5 gives a few examples of the SM dialect of Suiqi遂溪on the Leizhou 雷州 peninsula; she has also kindly provided me many more examples from her notes. Like the Hainanese dialects, Suiqi has lost the SM feature of nasalization of vowels. In initials, Suiqi agree well with most SM dialects, and disagreeing in this respect with the very marked difference that Hainanese shows in its initial inventory. I would place Suiqi in one subgroup with Hainanese and surmise that Min settlers from the Leizhou area brought their language into Hainan. At least one variety of Chaozhou spoken in Bangkok, Thailand has also lost vowel nasalization, (My own field notes). Another very interesting SM group colonized the Sam heung (Sanxiang三鄉) area of Zongshan Xian 中山縣 in Guangdong 廣東. This region has a number of very closely related SM dialects, all lacking nasalized vowels (and all strongly influenced by Zongshan Cantonese). (My own field notes).
7. The words ‘garden’ and ‘yellow’ (see note 10) are mentioned in note 3 as having alternate pronunciations in Amoy. We should expect Chaoan ꜀huiŋ and ꜀uiŋ in these words. Is this a case of dialect borrowing or special development with zero and h- initials? Note also the unusual rendering of the Jieyang word with two nasalization markers.
8. In the word for ‘fist’ the Jieyang form is from the literary (character pronunciation) stratum. Note that Amoy colloquial has ꜀kun, unaspirated initial and an aberrant final.
9. Although the Amoy cognate here has literary ‘pun, several SM dialects have ᶜpuiN or ᶜpng as colloquial forms, sometimes only in the meaning of ‘capital (money)’.

黃	꜀ʔuaŋ(L)	꜀ʔŋ	꜀ŋ	'yellow'[10]
		PSM *-oN		
(刺)	---	ts'ɯŋ'	ts'ɯŋ'	'to prick'[11]
湯	---	꜀t'ɯŋ	꜀t'ɯŋ	'soup'[12]
糖	꜀Xo	꜀t'ɯŋ	꜀t'ɯŋ	'sugar'
桑	---	꜀sɯŋ	꜀sɯŋ	'mulberry'

Some other features in which Chao's Chaoan differs from his Jieyang and from modern Chaozhou dialects that I have heard or read about are small points: where Jieyang has initial h-, he transcribes the Chaoan equivalent as x-in several cases, but where Jieyang velar initials are followed by i, the Chaoan form usually appears as a palatal, e. g.: Chaoan ꜀çᶜia, Jieyang ꜀kᶜiA 騎 'ride a horse'. This is not of course a phonological difference. Where Jieyang in rusheng has a clear glottal stop ending, the Chaoan equivalent merely uses the rusheng tone marks which may indicate a phonetic difference, e. g. Chaoan poi,꜃ Jieyang poi꜃? 拔 'pull out'. An unusual development is shown in the word for 'meat, flesh' 肉: Chaoan neŋ꜄ were Jieyang has the usual Chaozhou nek꜄. In this word, and others where the initial is a nasal, I have often heard the following vowel as very strongly nasalized. The Chaozhou word for 'woman' 女 'nɯŋ, although a shangsheng not a rusheng word, shows a similar development of this unexpected nasal final. Finally, to conclude this section, I should mention that in both Chaoan and Jieyang, indeed prevalent in the Chaozhou area, is the lack of the dental finals -n and -t which formerly existed but now have completely merged with finals -ng and -k. (See note 4). Karlgren (1926: 12) cites Gibson 1886 as his Swatow source - here final -n and -t are retained. Egerod 1956: 16 in his phonemic analysis of Swatow and in his valuable article Swatow Loan Words in Siamese, p. 139 states that his informants included speakers from Swatow, Bangkok

10. The Wenchang form is literary. Hainanese colloquial has ꜀ui.
11. There is no standard character for the Chaozhou word 'to prick', nor have I found SM cognates in my dialect materials.
12. There are several more examples of this Chaozhou dialect final which I did not take from Chao's notes since both the Chaoan and Jieyang forms were identical; the reflexes of PSM *-oN are regular and quite numerous.

and Malaya; his Swatow forms likewise include -n and -t; the corresponding Thai loans have -n and d; vowel nasalization is lost in the Thai loans. Further evidence from older works shows the retention of -n and -t in Fielde 1878, Duffus 1883 and Lim 1886. Fielde 1883 begings to show a difference: here only -ang and -ak occur (and -iang, -iak), and where one expects -uan and -uat, these finals are spelled -wn and -wt (contrasting with -uang, uak). Duffus 1883: Remarks, has a significant statement: 'k and t as finals are so much alike as to be scarcely distinguishable.' We can assume the same to be true of -n and -ng. I have not seen Ashmore's dictionary, but a reference to this problem is cited by Giffin 1961: viii: 'The Ashmore Dictionary is very unusal ... even though it was printed as early as 1880. There are, however, a few differences which we should note: ... 2) There are some endings that are definitely 'ng' endings, but Ashmore has listed them as 'n' endings, which might be due to the local dialect (Ten Hái). Be sure to check carefully with the teacher on such endings...'. Note that Giffin 1961 was published in Thailand. Another missionary production, Koons 1967, shows no -n and -t finals; all descriptions by modern Chinese linguists such as Li 1959, and Yuan 1960 show the merger into -ng and -k as does the Chao material and Dong in his section on Jieyang.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present-day Chaoyang dialect (S. Y. Zhang 1981); Chaoyang is definitely in the Chaozhou subgroup. Nakajima 1979 also has no -n and -t in his analysis of Chaoyang in his lexicon of Min dialects. From these sources, we can infer an older period before -n and -t had merged with -ng and -k, and then the fluctuation between them, starting with these finals following the low vowel a; finally the complete merger ensued.

This inference can be confirmed by field work I did while in Hong Kong between December 1968 and March 1969 on the dialect of a group of fishermen living outside of Hong Kong in Taipouh (Tapu 大埠)[13] who some fifty years

13. I take this occasion to thank Professor Marjorie Topley, anthropologis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who was very helpful in giv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Min speakers in the Hong Kong area; I am also very grateful to Mr. Horace Lei of the Hong Kong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Department who personally introduced me to this group of fishermen, helped me to select the speakers and provided a meeting place on the wharf where I did my interviewing.

before had come from Aotou 澳頭 Hweiyang 惠陽 Xia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tradition, told by my informants' great-grandfather, they left Chaoyang approximately two hundred years ago. Their place of origin, in their own words, was tioN^{2} ioN^{2} hai^{3} khau^{3} 潮陽海口, the seaport of Chaoyang. Like Chaoyang, Aotou has -u corresponding to Chaozhou -ɯ; more important, it still has -n and -t as in bin^{6} 'face' 面, pit^{7} 'writing brush' 筆 cun^{2} 'boat' 船, kut^{8} 'slippery' 滑 , gin^{2} 'silver' 銀; there was vacillation between uan^{2} and uang^{2}, literary word for 'king' 王; everywhere else the earlier -n had merged to -ng after the low vowel a: sang^{3} 'lean, thin' 瘦, sak^{7} 'louse' 蝨 tang^{2} 'surname Chen' 陳; otherwise the phonology is typically of the Chaozhou sort with occasional examples more like Amoy.

During this same stay in Hong Kong, I also worked on what is known locally as Hai^{3} lok^{8} hong^{1} 海陸豐, a term which includes the places of Hailu 海陸 and Haifeng 海豐.[14] My informant came from the village of Shangbu 上埠 lying midway between Hailu and Haifeng. One of the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Hailokhong dialect is the distinction of e and ei as in be^{3} 'horse' 馬 and bei^{3} 'buy' 買. In fact my Aotou speakers told me this fact - in their area, the Hailokhong people were largely merchants. The final -ei, corresponding to Chaozhou -oi, Amoy -ue and Zhangzhou -e, was discovered to exist in the 16th century Dominican text, the *Doctrina*. This is most interestingly discussed by van der Loon 1967: 127. The *Doctrina* finds its closest dialect relative in modern Zhangzhou, and it is with this group (and not with Chaozhou) that one must classify Hailokhong. Neither Li 1959 (pp. 2-4) nor Choy 1976: 8, 18-26 mention Hailokhong as a Chaozhou dialect. Hailokhong has almost exactly the same distribution of final nasals as does Aotou; no examples need be added; like Aotou, former -n and -t merge with -ng and -k when the low vowel precedes. As in its relative Zhangzhou, Hailokhong has the final -uiN which contrasts with

14. In Hong Kong, I was fortunate to be able to stay at Robert Black College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thank the personnel there for their courtesy. My informant for Hailokhong was an employee of Robert Black College. Of course this Min dialect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Hakua spoken in the same general area.

the syllabic velar nasal -ng.[15] van der Loon (op. cit. p. 131 and footnotes 103-4) comments on the dialect variation in olden days between -uiN and -ng. It appears that the various dialect forms of several hundred years ago have not changed very much, but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may have changed.[16]

I would now like to include data on some much earlier historical ohanges.

We have talked at length about SM nasalized vowel finals in various dialects. SM nasalized vowels followed by glottal stop occur in sets of three, as in the SM finals a, aN and aʔ. These finals are of course in contrast with am/ap, an/at and ang/ak. It is unusual in Chinese dialects to have contrasts between nasalized vowels and vowels followed by consonantal nasals, and likewise to have -p, -t and-k in contrast with glottal stop. I assume that in Proto Coastal Min (including Northeastern Min, Hinghua and Southern Min) that nasals and stops occurred after four high, and three low vowels:

i	y	ə	u
e		a	o

In the conservative dialects of Northeastern Min, the vocalism was largely unchanged except for the merger of ə and a; -m/-p, -n/-t and -ng/-k also were retained. In Fuzhou 福州 the nasals merged to -ng and the stops to -k (phonetically glottal stop). I have grouped Hinghua (Xinghua 興化) and SM together in an historical subgroup Proto Southern Min-Hinghua (PSMHH). In this stage, the nasal consonants and stops remained after the four high vowels

15. Apart from my main informant, I very briefly interviewed a few Hailokhong fishermen. Instead of -uiN, they, like Chaozhou speakers, had -ng. This indicates a good bit of dialect mixture, and is not surprising, especially among fisheremen and boat people who have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 great frequency.

16. I venture here a remark on the name Amoy. This spelling, unlike the modern English pronunciation of əmoi or æmoi, must have indicated the same sound as represented in the French spelling Émoui. Either the early cartographers used the Zhangzhou pronunciation, e^5 $muiN^2$, or else the pronunciation in Amoy itself in these earlier days was like that of Zhangzhou. The oldest reference I have found is ***Begin ende Voortgangh***, 1646, Amsterdam p. 44 Oost-Indische Reyse gedaen, no author given with a map of Amoy Bay and reference to 'de Stadt Aymoy'. By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ronunciation e^6 mng^2 had been established as evidenced by a missionary primer TN̂G oē HOAN JĪ CHHO·HA̍K done at their Amoy Office (Ē-Mn̂g Khek) *in* 1852.

but after the low vowels, the development was to nasalized vowels and to glottal stop[17]; after this stage, the high mid vowel lowered to a. Many SM dialects reflect this system; Hinghua has merged final nasals to -ng and final stops to -k (like Fuzhou, -k is phonetically glottal stop). Hinghua follows SM in keep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oral and nasalized vowels, but has lost final glottal stop. (And the Putian 莆田 dialect of Hinghua has also lost the contrast of oral and nasalized vowels). (*Y.H. Zhang* 1972).

Let us return briefly to PSM *-oN which has the reflex -ng in many SM dialec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n Changtai 長泰 van der Loon mentions that the value -oN is kept. (Op. cit. p. 132). This I have confirmed in recent field work. The final reconstructed as *-uiN presents greater difficulties since we must assume an earlier stage **-ueN; this forms a set with **-ue and **-ueʔ and goes back to a very early SM stage as well as being assumed for PSMHH.[18]

This paper has suggested that not all phonological differences are due to diachronic change. It is well recognized today that the problem of dialect variation may often be d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one of two or more competing forms. The Min problem is aggravated by the great mobility of many Min speakers having migrated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many from north to south, but some from south to north.[19] We may assume that much of the Min area has dialects that gradually shade into each other, as one often finds in a con-

17. See Y. H. Zhang 1972, especially pp. 4-5. Norman 1980 in describing Proto-Min adds that the high vowels are assumed to be close and rather short and the low vowels open and phonetically longer (p. 35 and 36 and footnotes 1 and 2 where Norman kindly acknowledges suggestions I had made in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18. PSMHH **-ueN > *-uiN, contrasts with another final which in Chaozhou and Quanzhou 泉州 (or Jinjiang 晉江) has the value -uiN, in Amoy -uaiN, and in Zhangzhou -uang or -uan (the latter especially in Taiwanese dialects derived from the Zhangzhou dialect system). A good example of this correspondence set is the common Min word for 'high' 縣 Chaozhou kuiN², Amoy kuaiN² and Zhangzhou kuang² or kuan².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endency for *-n to become *-ng is not limited to the Chaozhou area.

19. Yuan 1960 p. 241 and passim points out that SM dialects are also spoken in Zhejiang 浙江. Recently, Li and Chen 1982 have discussed a dialect of Zhangzhou type now spoken in the Mindong area.

tinental region; the dialect problem is made more difficult by having to assume the frequent migration of one group to another place by sea; a colony may be established and then splinter into groups that could go in any direction. An old colony can beget new colonies.

REFERENCES

Ashmore, William 1880 *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watow.

Chao, Y. R. 1975 My field work on the Chinese dialect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No. 2. pp. 3-8.

Choy, Chun-ming 1976 *A Dictionary of the Chau-chou Dialect* San-min Shu-jyu, Taipei.

Comelin, Isaak, ed. 1646 *Begin ende Voortgangh*, Amsterdam.

Dil, Anwar S. 1976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Dong Tong-he 1959 Sige Minnan fangyan. (Four South Min dailects). *BIHP* 30: 729-1042.

Duffus, William 1883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watow.

Egerod, Søren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n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Ejnar Munksgaard, Ltd. Copenhagen.

Egerod, Søren 1957 Swatow loan words in Siamese. Acta Orientalia XXIII 3-4: 137-156.

Fielde, A. M. 1878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 Swatow Printing Office Co., Swatow

Gibson, John C. 1886 *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 and to the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glas.*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watow.

Giffin, Louise 1961 *Beginning Chinese Lessons. Teochiu (Swatow) Dialect.* pp. 1-70. Mimeographed. Bangkok.

Hashimoto, Anne Yue 1970 The Liang-Yue dialect materials. Unicorn pp. 1-18.

Hashimoto, Oi-kan Yue 1976 Substratum in Southern Chinese - the Tai connectio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6: 1-9.

Hashimoto, Mantarō 1960 The Bonshio (文昌) dialect of Hainan. Gengo Kenkyu 38: 25-32.

Karlgren, Bernhard 1915-19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K. W. Appelberg, Uppsala & E. J. Brill, Leiden.

Koons, Alvin D. 1967. *Spoken Swatow.*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Hong Kong

Li Rulong and Chen Zhangtai 1982 Linguistic changes in Wănyáo, an isolated South Min dialect in the east of Fújiàn, during the past two centuries. Zhōngguó Yǔwén 1982. 5: 354-370.

Li Yong-ming 1959 *Chaozhou Fangyan.* Zhonghua Shuju, Peking

Lim, Hiong Seng 1886 *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Kohn Yen Hian Press, Singapore.

van der Loon, Piet 1967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Vol. XIII. 1-2, Part 2, pp. 95-186.

Norman, Jerry 1980. The Proto-Min fina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ponsored by Academia Sinica. pp. 35-73.

Wang, William S. -Y. and Norman Jerry *Five Fairies in Hainan.* (Produced in the 60's, mimeographed and privately circulated.)

Woon, Wee-Lee 1979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Hainan dialect, Parts 1 and 2, JCL 7. 1: 65-100 and 7. 2: 268-302.

Yuan, Jiahua 1960 *Hanyü Yanjiu Gaiyao.* Wenzi Gaige, Peking.

Zhang, Shengyu 1981 An outline of Cháoyáng phonology. Fāngyáen 1981. 1 pp. 27-39.

Zhang, Xianbao 1976 *The Haikou dialect.* MA thesi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Zhang, Yuhong 1972. *The Hinghwa dialects of Fukien. A descriptive linguistic study.* Cornell Ph. D. thesis. University Micro-films.

Latin *dormiō**

Eric P. Hamp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formation of the Latin verb 'to sleep' which have been insufficiently noticed. Certain facts of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e Latin base *dormī-* lead us immediately to recognize morphological implications.

Ernout and Meillet have claimed that this stem is a derived present from the athematic extended base **drěm-* to be seen in OCS *drěmljo*, with *m-* marking the durative state, or indeterminate aspect. At the same time they fail to motivate the use of a different extension to mark what is claimed to be the same aspect in Greek *ἔδραθον ἔδαρθον*.

Let us first note that a simple athematic in final laryngeal is to be seen in Vedic *drā́ti* 'sleeps' < **dreH-*. Now it is immediately clear that *dormī-* cannot reflect a zero-grade vocalism, for we should then not expect to find a Latin *d-*. I have shown[1] that IE **dr* regularly yields Latin *tr*. Therefore *dorm-* must be derived from **dorm-*.

If we wonder why the Greek verb 'to sleep' did not choose an *-m-* extension parallel, say, to **g^{w}em-* 'go' the probable answer is not far to seek: This had already been selected by *δραμεῖν* 'run', beside Indic *drā-*. So we find *δαρθ- δραθ-* formed in the same fashion as *πλή-θω*. It is now clear that our original base was **der-*, as others have seen, and that this occurred as a seṭ base **dreH-*

* I dedicate this essay as a token of my abiding esteem, respect, and inspiration—to the restless mind of Yuen Ren Chao, who now must sleep peacefully in the sure knowledge that he has enriched us as only the first of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1. "Sound Change and the Etymological Lexicon".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the Lexicon***,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8, 184-95; to which see the refinement on Indo-European 'thrush' KZ 95, 1981, 81.

and suffixed as **dr-dh-* (at least in pre-Greek).

On these grounds we see that *dormī-* can come only from an *o*-grade form in suffixed **-mo-*, i. e. a nomen actionis **dor-mo-*.[2] Thus the stem *dormī-* must be a denominal in origin, and cannot contain a verbal enlargement *-m-*.

We may now understand why no derived verbal noun matches *dormiō* and why *somnus* suppletes it. It is also easy to see how preverbs are so little involved with *dormiō*, with its nominal origi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lavic verb represented by Serbo-Croatian *drijèmati* and Czech *dřímati* 'slumber, doze' cannot reflect a primary formation. We must have here a derivation, with Balto-Slavic regular vocalic lengthening, of a nominal derivative formed from **dor-mó-*; that is to say, a thematic noun formed from **dormó-* would be expected to show *e*-vocalism,[3] hence **dremo-*→ **drēm-ā->drě̃m-a-*.

In Latin this denominal stem in *-ī-* from **dor-mó*, a nominalization of the base **der-* 'sleep', has supplanted the Indo-European base and stem **suep-*.

One may wonder what, apart from providing a purely Latin and Slavic solution, this Indo-European example has to offer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My purpose is to illustrate the community of problems which we encounter, despite the radical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typical situations in Indo-European and Sino-Tibetan. In the latter, as in other East Asian language families, we find that the problem of reconstruction is normally approached from a purely phonological-semantic aspect, since overt morphological criteria are typically absent from the starting data. Then from th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s, as e. g. in Karlgren's work, extinct morphology is recovered. In Indo-European, with its rich preserved morphologies, the approach is typically different. But in some instances, as in the present case, IE scholarship may well take a leaf from the Chinese book.

2. See my analysis of this formation, *KZ* in press.

3. See my formulation *Mü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40, 1981, 38 note 4, and earlier references. See also footnote 1 to the article cited in note 2 above.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Ting Pang-hsin

1. Introduction

Although different theories have been propose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ones of Archaic Chinese,[1]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there were four tone categories in Archaic (cf. Ting 1981) as well as in Ancient Chinese.[2] These tone categories might have derived from final consonants in Proto-Chinese, but eventually changed into various tonal systems in all modern dialects, such as Northern Mandarin, which has four or three tones and Cantonese, which has nine or more tones. Tonal splits and mergers were mainly conditioned by the contrast of voiceless and voiced initial consonants, and sometimes by sonority or aspiration (cf. Li 1980). In the process of tonal developments, it is worthwhile to observe some facts which may lead to new methods in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of proto-tones. Thre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2. "Sandhi tones" as proto-tones—the case of Southern Min[3]

In the Lin-kao dialect, also called the Be language, of Hainan Island, I recorded two sub-dialects having the following tonal systems:

---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to the XI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Tokyo, August 29—September 4, 1982, and was printed without my knowledge i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21. The version published here has both been revised and extended. I am indebted to Paul Jen-kuei Li and Ho Dah-an for their comments and Susan Hess for her editorial assistance.

1. Archaic Chinese denotes the language of roughly the first millenium B. C.
2. Ancient Chinese denotes the language of roughly the sixth century.
3. Mantaro Hashimoto also discussed the same problem in his forthcoming paper, to be published in this volume. Professor Hashimoto and I have almost the same idea.

	1	2	3	4	5	6
L1	35[4]	55	33	11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L2	11	55	33	22	$\underline{55}$	$\underline{33}$

There is only one case of tone sandhi that occurs in L1. For instance:

ba 35 "fish"	ba 11 kim 35 "gold-fish"
	ba 11 diam 55 "fish shop"
	ba 11 laŋ 33 "salted fish"
bui 35 "to cut"	bui 11 ŋau 11 "to cut rice plant"
tɛŋ 35 "to be born"	tɛŋ 11 ŋit $\underline{55}$ "birthday"
tsui 35 "hammer"	tsui 11 hɛt $\underline{33}$ "iron hammer"

The rising tone 35 preceding any tone changes into a low level tone 11. Compared to the tonal system of L2, which has no sandhi forms, it is quite natural to conclude that the sandhi form of tone 1 in L1 is very likely the tone value of proto-tone 1. In other words, we may consider the sandhi tone 11 as the basic or underlying form of the isolated tone 35. This differs completely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inguists in Chinese phonology. They usually use "basic tone" and "sandhi tone" to indicate the tones of a syllable in isolation and in sequence respectively. (cf. Tung 1960: 730-731). Now, we may hypothesize that the sandhi tones in sequence are more conservative in keeping the value of proto-tones.

This simple method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may be applied to much more complicated data such as that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Since Amoy is the most studied sub-dialect in this group, its tones and sandhi forms are given below:

4. Following the "tone letter" notation proposed by Y. R. Chao (1930), I use the numerals 5, 4, 3, 2, and 1 to designate different pitch levels from high, half-high, mid, half-low and low respectively. Short tones are underlined.

	1	2	3	4	5	6	7	8
	(*Yin-p'ing*)	(*Yang-p'ing*)	(*Yin-shang*)	(*Yang-shang*)	(*Yin-ch'ü*)	(*Yang-ch'ü*)	(*Yin-ju*)	(*Yang-ju*)
"Basic tones"	44	24	53		11	33	42	44
	↓	↓	↓	=6	↓	↓	↙↘	↓
"Sandhi tones"	33	33	55		51	11	44, 53	11

Bodman (1955), Wang (1967), and Hirayama (1974, 1975) presented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on these phenomena. The analyses of Bodman and Wang are essential to synchronic study but not related to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nly Hirayama (1974, 1975) proposed to choose some of the sandhi tones as the tone values of Proto-Amoy. His choice is based on two reasons: 1) A simple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for the changes from proto-tones to either "original" or "sandhi" tones in modern Amoy. 2) It should be easy to differentiate the values of proto-tones and, on the whole, to reconstruct a well-shaped tonal system. Diverging from Hirayama's proposal, I would simply take all the sandhi tones into consideration. But because tones change so easily and drastically in Chinese dialects, reconstructing the photo-tones of any dialect involves many factor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handle. The methods of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to be combine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to Amoy, four tonal systems of the main sub-dialects of Southern Min are cited as follows:

	1	2	3	4	5	6	7	8
Lung-ch'i, Chang-chou (Tung 1960)								
"Basic tones"	24	313	53		31	33	32	13
	↓	↓	↓	=6	↓	↓	↙↘	↓
"Sandhi tones"	33	33	35		51	11	44, 53	11
Chin-chiang, Ch'üan-chou (Tung 1960)								
"Basic tones"	44	24	55	33	31	31	53	35
	↓	↓	↓	↓	↓	↓	↙↘	↓
"Sandhi tones"	44	11	35	11	55	11	55, 53	11

Ch'ao-chou (Chan 1959)								
"Basic tones"	33	55	53	35	213	11	21	44
	↓	↓	↓	↓	↙↘	↓	↙↘	↓
"Sandhi tones"	23	213	24	21	42, 53	12	33, 44	21
Ch'eng-mai, Hainan (Ho 1981)	22	41	21	33	24	=1	55, 55	33, 33

The value of nearly every single "basic tone" is divergent. Depending on the above data alone, the proto-forms of these tones can hardly be reconstructed. But, except for Tone 5, all the "sandhi tones" clearly show resemblance. It seems plausible to take these sandhi tones directly as proto-tones as mentioned above. But special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Ch'eng-mai dialect in Hainan which has no sandhi forms, and may in fact presserve the tones of an earlier stage, one which had not undergone the usual tonal change, and which may therefore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s. We must make detailed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Hainan tones and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But before going any further, more data from Hainan sub-dialects should be considered:

	1	2	3	4	5	6	7	8
Ch'eng-mai (Ho 1981)	22	41	21	33	24	=1	55, 55	33, 33
Lo-hui (Ho 1977)	44	22	21	=6	13 ↓ 55	42	55 ↓ 53	22 ↓ 22
Hai-k'ou (Chang 1976)	13	22	21	=6	35	33	55	33
Ting-an (Norman 1969)	24	22	21	33	35	24	55	33
Wan-ning (Chan 1958)	33	11	21	53	13	=4, 5	44	12
Wen-ch'ang (Yüan 1960)	33	11	21	=6	24	53	44	21

Roughly speaking, Tone 1 is a half-high or mid level tone in Hainan sub-dialects. Its tone value corresponds to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We posit the value *33 for the proto-form of this tone.

Compared to Tone 1, Tone 2 is relatively a mid-low or a low level tone. Except for a few places which may have individual changes, the Hainan tones also coincide with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We reconstruct *11 for Tone 2.

Tone 3 in all Hainan sub-dialects is somewhat peculiar phonetically. There is a glottal stop which is pronounced simultaneously. I stated elsewhere (cf. Ting 1981: 276) that the glottal stop is a redundant feature of this low falling tone. It bears no significanc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language. The low falling contour is probably an innovation of the Haĭnan sub-dialects, and therefore, both the contour and the glottal stop can be neglected in the comparison. The sandhi tones of Tone 3 in Lung-ch'i, Chin-chiang and Ch'ao-chou all have a similiar contour. We posit *35 as the value of the proto-form of Tone 3.

Tone 4 shows a discrepancy between Hainan tones and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It is at present premature to reconstruct any value for Tone 4 on the data provided. More study needs to be done before we arrive at any conclusion.

Tone 5 is also problematic. Hainan sub-dialects point to a rising tone, but the sandhi tones of the other sub-dialects indicate a falling contour. These again reveal a contradictory situation. We have to leave this problem unresolved for the time being. It would seem that the Hainan tones have innovations of their own. Tone 5 had probably a falling contour in Proto-Southern Min.

The value of Tone 6 has the following varieties: 22, 33, 24, 42, 53 in Hainan; and 11, 12 in the others. Again,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a suitable solution here.

The sandhi tones of Tone 7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alue of Hainan tones. The falling tone 53 in Hainan occurs only when the syllable ends with a glottal stop.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shall be able to reconstruct a short tone *$\underline{55}$ for Tone 7.

Although Tone 8 has some different contours among the sub-dialects, the general tendency is easy to observe. Therefore, we posit also a short tone *$\underline{11}$ for this tone.

The tonal system of Proto-Southern Min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2	3	4	5	6	7	8
*33	*11	*35	?	(falling?)	?	*$\underline{55}$	*$\underline{11}$

Among these forms, Tone 1 and Tone 7 agree completely with Hirayama's reconstruction, although we proceeded from different premises.

3. Tonal Change from short to long

Scholar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probably all agree on the theory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endings -p, -t, -k of checked syllables gradually merged into -k or a glottal stop, and eventually changed to an open syllable by dropping the ending. (cf. Chen 1973). At the same time, the short tone that a checked syllable bears would usually change to a long tone. The most probable direction of this kind of change would be merging with the long tone having a similar or identical contour. This can be proven by the following evidence.

3.1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mentioned above, there are two short tones, i.e., $\underline{55}$ for Tone 7 and $\underline{33}$ for Tone 8. Ho (1981: 117) pointed out that in Lung-ch'i, another Southern Min dialect, both Tone 7 and Tone 8 are checked syllables with -p, -t, -k, and -ʔ endings, which regularly correspond to Tone 7 and Tone 8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But among these syllables, those with -ʔ ending changed from a short tone to a long one after this ending had dropped out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The contour of Tone 7, therefore, includes a long 55 and a short $\underline{55}$, while Tone 8 includes a long 33 and a short $\underline{33}$. Since there is no high level tone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the long 55 is a new tone

in the tonal system. However, since a long mid level tone 33, Tone 4, does exist, Tone 8 syllables having the identical contour naturally mixed with this tone. In order to clarify this statment, let us cite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Ch'eng-mai dialect again:

1	2	3	4	5	6	7	8
22	41	21	33	24	=1	55, $\underline{55}$ =33,	$\underline{33}$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the syllables of Tone 4 and a part of Tone 8 in the Ch'eng-mai dialect, originally different syllables in the Lung-ch'i dialect would become homophonous here. For instance:

	Lung-ch'i	Ch'eng-mai
"elephant"	ts'io 33	sio 33
"mat"	ts'ioʔ $\underline{13}$	sio 33
"ant"	hia 33	hia 33
"forehead"	hiaʔ $\underline{13}$	hia 33

3.2 The tonal change from short to long is sometimes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ones. In Yün-nan province, the most prevalent dialect spoken is South-western Mandarin which generally has four tones. Among a hundred and one prefectures, only fourteen places have five tones.[5] 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tones 1, 2, 3, and 4, there is a Tone 5 which contains only checked syllables. I chose four prefectures that have the additional Tone 5 to compare with eleven surrounding prefectures that have only four tones. All these sub-dialects are listed in two groups and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is shown in Map 1. Numerals in parentheses show narrow transcription or alternative pronunciation.

	1	2	3	4	5
	(Yin-p'ing)	*(Yang-p'ing)*	*(Shang)*	*(Ch'ü)*	*(Ju)*
P1. Lu-liang	44	53	42	24	313(312)
P2. Ch'ü-ching	33(23)	53	42	35(25)	31(312)

5. All material of Yun-nan is cited from S F. Yang 1969.

Group I	P3. Hsün-tien	44	53	31	13	42
	P4. Chan-yi	44	42	53(54)	35(25)	31(312)
Group II	P5. Hsüan-wei	44(33)	31	53	24(214)	=2
	P6. P'ing-yi	33	31	53	24(214)	=2
	P7. Lo-p'ing	44	31	53	13(14)	=2
	P8. Shih-tsung	44(34)	31(32)	53	13(213)	=2
	P9. Lu-hsi	44	31(41)	53	13(213)	=2
	P10. Lu-nan	44	31(21)	53	24(214)	=2
	P11. Yi-liang	44	42	53	11(21)	=2
	P12. Sung-ming	44	42	53	13(213)	=2
	P13. Lu-ch'üan	44	31(42)	53	313(312,212)	=2
	P14. Hui-che	55	31	53(54)	24(14)	=2
	P15. Ma-lung	44(33)	42	53	13(213)	=2

It is obvious that Group I, which has five tones, represents a dialect older than Group II, which has only four. Starting from Group II, we can see that Tone 2 and Tone 3 are both falling tones, but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tone value of the former is lower than the latter. Tone 5 syllables all merged into the low falling tone. Group I indicates two kinds of tonal systems. The first three have the same high falling contour for Tone 2, and Tone 3 is lower. But the fourth one is quite different. Near Group II, Tone 2 is lower than Tone 3 in this dialect, and therefore paves the way for the merger of Tone 5 from short to long.

Within Group I, Tone 5 syllables are pronounced short with a final glottal stop in P1 and P2, but have already changed to a long tone in P3 and P4. Since we know that Tone 5 was originally comprised of checked syllables with final stops in Ancient Chinese, P1 and P2 are thus older dialects representing an unchanged condition in Group I. The evolution of Tone 5 may have two processes:

1) $\underline{31}$ ⟶ 31 ⟶ 42 (or 41) (Tone 2)

2) $\underline{31}$ ⟶ 31 ⟶ 42 ⟶ 53 (Tone 2)

Noting the fact that Tone 2 is always lower than Tone 3 in Group II, we believe that the first process is very likely the true picture. In other words, when a checked syllable dropped its glottal stop ending, its tone would change to a long one and sometimes merge into another tone with similar or identical contour.

With this process in mind, we can posit the following tonal system for the proto-language of these two groups.

1	2	3	4	5
*44	*53	*42	*13	*$\underline{31}$

While Tone 2 changed from 53 to 42 or 31, Tone 3 went upwards from 42 to 53. This tonal shift must have taken place before the change of Tone 5, otherwise we cannot explain why Tone 5 eventually merged with Tone 2 rather than with Tone 3.

This is probably a case of flip-flop which may raise some doubts. If we reconstruct in a different way by positing *42 for Tone 2 and *53 for Tone 3, we cannot avoid to cope with the same problem in P1, P2, and P3 in Group I, where *42 would change to 53 and *53 would change to 42 and 31.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outh-Western Mandarin of Yün-nan province has a tendency that the tone categories are on the decrease from five to four. It is 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e five-tone dialects as residues which will eventally change to the four-tone system. Therefore, the values of Tone 2 and Tone 3 in P1, P2, and P3 are very likely reflect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proto-language. Although we may have different speculations on the tonal changes from the proto-system to these two groups, the exact process remains unknown.

3.3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checked syllables also exhibit another direction of change. In the Ju-kao dialect of Chiang-su, some of the Tone 6 syllables have the following sandhi forms:

p'iʔ $\underline{35}$ "other": p'i 11 ɻən 11 "others"

riʔ $\underline{35}$ "day": rei 11 tei 11 "daytime"

le? $\underline{35}$ "the winter sacrifice": le 11 yu? 11 "the twelfth lunar month"

sə? $\underline{35}$ "ten": sə 11 vẽ 11 "hundred thousand"

miə? $\underline{35}$ "to exterminate": miə 11 məŋ 35 tɕ'yu? $\underline{35}$ hu 11 "to exterminate the clan"

niə? $\underline{35}$ "to rebel": niə 11 mo 35 "rebels"

p'ɔ? $\underline{35}$ "white": p'ɔ 11 y 35 "white fish"

mɔ? $\underline{35}$ "ink": mɔ 11 lɔ 11 sə? $\underline{44}$ "a blue-black colour"

lɔ? $\underline{35}$ "six": lɔ 11 vẽ 11 "sixty thousand"

Out of ninety-nine Tone 6 morphemes, I found only the above nine which have this kind of sandhi form. The tonal system of Ju-kao is as follows:

1 (*Yin-p'ing*)	2 (*Yang-p'ing*)	3 (*Shang*)	4 (*Ch'ü*)	5 (*Yin-ju*)	6 (*Yang-ju*)
11	35	424	44	$\underline{44}$	$\underline{35}$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long tone 35 having the same contour of Tone 6. Yet, Tone 6 changed to Tone 1 instead of Tone 2.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process described above. If we call the first kind of change an example of homogeneous coalescence,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an example of heterogeneous coalescence. Here, high rising short tone becomes a low level long tone. The rule of homogeneous coalescence applies to the whole class of Tone 5 in Yün-nan, while the rule of heterogeneous coalescence applies only to a small portion of Tone 6 syllables in Ju-kao. However, there are two ways in which a short tone can change to a long tone. We must consider both of these kinds of change when reconstructing a proto-language.

4. Probabl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Wang (1967)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bidirectional tones, including the falling-rising and the rising-falling tones. Since the falling-rising tone occurs more often in Chinese dialects, here I would like to go back to seek out the origin of this marked tone.

In addition to the Yün-nan data listed above in Group I and Group II, let us examine a wider range of materials:

			1	2	3	4	5
	P16.	Feng-yi	44	31	42(41)	55(45)	24(14)
	P17.	Yün-lung	33	53	31	55	13(12)
	P18.	Erh-yüan	44	53	42	24	31(21)
'oup III	P19.	Chien-ch'uan	44	42(32)	31(41)	55(45)	13(213)
	P20.	Teng-ch'uan	44(33)	53(54)	31(41)	35(24)	11(21)
	P21.	Pin-ch'uan	33	42	53	13(14)	31
	P22.	Yen-hsing	55	53(52)	42(41)	313(213)	31

First,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varieties of Tone 4 in this group: 55, 45, 35, 24, 14, 13, 313, and 213. It is valid to describe the change from high (35) to low (13), or the other way around. But, the falling-rising 313 or 213 always occur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In Group II, Tone 4 syllables are also pronounced in falling-rising tones, such as 312, 214, 213 and 212. It seems that the proto-tone *13 shifted upwards on the one hand, and created a falling-rising tone on the other. The latter change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addition of a little falling contour to the beginning of a rising tone. At any rate, the falling-rising tone here must have derived from a rising tone, which is reconstructed as a natural result by examing the similar contours of Tone 4 in Groups II and III, no matter how we reconstruct its value.

The second phenomenon worth noticing is the change Tone 5 must have undergone. I have reconstructed a short falling tone *31 for it (see above). In Group III, two rising tones occurred.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to consider the rising tones as a later change, because Tone 5 finally merged into Tone 2 which has a falling contour. We are thus forced to change our reconstruction from *31 to *24 or *13 for Tone 5. The process of change may be restated as follows:

*24 (or *13) ⟶ 14 ⟶ 13 ⟶ 12 ⟶ 11 ⟶ 21 ⟶ 31 ⟶ 42
                               └⟶ 213 (312, 313)

Every stage of the change is actually clearly indicated in the data above, and serves to prove again that 213 is derived from a rising tone. Although I have not checked the origin of all the falling-rising tones in Chinese dialects,[6] this pattern is significan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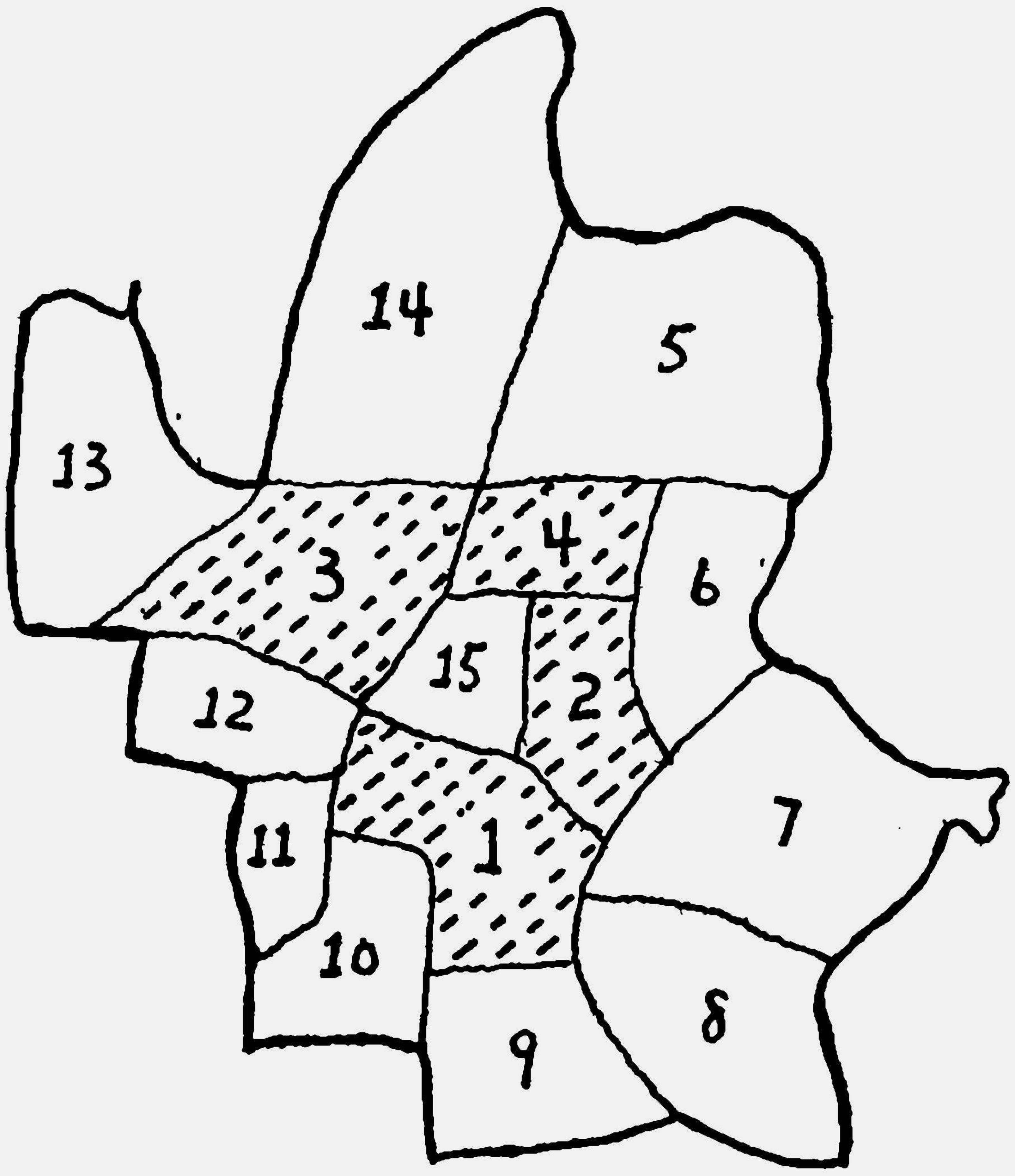
5. Conclusion

Thre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y observing these actual changes, we may propose useful methods for reconstructing tone values. For example,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well known sandhi forms in Mandarin. Tone 3 (214) syllable preceding another Tone 3 changes to Tone 2 (35). If we recognize the "sandhi form" as the proto-tone, *35 would then be the value of Tone 3 in Proto-Mandarin. As we know the rising tone is very likely th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n Yün-nan, the Mandarin 214 could also possibly be a change resulting from a rising tone. Both ways of reconstruction point to the same answer: "Mandarin Tone 3 was originally a rising t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I have illustrated elsewhere (Ting 1975) that Tone 3 (*shang sheng*) in Ancient Chinese was a high rising tone.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there are sixteen prefectures around the city of Peking. Tone 3 is pronounced falling-rising in eleven places and rising in five places.[7] Level and falling tone contours do not occur at all for this tone. I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tself is not a suitable proto-value of Tone 3, the only candidate left is a rising tone. This would coincide with my findings.

6. Another possible origin of the falling-rising tone is a low falling tone. But more study will be required before we can gi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7. According to Hopei Pei-ching Shih-fan Hsueh-yuan 1961, Tone 3 is pronounced falling-rising in the following eleven prefectures: Feng-ning, Luan-p'ing, Shing-lung, Chi-hsien, San-ho, Ta-li, Wu-ch'ing, Ku-an, Chuo-hsien, Lai-shui, and Yi-hsien, and rising only in the following five: An-ts'z, Chuo-lu, Huai-lai, Lung-kuan, and Ch'ih-ch'eng.



Group I
1. Lu-liang
2. Ch'ü-ching
3. Hsün-tien
4. Chan-yi

Group II
5. Hsüan-wei
6. P'ing-yi
7. Lo-p'ing
8. Shih-tsung
9. Lu-hsi
10. Lu-nan
11. Yi-liang
12. Sung-ming
13. Lu-ch'üan
14. Hui-che
15. Ma-lung

Map 1

BIBLIOGRAPHY

Bodman, Nicholas C. 1955, 1958. *Spoken Amoy Hokkie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Federation of Malays.

Chan, Po-hui. 1958. Wan-nin Fang-yin Kai-shu, *Wu-han-ta-hsüeh Jen-uen-k'o-hsüeh Hsüeh-pao* 1958. 1: 89-107.

——. 1959. Ch'ao-chou Fang-yen, *Fang-yen ho P'u-t'ung-hua Ts'ung-kan* 2: 40-120.

Chang Hsien-pao. 1976. *Hai-k'ou Fang-yen*.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ang, Kun. 1975. Tonal Developments Among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hereafter), Academia Sinica 46. 4: 636-709.

Chao, Yuen Ren. 193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ître Phonêtique* 45: 24-27.

——. 1933.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BIHP* 4. 2: 121-134.

Chen, Matthew. 1973.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 38-63.

Cheng, Chin-ch'üan. 1973. *A Sys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uton.

Egerod, Søren.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South Chinese Idiom*, Copenhagen.

Hashimoto, Anne O. Yue. 1980. 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irginia.

Hashimoto, Mantaro. 1961. On the Tonal System of the Bon-shio Dialect of Hainan, *Tookyoo Shinagaku Hoo* 7: 35-52.

——.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Forthcoming).

Hirayama, Hisao. 1974. Tone Values of Proto-Southern-Northern Min Dialects of Chinese, *Bungaku Tetsugaku Ronbunshuu.* 157-214.

——. 1975. Hsia-men-hua Ku Tiao-chih te Nei-pu-kou-n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 1: 3-15.

Ho, Dah-an. 1977. Hai-nan-tao Lo-hui Fang-yen te Yin-yün Yen-chiu,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1981.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Lio-vai, *BIHP* 52. 1: 101-152.

Hopei Pei-ching Shih-fan Hsüeh-yüan. 1961. *Ho-pei Fang-yen Kai-k'uang.* Hopei.

Li, Fang Kuei. 1980.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 *BIHP* 51. 1: 1-13.

Norman, Jerry.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 222-238.

Ting, Pang-hsin. 1966. The Phonetic System of Ju-kao Dialect, *BIHP* 36. 1: 573-633.

——. 197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en and Oblique Tones, *BIHP* 47. 1: 1-15.

——. 1981. Note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on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Academia Sinica. 267-283.

Tung, T'ung-ho. 1960. Four South Min Dialects, *BIHP* 30: 729-1042.

Wang, William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 2: 93-105.

Yang, Shih-feng. 1969. *Report on a Survey of the Dialects of Yunn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56.

Yüan, Chia-hua. 1960. *Han-yü Fang-yen Kai-yao*, Peking.

Ting Pang-hsin

漢語方言中聲調演變的幾個問題

（摘　要）

丁　邦　新

近年來頗有一些人討論古漢語聲調起源的問題，我自己的研究（丁：1981）認為在詩經時代已經具有以音高區別的四個聲調，就和中古音的情形類似；上古的聲調如果從韻尾輔音變來，至少也是諧聲時代的事。中古以後，四個調類由於聲母的清濁及其他因素演變為今日方言中或多或少的聲調，在演變的過程中，有一些實例可以作為我們擬測古調值的幫助。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下列三個有關聲調演變的問題來討論：

一、「變調」卽「原調」　傳統的看法認為一個字單念時的調是「本調」，連讀時的調是「變調」，本文藉海南島臨高話的實例來說明，所謂「變調」極可能就是早期的「原調」。這一種內部擬測的方法有時可以應用到相當複雜的方言裡，不過必須和比較擬測法合用，才能更進一步解決問題。本文羅列廈門、龍溪、晉江、潮州、澄邁、樂會、海口、定安、萬寧、文昌等地的閩語調值擬測閩南語的古調。

二、促調變舒調的方向　漢語史中入聲變舒聲是常見的演變，大致入聲韻尾 -p、-t、-k 先合流為 -k，再變為 -ʔ，最後消失。在入聲尾消失的同時，聲調通常也由促變舒。一般來說，入聲字總是變入調值相同或極相似的舒聲調，如海南島的澄邁，及西南官話中雲南的許多方言點；但是也有截然相反的情形，例如如皋方言中的陽入（35），連讀在韻尾消失時，不跟調值相關的陽平（35）合併，反而變為調值低平的陰平調（11）。

三、降升調的來源　從調型看來，降升調是比較不自然的一種。以雲南方言為例，降升調很可能是從升調變來，就是在升調的起頭加上一小段降調所造成的。

根據以上一、三兩點的討論，本文推測國語的上聲調可能是從升調變來，與北平四週的方言比較起來，顯示同樣的方向；跟我以前（丁：1975）從歷史的角度討論四聲調值的結論也是一致的。

The So-Called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in Fukienese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Tone Morphophonemics—

Mantaro J. Hashimoto

"Every transcriber feels that somehow [ɛ] is a variety of [e] and not a variety of [a], [ɔ] is a variety of [o] and not a variety of [ɑ]. If we took our scheme of cardinal vowels seriously, we ought not to have such feelings."[1] —Y. R. Chao

1. Introduction

Fukienese—Southern Min in particular—is well known for its intricate tone sandhi, in addition to the abundance of its musical accents commonly called 'tones'. What is referred to by this 'tone' is the syllabic intonation found in each syllable which in most cases happens to be a morpheme or word in any variet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itch contour of these syllabic intonations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jor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mes and which is reported in any descrip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rmally the one we find in a syllable (=morpheme or word) pronounced 'separately' or 'in isolation'—the one traditionally called 'original' in contrast to the modified or 'changed.' This is perhaps because the pitch contour of a musical accent in word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is believed to be the most neutral one which is not 'contaminated' by the preceding or following tones—to say nothing of the changes caused by the sentence intonation which can cooccur with sentence-final words and, overlapping the pitch contour of these sentence-final words, can greatly 'deform' their syllabic intonation (=tone).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Southern Min tone sandhi takes place such that a phonemic phrase or syntagma in Amoy (a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1 Chao 1934, 390 and Joos 1957, 51

Min), for instance, is 'marked' by changing tones of all the syllables (morphemes) but the final one in the syntagma. In other words, most Amoy morphemes in actual sentences undergo this tone sandhi, their 'original' tone being modified into the 'sandhi form'; and very few maintain their 'original' tones. These 'modified' tones are normally called 'changed tones'. This Amoy type tone sandhi is regarded as a unique feature of Fukienese or Southern Min, and very few linguists have ever noticed its unnaturalness.[2]

In this study we would like to question this traditional treatment's plausibility and propose a solution which requires to construe a set of underlying forms of tones and derive from them various shandhi forms—what correspond to both 'original' and 'changed' tones, for a better description of Fukienese tones.

2. Backgrounds of the traditiona treatment

An overall modification of primary phonemes in syntagmas or sentences is something we have seldom, in fact never, witnessed in natural languages, at least not to the degree found in this Amoy-type tonal changes.

The unnaturalness of this overall modification of syllabic intonations in the Amoy type Fukienese has seldom been felt by traditional linguists, due first of all to that wide-spread illusion that word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should be the least 'contaminated', but also to the fact that the secondary phonemes in many languages often undergo such drastic modifications. English stress reduction, Japanese and Southern Korean overall (except for the main one) reduction of accent nuclei within syntagmas, etc. are only a few instances of such modifications. It may also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intonational assimilation or dissimilation, not neutralization, among tones occurring in normal sentences takes place in non-final positions of syntagmas in many variet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syllabic intonations in tone languages have a very different nature from those of non-tonal languages and work as Bloomfield's 'primary phonemes';

2. I am glad to find, among those few, my old friend Ting Pang-hsin.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March-April, 1981.

suprasegmental distinctions between Amoy first and second tones, for instance, constitute a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 as much as, if not more than, those betweeen English *p*ot vs. *k*ot, or *shoe* vs. *due.*

Finally it may also be due to our ignorance on the phonological nature of the suprasegmental make-up of morpheme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When we enumerate a certain number of words, those occurring in the final positions carry some distinct intonations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non-final ones. Thus the first three words 'desk', 'chair', and 'blackboard' in the English phrase 'Desk, chair, blackboard, and chalk!' all carry a rising intonation, while the last word 'chalk' occurs with a falling intonation. English marks the end of this phrase with this falling intonation on the phrase-final words. When we quote a single word in isolation in English, the word is in fact uttered with this falling intonation. A similar phenomenon, though on a different level, can be observed in Amoy, too. As we mentioned above, a phonemic phrase in Amoy occurs with the tones of its non-final syllables (morphemes) all altered, leaving the final one intact,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When a single syllable (morpheme) is uttered 'in isolation', it is not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it is in fact uttered as the final syllable of a phonemic phrase which happened to consist of a single morpheme.

3. Basic premises of modern linguistic descriptions

When we find various contextual realizations of a linguistic form such that it occurs mostly as #A# but in some limited cases as #B#, modern linguists' description is, unless otherwise motivated or unless we find some strong evidence against, to set up the underlying form #A# whose contextual realizations should be defined by formulating a rule as follows:

$$\#A\# \longrightarrow \begin{cases} [B] \ / \underline{\qquad} \ C \\ [A]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Thus if an Amoy toneme assumes its surface phonetic shapes as [A] in most cases but in some limited cases as [B],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construe its underlying form as #A# than as #B#. Then, in the case of Amoy, too, wha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original' tone by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s should be the derived, 'changed' tone, and the so-called 'changed' tones should be our underlying tones. In other words, Amoy marks its syntagmas such that the syntagma-final syllables (morphemes or words) undergo major modifications. In fact, there are a few pieces of good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view of regarding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s' 'original' tones as the derived, 'changed' tones, and the so-called 'changed' tones as the underlying, 'original' tones, in the Amoy dialect of Fukienese.

4. Evidence from other Chinese dialects

A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elsewhere,[3] quite a few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maintain some of their tonal categories mutually distinct only in non-final syllables (=morphemes) of a syntagma. The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ones 1 and 2 in many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for instance, is neutralized in the syntagma-final positions. In other words, if we count Northwestern Chinese tones occurring in syllables (=morpheme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and ignore those occurring in other positions we fail to recognize one toneme altogether. This is because morpheme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are in fact compounds whose non-final morphemes are zero's. As mention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morpheme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carry tones with their syntagma-final make-up. It is imperative, in other words, to consider tones in words not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in those dialec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orrect tonal system.

The case for some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is even more serious. The Paoting dialect of Hopei, for instance, has in all six phonologically distinct tones. Among them, Tone 4 merges with Tone 6 in the non-final position of a syntagma but with Tone 3 in the syntagma-final position. In other words, Tone 4 in Paoting will become a *ghost tone*, unless a proper underlying toneme is set up for this elusive tone. In fact, an analysis of Paoting tones written some two decades ago describes the sandhi behavior of this tone in the following way:

3. Giet 1946, 251-3 and 1950, 105ff, Yang 1960, Zavjalova 1978 and 1979, and Hashimoto 1981.

> The third tone (which in fact includes our Tones 3 and 4!) alternates with the fourth tone (our Tone 5) *in some words* but with the fifth tone (our Tone 6) *in some other words.*

In other words, what should be described as a purely phonological phenomenon is treated as a lexical one in this traditional analysis of Paoting tones.

These instances clearly show that a naive, traditional way of describing Chinese tones by counting tones in words pronounced 'in isolation' can be applicable to some simple dialects like Pekinese or some of its variants. For others—in fact even for Pekinese, as discussed elsewhere[4]—we definitely need a set of underlying tonemes determined independently of this 'pronunciation in isolation', in order to properly account for their intricate tone sandhi phenomena.

5. Amoy tones and their sandhi forms

Since the days of Chiu Bien-ming[5], Amoy 'original tones' have been described to undergo the following 'tone-changes' and occur as 'changed tones' in non-final positions in ordinary syntagmas: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Tone-5 (yang-ch'ü: middle-level)
Tone 2 (yang-p'ing: high-rising)⟶ 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
Tone 3 (yin-shang: high-falling)⟶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Tone 4 (yin-ch'ü: low-falling)⟶ Tone 3 (yin-shang: high-falling)
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Tone 4 (yin-ch'ü: low-falling)
Tone 6 (yin-ju: low-staccato)⟶ Tone 7 (yang-ju: high-staccato)
Tone 7 (yang-ju: high-staccato)⟶ Tone 6 (yin-ju: low-stacca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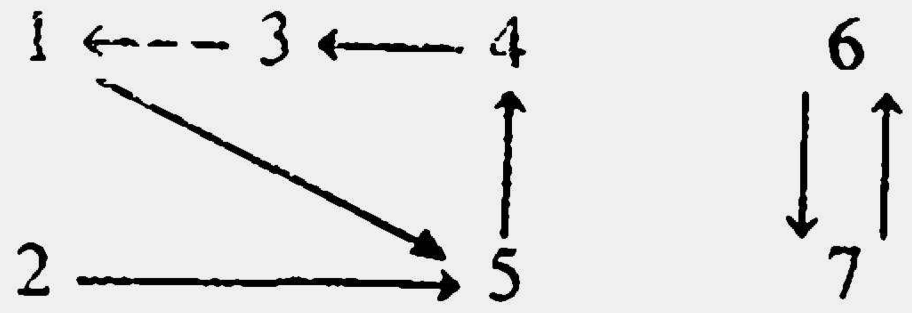


Chart 1: Amoy tone alterna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Now if most of those 'changed tones' can be assumed to represent the

4. Hashimoto 1981, 155.
5. Chiu 1934.

underlying forms of these seven tonemes, and if we substitute a middle-rising tone for Tone 2, the direction of this 'change' (alternation) can be reversed as shown in Chart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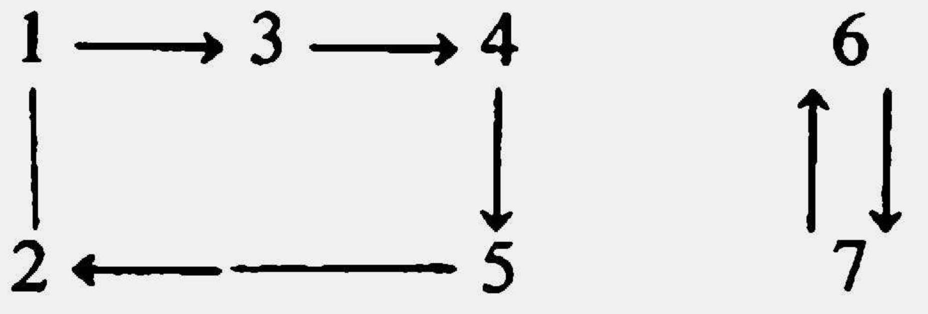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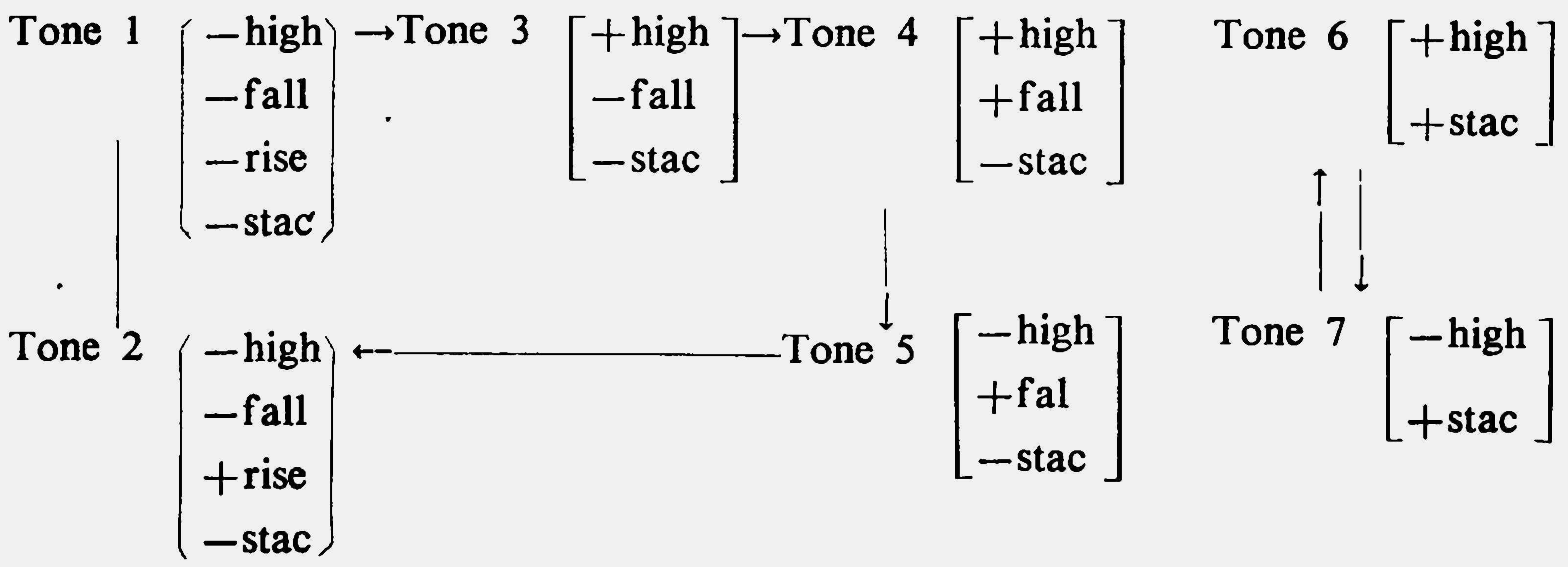


Chart 2: Amoy tone alternation in our treatment

In terms of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high], [fall(ing)], [ris(ing)], and [stac(cato)], these seven tones can now be described to undergo the following alternations:



These alternations can be formulated as follows:

$$\left\{\begin{array}{ll} [\alpha\ \text{high}] \longrightarrow [-\alpha\text{high}] & \text{if: } \begin{bmatrix} \text{———} \\ +\text{stac}\end{bmatrix} \\ \begin{bmatrix}\alpha\ \text{high}\\ \beta\ \text{fall}\end{bmatrix} \longrightarrow \begin{bmatrix}-\beta\ \text{high}\\ \alpha\ \text{fall}\end{bmatrix} & \text{otherwise}\end{array}\right\}$$

This rule is in fact little more than a mere 'translation' of William S-Y. Wang's rule.[6]

6. Advantages of our treatment

Advantages of our treatment can be seen in two aspects of Fukienese

6. Wang 1967, 103-105.

phonology. In the diachronic aspect, our treatment reflects certa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of Fukienese phonology.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Amoy (or similar Fukienese) tones is that the *yin* series (which used to constitute a high series) has been going to low,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yang* series (which can be assumed to have been a low group) has tended to go to high. Our derivation of the high sandhi tones of the *yang* group from the low underlying forms exactly reflects this tendenc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is general tendency and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line of Fukienese tonal developments, the synchronic morphophonemic rules will turn out to be internally inconsistent—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gives us higher underlying tones for the *yang* series which have to be developed into low tones (Tone 2—from a high-rising tone to a low-level tone, Tone 5—from a middle-level tone to a low-falling tone, and Tone 7—from a high-staccato tone to a low-staccato tone), which is very obviously conflicting with this general tendency, as *yang* tones can be considered to have originally constituted a low series because of the voicing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of syllables which carried these tones—the change could not have been from high to low.

In the synchronic aspect, our treatment sheds much light on the study of the phonology of other Fukienese dialects. Fukienese spoken in Formosa is pretty close to this Amoy dialect; its tone sandhi is also practically identical with that of Amoy, in their tonal categories as well as in their tone values. Among the Fukienese dialects spoken in Formosa, that of Yilan, at least its sound system, differs very little from the standard Taipei dialect, though one can immediately detect dialec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in their phonetics and lexicon. According to a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the Yilan dialect has the following seven tones which undergo tone sandhi as tabulated below:[7]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
Tone 2 (yang-p'ing: middle-rising)⟶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
Tone 3 (yin-shang: high-falling)⟶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7. Lan 1980, 41-43.

Tone 4 (yin-ch'ü: low-falling)⟶ Tone 3 (yin-shang: high-falling)

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Tone 4 (yin-ch'ü: low-falling)

Tone 6 (yin-ju: low-staccato)⟶ Tone 7 (yang-ju: high-staccato)

Tone 7 (yang-ju: high-staccato)⟶ Tone 6 (yin-ju: low-staccato)

Even though Yilan tones and their sandhi rules are, as one can see from the above chart, practically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Amoy, there are a couple of very puzzling, exceptional alternations—puzzling as long as we follow this traditional treatment.

First, Tone 6 (yin-ju; LOW in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when carried by a syllable with a glottal stop ending, alternates with Tone 3 (yin-shang; HIGH-falling by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In our treatment, the underlying form of Tone 6 is construed as a HIGH tone, which can easily go to Tone 3, a HIGH-level tone in our treatment, once the glottal stop ending of these Tone 6 syllables is lost in compounds. Second, Tone 4 (yin-ch'ü; LOW-falling i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goes to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by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when carried by a syllable (=morpheme) followed by a certain suffix. In our treatment, since the underlying form of Tone 4 (yin-ch'ü) is construed as a HIGH-falling tone,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one 4 goes to Tone 1 (yin-p'ing) which, in our treatment, is at least a MIDDLE-level tone. Third, Tone 1 (yin-p'ing; HIGH-level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and Tone 5 (yang-ch'ü: MIDDLE-level i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go to Tone 2 (yang-p'ing; MIDDLE-rising in the traditional treatment) when they occur in triplicated stative adjectives—a unique word formation in Fukienese. A change from Tone 5 (MIDDLE-level) to Tone 2 (MIDDLE-rising) may not be too bad here, but a change from Tone 1 (HIGH-level) to Tone 2 (MIDDLE-rising) is not very natural. Again, switching of only one underlying tonal feature is necessary for the change from Tone 1 to 2, if one accepts our underlying forms of these tones.

7. Other Fukienese dialects

This analysis can be applied to most Southern Min dialects reported in various

publications, like Ch'üanchou and Lunghsi (two major variants of Southern Min), and to some Southern Min dialects spoken in the Kwangtung Province like Chiehyang. Two important points have to be clarified here,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misunderstandings.

As can be seen from our treatment of Tone 2 in Amoy (for which we construed a middle-rising underlying tone, instead of a middle-level), what we are proposing is to set up underlying forms for Chinese tones which will best account for their intricate tone sandhi phenomena, not necessarily proposing to regard all of the so-called 'changed tones' by the traditional analysis as the underlying tones. In the case of Amoy, it happened that most of the underlying forms thus construed coincide with the so-called 'changed tones'. It is thus a matter of convenience to have said above that what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changed tones' should be the underlying tones and what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original tones' have to be the derived tones—though it will really lead to a better solution in general, if we switch them around as proposed above, as less decayed forms can be better kept in compounds (as their non-final morphemes) than in words pronounced separately or 'in isolation'. There are, however, some Southern Min dialects to which such a switching is not applicable. The Ch'aoyang dialect of Fukienese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is apparently one of them. Ch'aoyang tones undergo, as they are reported in recent publications,[8] a greater neutralization of tonal distinctions in the non-final position of syntagmas than in the final position, so that tonal features in syllables occurring in the non-final position of syntagmas do not provide us with much clue for establishing appropriate underlying forms, at least not as much as Amoy 'changed tones' do.

The final advantage of our analysis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here concerns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nature between the Amoy-type and the Foochow-type tone-sandhi.

The basic linguistic function of the Foochow-type tone-sandhi is also marking of syntagmas, just as in the case of Amoy. As it is reported in the *Outline of*

8. Chang 1979 and 1980.

Chinese Dialects,[9] the Foochow tone sandhi observed in disyllabic words is clearly a matter of assimilation and/or dissimilation among cooccurring tones. The Foochow dialect has the following seven tones, as they are reported in the same publication:

Tone 1 (yin-p'ing):	a high-level tone
Tone 2 (yang-p'ing):	a high-falling tone
Tone 3 (yin-shang):	a low-falling tone
Tone 4 (yin-ch'ü):	a falling-rising tone
Tone 5 (yang-ch'ü):	a rising-falling tone
Tone 6 (yin-ju):	a low-staccato tone
Tone 7 (yang-ju):	a high-staccato tone

Foochow tone sandhi in disyllabic words takes place as follows:

Tone 1 (high-level)+Tone 1 (high-level)⟶ high-level+high-level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1 (high-level)⟶ high-level+high-level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1 (high-level)⟶ high-level+high-level

Tone 1 (high-level)+Tone 2 (high-falling)⟶ high-level+high-falling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2 (high-falling)⟶high-level+high-falling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2 (high-falling)⟶high-level+high-falling

What we observe here is very straightforward: any tone followed by a high tone goes to a high-level tone. This can be formulated as follows:

[X]⟶[high level] /_____ [high tone]

Needless to say that this is a very clear case of assimilation between cooccurring tones.

Tone 1 (high-level)+Tone 4 (falling-rising)⟶ high-falling+falling-rising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4 (falling-rising)⟶high-falling+falling-rising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4 (falling-rising)⟶high-falling+falling-rising

9. Yuan *et al* 1962, 296-300.

Tone 1 (high-level)+Tone 3 (low-falling)⟶ high-falling+low-falling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3 (low-falling)⟶high-falling+low-falling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3 (low-falling)⟶high-falling+low-falling

Tone 1 (high-level)+Tone 6 (low-rising)⟶ high-falling+low-rising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6 (low-rising)⟶high-falling+low-rising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6 (low-rising)⟶high-falling+low-rising

Tone 1 (high-level)+Tone 5 (rising-falling)⟶ high-falling+low-rising-falling
Tone 4 (falling-rising)+Tone 5 (rising-falling)⟶high-falling+low-rising-falling
Tone 5 (rising-falling)+Tone 5 (rising-falling)⟶high-falling+low-rising-falling

What is underlying the above alternations is also quite clear; that is, any tone goes to a high-falling tone whenever followed by a tone which starts with a low beginning. This can be formulated as follows:

[X]⟶[high-falling] /_____ [low tone]

Somewhat different in its nature from the alternations listed above are the following changes:

Tone 3 (low-falling)+Tone 1 (high-level)⟶ high-rising+high-falling

Tone 3 (low-falling)+Tone 4 (falling-rising)⟶high-rising+falling-rising
Tone 3 (low-falling)+Tone 5 (rising-falling)⟶high-rising+rising-falling

The underlying regularity here is: a low-falling tone always goes to a high-rising tone whenever followed by another tone. We formulate this regularity as follows:

[low-falling]⟶[high-rising] /_____ [X]

This is obviously a case of neither assimilation nor dissimilation.

Thus a great majority of tone sandhi in Foochow is more like the Mandarin sandhi of Tone 3, namely:

Tone 3⟶Tone 2 /_____ Tone 3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moy-type sandhi. It seems that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can ha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one sandhi. One is for marking syntagmas through altering tones of the final syllables like Amoy. The other is also for marking syntagmas but in the form that certain tones within a syntagma undergo tonal alternations, due to the assimilation or dissimilation among themselves. It happened that Pekinese, the standard language of modern China, has both of them. First, Pekinese Tone 3 takes a special form, a falling-rising tone, when it occurs at the end of a syntagma, but otherwise remains as a low-level tone. Thus the occurrence of this falling-rising tone for Toneme 3 can mark the end of a syntagma. Second, Tone 3 alternates with Tone 2, when it occurs in the non-final position within a syntagma and followed by another Tone 3. Thus when we hear an underlying Tone 3 morphemes pronounced with Tone 2, we realize that we are still within one syntagma, not having reached the end.

Now a majority of tone sandhi in Northern Chinese is of the second type. It is prevalent in the so-called Central Plains dialects like Pekinese, but also found in many Northwestern Mandarin like Sian[10] and many of the Dungan dialects spoken in Soviet Kirghizia,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all originally from Northwestern China).[11] The first type seems to be wide-spread among southern dialects, particularly among Southern Min and in some Hakka dialects spoken near the Southern Min area. Considering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Foochow dialect, it is then hardly suprising to find in Foochow more Northern type tone sandhi. We may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dialectal grouping like Fukienese does not assure that all the subdialects that fall in that group, regardless of their subgrouping 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share the identical phonological features.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question phonological homogeneity of a large group of dialects. The Foochow dialect can be that much different from Amoy as far as their phonology is concerned, even though they may belong to the same dialect group and share many cognate lexical items and/or certain similar syntactic structures.

---

10. Sun 1961, 28.
11. Zavjalova 1979

8. Summary

To regard most Amoy 'changed ton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as their underlying forms is already implicit in an attempt at reconstructing Proto-Min tones by 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mainly on the 'changed tones.'[12] This view has also found a strong support in a typogeographical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ltaic linguistic structure which invad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north and with the Tai and/or Austroasiatic contact observed throughout southern half of the Chinese speaking territory—a study which lead to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Amoy-type tone-sandhi is basically a syntagma-final modification of tones instead of the non-final alternation.[13] We have pointed out in this study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one sandhi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reliance on the non-final, so-called 'changed tones' in construing the underlying forms is a mere accident in the case of Amoy tones—what is more essential is to determine a series of underlying tones with which we should be able to account for the tonal phenomena related to the syntagma marking in Chinese in general. This should be, and in fact have been, done for any reasonable description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the case for Chinese can not be an exception.

BIBLIOGRAPHY

Chang, Sheng-yü 1979. Ch'ao-yang fang-yen te lien-tu pien-tiao [Changed tones in continuous readings in the Ch'ao-yang dialect]. *Fang-yen* [*Dialects*] 2. 93-121.

______ 1980. Ch'ao-yang fang-yen te lien-tu pian-tiao (2) [Changed tones in continuous readings in the Ch'ao-yang dialect]. *Fang-yen* [*Dialects*] 2. 123-136.

Chao, Yuen Ren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Li-shih Yü-yan Yan-chiu-so Ch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12. Hirayama 1974.
13. Hashimoto 1979.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4. 363–398; slightly revised in Joos 1957. 38–54.

Chiu, Bien-ming 1934. Th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tone behaviour in Hagu (commonly known as the Amoy dialect) and their relation to certain questi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Hsia-men Ta-hsüeh Hsüeh-pao* [*Bulletin of Amoy University*] 2:2. 1–82 (Reprinted with revisions from the *T'oung Pao*).

Giet, Franz 1946. Phonetics of North-China dialects—a study of their diffusion. *Monumenta Serica* 11. 233–267.

_____ 1950. *Zur Tonität Nordchinesischer Mundarten.* Studia Instituti Anthropos 2. Wien-Modling: Verlag der Missionsdruckerei St. Gabriel.

Hashimoto, Mantaro J. 1979. Typogeography of phonotactics and suprasegmentals in languages of the East Asian continent.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13. 153–164.

_____ 1981. A phon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yllabic intonantions in the so-called tone languages. Andrew B. Gonzalez & David Thomas, Eds.: *Linguistics Across Continents: Studies in Honor of Richard S. Pittman.* Manila: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hilippines and Linguist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LSP Monograph Series, No. 11). pp. 147–155.

Hirayama, Hisao 1974. Chuugokugo binnan binhoku so-hoogen no seichoo choochi [Tone values of Proto-Southern-Northern Min dialects of Chinese]. *Bungaku Tetsugaku Ronbunshuu* [*Papers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57–214.

Joos, Martin, Ed. 1957. *Readings in Linguistics—The Development of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in America since* 1925.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Lan, Ching-han 1980. *Chuugokugo Giran Hoogen Goishuu* [*Vocabulary of the Yilan Dialect of Chinese*]. CAAAL Monograph Series 4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14).

Sun, Fu-ch'üan 1961. Sian fang-yen te pien-tiao [Changed tones in the Sian dialect]. *Chung-kuo Yü-wen*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100. 28–29.

Wang, William S-Y. 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3: 2. 93–105.

Yang, Paul F-M. 1960. Hotei tooryo hoogen no seichoo [Tones of the Tunglü dialect of Paoting]. *Chuugoku Gogaku*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97. 9–13.

Yüan, Chia-hua 1960. *Han-yü Fang-yen Kai-yao* [*An Outline of Chinese Dialects*]. Peking: Wen-tzu Kai-ko Ch'u-pan-she.

Zavjalova, Olga I. 1978. Some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Dungan dialect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9. 1–24.

______ 1979. *Dialekty Ganjsu.* Moskva: Izdateljstvo "Nauka."

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

杜　正　勝

一

五十多年前，胡適先生作「說儒」，以所謂儒的本質和其來歷互相發明，認爲最初的儒者都是殷遺民，穿戴殷時的衣冠，習行殷人的古禮。他們是周人所征服、統治和鎮壓的下層民族，飽嚐亡國的慘痛，因此養成柔儒謙遜的人生觀。在動輒得咎的環境裏，不敢進取，只好等待，故「儒」字從「需」。他們所等待的是「時有達者」的大預言的實現，胡先生猜想這個預言就是殷亡五百年後，有大聖人出世。這位大聖人即是「丘、殷人也」的孔子。按胡先生說，這就像希伯來人亡國後的彌賽亞懸記。在預言應驗之前，殷遺民秉其深厚的文化教養爲周人治喪、相禮，代代相承，餬口於四方。不過，孔子終於只作了「素王」，並非眞正恢復殷商王朝的王者，正如作爲希伯來人救世主的耶穌一樣，不能將天國建在人間。然而孔子卻把殷遺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人人可以仁爲己任的儒，把柔弱順媚的儒改造成剛毅進取的儒。胡先生相信他不但發掘到儒的本質，也拈出儒者的來歷，可以補章太炎「原儒」之不足。

「說儒」激起馮友蘭（原儒墨）、郭沫若（駁「說儒」）、錢穆（駁胡適之說儒）等先生的批判，除馮氏稍作歷史探討，指出殷商貴族雖亡國之餘仍有土有民以外，其他各家皆就儒的本質駁議，絕少觸及胡先生自許的來歷部分。誠如郭氏之論，「說儒」建立在孔子與耶穌的對比上，也就是有勝國的慘痛和孑餘的悲哀，乃有儒。批評者對於胡先生的大膽假設大都默認，但那是和傳統的歷史解釋截然不同的。

※ 本文初稿曾在國際商文明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NG CIVILIZATION, 1982年9月7～11日，夏威夷檀香山市）宣讀。

討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應與殷周革命的解釋分開，唯向來多混作一談。自戰國以下，文、武和商紂的臉譜已經定型，周革殷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彖辭）的義舉，百家少有異辭。武王伐紂既然是「救民於水火」（孟子滕文公下）的聖戰，他又是一位仁義聖王，殷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不暇，豈會遭受慘痛的苛待？但此正統解釋王充已疑「非其實」，（論衡語增）提倡懷疑精神的胡適先生當然不會輕易接受，何況他又特別表彰王充的思想呢！古文尚書有武成篇，可能即今存逸周書的世俘篇[1]；武成描述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論衡語增）世俘記載武王「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七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慘烈絕不下於「浮杵」。胡先生於世俘雖無專文論述，但從「說儒」的邏輯來看，他也樂於接受世俘的。另外有一批講奴隸制的歷史家，沿襲胡適先生的論點，配合既定的史觀，不是說殷遺民被嚴密壓迫，（岑仲勉，「宜侯夨𣪘」銘試釋）就是說整個夷爲周族的奴隸。（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郭沫若的中國史稿這兩部普及讀物亦皆明言殷商貴族當了俘虜。在這個問題上，奉行歷史階段論的唯物史家襲取疑古史家的前提，而賦以教條色彩，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徹底否定傳統對於殷遺民遭遇與地位的看法。

可是所謂殷遺民的「亡國慘劇」，考察西周與春秋的可信史籍固然無徵，檢點新舊銅器銘文也難以佐證。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已經發現周誥記載周人對待殷遺用一種「相當懷柔的政策」。雖然他仍然堅信周人只放任舊來禮俗，至於統治權則牢牢抓住，故胡適先生引爲「同道」。爾後如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白川靜（金文通釋）兩位先生及本文作者（周代封建的建立）皆陸續闡揚安撫懷柔之論。西周銅器銘文顯示，殷代邦國貴族的後裔在周王朝依然任官治民，有職有守，他們有能力而且獲准鑄造家國重器，當屬統治貴族無疑。然而學者從語言、曆法、制度等方面分析逸周書世俘篇，確定爲西周的作品，（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夏含夷，武王伐商的「新」證據）那麼，和金文資料豈不矛盾嗎？

---

1. 周書武成篇見引於劉歆世經，（漢書律曆志上）劉歆所立古文尚書也有武成一篇，後亡，據鄭玄說，亡於東漢初年建武之際。顧頡剛認爲今逸周書世俘中有世經所引之武成紀日三節，而「武王狩」一節復合於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之說，故定世俘即武成。見「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

逸周書本身卽可解答這項疑問。舊本逸周書第三十六篇克殷，第四十篇世俘，朱右曾作集訓校釋，移世俘作第三十七，「使與克殷相次。」這番更動不但合理，而且很有意義。克殷獎勵降順，世俘警誡不服。任何戰爭皆有投降和抵抗的人，兼具二者，乃得全豹。當「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克殷）時，豈不正如孟子說的：「（武）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盡心下）殷人額角觸地，叩起頭來像山陵崩塌般地發響。這種順民自然「尙有爾土」，「尙寧幹止。」（尙書多士）至於桀驁不馴者，非劉卽伐，非俘卽馘，亦人世之常情，不值得驚異。所以不論傳統解釋或晚近新說，總將征服時的戰況和征服後的處置連屬比類，委實是不必要的錯誤。我們在討論殷遺地位之先，須把這一層釐淸。

不過話說回來，投降的殷遺並非只擅長於叩頭而已，他們和洪承疇之流的「漢奸」也不一樣。時代不同，政治社會結構差異，倫理觀念有別，不宜一律以今視昔。今天再提出殷遺民遭遇與地位的老問題，闡釋傳統可信史籍，分析新舊銘文資料，一則欲正半個世紀以來的視聽，同時希望藉殷遺地位問題窺測商周政治社會結構的一些特質。至於本文的「殷遺」，以殷商貴族及其後裔爲限，不是泛指殷代的東方氏族。少數族姓不易肯定者，因爲行文方便，間或論及，但總以與殷王室有關係者爲主。

一

根據先秦典籍的記載，殷遺民的政治社會地位並不低，也絕無備受壓迫的痕迹。左傳定公四年云：衞史祝佗論述周初封建，魯、衞瓜分大批殷遺民，其政治措施皆沿襲前朝舊貫，他稱作「啟以商政」。「商政」的內容我們從尙書可以尋得一點端倪。

周公二度定殷後，以殷商舊都封給康叔，是爲衞國。他諄諄告誡康叔，謹愼治國，其辭見於尙書的康誥、酒誥和梓材三篇。周公的誥辭可以算是衞國建國的綱領，統御殷遺民的總則。然而周公並沒有要康叔設警察來監視殷人，也未專置軍隊以事鎭壓；相反的，卻一再強調重視殷商的優良傳統，薦舉殷商的老成人。這三篇誥辭尤以康誥爲主，所述的商政大要不外以下三點。第一、「紹聞衣（殷）德言，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普遍求索殷商歷代哲王的嘉言懿行，作爲周統治者的典範，以保

養殷人。殷先哲王大概如酒誥所指「自成湯咸至于帝乙」等成就王業的明君，譬如逸周書商誓篇云：「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的成湯；尚書無逸所羅列的祖乙、武丁和祖甲。祖乙「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武丁「時舊勞於外，爰及小人，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我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這些殷先哲王共同的特點是洞悉民隱，勤勞民事，康叔效法他們，才能「應（膺）保殷民。」第二、與平民最有切身關係的刑罰律令要因襲殷法。周公一則曰：「陳時臬司（法律），師茲殷罰有倫。」採擇允當的殷刑，作爲新法。再則曰，一旦執刑，當「蔽（斷）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根據殷法裁斷，所刑所殺乃得其宜，非康叔封一人恣肆其意。不過，「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則刑戮不赦。按尚書微子篇云，殷之末造，社會秩序蕩然無紀，連供奉神明的犧牲也有人敢偸竊取食；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可以想見當時殺人越貨，盜賊横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莫大的威脅。這方面的刑罰愈嚴厲，殷遺民必愈歡迎。至於拘繫嫌疑犯，周公告誡康叔須愼重處理，切莫草率定讞，五日、六日、十日，以至於三個月纔下判決。今天看來，也頗尊重人權的。第三、應該「丕遠惟商耇（老）成人，宅心知訓。」虛心訪問殷遺之老成典型，求教治國之道，並且擢用舊族，協理政事。這批人酒誥叫作「獻臣」，梓材叫作「大家」，逸周書皇門篇叫作「大門、宗子、勢臣。」他們作爲康叔的「股肱」，輔治「妹土」。

延攬殷商舊族巨室參與政事是收攬民心最有效的政策。殷太師曾對微子啟說過，紂王「乃罔畏畏（威），咈（違）其耇（老）長、舊有位人。」（尚書微子）武王牧野誓師，列舉商紂罪狀，亦曰：

>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泯）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遺父母弟，不迪（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尚書牧誓）

誓師之辭容有渲染歪曲，但指責商紂的過失遠較後代傳述者平實，與殷人亡國前的檢討也不謀而合，應當可信。商紂棄絕「舊有位人」，周人反而重新扶植他們，對這些舊族巨室而言，豈非革末世之弊，復先王之美政乎？康侯封手下的逘卽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

現在收藏在不列顛博物館的康侯簋作器主人是渣嗣土逘，當正名作渣嗣土逘簋。簋銘曰：「王來伐商邑，祉令康侯啚（鄙）于（于）衞。渣嗣土逘眔啚（鄙），乍（作）氒（厥）考尊彝。𠁁」（錄遺，157）主人名逘，嗣土（司徒）是他的官職，渣是他的領地，𠁁是他的族徽。渣，沬之繁體，通沬，即妹。（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㈠）妹即詩鄘風桑中的「沬鄉」，尚書酒誥的「妹邦」和「妹土」，地近淇水，在殷都範圍之內。𠁁，著錄的銅器銘文有Ƴ𠁁乙斝和Ƴ𠁁觚，就銘文風格而論是標準的商器，推知𠁁爲殷商族，所以逘當是殷遺民。傳世的逘器不少，或稱𠁁渣伯逘，或稱𠁁逘，或稱𠁁渣，或稱𠁁渣伯，可能與渣嗣土逘簋同屬一人之作[2]。周公東征，滅武康，建侯衞，簋銘云：「祉令康侯啚于衞，」當指此事。啚即鄙，廣雅釋詁云：「國也。」鄙于衞即建國于衞。眔有逮、及之義，沬司徒逘輔佐康叔封建國，故曰「眔鄙」。（楊樹達，關涉周代史實之彝銘五篇）逘稱沬伯，可能是殷的舊爵，又稱沬司徒，當是入衞以後的職官。司徒掌理土地和人民，他既是「舊有位人」，又是顯赫的「殷獻臣」，爲康叔之股肱是無可置疑的。

尚書酒誥提到的殷獻臣，外服有侯、甸、男、衞、邦伯，內服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及百姓里居（君）。逸周書商誓篇，周王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百官、里居（君）、獻民。」該篇一再稱呼「百姓」「爾百姓」「商百姓」「商庶百姓」「爾百姓獻民」「爾百姓里居君子」[3]，這是周王直接命誡殷商舊族的誥辭。「百姓」金文作「百生」，成王時的士上盉曰：「王令（命）士上及史寅廏于成周，禮百生豚。」（三代，14,12.2）百姓也是貴族，故周天子大會諸侯百官於成周時，天子餽于豚肉。春秋末葉，楚觀射父亦曰：「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國語楚語下）按照以上的分析，殷遺民的政治權也沒有被褫奪。

---

2 Ƴ𠁁乙斝，三代，13.48 8；Ƴ𠁁觚，三代，14.17.6；𠁁渣白逘卣，貞古，2.14；𠁁渣白逘尊，三代，11.31 1；𠁁逘鼎，三代，3.5.6；𠁁逘爵，三代，15 37.4-6；𠁁渣白鼎，三代，3.16.2。

3 「里君」之稱通見於銘文，如令彝、史頌簋，但文獻多誤作「里居」，酒誥、商誓各篇皆是，惟逸周書嘗麥篇作「里君」是正確的。商誓篇的「爾百姓里居君子」原來可能作「爾百姓里君」，後來誤將酒誥的「居」竄入，「君」仍保留，但「里居君」不詞，又加「子」而成爲「里居君子」。

衞是殷人二百七十三年的舊都，魯也作過南庚和陽甲的都城。（古本竹書紀年）周初分封時，衞得殷民七族，魯得殷民六族，「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定四）兩國的國情與施政頗多雷同，難怪孔子說：「魯衞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因此，康誥所述的商政也可以類推到魯國，可惜魯典殘闕，無法一一求證了[4]。但祝佗說過，魯的殷遺六族「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職事于魯。」（左定四）他們和衞的「殷獻臣」一樣，亦有內服、外服職事的。

當然，殷遺民得以保持政權必有一定的條件，首先要老老實實作個「不侵不叛之臣」。康誥說得很清楚，「不率大戛（法）」的臣工「乃別播敷（散佈），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病）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伐）。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刑）殺。」凡訛言惑眾，製造自己的聲譽，不率舊章，而危害到國君者，罪大惡極，立刻斬除，絕不寬赦。此之謂「義刑義殺」。逸周書商誓篇，周天子對商眾貴族說：

> 上帝肆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家邦君、商庶百姓，予則□（虔）劉滅之。

「虔劉滅之」乃周人對於頑抗不馴者的一貫態度，周公警告西遷成周的「殷頑民」即是典型的例子。他誥誡「殷遺多士」「比事臣我宗，多遜」的多士篇，三千年以下讀之，周公森厲威毅的容貌猶在目前。他說，殷士！你們如果謙遜服從，「奔走臣我，」「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還能擁有田邑，保持職官；否則，不但田邑被剝奪，連生命也不保。最後，一再叮嚀，乖乖聽話就可以安安頓頓過一輩子。（「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尚書多方篇記載成王大會諸侯于宗周，也以同樣口吻威脅殷遺多士和東土大族，復加之以利誘。如果「不忌（諆）于凶德」，穆穆在位，在自己的國家田邑效命周王室，「我有周惟其大介賚（賜）爾，迪簡（選）在王庭，尚（加）爾事，有服在大僚。」不但可以獲得賞賜，特別忠心可靠者還有機會被挑選到周王庭擔任重要的職位。

總之，周族征服者不論多嚴厲，只要不造反，不叛逆，殷遺民仍然不失其土地和

左定四：「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伯禽，杜預注云，周公世子。孔穎達疏引劉炫曰：「伯禽爲命書。」從下文「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來看，劉說較長。

人民，甚至可以有新的權位。若說周的警告正顯示殷的亡國之痛，責於周人者未免太苛。即使周王近親，一旦背叛王室，不亦殺伐無赦嗎？我們總不能說管叔、蔡叔也是勝國餘裔吧。大雅文王云，億萬商人「侯服于周，」「殷士膚敏（美貌敏捷），祼將于京。」既曰「侯服」，又曰「膚敏」，便絕對不是「青衣行酒」了。

殷遺民不但沒有遭到特別的壓迫，周人對殷商的繼承者——宋國反而特殊禮遇，春秋史事猶有蛛絲馬迹可尋。西元前 636 年鄭卿皇武子謂鄭伯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周王待宋君以客禮，不以臣屬，宗廟祭祀則餽贈祭肉，宋弔周喪，周王要拜謝。（左僖二十四）周頌有客，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箋云：夏殷「二王之後爲客。」振鷺篇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詩序也認爲是「二王之後來助祭」的頌詩。在周代封建禮制中，宋君地位高於諸侯一等。鄭育箴膏肓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左文五疏引）諸侯相於的喪禮如周天子對杞、宋，宋君在周禮中爲客不爲臣明矣。淸吳大澂編著的愙齋集古錄有一件愙鼎，銘曰[5]：

> 兄（貺）氒（厥）師，眉（微）見王，爲周愙（客），錫貝五朋，用爲寶器，鼎二，段二，其用亯于氒（厥）帝考。(4. 20)

該鼎素描載於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形制花紋近於周初。銘末「帝考」二字，吳大澂疑爲微子啟之器，可信。但他將首字隸定作「啟」，不能從。（集古錄釋文、賸稿、字說「客字說」）眉通微，國名。「眉見王」即微子來見周王。微子爲周之客，賞貝五朋，他的軍隊也受周王錫賞。故知上引兩漢經師的解說不但與春秋時人傳述的古禮吻合，也能獲得周初銘文的佐證。

陝西岐山鳳雛村新出的甲骨，有一片刻辭，似可再證明周客的舊說。辭曰：

5. 首字隸定作兄，讀爲貺，賜也。眉卽微，古文眉微通用。二字考釋具從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眉鼎跋」。「見」古文奇字，但其字形特標「目」與「人」，簡寫如作册折觥「見土」之「見」，（文物，1978年 3 期頁10）再簡化就如揚鼎的「見」（三代，3. 46. 3）其繁簡變化是有跡可尋的。吳大澂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隸定作「見」，可以信從。本鼎銘文亦見於三代4. 10. 1，簋銘收在三代8. 31. 3，行款稍異。

唯衣（殷）雞子來降，其執（縶）眔（及）乓（厥）吏（事），才（在）𢀛𢀛（地名也），卜曰：「南宮辝其乍（酢）。」（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附錄摹本。不分行款。）

徐中舒先生說，執當釋作縶，周頌有客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即縶留雞子及其隨從執事。卜以南宮辝與之醻酢，即以客禮接待之意。（周原甲骨初論）南宮是周的重臣，文王「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國語晉語四）韋解：「南宮，南宮适。」武王克殷，「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逸周書克殷）論語微子云周有八士，起首三人伯達、伯适、仲忽即屬南宮家族（杜正勝，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他們在周王朝的地位極爲顯赫。這片甲骨的南宮辝雖不能斷定是三士之一，其爲南宮家族則無可疑。占卜南宮辝接待來降的雞子，類似於武王使周公接待微史烈祖，（下節詳）是相當隆重的。徐中舒、陳全方皆以爲雞子即是箕子，有人懷疑，但卜辭明言「殷雞子」，其爲殷商遺民則斷然無疑。雞子爲周客，又可爲寍鼎添一新證。

上層殷遺爲周王之客；故宋國的封建地位要比一般諸侯爲高[6]，他對周天子的義務也比一般諸侯輕。直到春秋末葉，距離周初已經超過五百年，宋人還引證故事，作爲外交折衝的依據。西元前 509 年晉召諸侯爲天子城成周，分派各國的任務和負擔，宋國代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認爲滕薛等國宜代宋服役。雙方爭執不下，主持築城工程的士彌牟說：「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杜預注：「求故事。」（左定元）宋國免役，不與一般諸侯等齒，周王室應有檔案可查，否則，仲幾必不敢與霸主爭議。可見宋國居於客的地位也是載在盟府的。

考之金文、甲骨，權衡春秋史事，歸順的殷遺民並未遭受「悲慘」的命運，史家殊不必懷疑尚書誥辭失之宣傳，周廟頌歌流於誇張。何況紂王伏誅以後，周人先則立武庚，繼則立微子，以承殷祀，豈非周人對待殷遺態度的絕好說明？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入殷都，立刻釋箕子，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封比干之墓：種種措施無非在收攬民心。同時周人一再宣稱他們發動戰爭的對象只商王紂一人而已。逸周書商誓篇，武王曰：

6. 鄭皇武子又以爲鄭伯享宋公，宜不厭「豐厚」，（左僖二十四）因爲鄭的地位低於周天子也。

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無罪，其維一夫。予旣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

正與孟子傳述的「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盡心下）如出一轍。殷人一旦從周，必安堵如故，逸周書武寤篇才說：「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可見「誅一夫」是周人的政治口號，以商王紂一人爲敵，非以商民族爲敵。「一夫」語意雙關，既承認紂爲天子地位，又斥他孤立無援[7]。這場商周二族的共主爭覇戰在正確的政策指導下，化爲弔民伐罪，推翻暴政的義戰，而不是民族間的鬪爭。在這種情勢中，「小邦周」的征服者對待「大邑商」的殷遺民自然談不上「奴役」二字了，所以戰國時代傳述武王「親殷如周」，（呂氏春秋簡選）從遺老之願而修盤庚之政，（呂氏春秋愼大覽）當非粉飾虛言。我們愈研究傳世著錄的銘文和新出的考古材料，便愈肯定文獻的說法是信史。

三

西周銅器很多作器者或其祖先是殷代世族，研析銘文，可以發現不少殷遺的眞相，能說明他們在周人統治下的遭遇和政治社會地位。資料最完備，事例最顯著者，莫過於微史和彔𢦏兩個家族。族徽𠬝的資料雖然也豐富，但內容極其龐雜，非單純的家族。本節分別論述微史家族，彔𢦏家族和𠬝族徽等，以證明上文的看法。

㈠微史家族

1976 年年底陝西扶風庄白發現西周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 103 件，包括商、陵、折、豐、墻、癲和白先父七人的作器，同屬於一個家族。（文物 1978: 3，頁1-8）其中一件墻盤歷數殷末至西周中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國事和家譜，歷史家徐中舒，古文字學家唐蘭、于省吾、裘錫圭、李學勤和李仲操等先生皆作專文考釋。涉及家譜的部分曰：

青（靜）幽高且（祖），才（在）㣲（微）靈處。雩武王旣𢦏（災）殷，㣲史

7. 據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殷王常自稱「一人」或「余一人」，大約早期稱「一人」，晚期稱「余一人」。天子如此自稱，先秦典籍比比皆是，漢唐注疏家已見及此。其詳參見胡厚宣，「重論『余一人』」。但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按字面賦予新義，是不合古訓的。孟子每於古人古事增益新解，闡述他的思想，「一人」也是一證。

剌（烈）且（祖）迺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卑（俾）處甬。惟乙且（祖），逨（來）匹氒（厥）辟，遠猷腹心，子（仔）側沓（粦）明。亞且（祖）祖辛，遷毓子孫，緐猷（祓）多釐，櫅（齊）角（殼）熾光，義（宜）其禋祀。害屖（舒遲）文考乙公，遽趩（競爽），𢌳（德）屯（純），無誎（謫），農嗇戉（越）歷，隹（唯）辟孝󰂆（友）。史墻夙夜不㒸（墜），其日蔑曆。（不分行款，古文奇字多改作今字。）

盤銘縷述史墻的祖先，計有高祖、烈祖、乙祖、祖辛和他的父親乙公五世。我們結合同出諸器， 發現微史烈祖之子乙祖即是折器的父乙， 見於折斝、折觥、折尊、折方彝；那麼折便是墻盤的亞祖祖辛， 也就是豐器的父辛。 折器銘末有族徽𣪘（木羊雙册），豐襲用這個族徽，當是折之子，亦即是史墻的文考乙公，墻爵有「父乙」，可以爲證。同出微伯𤼈器的𤼈鐘云：「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辛公指折，乙公指豐，丁公就是史墻，故𤼈爵亦稱「父丁」。墻盤前半部歷述西周諸王的事功，從文武成康昭穆至當代的「緟寧天子」共王。史墻大概跨穆共兩朝，上溯其四世祖微史烈祖，適值殷周之際，故上引盤銘曰：「來見武王。」因此，墻子𤼈屬共懿時人，𤼈盨有司馬共，一般認爲是懿王朝的重臣。（唐蘭，永盂銘文解釋）另外白先父器十件，從鬲的形制風格分析，年代可能在西周晚期偏早，（文物 1978: 3, 頁 8）居這批窖藏器中之末，白先父或即是微伯𤼈之子姪輩，詳細關係不明。

微是地名或邦國之名，較早的文獻只見於尙書微子篇和牧誓篇。牧誓記載武王伐紂，周之同盟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詳細的地望雖不可考，大抵在今四川和湖北西部一帶，（孔安國傳和史記周本紀正義）屬於當時的少數民族。本報告撰寫人、唐蘭和李仲操等都主張史墻盤之「微」即牧誓的微國（文物1978: 3, 頁8. 20. 33）但作爲少數民族之微和這批銘文的內容不符，不可從。裘錫圭解讀作密國，（文物1978: 3, 26）繞的圈子更大， 而且周人克密早在文王時代（大雅皇矣）不能說「武王既戈殷」才來的。所以我們史墻盤之「微」當即尙書微子篇之微，檢討這批銅器的銘文就可以瞭然了。微史家族銅器羣有一件觚，銘曰：「父乙𠦪」銘末族徽，象一車三士，左一右二（有的作左二右一），車上載旗，或隸定作「𠦪」。世傳此族之器甚夥，或單銘，或綴父祖日干，大抵是殷商遺物。商末的緐毀也署此族徽，銘曰：

戊辰，弜師易（錫）𨪚
𦉢𠂤、𢆶貝，用乍父乙
寶彝。才（在）十月，隹（唯）王
廿祀，劦日，遘于匕（妣）戊、
武乙奭，豕一。𦀚（三代，6.52.2）

卜辭，遘者祭名，殷人對于上甲、大乙、小甲等祖宗致遘祭，（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頁二九）地點在宗廟，所以卜辭云：「丁未卜，……不冓……，才宗。」（京都，100）𨪚銘記宗廟遘祭，顯示他與殷王室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稱武乙及其配妣戊，可能是武乙的曾孫；設銘有父乙，當是帝乙，故知器主𨪚與帝辛（紂王）兄弟行。（參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卷一戊辰彝考釋；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刼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A196）所謂「唯王廿祀」，即紂王二十年。族徽𦀚表示殷商的王族。微史家族珍藏商王族徽的重器，說明他們是商王的後裔，典型的殷遺民。前引墻盤曰：「武王既災殷，微史烈祖廼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烈祖微史可能是微子啟之子，那麼，高祖就指微子啟了。史記宋微子啟世家云，武王克商，「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左傳也說微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僖六）徐中舒先生以爲墻盤所謂的「靜幽」「靈處」，取幽隱退遜之意，善處逆境，和微子啟的際遇非常符合。（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從形制花紋的風格論，商尊和商卣是這羣銅器中年代最早的，銘文相同，銘曰：

隹五月，辰才（在）丁亥，
帝后賁（賞）庚姬貝
卅朋、迖丝廿寽。商
用乍文辟日丁
寶尊彝，𢀛

辟者君也，殷末君王稱丁者只有文武丁，著錄另有商尊，祭父丁，（三代，11.21.1）則商可能是文武丁之子。殷王后賞商婦庚姬貝，（參見楊樹達金文說卷七「師旅鼎跋」）商作器頌揚父德。傳世的庚姬設（三代 6.44.2）和商婦甗（三代 5.6.2）

銘末皆有𠦪的族徽，當與微史家族的商同屬一對夫婦。𠦪經常見於商周銘文，很可能是殷商的王族，（下詳）故知商與帝乙同輩，是靜幽高祖微子啟之父或諸父；而前引庄白𥹀父乙觚的父乙也可能是帝乙，亦卽同出陵方罍的「父日乙」，所以陵與微子啟或帝辛是兄弟行的人物。

綜合庄白新出諸器，考得微史家族的系譜如下：

文武丁一商…高　祖一烈　祖一乙　祖一亞祖祖辛一文祖乙公一丁公一微伯㾜

‖（微子啟）（微史）（乙公）（辛公 作册折）　（豐）　（史墻）

庚姬

（註：虛線表示不敢肯定其父子關係）

自這個家族的第一代殷遺微史以下至微伯㾜，計六世，事蹟斑斑可考，可以看出王族殷遺在周人征服者統治下的地位。

牧野戰後，微史歸順周人，武王將他及其族人安置在周原，㾜鐘曰：「舍宇以五十頌處。」唐蘭先生考釋頌卽通，司馬法曰：「井十爲通。」五十頌便有五百井之地。領地相當遼濶，但是否如唐說擁有四千五百戶的領民則不能無疑。第二代乙祖，墻盤贊曰：「來匹厥辟，遠猷腹心，仔側𢍰明。」乙祖來輔佐其君，謀慮深遠，周王引爲心腹。他在天子左右，處事明達。君係成王或康王。第三代亞祖祖辛作册折，折觥曰：

隹（惟）五月，王才（在）庠，戊

子，令（命）乍册折兄（貺）晃

土于相厌（侯），易（錫）金，易（錫）

臣，揚王休，隹（惟）王十

又九祀。用乍父乙

尊，其永寶。𠦪

折尊、折方彝銘同。根據微史家譜比定，折活動期間約在康王，可以晚到昭王初，和著錄的睘卣（三代13. 40. 3）、睘尊（三代11. 33. 4）的主人同時。康王十九年南征，駐於庠。作册折受命賞賜後世巴郡南蠻五姓之一的相侯（世本），與作册睘受王姜之

命安撫夷伯，任務是相同的[8]。折官拜作册，係史官之流，故出使宣勅王命。使命完成後，康王頒賜給他銅器和奴隸。折有官守，有土地，有領民，故有氏，（劉師培，古政原始論第二）木羊雙册是他的族徽，有資格成爲分族的始祖，或即禮記所謂「別子」者也。因此，墻盤歌頌作册折「竅毓子孫，緐祓多釐，齊褱熾光，宜其禋祀。」竅，唐蘭先生以爲即栖，古文通遷；毓，育也。遷育或指分族，子孫綿延，備蒙釐福，恭謹謙愨，光顯家邦，宜享禋祀。頌詞和新族徽恰好配合。折之子豐，即第四代殷遺，襲其職官，沿用木羊雙册族徽。豐尊曰：

隹（惟）六月既生覇，
乙卯，王才（在）成周，
令豐㝷大矩，大矩易（錫）
豐金，貝，用乍父
辛寶尊彝。𦍌

㝷同殷，周王會見諸侯百官曰殷。䣄卣：「明保殷成周」，（三代，13.39.3）即令彝所載：「明公朝至于成周，徣令舍三事令（命），眔卿旋（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命）。」（三代，6.56.2）也近於尚書康誥的「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禮春官大宗伯曰：「殷見曰同」，「殷覜曰視。」鄭玄云，眾見、眾聘也。諸侯百官來朝會，天子召見，命官，佈達政令，故周禮秋官大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殷禮是封建時代重要的政務，豐參與其事，足見其地位之高。史墻稱頌他「競爽，德純，無譴」，性格剛強爽明，品德沒有瑕疵；又說他「農穡越歷，唯辟孝友。」後句

---

8. 西周記載南征的銅器，金文學家意見向來極不一致，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主張周初成康時期也南征，以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及考釋和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爲代表；一派將南征諸器皆歸屬昭王之世，以唐蘭爲首。唐氏從1962年發表的「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到最近刋行的遺作「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意見都沒有改變。庄白微史家族器世弟分明，年代肯定，記事精細，應該是檢查這兩派意見的上好資料，但諍議仍然不息，因爲學者仍執成見而分析這批銅器，李學勤本唐蘭之說，定作册折於昭王，理由並不充分。（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法高先生提前到成王，（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微史祖孫三代擠在武王成王時代，誠然太緊迫，何況武王克殷後不久就謝世了。別的器物暫且不談，單就微史家族器而言，作册折從王南征宜放在康王之世才合情理。參見劉啓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及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

倒文，于省吾先生說當讀作「農穡越歷，孝友唯辟。」辟，法則也；歷，治也。豐當然不會親自下田耕種，農穡於是乎治，若非指領地擴充，就義涵稟祿增加。宋朝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著錄一鼎，頌揚微伯、媓氏，銘末有羊雙册的族徽，（卷九，頁八三）可能與折、豐有關。第五代史牆，牆盤自贊「夙夜不墜，其日蔑曆。」夙夜，從政也，詩經、金文的習慣用語[9]；蔑曆，銘文術語，意指軍功策勳而旌伐其善，（白川靜，再論蔑曆）二語顯示史牆是職掌軍政的貴族。史牆之子微伯𤼈，第六代殷遺。這批窖藏屬於他的作器多達四十三件，但尙非他所鑄的全部，足見其財力之雄厚與地位之崇高。𤼈段說他「用夙夕」，𤼈鐘說他「恪夙夕，左（佐）尹氏」，「夙夕虔敬，卹厥死（尸）事。」當是王廷重臣之一，故周天子經常錫賞。懿王四年王在周師彔宮，十三年王在成周嗣土淲宮，皆賜𤼈車服佩飾；孝王三年，王在鄭，賜𤼈彘俎。其事具載於𤼈盨，十三年𤼈壺，和三年𤼈壺，可謂備極榮寵矣。

微史家族自從武王克殷後，來服於周，經歷六、七代，累世有職有守，勤勞王事。或在天子左右，籌謀策畫；或追隨天子出征，代宣勅命；或會見諸侯百官，佈達政令。除世守的史官外，在內參政，出外領兵，一百五十年來，地位權勢不曾稍衰，采邑甚且日漸擴張。他們原屬殷商王室，是典型的殷遺民。這個家族的歷史應該是說明殷遺遭遇及地位的最佳例子，但並不是特例。

㈡彔㦰家族

另外一支典型殷遺是彔㦰家族。同在扶風庄白，1975年春發現墓葬，取得一批銅器，墓主曰伯㦰，其中的鼎和段記載他的武功。（文物 1976:6, 頁 51-65）㦰鼎二云：周王使「㦰達（率）虎臣御（禦）淮戎。」記㦰抵禦淮戎。㦰段一也記錄㦰指揮的一次戰役，銘曰：

隹（惟）六月初吉，乙酉，才（在）堂𠂤，戎伐

9. 詩小雅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大雅烝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韓奕：「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師酉簋：「敬夙夜勿灋（廢）朕令（命）。」師𧻚簋、師虎簋同。師望鼎：「虔夙夜出（納）王命。」或作「夙夕」，如毛公鼎：「恪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易）。」梁其鐘：「虔夙夕辟天子。」及本文正文徵引的𤼈鐘𤼈簋之文。

> 𢼸，𢦏達（率）有嗣（司）、師氏、虎臣奔追御戎于
> 棫林，博（搏）戎䠒。朕文母競敏䆸行，
> 休宕氒（厥）心，永襲氒（厥）身，卑（俾）克氒（厥）啻（敵），
> 隻（獲）馘百，執䛒（訊）二夫，孚（俘）戎兵：盾（盾）、矛、
> 戈、弓、備（箙）、矢、裨（裨）、胄，凡百又卅又五
> 款（欵）；寽（捋）戎，孚（俘）人百又十又四人，衣（卒）
> 博，無眂（斁）于𢦏身。（下略）

御戎之「御」多隸定作「御」，通「禦」，然字體結構與「御」不同。著錄銘文有御鬲、御𣪕和伯御𣪕。（分別見於三代，5. 38. 1; 6. 48. 5; 7. 10. 3）御鬲銘：「王光（貺）商（賞）御貝」，御𣪕銘同，但時間、地點不一。兩器銘文全部鑄在亞形內，似爲殷商之器。從伯御𣪕知道，御是族名或國名。疑御戎是戎之一種，和戎䠒連言，我們知道䠒屬淮夷，（下詳）䠒或亦夷也，但𢦏𣪕一和𢦏鼎二所載並非同一次戰爭。棫林之戰「俾克厥敵」，大有斬獲，計馘百人，執戎酋二，俘戎卒一百一十四，此外還有武器甲胄，戰果相當輝煌。

某年六月初吉，𢦏在堂𠂤受命伐戎，其母亦參戰；戰爭結束後，𢦏班師回堂𠂤，同年九月既望，王俎姜派遣內史友員賞賜𢦏，𢦏作重器享祭文祖乙公和文妣日戊，即是庄白出土的𢦏鼎一。上引𢦏鼎二享祭文考甲公和文母日庚。𢦏以日干稱其父祖祭名，有殷人遺風[10]；如果我們再以庄白新出𢦏器與傳世著錄的彔𢦏以及彔子之器比勘，便可肯定他們確實是殷遺民。

著錄的彔𢦏諸器記載周師征伐淮夷的事件。東南方的淮夷侵叛，周王派遣師雄父率軍征討，駐在叶𠂤，遠及䠒侯之國，參戰的將領如遹、稽、臤、彔𢦏和競皆鑄重器

10. 羅振玉集錄殷文存，以日名和圖象爲斷定殷器的主要原則，他相信日名之制雖可「下施於周初，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殷文存序）爾後王辰編輯續殷文存，亦遵從此原則。（續殷文存自序）殷周之器的分野當然不可能這麼單簡，容庚作商周彝器通考時已指出殷商圖形、日名皆下及周代，不能作爲斷代標準。（第五章銘文）但作爲斷別廣義的族屬，日干還是有用的，白川靜將日名的西周器皆歸作東方系氏族，（金文通釋）雖失之籠統，亦是辨別殷遺民的一項參考。

追記其事。茲據相關銘文排列大事記如下[11]：

1. 唯六月既死覇，丙寅，師雒父戍在叶自，遇從。師雒父肩史（爰使）遇事于𢦚侯。侯蔑遇曆，錫遇金。　　遇甗
2. 稽從師雒父戍于叶自，蔑曆，錫貝卅寽。　　稽卣
3. 師雒父戍于叶自，臤從。　　臤觶（3、7同器）
4. 王令𢦏曰：「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叶自。」伯雒父蔑彔曆，錫貝十朋。　　彔𢦏卣、彔尊
5. 唯十又一月，師雒父循導至于𢦚，𩰫從。其父蔑𩰫曆，錫金。　　𩰫鼎
6. 伯雒父來自𢦚，蔑彔曆，錫赤金。　　彔毁
7. 唯十又三月既生覇，丁卯，臤從師雒父戍于叶自之年，臤蔑曆，仲競父錫赤金。　　臤觶
8. 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𢦏，……余錫汝秬鬯一卣、金車、桒幬較、桒𠤕、朱虢靳、虎冟朱裏、金甬、畫輯、金厄、畫轉、馬四匹、鋚勒。　　彔伯𢦏毁
9. 唯伯𢦏父以成自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鄘，白屖父皇(衡)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競章(璋)　　競卣

上列諸器，師雒父的地位最高，多次錫賞部屬，應是這次征伐的統帥。主持賞賜者還有伯𢦏父，郭沫若疑即彔𢦏之字，似乎可信。因為「屖」通「夷」，「𢦏」釋為「戎」，名戎字夷，所謂名字連類也。今按彔𢦏卣，周天子命彔𢦏以成周師氏戍叶自，

---

11. 下列八銘時間可以直接肯定者是遇甗和臤觶，有月份，有月相，也有紀日干支，而同在師雒父戍於葉自之年。從銘文內容看。遇甗所記之事在前，臤觶所記之事在後，以二銘為立足點，來檢驗其他諸器所記之事，𩰫鼎顯然也屬於同年而發生在遇甗和臤觶之間。假設彔伯𢦏簋和競卣的賞賜皆在戰爭結束之後，那麼便可能是次年正月發生的事情。首先我們根據遇甗和臤觶核證近代各家月相的說法，董作賓先生定點說絕不適用，勞榦先生修正董先生的說法也扞隔難通，只有王國維和新城新藏的四分月說可以符合，（至少既生霸和既死霸兩個月相如此。）這一點最近龐懷清已經討論到了。（西周月相解釋「定點說」芻議）如果某年十三月既生霸丁卯是初九，上推六月既死霸丙寅，六月小是廿三，大是廿四；下推次年正月庚寅是初二或初三，（彔伯𢦏簋）正月既生霸辛丑是十三或十四。（競卣）另有競簋曰：「唯六月既死霸壬申，白屖父蔑御史競曆，賞金。」可能同屬這次戰爭，那麼壬申是六月廿九或三十，也符合王國維既死霸的範圍。唯龐氏分遇甗和臤觶為相次之兩年，是不需要的。諸器銘文參見大系。

伐淮夷；而競卣云，伯屖父受命以成𠂤即東，伐南夷，二事相侔，彔𢦏可能即是伯屖父。此其一。彔𢦏卣和競卣的時間連屬。（本文註11）係指同一次戰事，此其二。從成周出發，駐於叶𠂤以禦淮夷，淮夷顯然在叶𠂤之外。徐中舒先生考釋叶𠂤故地即春秋楚邑之葉，今河南葉縣，（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值成周之東南，所以競卣既曰「即東」，又曰「伐南夷」，此處之南夷當指淮夷，西周銘文多稱「南淮夷」。（虢仲盨、翏生盨、兮甲盤、敔𣪘、禹鼎）這也是伯屖父即彔𢦏的另一證據。根據受命、錫賞和稱謂。彔𢦏的地位稍遜於師雍父，雖歸其節制，但比其他將領高，故周天子親自授命，而他也可以在𩁹頒賞部屬。李學勤認爲彔𢦏即師雍父，不值採信[12]。

綜合相關銘文的月曆知道，周王某年六月，師雍父已駐於叶𠂤抵禦淮夷入侵，天子授命彔𢦏率領成周師氏戍于叶𠂤，也不會晚於六月。大概彔𢦏抵達叶𠂤之後，有功，師雍父賜予貝十朋；同年十一月，師雍父循省𩁹國回來，又表彰彔𢦏的功勞，錫賞赤金，地點可能也在叶𠂤。班師回朝，已經歲尾，翌年正月初，周王親自賞賜彔𢦏命服和車馬等封建階級信物。每有賞賜，彔𢦏皆作器祭祀先人，彔𢦏卣祀文考乙公，著錄別有彔𣪘亦祀文考乙公（三代7. 19. 4）上引彔𣪘祀文祖辛公，彔伯𢦏𣪘祀皇考釐王。

分析傳世著錄的彔𢦏和庄白新出的伯𢦏，我們發現他們兩人不僅同屬於一個家

12. 最近李學勤發表「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一文，其中提到彔𢦏家族，犯了很大的錯誤。第一，混淆庄白新出𢦏器和傳世著錄彔𢦏諸器的記事，將兩批器主視若一人。後者下文會討論。至於前者，六月初吉乙酉（𢦏簋一）和六月既死霸丙寅（遹甗）、十三月既生霸丁卯（臤觶）絕不同年。這是一點。庄白新出銘文周𩁹之戰相當激烈，著錄銘文或曰「伯雍父來自𩁹，」（彔簋）或曰：「師雍父循導至于𩁹，」（甗鼎）或曰：「師雍父爰使遹事于𩁹侯，」𩁹侯甚且賞賜遹金，（遹甗）周與𩁹似未正式決裂。這是二點。所以這兩批銅器的內容不能混爲一談。第二、他認爲師雍父即是彔𢦏，證據之一是庄白𢦏墓出土一件「伯雍父自作用器」盤，這點正文將有所解釋。李氏另一理由是𢦏讀爲終，義爲盡、止，雍(雍隸定作雍)意爲閉、塞，一名一字。按師雍父之雍讀作「雍」頗值得商榷。彔簋、彔𢦏卣、甗鼎、遹甗、臤觶之「雍」與曾伯霖簠淮夷之「淮」，庄白新出𢦏鼎二淮戎之「淮」相似，反而與毛公鼎、盂鼎、辛鼎、邾王鼎的「雍」相去較遠。（周法高金文詁林 No. 485）稽卣亦是「淮」字，器蓋四字皆同，不是筆誤。郭沫若大系考釋照描不釋，態度是相當謹慎的。退而言之，「雍」作雍即使可從，李氏引申之義亦不足取。盂鼎「敬雍德經」，辛鼎，「厥家雍德」，毛公鼎「汝毋敢妄寧，虔夕夙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雍」(雍)皆不宜作閉塞解。而且古人命名，或以德，或以類，不以隱疾，不以畜牲，（左桓六）取義正祥和泰，豈有以終盡爲名而以閉塞爲字者乎？何況彔簋和彔𢦏卣皆曰：「伯雍父蔑彔曆，」明明白白是兩個人。第三、李氏認爲師𢦏父伐淮夷之戰最高統帥是周天子，亦游辭臆說，不值得深辨。他在一個小註裏把彔伯𢦏簋從彔𢦏器羣剔除出去，也沒有根據。按照我們的大事編年，這件器物所記之事是很容易安排的。

族，而且是父子，第一庄白伯𢦚之文考甲公，文母日庚，文祖乙公，文妣日戊；彔𢦚之文考乙公，文祖辛公，則彔𢦚很可能是庄白伯𢦚之父，祭名甲公。伯𢦚墓出土的II式鼎銘曰：「王唯念𢦚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𢦚率虎臣禦淮戎。」又曰：「唯厥使乃子𢦚萬年辟事天子。」經過上文分析，我們知道周王所「念」於伯𢦚之父（辟者父也）者卽命彔𢦚以成周師氏伐淮夷之事。第二、庄白伯𢦚墓葬報告人斷定伯𢦚和傳世著錄的彔𢦚同是一人，因爲文祖乙公和文祖辛公同是𢦚的祖輩，文考甲公和文考乙公同是𢦚的父輩。（文物1976: 6, 頁55–56）諸父之說在西周恐怕不存在了，否則銘文不可能經常出現伯仲叔季的排行，而且微史家族銅器中，墻盤和𤼈鐘縷述歷代祖先，更無任何諸父諸母的痕迹。第三、彔𢦚父子是征討淮夷的世家，伯𢦚所抵禦之淮戎，奔追之𨙶戎和搏擊之戎𢦏皆屬淮夷，與彔𢦚叶𠂤之戍的對象同種[13]。不過彔𢦚時周與𢦏侯似未發生大戰，到伯𢦚的棫林之役，戰況卻相當慘烈。第四、叶𠂤之戍，彔𢦚至少兩度接受師雍父之賜，兩人皆王庭重臣，相互間的餽贈錫賞或不止這兩次而已。伯𢦚墓出土一件「白雍父自作用器」之盤足資說明，此盤也可能彔𢦚得自於師雍父而傳

13. 唐蘭先生考釋庄白伯𢦚三器（鼎一、鼎二、簋）主張𢦚鼎二的「雍戎」居渭北，是玁狁的前身；𢦚簋的「棫林」在涇水之西，扶風寶鷄一帶，「戎𢦏」卽戎胡。（伯𢦚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這麼說來，西周中期周王朝就發生周原京畿的保衞戰了！我曾從西周對外關係證明這種論調之不當。（周代封建的建立，尤其是註159）其實唐蘭先生說「淮夷從來不稱戎，」是上了西戎東夷機械劃分的當，因此考證愈細致，愈不得要領。尙書費誓豈不說「淮夷徐戎並興」？大雅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徐戎亦淮夷之一種也。班簋曰：「王命毛公……伐東國痟戎。」黃盛璋考證痟國靠近渤海灣，（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雖不必是，但銘文既曰東國痟戎可見東國是有戎的。左傳隱公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楚丘在今河南東部，其地有戎。春秋經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曹在魯西定陶，也有戎。左傳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魯國亦有戎。這些都是春秋初期的事，西周以來的東土之產，不是後來被秦晉逼出山的遊動民族。傳世有郳白御戎鼎（三代, 3. 37. 1）郳伯名曰御戎，山東的郳國也有戎人。左傳桓公十三年，羅與盧戎聯軍敗楚，此時羅國和盧戎皆在襄陽府，（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那麼連漢水中下游也有戎。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時楚都郢，在荆近江陵縣，則長江中游亦有戎的足跡。淮夷稱戎，又何足異哉？唐蘭先生說𢦏卽胡是對的，但非陝北之胡。春秋經昭公四年曰：「楚子、蔡侯、陳侯、許男、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楚滅頓，滅胡。」集解引漢書地理志曰：「汝南南頓縣，故頓子國。」又引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胡的地望在於河南上蔡與汝南之間，近淮水，故稱淮夷。從洛陽經葉到汝南幾乎構成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直線，故周王命彔𢦚卽東而伐南夷。我們乃取徐中舒先生說，𠙵釋作叶，卽河南葉縣。如果釋作古，按丁山先生考證在固陵苦縣之間，（殷商氏族方國志）當今河南淮陽、鹿邑、太康一帶，嫌稍偏東北了。最近白川靜教授發表「淮戎と𢦚氏諸器，」主張𢦚器的淮戎是淮夷系的南夷或東夷是對的，但是否屬於北方戎種則猶可有商。

與其子的。第五、彔𢦚作器或單稱「彔」，（彔段）或「彔」「𢦚」同鑄於一器而分稱，（彔𢦚卣）；或全稱「彔伯𢦚」。（彔伯𢦚段）他顯然襲彔伯之爵，名作𢦚，庄白伯𢦚諸器，三鼎、段一和甗皆單稱「𢦚」，兩壺和段二稱「白（伯）𢦚」，伯𢦚稱謂係父之名字爲子所襲而成爲分族的公稱，西周以來不乏其例。如小臣單之於單伯，小臣艅之於艅伯，合乎邦國水準者稱某伯，否則僅稱伯某，某成爲族名，其實還是具體而微的國，曰「伯𢦚」而不曰「𢦚伯」可能是這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曰：「皇祖伯某」，鄭玄註：「伯某、且（疑即「祖」）字也。」黃以周禮書通故卷八「宗法」曰：「伯某之字或即氏。」很有見地。彔𢦚的「𢦚」就成爲他的某子之氏名了。所以彔𢦚與庄白伯𢦚分明父子二人，卻同具「𢦚」名[14]。

彔𢦚的彔是國名，其始祖可能是周人册封之祿父。關於祿父的來歷，漢代已有異說。太史公以爲祿父即武庚，（殷本紀、魯、衞、宋與管蔡等世家）尚書序「微子之命」僞孔傳也說武庚一名祿父。但毛詩「邶鄘衞譜」孔穎達疏引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論衡恢國篇云：「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武庚與祿父別爲二人。不過「邶鄘衞譜」孔疏引尚書大傳又說「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顯然和管蔡世家所謂「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一樣，祿父即是武庚，可見書傳對於武庚祿父是否一人亦猶疑不決。唯據今見金文材料；祿父和武庚當分別爲二。大保段曰：「王伐彔子聑，叡氒（厥）反，王降征令（命）于（于）大保，大保克𢼊（敬）亡遣。」（三代，8.40）大保者召公君奭也，估計時間，彔子聑之叛可能在成王晚年。世傳有王子聑匜（綴遺，14.39）、天子聑觚，（三代，14.31.3）和多亞聑彝(三代，6.49.1)足證彔子聑是殷王子孫。彔子聑叛，周天子派遣召公征伐，未及周公，當與武庚無關，彔子聑和武庚不是同一人，多亞聑彝云（用乍大子丁彝」，天子聑觚亦曰：「天子聑作父丁彝。」則彔子聑與武庚也不是親兄弟。不

14. 左隱八，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是也。春秋時代貴族多以祖父之字爲氏，鄭國的八穆：罕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國氏、良氏、羽氏，宋國的華氏、樂氏、皇氏、仲氏、魚氏 鱗氏、蕩氏、向氏等皆是。（陳厚耀，春秋世族譜）這些例子和彔𢦚家族的情況並不完全符合，一是祖孫而非父子，二是字而非名。但這兩點差異並不嚴重，可能是春秋與西周之區分吧。

過，彔子耶當屬殷王族無疑，自稱「王子」表示他的出身，「天子」可能是反叛時的僭號。他的後人彔㦰猶尊稱皇考曰「釐王」，（彔伯㦰𣪘）是有其家族背景的。

彔㦰相關諸器的年代各家說法相當懸殊，容庚定在成王，（通考，頁47）陳夢家定在康王後半，不晚於昭王，（斷代㈤）郭沫若定在穆王。今按庄白伯㦰諸器的形制，花紋和銘文，大部分作于穆王時代。（文物 1976:6,頁55）伯㦰繼承其父彔㦰抵禦淮夷，棫林之役，其母日庚參戰，此時彔㦰想必過世。器稱文母祭名，則器物制作距離戰事頗有一段時間。因此推測彔㦰的活動可以早到昭王，郭沫若認爲彔㦰相關諸器不失周初器的風味，可能是這緣故。那麼彔㦰之父乙公值康王，其祖辛公值成王。辛公可能是彔子耶，而耶之父丁則屬殷周之際的人物，稱爲大子，或即武王册封的祿父。如果我們的推測不誤，可得彔㦰家族的系譜如下：

父　丁——彔子耶——乙　公——甲　公——伯　㦰
（王子祿父 大子丁）（辛公）　（釐王）　（彔㦰）
　　　　　　　　　　　　　　‖　　　　‖
　　　　　　　　　　　　　妣戊　　　母庚

彔㦰家族投降周人，也很受到禮遇，先有祿父之封，後有彔子耶之飲。多亞耶彝曰：

辛巳，王酓（飲）多亞

耶，享京麗。

易（錫）貝一朋，用乍大子丁彝。（三代，6.49.1）

多亞是彔子耶之官職，京是地名。麗，說文曰：「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徐灝段注箋曰：「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註：儷，兩也；皮，鹿皮。按士冠禮主人酬賓，聘禮上介奉幣，亦皆有儷皮，蓋古人不獨用於昏禮；其用之，則小雅鹿鳴之義也。」詩序云：「鹿鳴，燕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周王在京宴飲殷遺多亞耶，賞賜鹿皮海貝，亦安撫懷柔之一端。彔子耶叛變在國王錫飲之前抑或其後，無可考。但他被召公敉平後，終於承認現實，相信天命在周不在殷了，於是臣服周室，作爲周股肱之臣。周天子命彔伯

䜌時，勉勵他說：「繇，自乃祖又（有）勞于周邦，又（有）闢四方，惠弘天令（命），汝肇不墜。」彔䜌的祖父彔子耶勤勞周邦，作爲周王的爪牙腹心，闢土四方。他纘繼父祖之職，率領成周師氏征伐淮夷，其子伯䜌也因父親之蔭，而作周王的親信，以虎臣、有司和師氏追擊淮戎。這個殷遺世家代代擁有兵柄、土地、人民和職守，經歷大約百年，家聲猶能不墜。

㈢𠱙及其他

微史和彔䜌兩個家族的歷史顯示周人統御殷遺民的主要政策是安撫懷柔，個別案例見於周代金文者猶比比可考。只是難得找到這麼長期綿延的家族而已，但並不意味個例不代表一個個連綿的家族。現在以𠱙爲主，舉幾個事例以見其一斑，我們相信考古工作愈發達這類資料是會層出不窮的。

周初封建時，召公長子匽侯旨北征，建立燕國，舉用不少殷遺民。1973和1974兩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房山縣琉璃河鎮黃土坡村一帶發掘七座西周墓，六座有殺殉，少者一人，多者二人，五座有銅器殉葬品，銅器銘文多帶商器族徽。（兩座無，但皆有一人殺殉）從墓制、殺殉和殉葬品來看，墓主屬於中級貴族。（考古1974: 5, 頁309-321）其中墓52，主人曰復，出土的尊銘曰：「匽侯賞復冂（冋）衣、臣妾、貝。」鼎銘曰：「賞復貝三朋。」復鑄寶器以祀父乙。同墓還出土父乙爵、父乙觶，復父之祭名當爲乙；另出父辛爵。大概是先代的遺物。復墓重槨，殺殉一人，隨葬品極富。他既領受匽侯的禪縠（細絹單衣）和臣妾，當是一位有采邑的領主；隨葬品多兵器、如勾戟、矛、劍、鏃和首飾，其官職顯然也是將帥之流。本墓所出陶簋、陶罐的形制與灃西第一期者一致，屬於成康時期，復活動的年代必在周初，也許可以早到殷末。復尊和復鼎銘末所鑄族徽卽𠱙的簡字，據此可以推測復的出身。

傳世著錄之器甚夥，日人小川茂樹（卽貝塚茂樹）整理得一百七十件(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𠱙に就て）考古新出亦所在多有，如山東長青(文物1964: 4，頁42-47）甘肅靈臺白草坡（文物972: 12，頁8）安陽西北岡，（李濟，殷虛出土伍拾參件靑銅容器之硏究，圖版十七）上引陝西微史家族器與琉璃河黃土坡。和最近從廢銅中撿出的𠱙
䲨器十九件，器形包括鼎、簋、豆、爵、觚、觶、斝、角、尊、卣、罍、盉等（文

物1982: 9，頁34-43）此銘考釋，異說紛紜[15]。宋人讀作「析子孫」（呂大臨，考古圖）近人不從，五十年前丁山先生釋作「冀」，今山西冀縣的古國；（說□）最近于省吾先生釋作「舉」，舉子也。（釋𡗗）鑄有此銘之器既然如此龐雜，古之冀國文獻鮮稱，恐怕不足以當之；另一方面，所謂有過如何舉子的故事，後世子孫乃造此字以爲該民族標誌，也純屬臆測。二者皆按圖象之形而勉強隸定成後世文字，檢證缺乏說服力。著錄之器雖失載出土地點，但根據出土報告，東及山東，北至河北，西達甘肅都發現此銘作器。散佈如此之廣，傳世又如此之多，可能不是單個血緣家族或民族的作器。

□，多見於商器，當是殷代的族徽無疑，可惜商器銘文簡質，很難提供此族進一步的資料。晚至殷周之際有一些銘文稍長，才有點線索可尋，最顯著的體例是「子賞小子某」的銘文每綴以此族族徽。𢿰卣蓋銘云：「□母辛。」器銘曰：

> 乙巳，子令小子𢿰先目（以）人于
>
> 堇，子光商（貺賞）𢿰貝二朋。子曰：「貝，
>
> 唯蔑女（汝）曆」𢿰用乍（作）母辛
>
> 彝，才（在）十月二。隹（唯）子曰：「令(命)望人方𩁹。」（三代，13. 42. 3）

---

15. □，呂大臨釋作「析子孫」，薛尚功從之，云貽厥子孫。西清古鑑因襲未改。但自晚清以下，新說孳生，或按形隸定，由字溯義；或揣測義涵，不強認識。吳榮光隸定作「鼎」，丁山作「冀」，郭沫若作「異」，于省吾作「舉」，加藤常賢作「非虞」（巫賢），屬於前者；後者則如徐柏同「取析薪負荷之義」，劉心源訓作「析木」，方濬益言「作器以分之子孫」，孫詒讓曰黼黻之原始象形，張鳳謂象古代殺人之祭，衞聚賢云獻俘犧牲，馬叙倫說造牀爲業者的小宗之氏，王國維解作「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吳闓生愼言闕疑，只肯定是上古民族用爲標識的符記。以上各家之說具見於周法高先生編著的金文詁林附錄及金文詁林補附錄。此銘大概是族徽之屬。古代氏族形成的過程頗爲複雜，或以領地，或以官守，或以職事，或以父祖的名或字，最近林澐從這些方面來分析早期銅器銘文，方法是對的，（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但他相信族徽必可隸定成單「字」，因而批判存疑的圖形文字說，則不僅昧於文字演進的現象（參見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對於族徽的眞義也有些模糊了。族徽造形古拙，卽使單文也可能表示很豐富的意思，如果是合文的族徽，必是由各部分意義綴合成完整的概念。譬如□，象一人荷戈，若隸定爲「何」而解釋古代有何族，意義又安在呢？人荷戈形固是某族的徽幟，但取以爲該族標識的意義則斷非「何」字所能解答的。況且氏族尚古，唯其作爲族徽，雖文字已經相當進化，但猶存古風，卽使新族造新徽，也必以古式爲尚。這是晚到殷商西周，中國文字已非常進步，然而仍有這許多奇文古字的緣故；如果肯定可以一一隸定出來，族徽寫法與其他銘文那麼不同，在文字演進上便很難解釋。所以關於□的考釋，目前仍然以族徽標幟較可靠，闡述其義或坐實某字都是危險的。此銘分三個獨立部分，據琉璃河黃土坡村的復尊和復鼎，上部的𠂢可簡化其半，但絕不能全省，金文有亞形中𠂢其，𠂢可能表示官守或職事，也是區別族類的一項標幟。薛尚功款識著錄一個族徽□，（卷二，頁三一）上面部分顯然非誤摹，當與𠂢不同。職是之故，我們認爲若對□之義有所闡述，構成的三部分皆宜有所說明。

征伐人方，可能商末之器。小子𤔲受子之命，先率軍至堇，似乎是先鋒部隊，刺探軍情，故曰「望」。續殷文存著錄一段蓋之銘，漫患難讀，大意是子賞小子某貝，命伐人方。末鑄𡥈（卷上頁四九）與𤔲卣類似。小子𥂥鼎曰：「子易（錫）小子𥂥，王商（賞）貝，才（在）𡧍餗。」（續殷上，25）駐軍之地曰餗。這三器的主人小子某都是帶兵的將領，而且歸子節制 。 因爲小子是子的部屬 ， 又稱子作「君」。小子省卣曰：子賞小子省貝，「省揚君商 （賞） 貝 。 」（三代， 13. 38. 3）小子啟尊銘文較簡：「子光（貺）商小子啟貝」，據上文推斷，也不例外。

按銘文體例，小子𤔲等人的族徽是𡥈，但甘肅靈臺白草坡潶伯墓出土一件尊，銘曰：「子𡷀乍母辛尊彝𡥈（文物，1972: 12, 頁 8）則子某也有以此銘作族徽。因此上引「子錫小子」諸器，小子不僅是子的部屬，也可能是他的族屬。相對於小子者是大子，小臣缶鼎曰：「王易（錫）小臣缶湡責五年，缶用乍享大子乙家祀尊。𡥈父乙」小臣缶受王賞，作器祭祀父乙，故曰「家祀」。他的父乙當即太子乙，族徽是𡥈。續殷文存著錄此銘之尊一件。祭祀大子丁。（卷上，頁五七）。

總之，不論大子、子、小子都和𡥈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此銘字形子从「子」。甲骨卜辭經見子某，董作賓先生推測是王子，(五等爵在殷商)可從。凡言「子」者可能是歷代殷王之子，而𡥈或即是殷商王子以及他們後裔的族徽。不過殷商王子及後裔固可有其他族徽，同時也不是所有的王子或後裔都能採用此族徽。本銘除「子」之外還有兩個構成要素，在更多新資料出土之前，暫時闕疑。我們現在唯一敢說的是，署本銘之器者可能是殷王的後代[16] 。前文討論微史家族，商尊、商卣銘末皆鑄𡥈，器祭文辟

---

16. 日人貝塚茂樹引申董作賓王子之說，認爲𡥈是王子及屬國貴族子弟組成的氏族青年團，（見前引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𡥈に就て。）白川靜云卜辭雖有「多方小子小臣」（粹1162），但具備此銘的小子小臣常是殷王室的貴游子弟，加上「多方」二字以區別一般的小子小臣。（小臣考）𡥈代表的族類非常複雜，我們只敢肯定它與殷王室有淵源，不敢說所有王子後裔必屬此族，也不敢說具此族徽必皆殷王子的後代。此其一。此族徽是否包括方國子弟，貝塚之說依然值得參考。程長新等人最近公佈在北京銅廠廢銅中挑選的一組二十八件商代銅器，大部分鑄有「𣲩䖒」二字。（文物1982：頁9, 3-443)䖒是殷代的方國，殷墟卜辭曰：「伐弗及䖒方？伐及䖒方哉？」（甲807)「貞伐䖒。」（前5. 37. 5）䖒亦作盧，卜辭曰：「伐及盧方，擊（唯）盧方乍伐。」（鄴3. 43. 4）可見𡥈並非皆殷王子之族。但著錄有一件䖒壺，族徽是庚丙雙册，（三代，12. 9. 3）則䖒國統治階級也非純𡥈族。似乎以此銘作族徽者還包含方國子弟。此其二。然而若說

（轉下頁）

日丁，我們推測商是殷王文武丁之子。著錄的婦闖甗文姑日癸，亦具此銘。（三代，5. 8. 6）殷代先妣祀譜，文武丁的配偶是日癸， 各家皆無異說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頁九四）婦闖可能和商婦庚姬一樣，皆文武丁的媳婦，王子之族，故可以本銘作爲族徽。如果我們的論證可以成立，殷墟西北岡墓 1601 出土的技段，有𢍘的族徽，（李濟，前引文）也應是殷王子之族的遺物 。 白川靜先生考論殷代雄族 ，𡴀與鄭、雀、㿝、晝、𠂤並稱最強的六族，（殷代雄族考　其六𡴀）卜辭顯示他們與王室的關係極其親近，鄭、㿝、晝皆稱「子」，雀祀辛父、父乙、兄丁、母庚，當是武丁之弟，但𡴀的身分不明。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卷中著錄的𡴀卣，有𢍘的族徽，卜辭金文可以互證𡴀是王子之族，𢍘族出身於殷王室應該不須疑惑了。

西周初期有一位員，員卣說他從史旗伐鄶，率先入邑，俘金。（三代,13. 37. 1）作戰相當英勇。員鼎記載某年正月周王狩于昏敵，「員執犬休善。」（三代,4. 5. 4）服侍周王很周到。鼎祭父甲，末有族徽𢍘。同時有一位將領叫作旂，旂鼎云：「公錫旂僕，」亦屬於𢍘族，祭祀文父日乙。（三代,4. 3）旂有軍隊 ， 有部屬 ， 故師旂鼎曰：「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三代，4. 31. 2）金文除稱「師旂」外，又稱作「伯旂」。（三代，2. 49. 3）這兩位殷遺卽使在殷商王朝剛剛衰替之後，和微史烈祖或𢑚子耶一樣，並未喪失他們的權勢和地位。

傳世著錄的周初殷遺 ， 事蹟比較詳細可考者是安州六器的中，（大系 ，頁六一八）宋徽宗重和元年（西元1118年）安州孝感縣出土。（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三）中甗二曰：

> 隹（唯）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貫行。（不分行款）

（接上頁）

是青年團則有可商。商周貴族亦皆武士或將領，不論小臣也罷，小子也罷，作册也罷，史也罷，無不參加軍隊，其他貴族更不在話下。如果貴游年青子弟組織特別的軍團而成爲特殊的族，於理難通。此銘从𠁁，或釋作牀，字形雖近，但失其義。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古代疾病、死亡才用牀，恐難作爲族徽，至於馬叙倫釋爲造牀爲業之族，更不值得深辯。我們認爲𠁁當從王國維說，釋作俎，和祭祀有關。使用此銘者可能職司宗廟祭祀，所以本文說不是任何單純的血緣團體。至於王國維說「大人抱子置几間」，也保留。禮記曾子問：「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曲禮上：「坐如尸。」大人抱子爲尸亦當坐而非立，與圖象不符。

𠂤甗亦記述巡省南國之事，銘文詭變殘闕，不能通讀。大意說𠂤的軍隊戍守漢𣪘州[17]，周王命他「事小大邦，」大概監視漢水諸異族。周王曾經賞𠂤馬：（𠂤觶）更重要的是「令（命）大史兄（貺）褱土，」作爲他的采邑。（𠂤鼒）觶、甗皆祭父乙。另外續殷文存著錄的𠂤父乙爵，（下.23）可能同屬一人的作器，而𠂤鐃（三代，18.5.2）和父辛𠂤爵（續殷文存，下.30）則爲同族之祭器。侯家莊墓1022出土的爵亦鑄「𠂤」字。「李濟，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圖版叁伍）1969-1977 年發掘殷墟西區墓葬，第六區墓1080年代屬於殷墟第四期，刼後殘餘的銅觚、銅爵皆有「𠂤」，墓主應是𠂤族之人。第三區墓 699，亦屬於第四期，爲所有九百多座發掘墓中五座甲字形大墓（帶墓道）之一，墓道殉二人，二層臺殉三人，足徵墓主的地位必不低。本墓遭盜掘，殘留的三件銅鐃亦皆鑄「𠂤」銘。（考古學報 1979：1）卜辭云：「犬𠂤告麇，王其射；」（粹，935）又云「小臣𠂤」（前4.27.6）；祖甲之世𠂤族族長還擔任過王室的貞人，（張秉權，觚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可見𠂤族與殷王的關係非比尋常。周金文存著錄一件尊，可以尋繹這族的出身。銘曰：

𠂤𦥑𥃝彝。（5.10）

著有𦥑的族徽，再參證以上的論述，𠂤很可能也是殷商的王子之族。那麼，西周初期隨同南宮南征的𠂤當是殷遺民了。這家族至遲從祖甲以下已顯赫，入周後依然保持優越的政治社會地位，歷久不衰。上引師旂鼎說，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請伯懋父裁斷，白懋父申誡師旂御下無方，眾僕違上無長，該當刑罰，但暫不罰鍰，不流放，責令他們戴罪立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頁 183）這篇誡辭由𠂤書記，交給師旂鑄銘。直到西周中葉以後，今陝西扶風齊家村還有一支𠂤族，族長曰友，作寶器傳之後世。（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羣圖十——十五）

1971年洛陽舊城東北的北瑤村南瀍河西岸清理一座西周前期墓葬，（考古，1972：2,頁 35-36）有棺、槨（已朽）和腰坑（坑內一狗）。隨葬的青銅禮器種類繁多，計有鼎、簋、卣、尊、斝、觚、爵、觶，其中卣尊斝觚爵五件器物質地類似，銘文相

17. 𣪘是族名，舊錄的鼎與簋分別見於三代，3.31.7,7.1.6; 陝西寶鷄代家灣出土晚商之器，觶銘有𣪘，見王桂枝、高次若，「寶鷄地區發現幾批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 1981 年1期。州，井侯簋曰：「錫臣三品：州人，倲人、庸人。」（三代，6.54.2）州臨近漢水，可能屬於𣪘族。

同，皆作「𢍰作尊彝。」墓主是𢍰，但𢍰和叀一樣，族名而非私名。𢍰見於卜辭，云：「庚寅卜，爭貞：令𢍰眔㲋古𧗳（衞），㞢（有）畢（禽）？」（甲1167）𢍰是武丁時期的將領。金文著錄有𢍰鼎，族徽是𡿧；（三代，2.13.3）也有𢍰盂媿𣪘，（貞松，5.27.1）說明𢍰族嘗與媿姓通婚。本墓發掘者認爲墓葬保留若干殷俗，銅器形制與花紋也是殷周之際習見的。結合考古資料與新舊銘文來看，墓主也是殷遺民；葬於洛陽，很可能是被周公遷來成周的殷頑第一代或第二代。據墓葬遺物，主人生前具有相當的政治社會地位，是一位謙遜臣服的殷遺民。

當時成周殷頑如𢍰之「多遜」者必不乏人，士上盉（舊題臣辰盉）曰：「王命士上眔（及）史寅𡩜（殷）于成周，禮百生（姓）豚。」殷是天子會見諸侯百官，佈達政令的大典，有百姓參與。卜辭曰：「叀（唯）多生（姓）饗，叀（唯）多子〔饗〕。」（甲 380）多子是殷王諸子，多姓卽百姓，是殷代的族長。（張政烺，古代中國十進制氏族組織）周王在成周舉行大典，賞賜殷商族長豬肉，族長必包括被遷來的殷遺民。

周原是偏處西陲的小邦，自太王以下不斷擴張，也不斷吸收新的成員，大雅緜篇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這些疏附、先後、奔奏、禦侮都是來歸之臣。前引士上盉，以𡉚爲族徽，據傳1929年與士上盉同在洛陽出土的𡉚族器大約五十件。（陳夢家，斷代㈡）此族是殷商時代的世家，卜辭作𡉚，釋作「先」，曰「先侯」（前2.28.2），也是貞人之一。（饒宗頤，貞卜人物通考，頁647-649）西周初年，此族的士上「殷于成周，」他們何時歸附周人則不可考。武王時代的小臣單觶，曰：「王後反，克商，才（在）成自。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云云。（三代，14.55.5）小臣係殷代的職官，白川靜先生認爲職司此官者多與殷王室有親密的關連。（小臣考）這位小臣單可能也是殷遺，後世的單伯昪生鐘可以作證。鐘銘曰：

> （上缺）單白（伯）昪生曰：「不（丕）顯皇祖剌（烈）考逨（來）匹之（先）王，爵（勳）堇（勤）大（天）命，余小子肇帥井（型）朕皇且（祖）考懿德，口保奠（下缺）（窓2.13，不分行款）

「來匹先王」，語句與墻盤的「唯乙祖來匹厥辟」一模一樣，單伯昪生的皇祖烈考既

然也來歸順佐助周王，有可能即是周初的小臣單，依銘文體例，小臣其官，單可能是族名，子孫可以「單伯」作爲爵名。此外1963年寶鷄賈家出土的䚄尊，（文物 1976:1,頁62）䚄也不是周人。尊銘云，周王初遷於成周，祭祀武王，

王㝬（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𣪘，䚄公氏克逨（來）玟（文）王。肆玟（文）王受茲〔天命〕。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辥（乂）民。』烏虖！𣪘，有唯小子亡（無）戠（識），䀠（視）于公氏，有𤔲（勳）𢍏（于）天𢽕（徹）令（命），苟（敬）亯（享）𢦏（哉）！」叀（唯）王龏（恭）德谷（裕）天，順（訓）我不敏。王咸㝬（誥），䚄易（錫）貝卅朋。（不分行款）

「在𣪘」之𣪘和「䚄公氏」之䚄，唐蘭、馬承源皆釋作「爾考」連讀，形音都沒有根據，不可從。𣪘，白川靜先生解作地名是對的。（金文通釋補篇）卜辭有「才（在）𣪘，」（後，下 12.12）是地名無疑，也作人（或族）名，曰「貞𣪘𣀈（得）。」（鄴，3.38.5）又曰：「𣪘允得。」（前，7.42.2）我們懷疑䚄原出𣪘，而爲別支分族，䚄是分族族名，故稱䚄父曰䚄公氏。䚄氏既出於𣪘，周王亦可以𣪘呼之。「小子」上文已有所論述，可能是殷王子的子弟或後裔。所以䚄的出身應該很清楚，他們也是歸順周人的殷遺民，周王一再以天命來告誡。亦尙書多士、多方之餘意也。這支殷人早在文王時代已來歸附。考釋者根據「宗小子」之「宗」推斷䚄與周王同宗，（陳昌遠，有關何尊的幾個問題）證據非常薄弱[18]。

傳世著錄和考古新出的銘文在在證明周人不吝吸收殷人成爲統治階級，而殷人也樂於和周人合作，孔子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曰）正是這段歷史的寫照。周之安撫懷柔和殷之缺乏「民族意識」，應還有更深的意義，只有從殷代的政治社會結構考慮才好理解。

四

周人在殖民封建過程中採取懷柔安撫政策，我以前提出兩點因素，一是到殷周之

18. 殷周貴族皆有宗，不限於王而已，銘文常見「用享于宗」，「用享于宗室」，「作厥宗寶尊彝」，例子不勝枚舉，參見周法高金文詁林卷七「宗」字條。

際，政治社會結構依舊以傳統的氏族爲基礎，二是周族的人口結構失之脆弱，（周代封建的建立）這意見現在仍然不變。上節說到周征服者不斷吸收新成員成爲統治階級，主要是第二因素造成的；至於政治社會結構，複雜萬端，非現階段的資料所能解決，本文只想就族羣結構提出一些推測，以便說明文獻和銘文對殷遺民的描述。

讀史的人大抵多承認三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於氏族，但「氏族」的概念向來弄不清楚，不少人還將與原始社會的氏族混而爲一，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糾葛。三代的氏族其實是一個政治社會單位，各地統治階級固有血緣連繫，基層的被統治者可能也以自然的血緣作爲結合的主要手段。然而每個政治社會單位卻包含不同的血緣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同，被統治者之間也互不相同。先秦文獻中通常認爲毫無疑義的血緣羣字彙，如姓、氏、族等，其義涵與其說是血緣性，毋寧是政治性的。魯國眾仲說，姓是賜的；（左隱八）周王子晉曰：「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國語周語下）楚觀射父亦曰：「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國語楚語下）氏，有土地、有人民才可以有氏，眾仲故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左隱八）至於族，造字从㫃从矢，表示一羣人共同打獵，收穫分享，共同作戰，死生與之，也絲毫看不出血緣的痕迹，雖然族羣可能也多因血緣而集聚。這些意見我在別文已經討論，此處從略[19]。殷代的民族亦當如是觀。衛史祝佗說，周公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給魯，使氏族長

>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定四）

這六族殷遺民都包括宗氏，分族和類醜三種成分，宗氏是族長的嫡系親屬，分族是族

19. 關於姓氏與族羣，我最近寫的兩篇文章曾有所討論，一是「傳統家族試論」，載於大陸雜誌；一是「古代基層社會的變遷」，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經濟學研究所合辦的中國社會經濟史暑期研討會宣讀。管東貴先生審查意見說：按，從社會發展史的觀點看，血緣團體必有以爲代表的符號：無文字時代有圖騰；進入文字時代後，乃以文字取代圖騰，成爲血緣團體的符號，是爲姓。古姓多從女，如姬、姜、姚、嬀、姒、好等，卽反映了姓的血緣關係。後起的「姓」字，從女、生，生亦聲，也是寓意於此。「同姓不婚」之俗甚古，此處所謂之姓，卽指血緣關係而言。故愈古，姓愈具有血緣關係。至後代，血緣的親密性（包括權利與義務）被濫用，乃有政治性的賜姓事件，浸假而成爲一種制度，遂破壞了姓的血緣特性。然萬變不離其宗，故不宜以晚生之變例否認其根本。管先生審查意見又說：氏乃同姓血緣團體再分化的標誌。故同姓不一定同氏，同氏必同姓。故氏的血緣關係較姓尤近。血緣的地緣化可能是氏的最早成因，卽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往後乃有以職爲氏，以官爲氏，以王父字爲氏等特例。

長的旁支親屬，類醜則是替氏族長從事生產勞動的被統治者。分給衞侯的七族殷民，（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祝佗雖然不曾明言他們的族羣成分，想亦涵蓋這三類。類醜和宗氏當無血緣連繫，但他們卻同屬一族；相反的，即使原有血緣關係，一旦分別擁有土地、人民或職官，就成爲不同的氏族了，於是具備不同的族徽。異地則異氏，即是眾仲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解釋周大夫劉夏曰：

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襄十五）

至於職官，眾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隱八）這是以官爲氏。原本同血緣，由於采邑或職官不同，也就成爲異族了。此之謂「分族」。

殷之氏族繁夥，史記殷本紀云，契之後分封者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不過舉其彰明較著而已。上引左傳魯之六族與衞之七族都不在這七支氏族之內，金文、卜辭出現的氏族更加不可勝數，足見殷代盛行分族。卜辭的人名往往延續數期之久，而且也當作地名使用，其實即是氏族或邦國，（張政烺，前引文；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其中固不乏東土舊族，但也有不少是殷王的後代，可惜今日難考了。其所以難考是有緣故的。殷王室不斷擴張，氏族不斷分衍，在不同地區建立不同的邦國，由於殷人不重視同姓的連繫，數代之後，即使同出於一脈亦往往變成路人。甲骨文的「子某」大抵是殷的王子，他們立邑建國，年久月深，難免與王朝發生爭端，甚至兵戎相見，這在當時幾乎是以不同國家看待的。茲舉三例說明之[20]。一是𧗓。

壬口〔卜〕，內貞，𧗓其來延我于宋？（佚 148）

辛丑〔卜〕，內貞，我𢦏𧗓于鼀？（前 6.22.8）

癸丑卜，𣪘貞，自往𧗓，亡𡆥？（前 4.31.5）

庚子卜，𣪘貞，我勿歪𧗓？十一月。（拾遺 9.12）

20. 以下三例所舉甲骨文材料大部分引自張秉權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管東貴先生審查意見說：「這類事所反映的乃是制度有所缺失時，血緣關係已不足以約束政治利害衝突的緣故，非因姓、氏無血緣關係故。猶如周朝到春秋戰國時代周王與姬姓封國間發生的戰爭事件一樣。」

𢦔讀作哉，傷也，敗也；延（正）重皆征伐之義；我是貞人自稱，代表殷王朝，這四條卜辭涉及殷王與衎國的戰爭。然而衎國原是殷王子的封國，卜辭稱作「子衎」。（丙 160）第二例是不。

庚申卜，王貞，余伐不？三月。

庚申卜，王貞，余勿𢦏不？

丙寅卜，爭，乎龍、光、侯𢦏希𢦔？（丙 1）

貞，勿乎从希子不？（乙 5803）

弗其𢦔不？（摭佚 90）

王其乎眾𡆥戍受人，叀啚土人眾𢦔人又𢦔？（鄴三下43.6＋43.7）

余是商王自稱，叀字不識，義可能近於征伐，希有荼毒的意思，𢦔同不。（張秉權丙編考釋）據上引六條卜辭，殷王卜問親自出兵或徵召諸侯軍隊討伐不國。但是不也是殷王子所建的國家，卜辭又稱，子不，曰：「貞，子不其㞢（有）疾？」（前4.32.2）和貞卜殷王諸子諸婦有疾同例。第三、子目，可能是武丁諸子之一，卜辭云：「宇貞，子目娩妨？」（乙 3069）又「貞，目其希疾？」（丙 142）唯卜辭亦

貞，乎雀征目？（丙 261）

大概目國不受命，故卜問召雀征伐之。

殷商王子及其後裔和商王室的關係尚且如此不穩定，那些與殷王親屬關係疏遠的邦國若叛服無常，也不值驚異。譬如亘，族長嘗任王室貞人，（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卜辭有云：

癸卯卜，㱿貞，乎雀，衒伐亘𢦔？十二月。（丙 249）

癸亥卜，亘弗月雀？

丁卯卜，雀隻（獲）亘。（粹 1553）

郭沫若考釋，月假爲抈，說文：「抈，折也。」雀亘兩國之爭，殷王廻護雀，至如姫姓的召方曾任殷王西史，（乙 4536）殷王亦「貞召古王事。」（續 3.27.1）然而殷王常卜問征伐召方事宜。（白川靜，召方考）亘、召雖出入王廷，卻和殷王和戰無常，當然那可能是異代才發生的。

殷代氏族皆是政治社會體，有土地，有人民，相當獨立自主，他們和殷王室不一定共具高度的認同意識。即使是殷王後裔之族，武王革命對某些人來說，不過換了一位共主，無所謂亡國之痛。他們願意歸順周人，小邦周也樂於接納。然而由於殷代氏族的獨立性，使得周人殺了「一夫紂」，殺不盡數百年來盤根錯節在各地的殷族邦國，正應了俗話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周王對付殷遺民乃極盡懷柔安撫之能事。我們從文獻和銘文發現殷遺地位未曾低落，遭遇無所謂悲慘，根本原因當從殷代氏族的政治社會結構去探索。周人克殷以後，特別強調親親，可能是懲前毖後，「殷鑑不遠」的結果。此中或許可能透露一點殷周制度異同的契機，玆事體大，不是這篇文章能够解決的。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稿，同年十一月修訂。

引用書目

前	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
續	羅振玉，殷虛書契續編
後	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
甲	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
丙	張秉權，殷虛文字丙編
鄴	黃　濬，鄴中片羽
粹	郭沫若，殷契粹編
京都	貝塚茂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三代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本文所引金文以此書為主，他見者不重錄）
愙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
大系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
錄遺	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
貞松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
貞松補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
佚	商承祚，殷契佚存
摭佚	樂旦丘，殷契摭佚
拾遺	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

王　辰，續殷文存

鄒　安，周金文存

吳大澂，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容　庚，金文編

文物1964(4)，山東省博物館（唐士和），「山東長清出土的青銅器」

文物1972(12)，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組（魏懷珩、伍德煦），「靈台白草坡西周墓」

文物1976(6)，羅西章、吳鎮烽、雒忠如，「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㦰諸器」

文物1978(3)，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庄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

文物1982(9)，程長新等，「北京揀選一組二十八件商代帶銘銅器」

考古1972(2)，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瑤西周墓清理記」

考古1974(5)，琉璃河考古工作隊，「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

考古學報1979(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楊寶成、楊錫璋），「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

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羣，文物出版社（1963）

丁　山，殷商氏族方國志（大通書局影印）

丁　山，「說㝬」，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1930）

于省吾，「釋㚔」，考古1979(4)

于省吾，「墻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1）

王　辰，續殷文存「自序」

白川靜，「殷代雄族考　其六𠂤」，甲骨金文學論叢八集（1958，油印本）

白川靜，金文通釋，及補篇，白鶴美術館誌，1962—1982

白川靜，「再論蔑曆」，史語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1980）

白川靜，「召方考」，甲骨金文學論叢二集（1955）

白川靜，「小臣考」，立命館文學 116,117 (1955)

白川靜，「淮戎與彧氏諸器」，三田村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立命館大學文學會（1980）

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1)

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收入李亞農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李仲操，「史墻盤銘文試釋」，文物1978(3)

李學勤，「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2)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中國歷史博特館館刊1979(1)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1980(8)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史語所，1966）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史語所，1972）

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史語所集刊五十本三分（1979）

杜正勝，「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史語所集刊五十本三分（1979）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大陸雜誌六十五卷第二、三期（1982）

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吳大澂，　齋集古錄釋文賸稿（商務印書館）

吳大澂，字說（藝文印書館）

林　澐，「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1）

貝塚茂樹，「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𡦹に就いて」，東方學報（京都）九册（1938）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Early China*, 6, (1980-81)

周法高等，金文詁林（臺北中文出版社影印）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史語所專刊 77,1982）

周法高，「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

史考古組（1981）

胡厚宣，重論「余一人」，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1981.11）

胡　適，「說儒」，史語所集刊四本三分（1934）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人民出版社，1949,1965）

唐　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 1962(1)

唐　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所出墻盤銘文解釋」，文物 1978(3)

唐　蘭，「䎽尊銘文解釋」，文物 1976(1)

唐　蘭，「伯㦰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文物 1976(6)

唐　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1981.1）

容　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3）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 1959(3)

徐中舒，「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 1978(2)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5）

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 1976(1)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

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5）

陳厚耀，春秋世族譜（四庫珍本四集）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㈠、㈡、㈤」，考古學報 1955(9)(10). 1956(3)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刼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按作者原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實出陳夢家之手筆）

陳昌遠，「有關何尊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 1982(2)

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1967）

張秉權，「觚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附錄」

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歷史教學第三卷三、四、六期（1951）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溫天河等譯，鼎文書局）
黃以周，禮書通故（華世出版社影印）
黃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考古與文物 1981(1)
勞　榦，「周初年代問題與月相問題的新看法」，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馮友蘭，「原儒墨」，清華學報十卷二期（1935）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史語所集刊四本三分（1934）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藝文印書館）
裘錫圭，「史墻盤銘解釋」，文物 1978(3)
董作賓，「四分一月說辨正」，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董作賓，「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史語所集刊六本三分（1936）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史語所專刊之五十附册，1965）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臺灣大通書局影印）
劉啟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 1978(5)
錢　穆，「駁胡適之說儒」，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東大圖書公司，1979）
羅振玉，殷文存「序」
龐懷清，「西周月相解釋『定點說』芻議」，文物 1981(12)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文史第二輯（1963）

The Status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after the Chou Conquest

(English Abstract)

Tu Cheng-sheng

I

The idea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殷 dynasty were oppressed by the Chou conquerors has been popularly accepted by historians for the last half-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articulation of this theory was published by Dr. Hu Shih 胡適 in his 1934 article *Shuo-ju* 說儒 (On the Origins of *Ju*), in which he proposed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rm *ju* is "coward." According to Dr. Hu, this term was applied to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who were so subjugated by the Chou people after their conquest that a prophetic myth spread among them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would be emancipated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 by a Sage, a kind of Chinese Messiah.

Dr. Hu's theory was severely criticised by Feng Yu-lan 馮友蘭, Kuo Mo-jo 郭沫若, Ch'ien Mu 錢穆, and others, b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Feng, most of this criticism was focus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u* or Confucians as a group, while little was said about the main point of Dr. Hu's article, i.e.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Ju* and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meanwhile, Dr. Hu's basic hypothesis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historical truth. Although Fu Ssu-nien 傅斯年, for example, found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were treated conciliatorily, he nevertheless believed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completely stripped them of political power. Subsequent historians have believed that all the Yin commoners were dispersed as slaves, or that the Yin nobles became captives. Such approaches clearly follow Dr. Hu's early theory.

However, Dr. Hu's hypothesis about the Yin survivors is not supported by classical documents or by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of the perio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se sources leads us 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conclusion. For this reason, I would like to review this historical problem in this article.

II

Pre-Ch'in historical data contain no hint at all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were oppressed by the Chou conquerors and endured a "sorrowful condition." On the contrary, such sources as the *Shang-shu* 尙書, *Tso-chuan* 左傳, *Yi Chou-shu* 逸周書, and *Lü-shih ch'un-ch'iu* 呂氏春秋,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urviving Yin aristocracy largely retained their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also their control over the peasants who farmed their lands. Even though the last Yin dynastyic ruler, King Chóu 紂, was beheaded by King Wu 武 of Chou, Chòu's son Wu-keng 武庚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to administer the capital city of Yin as the *de facto* ruler of the Yin people. The *Tso-chuan* (Ting 4) contains the lat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court recorder Chu T'o 祝佗 of Wei 衞 's description of the early Chou "*feng-chien* 封建" socio-political system; in it, Chu T'o recounts how large numbers of Yin survivors ended up in the states of Lu 魯 and Wei,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ose states were modelled on that of the Shang 商. Chu T'o uses the phrase "*ch'i yi Shang-cheng* 啟以商政"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s of Shang).

The general meaning of this term "Shang-cheng" can be found in the "K'ang-kao 康誥" and "Chiu-kao 酒誥" Chapters of the *Shàng-shu.* These two texts contain the Duke of Chou (Chou-kung 周公)'s admonition to Uncle K'ang 康叔 to carefully administer the Yin people, and were giv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Duke's enfeoffment of Uncle K'ang in Wei after the Duke of Chou had successfully put down the rebellion of Uncle Kuan 管叔, Uncle Ts'ai 蔡叔 and Wu-Keng. The Duke's admonit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basic

outline of political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state of Wei was founded, and contain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points: First, the Duke of Chou ordered Uncle K'ang to work hard to emulate the excellent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sage rul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and to find ways to apply these words and actions to protecting and fostering the people. These sage rulers of the Yin-Shang period were most likely Ch'eng-t'ang 成湯, Tsu-yi 祖乙, Wu-ting 武丁 and Tsu-chia 祖甲, whose deeds are recorded in the "Wu-yi 無逸"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they are also described in the "Shang-she 商誓" Chapter of the *Yi Chou-shu*, while poems praising them make up the "Shang-sung 商頌" section of the *Shih-ching* 詩經. The principles of rulership embodied by the sage rulers in these texts are none other than respecting and fearing The Heaven God, self-control, not to daring to indulge in dissipation, awareness of the people's suffering, and being able to love and protect the people. The second major point is that the laws having the closest direct effect on the common people, i. e. the system of penalties and punishments, should be modelled on those of the Yin-Shang period. The Duke of Chou ordered the Yin punishments to be set up as the new law of the Wei state so that by using these Yin punishments to punish criminals among the people, the Yin people would not feel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using harsh methods to oppress them. The punishments emphasized by the Duke of Chou at that time were those for murder and theft, which directly reflecte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btaining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The "Wei-tzu 微子"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records that during the time of King Chòu, T'ai Shih 太師, the military leader, lamented the prevailing social disorder, in which the people dared even to steal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to the spirits and eat them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o such sacrilege, every other crime imaginable was committed.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strictly enforced the laws against murder and theft should thus have been welcomed by the Yin survivors. The third major point is that the Duke of Chou advised Uncle K'ang to respectfully approach the surviving elders of Yin-Shang and request their guidance in formulating his ruling policies, and also to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the ancient clans of Yin-

Shang in ruling the state. These people were called the "*Yin hsien-ch'en* 殷獻臣" in the "Chiu-kao"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while the "Tzu-ts'ai 梓材" Chapter calls them the "*Ta-chia* 大家," and the "Huang-men 皇民" Chapter of the *Yi-Chou-shu* calls them the "*Ta-men* 大門," "*Tsung-tzu* 宗子," or "*Shih-ch'en* 勢臣"; in any case, they were to be used as Uncle K'ang's "legs and arms" in assisting him to rule the state of Wei. One of the goals of this policy was to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surviving Yin nobles, for we know that the Yin nobles were strongly dissatisfied by their King Chòu's defiance of the elders and ancient clans, his abandonment of his brothers, and the way he would listen instead to the advice of his favorite women and of fugitives from other states. After the Chou conquest, the ancient clans and great families were respected and restored to positions of influence; those outside the capital were given lands and titles such as *hou* 侯, *t'ien* 甸, *wei* 衞, and *pang-po* 邦伯, while those within the capital were given the titles of *pai-kuan* 百官, *tsung-yin* 眾尹, *pai-hsing* 百姓, *li-chün* 里君 and so on. All of this conclusively recorded in the *Shang-shu* "Chiu-kao" and *Yi-Choh-shu* "Shang-che" chapters.

Although the *Shang-shu* has no "admonition of Lu," Chu T'o's account quoted above indicates that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state of Lu as well. Chu T'o, in his speech at *Tso-chuan* mentions that six of the surviving Yin clans in Lu followed the orders of the Duke of Chou and were given offices by the Duke of Lu, so their situation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Yin hsien-ch'en*" in Wei. The Yin survivors moved to Ch'eng-chou 成周 (the Chou eastern capital) by the Duke of Chou apparently put up the most stubborn resistance, but the "To-shih 多士" and "To-fang 多方" Chapters of the *Shang-shu* record that the Duke of Chou told these people that if they only faithfully served Chou kings, they could still have lands and rank, and would even be given rich rewards.

From these documentary sources it is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endured the painful tragedy of a vanquished kingdom. Of course, their merciful treatment by the Chou was contingent on their

faithfully serving their conquerors; otherwise, just as the "To-shih" and "Tofang" Chapters recount, the Duke of Chou told them that not only their lands would be confiscated, but their lives would also be in danger. Since even the Duke's brothers of Kuan and Ts'ai had been put to death and exile respectively without mercy when they rebelled, what better fate could these survivors of a conquered kingdom expect? Thus we cannot view the harsh warnings in the "To-shih" and "To-fang" Chapters as proving that the Yin survivors indeed met with a "tragic fate."

The *Tso-chuan* account at Hsi 24 contain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Wu-tzu 皇武子 and the Duke of Chèng 鄭, in which the Chou Emperor is described as treating the ruler of the state of Sung 宋 as an honoured guest and not as a vassal; he offered sacrifices of meat to the Sung ruler, and when there was a funeral in the Chou royal house, the Sung ruler attended as a mourner, for which the Chou Emperor especially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From this it is clear that the state of Sung, founded as it was by Yin survivors, nevertheless enjoyed a higher status than other lords in the *feng-chien* system. The "Honoured Guests" (*k'o* 客) mentioned in the "Yu-k'o 有客" and "Chen-lu 振鷺" Odes of the "Chou-sung 周頌" section of the *Shih-ching* are interpreted by the Han Scholiasts as references to the rulers of the states of Ch'i 杞 and Sung (descendants of the Hsia 夏 and Shang dynasties respectively); this interpretation seems indeed to be based on fact.

With King Wu of Chou's victory over the Yin, the Chou became the masters of China, but they did not make this struggle into an all-out popular war; on the contrary, they used the Yin King Chòu's corruption and despotism as an excuse for starting the struggle. The *Yi Chou-shu* "Shang-che" Chapter describes King Wu's announcement of the Shang people's innocence; only King Chòu himself was guilty of any crime, and this account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Mu-shih 牧誓" Chapter of the *Shàng-shu.* Mencius's "*Wen chu yi-fu Chòu* 聞誅一夫紂 (I have heard of the putting to death of that fellow Chou)" (*Mencius* I-B/8) and T'ai-tzu Chin 太子晉 's statement that King Wu "*yi-sha yi-jen* 義殺一人 (dutifully slew the king)" (*Yi Chou-shu* Chapter 64) were probably

the battle cries of the Chou in their attack on the Yin. In this way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able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the Yin people and sow rebellion among King Chòu's armies, thus creating the precedent for their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after the victory. For this reason the accounts of King Wu's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after his victory over King Chòu in the "Shen ta-lan 愼大覽" and "Chien-hsuan 簡選" Chapters of the *Lü-shih Ch'un-ch'iu*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other pre-Ch'in works, and hardly qualify as excessive praise of King Wu's actions.

III

Besides documentary sources,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to pursue my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Yin survivors under Chou rule. These materi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ose vessels which have been known for some time but which were not scientifically excavated, and those which have been more recently excavated under scientifically-controlled conditions. Among the most extensiv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been those carried out in 1976 at Chuang-po 庄白 in Fu-feng 扶風 county of Shensi province, which uncovered the vault of the Wei-shih 微史 Clan; in 1975 the same village yielded the Po-tung 伯𢦔 bronze vessels, which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earlier known bronze inscriptions allow u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Lu-tung 彔𢦔 Clan. Moreover, the groups of the "𤔲" will figure in our discussion.

A total of 103 bronze vessels were unearthed in the Wei-shih Clan group. These vessels bear the names of seven people who had them made: Shang 商, Ling 陵, Che 折, Feng 豐, Ch'iang 墻, Hsing 㾟 and Po Hsien-Fu 伯先父; on the basis of inscription content, clan relationships, the names of those sacrificed to, and the styles of the vessels temselves, we can reconstruct the genealogy of this clan as follows:

TABLE 1: Genealogy of the Wei-shih Clan

Wen-wu-ting 文武丁

Shang=Keng Ch'i 庚姬
|
Kao-tsu 高祖 (Wei-tzu Ch'i 微子啟)
|
(1) Lieh-tsu 烈祖 (Wei-shih 微史)
|
(2) Yi-tsu 乙祖 (Yi-kung 乙公)
|
(3) Ya-tsu Tsu-hsin 亞祖祖辛 (Hsin-kung 辛公/Tso-ts'e Che 作册折)
|
(4) Wen-tsu Yi-kung 文祖乙公 (Feng 豐)
|
(5) Ting-yung 丁公 (Shih-ch'iang 史墻)
|
(6) Wei-po Hsing 微伯瘐
|
(7) Po Hsien-fu 伯先父

In this genealog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in survivors is represented by no. 1, Lieh-tsu. From there down to no. 5, Shih-ch'iang, the genealogy is clearly enumerated in the *Ch'iang-p'an* 墻盤 vessel-inscription; it matches the traditional genealogy of the Chou kings from Wu 武 to Kung 共, so we will not elaborate further here. The *Hsing-chung* 瘐鐘 vessel inscription tells us that Hsing was the son of Shih-ch'iang. Meanwhile, the Po Hsien-fu vessels belong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in terms of artistic style, and are the latest of all the bronzes under discussion, so Po Hsien-fu is quite possibly the son of Wei-po Hsing for this reason. Again according to style, the vessels bearing the name of Shang 商 are the earliest in this group, and the "*Wen-p'i Jih-ting* 文辟日丁" to whom they are dedicated is probably Wen-wu Ting (also called Wen Ting 文丁 in *Shih-chi* 史記); thus Shang is the son of Wen-wu Ting,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s Ti Yi 帝乙, and thus also of Wei-tzu Chi's father's generation. Moreover, a ***ku*** 觚 beaker in the Wei-shih Clan bronzes bears the clan-symbol 𢆶, which is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well known 𢆶-***kuei*** vessel. This ***kuei***'s inscription says it was made by 𢆶 in the 20th year of King Chóu's reign and dedicated to P'i-wu 妣戊 and Wu-yi 武乙, indicating that its owner was a member of the Yin-Shang royal clan. From these two points we can establish that the Wei-shih Clan belonged to the royal clan of the Yin without a doubt. The phrase "*ching-yu Kao-tsu* 靜幽高祖 (the quiet

and melancholy High Ancestor)" in the *Ch'iang-p'an* inscription can thus be analysed as referring to Wei-tzu Ch'i, a point that has been conclusively discussed by Professor Hsü Chung-shu 徐中舒.

Following the Chou conquest, this clan came to serve the Chou; King Wu ordered the Duke of Chou to establish Wei-shih 微史,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in survivors, in the Chou homeland of Chou-yuan 周原, with a fief of fifty *sung* 頌 of land. Yi-tsu,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pported the Chou King and became his favoured assistant, while Ya-tsu Tsu-hsin (also known as Tso-ts'ẹ Che) accompanied the Chou King on military expeditions to the south; he was even entrusted with the duty of enfeoffment of Hsiang-hou 相侯, a southern barbarian. Feng,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Chou King's visits to the regional lords and the officers, and made the formal announcements of the King's commands. Shih-ch'iang,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not only continued in his clan's hereditary office of court recor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yal state, but also probabl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military arena as well. Wei-po Hsing,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given assistance to Yin-shih 尹氏, was twice personally rewarded by the Chou Kings; he enjoyed great favour at his court. Thus although the Wei-shih Clan was made up not just of Yin survivors, but was descended from the Yin royal house, yet their high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under the Chou is clearly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these six generations.

Another case is the Lu-tung 彔刻 Clan. The name Po-tung 伯刻 appearing on bronzes excavated at the Chuang-po site in Fu-feng county is that of a relatively late member of the Lu-tung Clan, while Lu-tung himself was an early member of it. Bronze-inscription scholars generally date Lu-tung to around the time of the Western Chou King Mu 穆.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names of persons to whom vessels in these two groups were dedicated reveals that Po-tung's father was Chia-kung 甲公 and his grandfather was Yi-kung 乙公, while Lu-tung's father was Yi-kung and his grandfather was Hsin-kung 辛公; thus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Po-tung was Lu-tung's own son. Moreover, Po-tung and Lu-tung

are both mentione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as taking part in military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Huai 淮 barbarians; during an invasion by the Huai-i 淮夷, the Chou King ordered Lu-tung to lead a regiment of troops from Ch'eng-chou under the command of Po Huai-fu 伯雒父 to attack Fu-hou 鈇侯, while Po-tung also led the *Hu-ch'en* 虎臣 (royal guards) and officers in attack on the Huai-jung 淮戎 and Jung-fu 戎鈇, in which he established a glorious record of military prowess. The similarity of the duties of these members of two generations of the same clan may reflect what classical sources refer to as a "*shih-kuan* 世官" or hereditary office. Finally, that Lu-tung twice received rewards from Po Huai-fu on military campaigns, and that a bronze *p'an*-vessel found among the Po-tung vessels at Chuang-po bears the inscription "Po Huai-fu tsu-tso yung-ch'i 伯雒父自作用器 (Vessel made by Po Huai-fu for personal use)," both lend further support to the fact that Lu-tung's relationship to Po-tung was that of father to son.

Lu-tung's native state of Lu 彔 was actually founded by Yin survivors; its founding ancestor was probably one Lu-fu 祿父, who had been granted a recorded fief by the Chou conquerors. Lu-fu's own origins have been debat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some say he was Wu-keng 武庚, while others say the two names are of different people.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tend to support the latter view. Early in the Chou period, there was a rebellion by Lu-tzu Sheng 彔子耶, which was put down by the *t'ai-pao* Shao-kung 太保召公. The rebel is alternatively called Wang-tzu Sheng 王子耶 or T'ien-tzu Sheng 天子耶 in the inscriptions; I suspect that the cognomen "Wang-tzu" or prince reflects Sheng's royal origins, while the "T'ien-tzu" or the Son of Heaven he arrogated to himself during his rebellion against the Chou. If he was indeed a prince, Lu-tzu Sheng must then have belonged to the Yin royal clan, so his father Ting-kung 丁公 could possibly also have been called T'ai-tzu Ting 太子丁, and his descendant Lu-tung would have used the respectful epithet King Hsi 釐 for his father. These materials again show that the Lu-tung Clan was not only a Yin survivor but part of the Yin royal clan; its genealogy can be tentatively re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new and old bronze-inscriptious and dates as in Table 2.

TABLE 2: Genealogy of the Lu-tung Clan

(1) Fu-ting 父丁 (Wang-tzu Lu-fu 王子祿父; T'ai-tzu Ting 太子丁)
|
(2) Lu-tzu Sheng 彔子耶 (Hsin-kung 辛公)
|
(3) Yi-kung 乙公 (Hsi-wang-釐王)
|
(4) Chia-kung 甲公 (Lu-tung 彔䜌)
|
(5) Po-tung 伯䜌

That Lu-tung's and Po-tung's exploits were recorded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shows that they were not of low official rank; Lu-tung's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ranks were also quite high. The *Lu-po Tung kuei* 彔伯䜌毀 inscription quotes the Chou King's charge to Lu-tung, in which he says that Lu-tung's father aud grandfather served the Chou court, conducting military campaings in the four quarters and opening up the borderla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ou heavenly mandate, and tells Lu-tung that he must not fail to continue his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record of service. This shows that Lu-tzu Sheng eventually capitulated to the Chou King and became one of his trusted "legs and arms." Lu-tung himself led Ch'eng-chou troops against the Huai barbarians, and his son Po-tung commanded the *Hu-ch'en* guards, officers and troops against the Huai-jung; all of this was indeed a continuation of their ancestors' accomplishments. Thus this clan of Yin survivors also enjoyed a position that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Wei-shih Clan, and again cannot be seen as enduring a tragic fate under the Chou conquerors.

Numerous previously-known as well as newly-excavated Western Chou bronzes bear the 𢀛 Clan-symbol. For example, in 1975 exca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at the Tomb 25 site at Huang-t'u-p'o 黃土坡村 at Liu-li-ho 琉璃河 in Fang-shan 房山 county of Hopei province; the tomb was that of a person named Fu 復. This tomb had a double coffin-wall construction, and contained one human sacrifice and a very rich array of funerary goods, mostly weapon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erson buried there had been a military commander or general. A

tsun 尊 and a *ting* 鼎 vessel were also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and bore inscriptions with the clan-ymbols [glyph] and [glyph], which would appear to be simplified variants of [glyph]. This tomb has been dated to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Meanwhile, some vessels discovered at An-chou 安州 in Hupei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bear inscriptions recording the deeds of one Chung 中, who, at the time when the Chou King ordered Nan-kung 南宮 to put down a rebellion among the state of Hu 虎, was sent by the king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reconnaissance of the territory of Hu. Chung's troops encamped at a place called Ch'i-chou [glyph]州, on the Han 漢 river, and are said to have brought a number of large and small states in the area under control; they probably oversaw the non-Hua-hsia 華夏 states in the Han river plain.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ung *tsun* published in the *Chou chin-uen ts'un* 周金文存, Chung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glyph] Clan; most bronze-inscription scholars feel that the An-chou Chung vessel group belongs to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Moreover, a certain Yüan 員 appears in another inscription as having accompanied the court recorder 旗 o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state of K'uai 鄶, in which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heroically while leading an attack; the clan-symbol [glyph] again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is inscription. Another Western Chou tombsite was found in 1971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an-Ch'an 南瀍 river in the village of Pei-yao-ts'un 北瑤村, northeast of the old city of Loyang. This site yielded a number of bronzes bearing basically similar inscriptions and made by a person named Teng 𢍭; a previously-known early bronze, the Teng-*ting* 𢍭鼎, also bears the same clan-symbol as Yüan's.

Most of the previously-known bronzes, bearing either the clan-symbol alone or the name of an ancestor as well, are Yin vessels; thus the [glyph] was clearly a large clan at that time. The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Shang 商 generation in the above mentioned Wei-shih Clan vessel group have this symbol at the end of their inscriptions, as do the previously-known *Keng-ch'i kuei* 庚姬段 and the *Shang-fu yen* 商婦甗. We know that Shang's wife was named Keng-ch'i, as we have discussed; the Wei-shih Clan came from the Yin royal house, so the [glyph] clan-

symbol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Yin royal clan. From the Chung 中 sub-clan of the 𠦪 clan, we have a Chung *chueh* 爵 -vessel unearthed at Tomb 1022 at Hou-chia-chung 侯家莊, the Yin-Shang cemetery site at Anyang, while a bronze *ku* and *chueh* bearing the character Chung were recovered from a rifled tomb, No. 1080, in Zone 6 of the western Yin-hsü 殷墟 grave area during the digging which was conducted there from 1969 to 1977. Tomb 699 in Zone 3 of the same area is one of only five large tombs among the more than nine hundred tombs there; it contains four human sacrifices, and yielded three bronze *nao* 鐃-bells bearing the character Chung. The finding of bronzes bearing this name in the Yin-hsü area refle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ng Clan and the Yin royal house. The head of the Chung Clan served as the Yin king's *chen-jen* 貞人 or oracle-bone diviner. Teng, mentioned above, also appear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s the name of a sub-clan. All of this reveals the 𠦪 Clan's special status.

The symbol 𠦪 itself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Professor Ting Shan 丁山 as *Chi* 冀, the name of as ancient state in present-day Chi county, Shansi province,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appear to fit with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seen so far. The character contains the element *tzu* 子, "son" or "child", which was used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personal names; such compounds have been tentatively interpreted by Professor Tung Tso-pin 董作賓 as the formal names of royal princes. Thus the character 𠦪 may be connected to a princely clan; but Professor Kaizuka Shigeki 貝塚茂樹 goes a step further to suggest that this character represents a young clan group made up of princes of Yin royal house and that of the vassal states. We presently lack sufficient documentation to establish whether or not such a group included vassal states of the Yin-Shang kingdom itself, but it does appear that the Yin-Shang princes and their descendants generally used the character as their clan-symbol. If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group had separate fiefs, they would then use the names of their sub-clans such as Chung or Teng; originally they belonged to the 𠦪 Clan. If this hypothesis is correct, then the Western Chou vessels bearing the

clan-symbol 𢆶, like those of the Wei-shih and Lu-tung Clans, provide ample proof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enjoyed quite a high socio-political status under the Chou.

IV

The clan structure of the Yin period, just as Chu T'o said, included ***tsung-shih*** 宗氏 (main clans), ***fen-tsu*** 分族 (branch-clans), and ***lei-ch'ou*** 類醜 (associated groups). ***Tsung-shih*** were made up of direct relatives, and ***fen-tsu*** of branch-relatives, while ***lei-ch'ou*** were those ruled by the clan and engaged in productive labour. The Yin clans were constantly sub-dividing and establishing new, independent states and clans; since they did not emphasize the same-surname relationship, sub-clans sharing a common ancestor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independent and apparently unrelated groups. As Professor Tung Tso-pin has discussed, the "*tzu*-X 子某" name-compound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were the names of Yin princes, but we can see that once these princes had established their own states, they would eventually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Yin royal house; such conflicts could even develop into open warfare, as if they were indeed different countries. Prime examples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inscriptions are the "states" of Pú 𧗿, Pu 不, and Mu 目. Since the clan was thus the basic political and social unit of Yin society, and each was effectively independent with its own land and population,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able to kill "that fellow Chóu", but were unable to eradicate the widely-scattered Yin-clan states that has evolved over several centuries. Added to this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clan-stat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subservient to the Yin royal house, or had mobilized their own troops against it; in this situation, the Chou King Wu could naturally sow mutiny among the Yin armies. To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the Chou conquest was in reality a simple change of the master of the states; although they lost their own kingdom, they did not taste the bitter fruits of that loss. To understand the Chou's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survivors and their consequent high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during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it would thus appear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Yin Shang period itself, as revealed b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I have relied primarily on Chou-period materials in this paper, I can attempt no conclusive answers to this major question in Yin-Shang history here; I seek rather to simply open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濁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學調查

陳 仲 玉

壹、前言
貳、地理環境與氣候
叁、人文景觀
肆、遺址的調查
伍、發現的遺物
陸、結語

壹、前 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經在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間，與國立臺灣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實行「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主持人張光直博士曾經在提出這項計畫構想時，敍述到臺灣考古的重要性有以下的四點理由：⑴臺灣考古學最基本的意義，就在它本身所供給的材料。臺灣的人類史是中國人類史以及東亞、東南亞人類史不可缺的一部分。⑵現代的文化生態學注重文化系統的諸種成分與自然環境中諸種成分之間的連鎖關係。⑶臺灣在中國大陸東南部，爲大陸向太平洋方向必經的路線之一；在史前人類的遷移史上及在大陸與海洋的關係上，都一定佔有很重要的地位。⑷臺灣史研究及古史研究一般方法要溝通現代的民族學與古代考古學，臺灣有豐富的民族學與語言學的資料，是臺灣考古的一筆很大的資本[1]。這項原計畫要做上十年以上的計畫，可惜因諸多的原因而在勉強維持了三年之後就結束了。濁水溪的考古調查工作僅做到中游和下游的區域，上游區域則沒有做完。

筆者於六十九年秋天，曾經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徒步走過濁水溪上游自武界到萬大發電廠一段的河谷山路。就在這段山路上有三處地點發現有史前時代的石器。回所後，再查閱有關日據時代的文獻資料，知道那一帶在早先也有若干考古的發現，

1. 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1977年出版，頁 3-5。

確定這段河谷在史前時代即已有人類的活動。於是提出以下的四點現象向石璋如師報告。

(1)此段河谷之北為萬大水庫，其南為武界水壩，並有發電廠的設置，已有水利的開發。可知其水資源豐富，具有優良的生態環境，可能自古即適於人類居住。

(2)河谷中現今仍住有四個山胞村落，法治村的武界部落與萬豐村的曲冰部落為布農族，親愛村的萬大部落是泰雅族的鄒利亞族，親愛村的松林部落則是泰雅族的賽德克亞族。這三個古時競爭激烈的族羣，如今安居於此河谷中，成為一特殊的人文景觀。

(3)在該河谷中發現到多處有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遺留。因而知此河谷亦是古代人類活動生活的場所，具考古學調查與發掘的價值。

(4)此河谷東北邊的萬大水庫，附近有霧社、春陽、廬山溫泉等處已是觀光勝地。再往北的清境農場已是政府有計畫的山地開發區。中橫公路的霧社支線早已完工通車。所以，此河谷的開發將是不久的事。

基於以上這四點情形。璋如師即時指示着手擬訂在這段河谷做考古學調查與發掘的研究計畫，並且將範圍擴大至整個濁水溪上游主流的地區。所以，我們在七十年春天擬訂了「濁水溪上游河谷的考古學調查與發掘」計畫。石璋如先生為計畫主持人。這計畫具有以下的幾點意義：(1)臺灣近年來社會與經濟的快速發展，各項官方的建設與民間的建築，平地地區的古代遺址或遺蹟多已遭受破壞，而各項建設與建築已逐漸指向山地。山地的開發，道路建築、森林遊樂區的規畫都說明了這種趨勢。而這類開發的實施，往往難與學術研究作事前的配合與協調，以致在工程進行之中發現古蹟，則就措手不及，臨時的搶救工作又會阻礙建築的進行。所以，在將要開發的山地事先做考古工作，以收未雨綢繆之效。(2)雖然重點放在考古工作，但在工作推展之前，必須將工作區域的地形、地理、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略作觀察，以便與考古工作做比較和研判，這種工作成果將有助於以後開發該地區時的參考。(3)這計畫雖是採取小區域，以一年為整體的計畫工作，但目標上還是集數小區域之計畫，以便以後集合成一大區域的研究基礎。希望以此有助於未來的區域研究發展。(4)有助於史語所對臺灣考古工作的進行與研究工作的推展，並為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增加田野工作的訓練。所以，這

計畫在基本精神上，仍然是「濁大計畫」考古學部分的延續。

計畫擬訂後，曾提出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申請專案補助計畫實施的經費，並且承該會核准。七十年七月即着手做田野調查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尤其是人類學高山族部分的資料，自然環境方面的地理、地質、氣候、土壤等文獻資料的蒐集，都要注意到。在經過了相當的準備之後，筆者與研究助理余澤宇先生共同前往濁水溪的上游河谷，以仁愛鄉法治村武界部落以北至合作村靜觀部落爲主要調查區。調查之後，又選擇了萬豐村曲冰部落北方約二公里之 Qais 一地做試掘。本文就是這計畫中的調查工作報告。至於發掘部分將另在曲冰遺址發掘報告中專文敍述。

貳、地理環境與氣候

濁水溪流域是在臺灣本島西坡的中部，主流全長 178.6 公里，流域面積有4,324平方公里，是臺灣省最長與流域面積最大的一條河流。主流發源於合歡山主峯與東峯間的佐久間鞍部，而以中央山脈的奇萊主山北峯、奇萊主峯、能高山南峯、大石公山、丹大山、馬博拉斯山、以及玉山爲南界之一線的範圍內爲其上游集水區。主流自發源地先集合歡山東坡之水，之後西流，先後納塔羅灣溪、萬大溪、卡社溪、丹大溪、郡大溪諸流，往西在龍神橋處再與陳有蘭溪會合。故在龍神橋以上部分爲上游，以下則爲中下游。如以這一範圍的畫分爲準，則濁水溪上游的流域實應包括主流之外的丹大溪、郡大溪、陳有蘭溪等大支流之諸流域。整個濁水溪流域可分成山地區、丘陵區、谷地區、臺地區、平原區五個區域，而上游則均在山地區中，上游全長 91 公里，上游主流流域面積凡 792 平方公里[2]。

濁水溪主流的上游又名霧社溪，其流路大致呈閉塞曲流 (Inclosed Meander)，其中大部分呈「成育掘鑿曲流」(Ingrown intrenched meander)；河床狹窄，爲一連續之峽谷。如丹大溪合流點至武界之間，稱「良久屏峽谷部」即爲標準之峽谷地形。自武界至霧社之間，軟質之千枚岩狀板岩甚發達，因而河流之側切較甚，形成寬濶之河床，但其中如有硬質之砂岩或板岩分佈時，河流即被緊扼形成隘路或地峽。武界之東北方，姊原的北方，萬大溪合流部附近，都成標準的隘路。而此三地峽之北方又是寬

2 石再添等，濁水溪流域的地形學計量學研究，臺灣文獻二十七卷第四期，1976 年，頁 1-3, 13。

廣的河床平原，這種河床之寬狹變化乃河蝕對地質堅弱顯然的差異。霧社是在濁水溪與眉溪之間緊扼而狹隘的山稜上，地形上屬於一個風隙（或風谷），可能古時在此處有河川襲奪的現象。霧社以上的濁水溪河谷仍呈連續之峽谷地形。其中雖有廬山、平和、靜觀等河階地，但極爲狹窄[3]。此段河谷因坡度均大，兼以水土保持不良，一遇颱風暴雨，則土塌山崩，砂石隨流而下，使濁水溪含砂量之大，冠於全省，常造成嚴重之洪水災害。

濁水溪上游河谷的氣候，除了少數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峯之外，全屬於山地溫帶重濕氣候區。氣候特色[4]：

1. 氣溫較低，並依地勢之增高而遞減。氣溫垂直遞減率平均每一百公尺減 0.45°C 至 0.5°C ；並且其年變象較平地爲小，卽氣溫年較差隨地勢增高而減小，但各地氣溫年較差皆不超過十度。海拔一千公尺處年均溫在 18°C 左右。
2. 雨量多於平地，年降雨量皆在 2500 公厘以上。雨量隨地勢而增多。七月雨量最多，十一月最少。夏季多對流性雷雨，地形雨或颱風性等暴雨。降雨強度甚大。
3. 山地風速較大，但受地勢高低及背風向風等局部地形所影響而有不同。夏秋雨季風速較小，平均風速每秒一公尺左右。冬春二季風速較大，平均風速每秒 1.6 至 2.2 公尺間。強風次數較平地爲多，尤以夏季最多；風信以西南風頻率最高。谷地有恒定的山風與谷風。
4. 相對濕度較平地爲大，年平均相對濕度在百分之九十左右。
5. 雲量亦較平地爲大，年平均雲量在 5 以上。

此段河谷因多峽谷，階地並不發達，偶而在兩岸殘留的若干狹窄的河階地，也多爲人們居住地與耕地。現將其中之較大者之拔高、比高、面積、坡度等資料列如下表一：

---

3 林朝棨，南投縣地理志地形篇稿，南投文獻叢輯（十二），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 53 年 6 月 2 日出版，頁 90-101。

4. 王洪文，南投縣地理志氣候篇稿，南投文獻叢輯（十五），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 56 年12月25日出版，頁 156-158。

表一：濁水溪上游主流河谷之河階地[5]

河階地名	拔高（m）	比高（m）	面　積（km^2）	坡　度	備　　註
靜觀　T_1	1600	240			
靜觀　T_2	1560	200			
靜觀　T_3	1420	60			
靜觀　T_4	1390	30			
平和	1300	90			
平靜	?	?			
廬山	?	?			
春陽	1240	440			
霧社	1150	180			
萬大	840～880	10～90	0. 80	4°24′	
松林	820～840	10～30	4. 60	7°35′	
松林西T_1	1040	80			
松林西T_2	960～1000	40			
松林西T_3	820～840	20			
姊原	800～820	20～50	4. 00	4°24′	
曲冰	780～860	10～90	3. 20	5°43′	又名干卓萬
武界	700～720	10～30	0. 57	4°35′	
地利　T_1	440～480	80	0. 70	11°19′	又名塔馬羅丸
地利　T_2	420	30			
拔社埔	360～400	5～45	2. 24	2°25′	龍神橋東方 5 公里
中和	400～440	80	0. 40	7°08′	人倫
治坡石	460～500	80	0. 32	9°44′	塔爾波潤灣
雙龍	500～580	120	0. 40	7°36′	迭特文

5. 石再添等，1976 年，頁 10

上表所列的十七處河階地中，除了平靜與廬山缺乏資料之外，其它十五處階地如依日人富田氏用階地與河床的比高，以一百公尺為分畫，一百公尺以上者為高位河階，以下為低位河階[6]，則此十五處地點，共二十一段階地之中，屬高位河階者有四段，佔19%，屬低位河階者有十七段，佔81%。並且面積均不大，坡度多在 10° 以內。

叁、人文景觀

本文所敍述的調查區域限濁水溪上游自良久屏地峽以上的主流部分河谷。此段河谷現屬南投縣仁愛鄉管轄。區域內，基本上全屬山胞居地，並且有相當複雜的族羣關係，這是此區域的特殊人文景觀。現將各山胞部落的名稱、族羣與人口數列如下表二：

表二：濁水溪上游主游兩岸之山胞部落、族羣與人口數

村名	部落	所屬族羣	人口[7] 山地	人口[7] 平地	備註
法治村	武界	布農族卓社羣	861	53	
萬豐村	曲冰	布農族卓社羣	735	35	干卓萬社
親愛村	松林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太魯閣羣	408	12	
親愛村	萬大	泰雅族鄒利亞族萬大羣	778	19	
仁愛村	霧社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羣	561	844	
春陽村	春陽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羣	1,104	29	櫻社
精英村	廬山溫泉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羣	111	58	馬海坡社
精英村	廬山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霧社羣	631	85	
精英村	平靜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韜佗羣	750	25	
合作村	平和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太魯閣羣	746	21	
合作村	平生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太魯閣羣			
合作村	靜觀	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太魯閣羣			
合計			6,685	1,181	
總計			7,866		

6. 陳正祥，臺灣地誌（下册），敷明產業地理研究所研究報告第 94 號，1961 年出版，頁 912
7. 依據南投縣仁愛鄉公所民國七十年八月分的人口統計數。

大族羣的分別，有布農族與泰雅族，這兩族在霧社南方大約十六公里處分界。也就是後來我們發現史前聚落遺址的地點，布農族稱該地爲 Qais，亦即「界限」之意。Qais 以南有曲冰部落，在日據時代稱干卓萬社，舊部落在今之曲冰部落南方約三公里。再往南有武界部落。以前這兩部落合屬法治村，民國五十八年始將曲冰部落分出，設爲萬豐村。這兩部落都屬布農族的卓社羣。

自 Qais 以北的河谷地，雖均爲泰雅族的居地，但其族羣關係較爲複雜。直接與布農族曲冰部落接壤的是松林部落，原屬賽德克亞族太魯閣羣；他們與濁水溪主流最上方合作村的平和、平生、靜觀三個部落是同羣的。然而，如今與他們鄰近的泰雅族人卻是鄒利亞族的萬大羣，居住在他們的北邊。萬大部落位在萬大水庫南邊，萬大溪與濁水溪會合點附近的地區，實包括萬大發電廠附近的部落在內。其北即霧社、春陽、廬山溫泉（即馬海坡社）、廬山諸部落，均屬賽德克亞族霧社羣。但是在廬山與平和兩部落之間又夾著一個平靜部落，屬泰雅族賽德克亞族韜佗羣。所以，就這一段不算太長的溪流河谷中，僅是泰雅族部分就有二個亞族與四羣的差異。

由於這一地區有這麼複雜的高山族部落居住其中，在古時更涉及獵場的分配問題，所以族羣的鬪爭相當激烈。先不說泰雅族與布農族之水火不容，就是泰雅族的羣體之間的鬪爭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發生在民國十九年的霧社事件。由於日人大力實行所謂的「理蕃政策」。用高壓手段控制高山族，更由於日警的作威作福，於是引起了高山族的抗日運動。這項由馬海坡社頭目莫那魯道領導的抗日事件曾經造成軒然大波，受全世界的注目。日人被殺者197人，日本政府曾出動軍警 2,744 人，並且使用其時最新式之武器機關槍、山砲、飛機投彈、施放毒氣瓦斯等手段鎮壓。但最後日人是用「以夷制夷」的辦法，利用與莫那魯道敵對的族羣作戰。莫那魯道雖抵抗到底，但仍不免兵敗而自殺身亡[8]。這是數十年前的一段故事。自從光復以來，我政府本一視同仁之同胞愛精神，多方輔導，改善山胞生活。如今在這地區的族羣間鬪爭現象早已不存在。因緊鄰而居，族羣間的通婚更是普遍。山胞在往時以種植小米、甘藷、蔬菜爲農耕作物，狩獵亦很重要。如今多種稻米、水果蔬菜、香菇爲主要生

8. 劉枝萬，南投縣革命志稿，南投文獻叢輯(七)，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 48 年 6 月 30 日出版，頁 290-344。

業，狩獵因政府禁止，已很少見。

這段河谷南段的良久屏峽谷一帶均爲懸岩峭壁，河道狹窄曲折無水運之便。故自濁水溪中游要從水道進入此谷地，則極爲不便。故要進入此谷地多是翻越谷地西側的山路而入。較早開闢的道路是自埔里沿眉溪河谷而上，從霧社附近的鞍部而入霧社，這仍然是目前要進入這段河谷的主要道路。這條道路再自霧社往東北向沿眉溪與濁水溪的稜線可通合歡山一帶，在大禹嶺接中橫公路，是爲中橫公路的霧社支線。自霧社往東有公路通到廬山溫泉。這條線是在日治末期逐漸開發廬山溫泉而設。除此之外均爲產業道路；有：廬山溫泉經廬山往靜觀、自霧社往曲冰、自武界往埔里等線。這些產業道路均是近十數年內才開闢的。道路未開闢之前，交通全靠步行。目前卽是曲冰往武界一段，仍然是一條步道。幾條產業道路大都不走公車，行旅與貨運多靠民營的貨車。可知這段河谷原是相當閉塞的地區。而埔里一地至今仍是他們的轉運站。

漢人在這一區域的開發比較晚。雖然與這地區關係密切的埔里盆地在光緒元年卽已設廳治管理，完成漢人的移民[9]。但漢人始終僅止於埔里地區，難於進入此處山區，這與對外交通情況和政府的山地保護政策有關。按此段河谷之諸村莊中，霧社因是鄉政府所在地，並且又是名勝遊覽區，所以目前平地人口超過山地人口。而廬山與廬山溫泉一帶也因爲是觀光遊覽地區有稍多的平地人之外，其餘諸部落中的平地人口甚少（參看前表二）。而且大多是在光復以後由於在山地經商，或與山地人婚配等關係，才遷移進去的。但與此地區息息相關的濁水溪與眉溪稜線上之山坡地，淸境農場一帶，在民國五十二年間有大批的移民。那是自越南緬甸一帶撤遷來臺的義民，他們多是我國西南方的邊疆民族，政府特別安揷他們在此墾殖之故。

濁水溪上游的此段河床，如由縱切面觀察，在平靜與平和之間，萬大溪合流處、武界部落上方等三個地點都爲遷急點[10]，可利用河床的落差發電。萬大溪合流處設水壩，使成萬大水庫，並設發電廠。在武界上方築一水壩，再自此水壩右側鑿一隧道通日月潭，引此段濁水溪之水供日月潭大觀發電廠之用。此二發電廠之工程均甚雄偉。所以，水力的開發也是此段河谷的特殊人文景觀。

9. 劉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稿，南投文獻叢輯，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 47 年 1 月 1 日出版，頁 229。
10. 石再添等，1976 年，頁 9。

肆、遺址的調查

這段河谷與考古學發生連繫可推早到一九〇〇年，日人鳥居龍藏在仁愛鄉（其時爲臺中州能高郡）眉原社發現打製石斧。自後的十年間，先後有森丙牛、尾崎秀眞、馬淵東一、青木三次等人均有所發現。但是，由於這些日本學者在當時到這一帶的調查，並不是爲考古學作調查，而是注重高山族的人類學調查。他們在調查蕃社時，往往發現到石器或陶片等物，順便將標本帶回，並且在蕃族調查報告中，或是遊記中，簡單地提上一筆，很少有考古學的專門報導。今將與此段河谷有關考古的發現列如下表三[11]：

表三：濁水溪上游主流地區之史前遺蹟與遺物（1911–1955 年間發現者）

地　　名	現　在　位　置	發現者	發現年月	遺　　物
Toroko 社	靜觀村落附近	森丙牛	1911年 3 月	打製石器
Tarowan 社	平生村落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Mahebo 社	廬山溫泉附近	尾崎秀眞	1930年 8 月	陶罐
櫻社	春陽村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石鑿
霧社	山胞抗日紀念碑前廣場	劉枝萬	1955年 2 月	打製石斧
Molosal	萬大發電廠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Tobanan	親愛村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Hagel	親愛村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Shinkutswan-Tahamis	姊原北方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姊原	姊原臺地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石鑿
妹原	干卓萬舊社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Teisiyau	干卓萬舊社附近	馬淵東一	1935年 7 月	打製石斧
武界上坡	法治村附近	青木三次	1944年 7 月	打製石斧

11. 劉枝萬，南投縣考古誌要，南投文獻叢輯㈣，南投縣文獻委員會發行，民國 45 年 6 月 30 日出版，頁 51-67。

以上的十三條資料，因爲並非均出自正式的考古學報告，所以缺乏確實的地點與其他的細節，我們只知道這段河谷的沿岸多史前石器與少數陶器的發現。這一點對於重新做調查工作時的幫助有限，卻給了我們相當大的信心。

在我們對於地圖與地理、地質等資料的研判之後，筆者與研究助理余澤宇先生曾於七十年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八日在霧社至武界一段的河谷中，做了爲期十一天的調查。又於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一日在霧社至靜觀一段的河谷中做了爲期八天的調查。由於受人力與儀器不足等等因素的限制，我們仍然盡力以步行與用眼力搜尋古蹟古物的方法，對於每一處可能爲史前遺址的地形，作普遍與深入的探察。大致是依山路可及的兩岸河階地、緩斜坡，尤其注意大型支流的兩旁階地，亦即若干河流的交會口。每有蹟象或古器物的發現，即時採集標本並在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地圖上標明地點位置，並做記錄及照像繪圖等工作。地圖上無詳細地名者，則盡量查詢當地山胞之地名，並用羅馬拼音標示。經過這二次的調查，我們在濁水溪上游這段河谷中共發現以下的十八處遺址（附圖：濁水溪上游河谷史前遺址分布圖）：

表四：調查濁水溪上游地區發現史前遺蹟地點及遺物表

地　名	所屬村落	河階	海拔（m）	比高（m）	發現的遺物
1. 靜觀第二階地	合作村	高位河階	1,560	200	打製斧形石器五件
2. 頂春陽	春陽村	高位河階	1,240	440	打製斧形石器一件
3. 春陽溫泉高階地	春陽村	高位河階	1,200	150	打製斧形石器三件
4. Marosan	萬大發電廠	低位河階	940	80	打製斧形石器二件
5. Maroi	親愛村	低位河階	930	50	打製斧形石器四件
6. Bulaii	親愛村	低位河階	910	60	打製斧形石器一件
7. Hanabai	松林	低位河階	860	50	打製石器五件，陶片少許
8. 松林舊社下方山路旁	松林		950	110	打製斧形石器二件
9. Yayün	松林	低位河階	860	60	打製斧形石器二件
10. Qais	萬豐村	高位河階	930	120	打製石器十五件，陶片

11.姊原緩坡地	萬豐村	低位河階	820-850	20—70	打製斧形石器十四件
12.姊原上方階地	萬豐村	高位河階	920	140	打製斧形石器一件
13.曲冰階地	萬豐村	低位河階	840-880	30—70	打製石器四件
14.干卓萬舊社	曲冰舊部落	低位河階	800	50	打製斧形石器十件
15.Demou	曲冰舊部落	低位河階	810	60	打製斧形石器三件
16.Nogan	萬豐村	低位河階	770	40	打製斧形石器一件
17.Danginon	萬豐村	低位河階	780	50	打製斧形石器一件
18.武界圓山下方	法治村	低位河階	760	40	打製斧形石器二件

上表所列的十八處遺址均在地面上採集到石器，其中並有 Hanabai 與 Qais 二遺址有陶片的出現。這十八處遺址主要是分布在以下的幾處河階地與緩坡地上：

(一)靜觀高位河階

共分四段，第一段拔高 1,600m，比高 240m；第二段拔高 1560m，比高 200m；第三段拔高 1420m，比高 60m；第四段拔高 1390m，比高 30m；其中第二、三段為聚落地點，第一、四段則殘留面積狹小。經調查，遺物僅在第二段河階有所發現，係位於村子口和氣巷七號附近果園下方道路旁，採集到打製斧形石器二件，另外在其南方三十公尺處，位於村落後面的果園內也採集到三件同樣形制的石器，因此我們認為這是一處史前遺址。唯第二、第三段河階蓋滿部落的居屋，縱有史前遺址恐已遭破壞殆盡。

(二)春陽高位河階

根據地質學家的調查，霧社以上的濁水溪上游低位河階並不多見，主因是奇萊主溪西岸，山坡多順層向發育，且多急崖，河階不易形成，故霧社、廬山、平和等處河階，皆沿左岸發育，非常狹隘，為河谷僅有的平地，山村聚落多半循此地形修建，所餘空地實不多見，如有史前文化遺址恐遭破壞亦難尋。這次僅在春陽附近發現石器分佈地點兩處：一處位於頂春陽的春陽溫泉別館前停車場旁石子路面上，海拔為 1240m，比高為 440m，採集到一件打製斧形石器，出土地點已無法確定；一處位於春陽水文站對岸，高位河階地面海拔 1200m，比高 150m處，採集到三件打製石

器，經實地調查，地面經修整做爲雜糧耕種地，地面滿佈自然板岩石塊，僅有二、三家散居民宅，其地質主要屬板岩石塊地層。

㈢萬大低位河階

包括萬大發電廠與親愛村兩河階地，前者位於萬大溪與濁水溪會合口之北約 3 公里，泰雅族土名 Marosan，階面拔高 900～950m，比高 40～90m，坡度 4°24′，面積 0.2km²，由於土地面積有限，且沿著山坡普遍建築員工宿舍及道路、學校等地面設施，僅在村落後的山麓旁路面拔高 940m，比高 80m 處拾得二件打製斧形石器。後者位於萬大溪會合口下方一公里，階面拔高840～880m，比高10～90m，坡度 4°24′，面積 0.8km²。遺物發現地點有二處，一處在順益木材行旁菜園內，泰雅族土名 Maroi，拔高 930m，比高 50m，發現打製斧形石器四件；一處在親愛村對岸山麓小路旁，泰雅族土名 Bulaii，拔高 910m，比高 60m，發現打製斧形石器一件。以上三處之遺物皆自地面採集。

㈣松林低位河階

位於萬大部落西南方之濁水溪左岸，拔高820～840m，坡度 7°35′，面積4.6km²。右岸則可見到三段階面，最下段可與松林對比，中段拔高960～1000m，比高40m，上段拔高爲 1040m，比高爲 80m，是爲松林舊社所在。遺物發現地點有三處，一在濁水溪左岸中段階地，松林聚落北方約 500m，泰雅族土名 Hanabai，拔高 860m，比高 50m，地表土質爲灰色砂土，且多粘板岩石塊，現闢爲玉米田，地表採集到甚多的打製斧形石器與夾砂紅陶碎片二片，石器相當密集，可能是一處遺址。一在濁水溪右岸中段階面，位於松林舊址下方河階，與 Hanabai 遺址隔河相對，拔高 950m，比高 110m，在山路旁採集到二件打製斧形石器，在其下方階面已全部闢爲水田，遺物出土地點無法判定。另一處位於松林南方一公里，往曲冰的產業道路東側山坡地，泰雅族土名 Yayün，拔高860m，比高60m，濁水溪在其西側。遺物發現在山坡梯田第 8～10階，現闢爲蔬菜田，地表可見到不少的打製斧形石器殘件，但完整的不多，僅收集二件完整的石器。從遺物分佈的密集狀況判斷亦可能爲一遺址，但因梯田的開闢，遺址恐大部被擾亂。

㈤ Qais 高位河階

海拔高度 930m，比高 120m，位於 Yayün 地點西南方約二公里處，爲和緩傾斜地面，面積南北長約 180m，東西寬約 90m，濁水溪圍繞西、北二面而過，地面種植水稻與豆類作物。土質爲灰砂土，夾雜粗板岩碎石遍布地表，遺物發現有豐富的打製斧形石器與陶片殘留，可能是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後經試掘，即以「曲冰」爲該遺址之名。遺址西北方，產業道路旁，亦有一塊和緩的坡地，當地居民正砍伐樹林計劃開闢爲菜圃，清理後的地面，面積東西長約 60m，南北寬約 40m，地面亦發現打製斧形石器三件。

(六)姊原緩坡地

位於松林河階西南方約三公里，地勢相當平坦，南北長約一公里，寬約 0.4 公里，拔高 800～820m，比高 20m，坡度 4°24′，面積 $4km^2$，發現二處石器分佈地點，一處位於姊原坡地上，我們調查時在坡地的南北兩端皆有發現，北端的地面全部開墾成水田，石器散見於田埂路邊，這一邊遺址保存情形不佳，南端的地面，面積南北長 150m，東西寬 50m ，拔高 820m ，比高 70m ，土色爲灰褐土，散佈板岩及碎石，地表爲和緩的傾斜地面，被闢爲雜糧作物的田地，地面散見不少的打製石器，可能爲一處遺址。另一處發現石器的地點是在姊原低位河階的上方，位於今產業道路的東側頂處，拔高 880m，比高 140m，站在曲冰遺址高處往南望，即可見到，似同屬坡度緩和的階地，地形與 Qais 遺址略同，估計面積南北長 150m，東西寬 50m，據當地村民告知，該處早期布農族人曾在此居住過一段時期 ，經實地勘查，地面還可見到板岩疊成的毀牆數段。僅拾得一件打製石器。

(七)曲冰階地

拔高780～860m，比高10～90m，坡度 5°43′，面積 3.2km^2，曲冰部落位居階地中央。我們在村落的下方和上方都發現到不少的遺物，包括有打製斧形石器三件。村落的下方爲廢棄之梯田，仍可見到開闢過的階面，目前爲當地人放牧之所在，雜草叢生；其上方爲村落建築，村落的最上方爲曲冰派出所，我們在派出所的後面菜園地面亦拾得一件打製石器。

(八)曲冰舊社低位河階

即干卓萬舊社，位於村落南方約三公里，海拔800m，比高70m，現今約有十餘處住

家，住家前後均爲大片水稻田，遺物發現地點位在舊社的後面山坡，地表採得打製斧形石器十件。此外在曲冰村落至干卓萬舊社之間的山路旁台地，布農族土名Demou，拔高 810m，比高 60m，地面採集到三件打製石器。曲冰舊社對岸的 Nogan 地點，拔高 770m，比高 40m，位於曲冰往武界的山路步道上，過曲冰吊橋不遠的路旁，拾獲一件打製斧形石器。Danginon 地點，位於 Nogan 西南方，500m 係楓橋旁山腳下之狹小土地，拔高 770m，比高 50m，現僅有一戶農家，採集到一件打製斧形石器，係在耕種的旱田地上拾獲。

(九)武界低位河階

位於良久屏峽谷之北部，武界水壩下方，爲一沖積扇階地，拔高700～720m，坡度4°35′，面積 0.57km²。左岸階面上，有一圓丘拔高 740m，當地居民稱之爲圓山，這次在圓山附近武界吊橋東端產業道路旁拾獲二件打製斧形石器，發現石器地點拔高 720m，比高 40m，位於河階的上端。遺物就在一民宅的門前路邊石堆裏發現，因出土地點不能確知，無法判定遺址位置。圓山隔著濁水溪與對岸的武界部落相對，村落位居河階的較高處，沿著河床兩岸較低的階地，皆已闢爲水田，經全區勘查，皆無遺物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推測是低位河階離河床太近，高處僅差三十公尺，武界低位河階在古代無水壩調節水量等功能，雨季洪水一來，當即爲溪水泛濫區，恐不適於史前人類居住。況且今日沿著河床的所有低位階地皆已闢爲水田，由於土地的高度開發利用，以及修地整田的關係，縱有遺址亦難以發現。

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之中，因爲純是用地面上觀察的方法，如是一處林地或未開墾地，則雜草叢生，根本無法做地面的觀察。但是，如果是種植稻米的水田，則調查時正是禾稻油油的時節，更無法看到什麼蹟象。我們祇好盡量在山路、田埂、和種植雜糧蔬菜的旱田中找尋。尤其是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後調查霧社至靜觀一段河谷的時候，正值連日延綿的大雨，調查工作甚是艱難，受了更大的限制。所以，上述的十八處發現古蹟古物的地點，僅是我們在受著諸多限制下所得的成果，相信未被發現的遺址仍多，有待以後再進一步的調查。若依實地觀察遺物的分佈情形，這十八處地點之中，至少有 Qais, Hanabai，姊原南方低位河階，姊原上方高位河階，曲冰部落等

五處可做試掘。

伍、發現的遺物

上述十八處可能是史前時代的遺址地點，我們所依據的蹟象是建立在地面觀察所發現的遺物上。遺物可分爲石器和陶片二部分。採集標本的數量是看各地點的實際情況而定。標本出現很少的地點，就盡量的蒐集；標本多的地點，就選其形態有差異性者，或是隨機取樣的方法蒐集。

十八處地點均發現到石器，共採集到石器七十六件。因爲它們是我們調查這段河谷主要可以做初步研判的材料，所以，要先將這組標本做些分析。一般研究古代器物的方法是先從器物的分類入手。這種方法至少有二方面的作用：(一)將眾多的標本分成若干類型，等於是分組簡化，以便資料的處理和敍述。(二)古器物是古代人類生活活動中具體而明顯的證據，是經過人手作某種經營的結果；標本經分類之後，易於理出系統，或排成層序關係，以便作更進一步的考察。所以，這七十六件標本，我們仍然以分類學的方法入手。我們發現，其中有七十二件屬於端刃器中的打製斧形石器。其餘的四件中，有三件屬於邊刃器系統的刮削器，另一件是斧形器與刮削器的複合工具。

關於臺灣史前時代的打製斧形石器，作者曾經有過一次綜合的研究[12]。器物經形態學的觀察，依三項分類學的標準：

(一)刃部是器物主要的使用部分，依這部分形態爲大類的分劃標準，可分爲弧刃與平刃兩大類。

(二)由刃部與柄部結合而成的斧身形狀，最寬度的所在爲另一顯明的形態分畫。所以最寬度的位置是分型的第一個標準。如將斧形器依照刃部朝下的放置，最寬點在柄部接近刃部的位置稱「下寬」；近於全器的中段，稱「中寬」；近於頂部者，稱「上寬」，上下略同者稱「同寬」。

(三)除了最寬部位之外，柄部還有若干形態上的差異：

(1)沒有下述各特殊形態者爲「一般型」。

(2)頂部經橫切修整者，稱「平頂型」。

12. 陳仲玉，臺灣史前打製斧形石器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自印本 1979。

(3)器身柄部自刃部的上方內束，使兩側邊成爲內凹的弧線形狀，是爲「束柄型」

(4)中腰部位內束，是爲「束腰型」。

(5)位於頂部與腰部之間的頸部內束，是爲「束頸型」。

(6)柄部偏於一邊，是爲「偏柄型」。

如依照這三項分類標準，濁水溪上游河谷所發現的這組打製斧形石器標本可分類爲以下的二類九型：

(一)弧刃類：刃部大致成圓弧形，弧度的大小也有相當大的差異，有時刃線會稍偏一方。共有六十件，又可分成以下七型：

(1)一般下寬型，共有七件。器身最寬度近於刃部，多保有石片片解時圓或尖的頂部。（圖版壹，4，Qais；圖版拾：1，Qais；圖版拾壹：1，曲冰）

(2)平頂下寬型，有二件。形制與一般下寬型相似，惟頂部經過修切，縱剖面呈現的最厚度在近頂端的部位。二件器形又因寬長度的比例不同，又可分成二亞型：採集於春陽溫泉附近高位河階的一件，長寬指數爲 44.29，是爲窄長型（圖版：3，圖版肆：1，均春陽溫泉）；另一件採集於 Qais，長寬指數是 70.54，是爲寬短型。

(3)一般中寬型，有九件。最大的寬度在近柄部的中腰，頂部仍保留圓或尖的形態。此型多是窄長型（圖版壹：1，Qais）

(4)平頂中寬型，有二件。形似一般中寬型，惟頂部經修切，最厚度多在柄的上半段近於頂部的部位。（圖版壹：5，Maroi）

(5)平頂上寬型，有八件。最大寬度與厚度均近於頂部的部位，並且頂端經修切。又可分爲窄長（圖版貳：1，圖版捌：1，曲冰；圖版柒：1，Demou; 2，Maroi；圖版捌：1，曲冰）與寬短（圖版貳：2，干卓萬舊址）二亞型。

(6)一般同寬型，有十三件。柄部的上下寬度大約相等，頂部留有圓或尖的形態，器形均尙窄長。（圖版壹：2，靜觀；圖版參：Bulaii；圖版伍：2，Maroi; 圖版陸：2，姊原；圖版玖：1，姊原；2，Qais）

(7)平頂同寬型，有十九件。形狀似一般同寬型，惟頂部經修切平整。又可分爲窄長與寬短二亞型（圖版壹：6，姊原；圖版貳：3，Marosan；圖版肆：2，姊原；圖版伍：1，Yayün；圖版陸：1，Marosan）

(二)平刃類：刃部平直。僅有二件，分屬以下二型。

(8)平頂上寬型，僅有一件。平刃，最大寬度在近頂部的部位，頂部經修切。（圖版貳：6，圖版捌：2，均 Qais）

(9)平頂同寬型，僅有一件。器身近於同寬，頂部經橫切，最厚度在近頂部（圖版貳：5，圖版拾：2，均曲冰）

除了打製斧形石器之外，我們在萬大至武界一段的河谷，還發現三件刃部在一長邊的刮削器。其製作方法是自石材上打下一塊近似長方形的石片，使一長邊具有鋒利的刃部，另一長邊則爲較厚的脊背。這種石器的刃部大多可看出經過使用而消耗的痕跡（圖版貳：7，圖版拾壹：2，均干卓萬舊址）。此外還有一件石器，外形類似弧刃類平頂下寬型石斧；但除了具有石斧的端刃之外，器身的一長邊也具有鋒利的刃部，而另一長邊爲較厚的脊背。所以，此件石器是斧形器與刮削器的混合工具應屬石刀類（圖版貳：4，圖版陸：2，均 Hanabai）

現將此段河谷所發現的石器之分類列如下表：

表五、濁水溪上游河谷發現的石器地點、類型及數量

標本出土地點 \ 類型 \ 件數	I. 弧形									II. 平刃		刮削器	斧形器與刮削器混合工具	未分類者	合計
	一般下寬型	平頂下寬型	一般中寬型	平頂中寬型	平頂上寬型		一般同寬型	平頂同寬型		平頂上寬型	平頂同寬型				
					窄長型	寬短型		窄長型	寬短型						
1. 靜觀第二階地			1				4								5
2. 春陽								1							1
3. 春陽溫泉高階地		1							2						3
4. Marosan								1	1						2
5. Maroi				1	1		1		1						4
6. Bulaii							1								1
7. Hanabai	1							2				1	1		5

8.松林舊社下方山路旁				1			1								2
9.Yayün			1						1						2
10.Qais	2	1	3		1		3	1		1				3	15
11.姊原緩坡地	1		2				3	2	2			1		3	14
12.姊原上方階地					1										1
13.曲冰階地	1					1		1			1				4
14.干卓萬舊社			1		1	1	1		2			1		3	10
15.Demou					2									1	3
16.Nogan	1														1
17.Danginon	1														1
18.武界圓山下方			1						1						2
標本總數	7	2	9	2	6	2	14	8	10	1	1	3	1	10	76

關於臺灣史前的打製斧形石器，作者曾經有次機會，將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以下簡稱考古系）所收藏的此類標本，做了全面的觀察，並且選擇了其中帶有各地區代表型的 1,467 件標本，做次研究並寫成論文[13]。考古系的這批石器標本實是自1928年，日人在臺大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設土俗人種學研究室開始，至民國六十八年作者做研究時，這五十年間教授學者們蒐集的考古學標本之一部分。它所涵蓋的考古學遺址範圍很廣泛；包括臺灣本島各地區與澎湖羣島。現在如果將我們在濁水溪上游河谷所發現的標本（即本文標本）與考古系的標本做次比較，則具有相當的意義。這個比較研究，仍然是依形態學上的思考。

(一)就分類上的類型之比較。 考古系標本可分成二類十九型。 本文標本可分成二類九型。兩者共有的類型已如上述的(1)至(8)型。本文標本所無的是：弧刃類之束柄下寬型、束腰下寬型、束頸下寬型、偏柄下寬型、束頸中寬型、一般上寬型、束腰同寬型；平刃類之一般下寬型、束柄下寬型、偏柄下寬型、一般中寬型。而本文標本特有的平頂同寬型，是此地區的一種特色，則不見於考古系的標本中。所以，普遍出

13. 陳仲玉，1979 年，頁 30~51。

現於東西海岸地區的束柄型與東海岸地區的束腰各型，均不在此地區出現。本文的標本將這一個地區的特性很明顯地呈現出來。

(二)就兩者所共有的八型之數量比較。這個比較，除了本文的標本之外，將取考古系標本中的三個數據：(1)全面性的數據，(2)濁水溪中游集集鎭的數據，(3)埔里鎭的數據，因集集與埔里兩地與濁水溪上游這段河谷地區的關係密切。現列表如下：

表六：打製斧形石器八類型之數量與百分比之比較

類	型	全省		集集鎭		埔里鎭		濁水溪上游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弧刃	一般下寬	546	41.36	75	40.76	13	39.40	7	11.48
弧刃	平頂下寬	28	2.12	1	0.54	2	6.06	2	3.28
弧刃	一般中寬	417	31.59	58	31.52	4	12.12	9	14.75
弧刃	平頂中寬	19	1.44	5	2.72	2	6.06	2	3.28
弧刃	平頂上寬	13	0.99	3	1.63	0	0	8	13.11
弧刃	一般同寬	244	18.48	36	19.57	8	24.24	14	22.75
弧刃	平頂同寬	50	3.79	6	3.26	4	12.12	18	29.51
平刃	平頂上寬	3	0.23	0	0	0	0	1	1.64
合計		1,320	100.00	184	100.00	33	100.00	61	100.00

由這表上的百分比可以看出本文濁水溪上游的標本有以下的幾點特性：(1)弧刃類一般下寬型的標本較少。(2)弧刃類一般中寬型比集集鎭與全省的少，但此點與埔里鎭則相似。(3)弧刃類平頂下寬型與平頂中寬型均比集集鎭與全省的多，但又不如埔里鎭。(4)弧刃類平頂上寬型、平頂同寬型，及平刃類平頂上寬型這三型均比其它各處爲多。由這項比較，顯示本文的標本平頂各型均多是它們的特色，而這特色又與埔里盆地的情形有些近似，與集集鎭地區顯然不同。

(三)就製作技術方面的比較。本文的標本無例外地是用片解與打剝聯用法製作的。在本省海岸地區所常見的 單面片解法 ，而此法所製作 打造出來的一面留有原石皮的石

器，在此地區完全未見到。這一點是山區石器的另一特色，在此地區也不例外。兩面均經片解或打剝的石器，打製痕較爲清晰。而本文的標本如上所述，各類平頂型的標本較爲豐富；他們在製作時，往往只在刃部與柄部的兩邊打剝，而留下頂部原石材寬厚具有稜角的形狀（圖版肆：1，春陽溫泉；圖版柒：1，Demou）這一點是本文標本的另一特色，在其它地區所少見。

㈣就石器的質料來看。本文的標本，自春陽以南各地點所採集的標本，均是用砂岩的質料。惟獨在最北邊的靜觀河階所採集到的五件標本，其石質類似綠色片岩，或是玢岩。因未經專家的正式鑑定，屬於何種質料未能確定，但可以確定它們不是砂岩。按靜觀一帶與北港溪流域僅隔一條比高不算太大的山稜線。靜觀的石器，器形也較小，長度大約在十至十二公分之間。該地與春陽以南地區在史前是否屬於二個不同的文化區，則有待更進一步的探討。

陶片在這十八處地點的觀察之中，證據極爲缺乏，僅在 Qais 與 Hanabai 二處各發現少數幾塊破片，並且破片的面積均不大。Qais 發現的是灰色陶片，Hanabai 的是紅色陶片，兩者均屬於夾砂陶的系統。這部分的器物雖微少，它所提供我們的消息則很重要。按史前時代的物質文化，除了石器與陶器兩項之外，其他的器物如骨角牙器、木器等物因不易保存，尤其在做調查時更難尋得；而石器一項對於各文化相之間所表現的特性不如陶器來的靈敏。因此，在這段河谷的十八處地點之中，雖然只有二處有陶片的發現，可是它們屬於灰色與紅色夾砂陶的現象，則多少也給了我們一些信息。這類陶片在濁水溪中游地區的若干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它與埔里盆地大馬璘遺址的陶片也頗爲類似。

陸、結　　語

考古學用地表的探查法尋找遺跡、或採集遺物，都只能說是在研究工作上最初爲找尋線索的一種手段。探查到線索之後，必須經由試掘的方法，由地層中的更多證據來證實此線索的可靠性，進而再擴大試掘爲正式的發掘，以求得完整的研究。在濁水溪上游這段河谷的初步探查工作中，有了上述的成果，可以說是一個好的開始。在遺址地點的調查方面，十八處地點之中，依據各地點之遺物在地表的分布情形觀察，其

中至少有 Qais 、 姊原南方低位河階 ， 姊原上方高位河階 、 曲冰階地和松林北方的 Hanabai ，這五個地點可以試掘。五地點之中以 Qais 一處的遺物分布最爲密集，應予最優先的考慮。

事實上，筆者在做這種選擇之後，曾經卽時着手於 Qais 的試掘。在該地最初的三個探坑中，發現均遺留有古時建築物基礎的蹟象。再經過擴大探坑的試掘，證實了此地點乃是史前時代的一處聚落遺址。我們在該地點前後做了四個月的發掘工作。挖掘總面積六百平方公尺。由於有這麼大的工作量，有關 Qais 一地的發掘工作將專文報導。不過，由這項發現，我們已經證實了濁水溪上游的這段河谷，在史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先民居住其中 。 再從所發現的遺物觀察 ， 他們的若干物質文化與濁水溪中游，以及埔里盆地的若干新石器時代文化有關聯，這一點已是可確定的事實。而 Qais 一地的工作量大增，使我們無餘力再試掘其他幾個地點。所以，這一段河谷的考古工作雖已有了好的開始，但也僅是一個開始而已，要推展這部分工作，仍有待今後的加強與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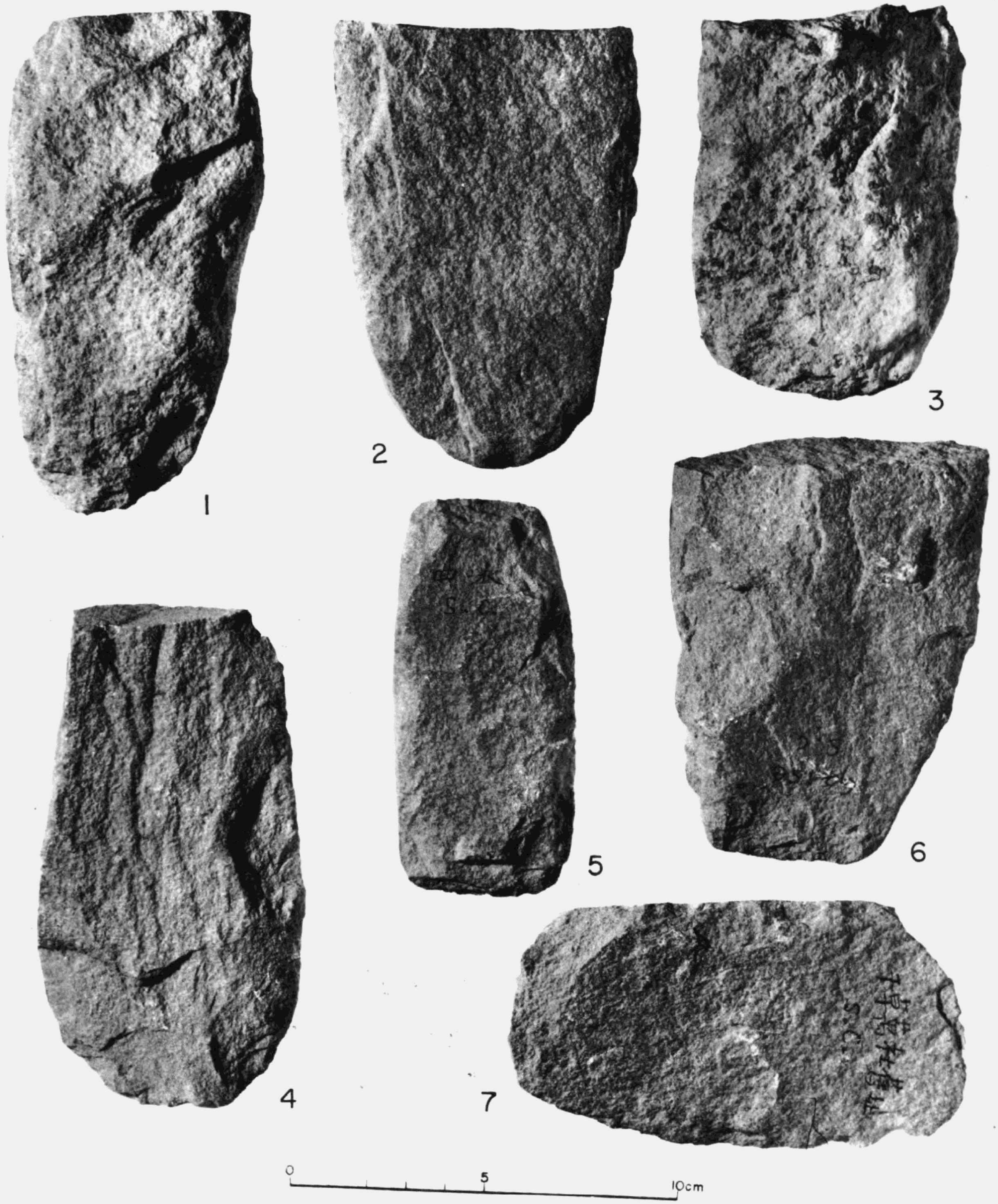
本文承高曉梅師石璋如師審閱與斧正 ， 並曾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 ， 耑此誌謝。

濁水溪上游河谷史前遺址分布圖

圖版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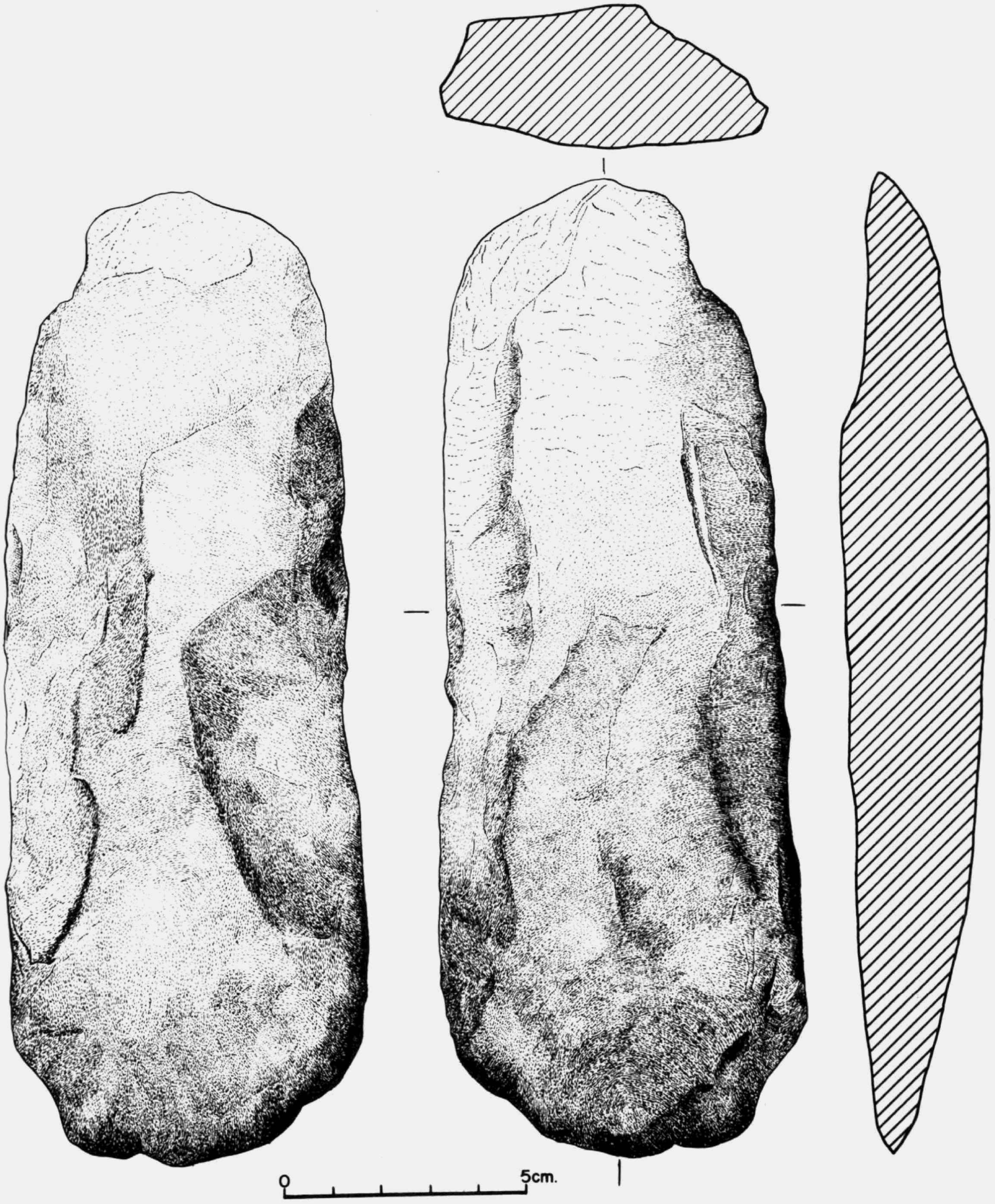
打製斧形石器：均屬弧刃類。1.一般中寬型 2.一般同寬型 3.平頂下寬型 4.一般下寬型 5.平頂下寬型 6.平頂同寬型

圖 版 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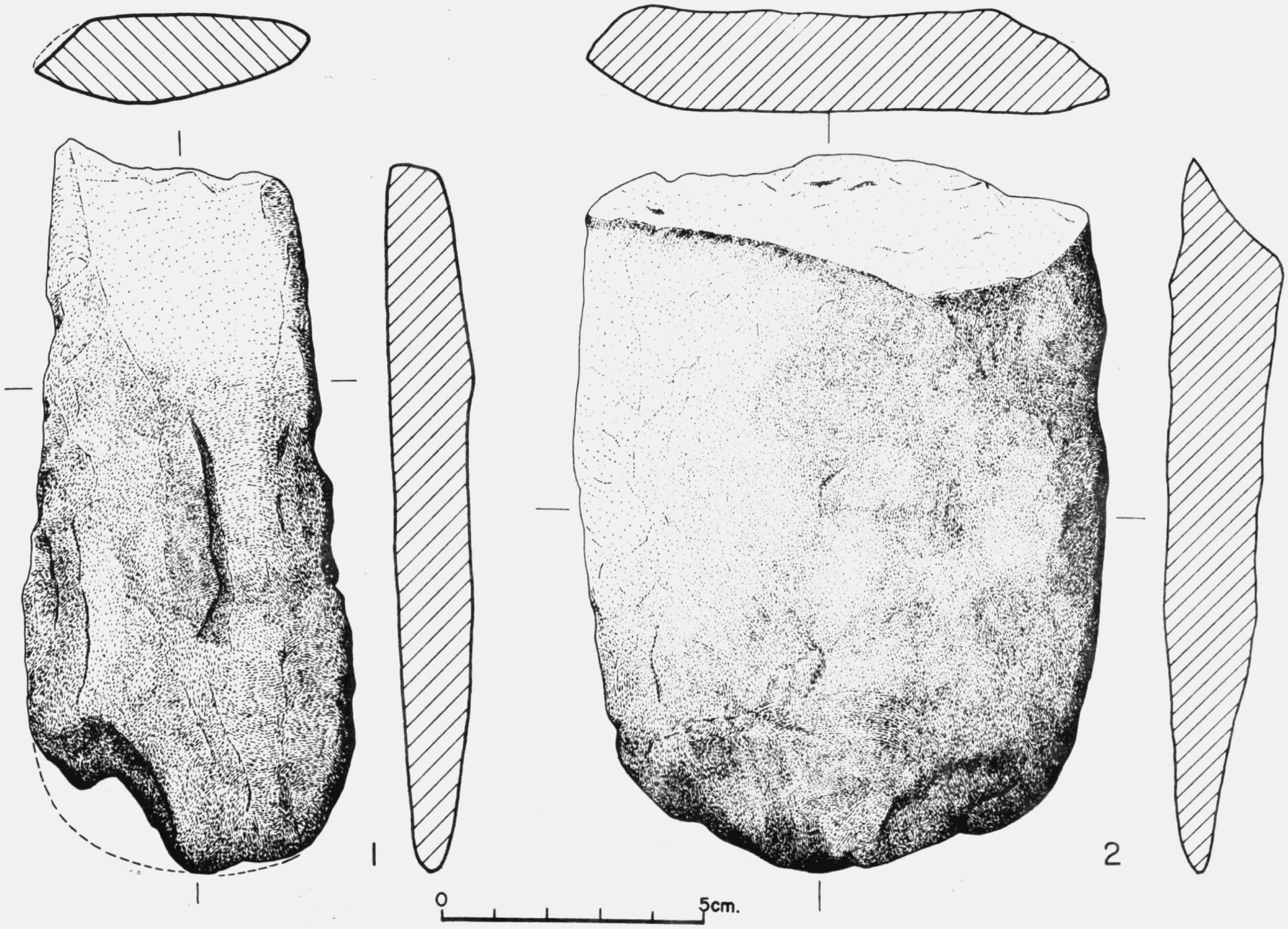
打製石器：1.弧刃類平頂上寬型石斧 2.弧刃類平頂上寬型石斧 3.弧刃類平頂同寬型石斧 4.斧形與刀形複合器 5.平刃類平頂同寬型石斧 6.平刃類平頂上寬型石斧 7.刮削器

圖 版 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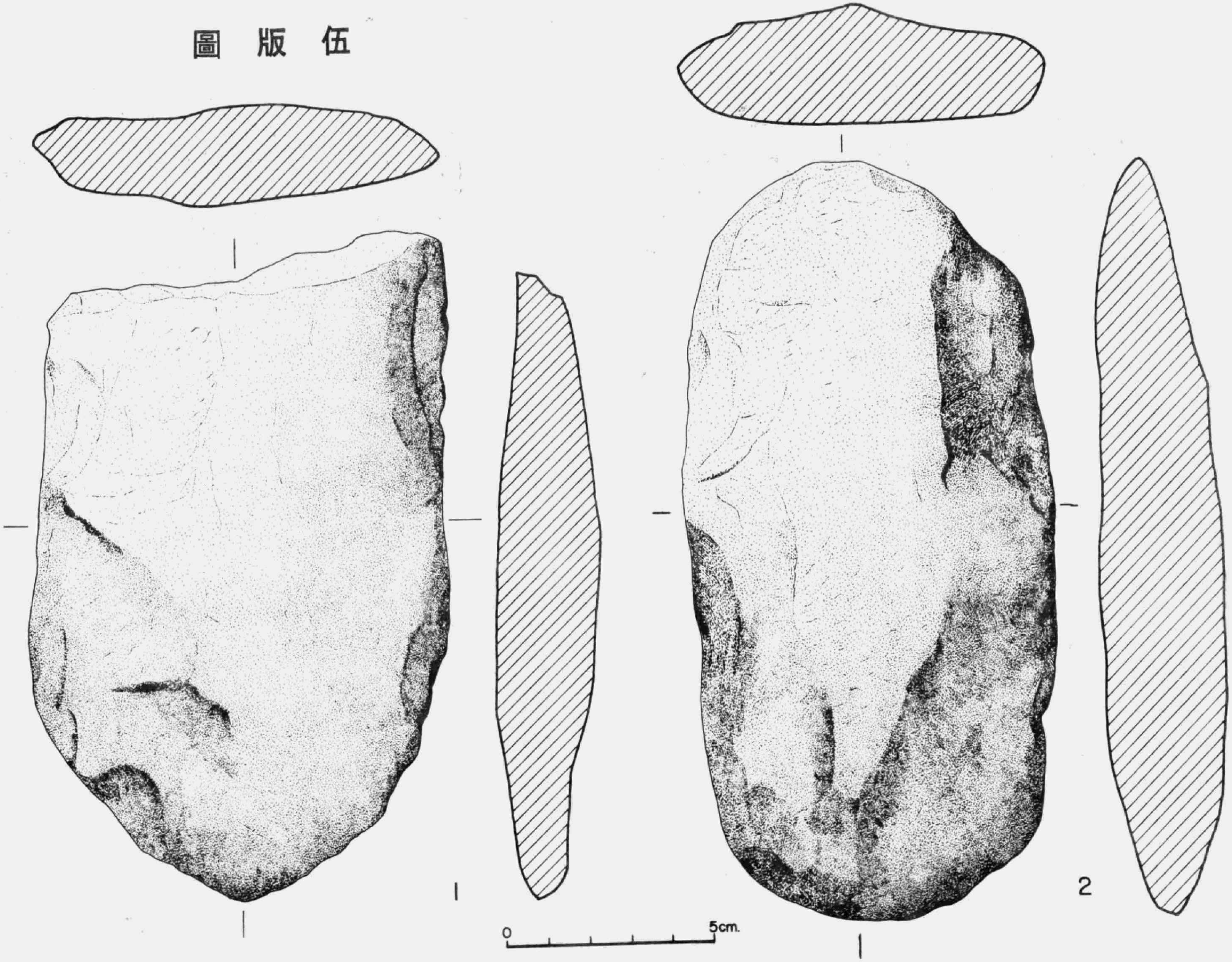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弧刃類一般同寬型

圖 版 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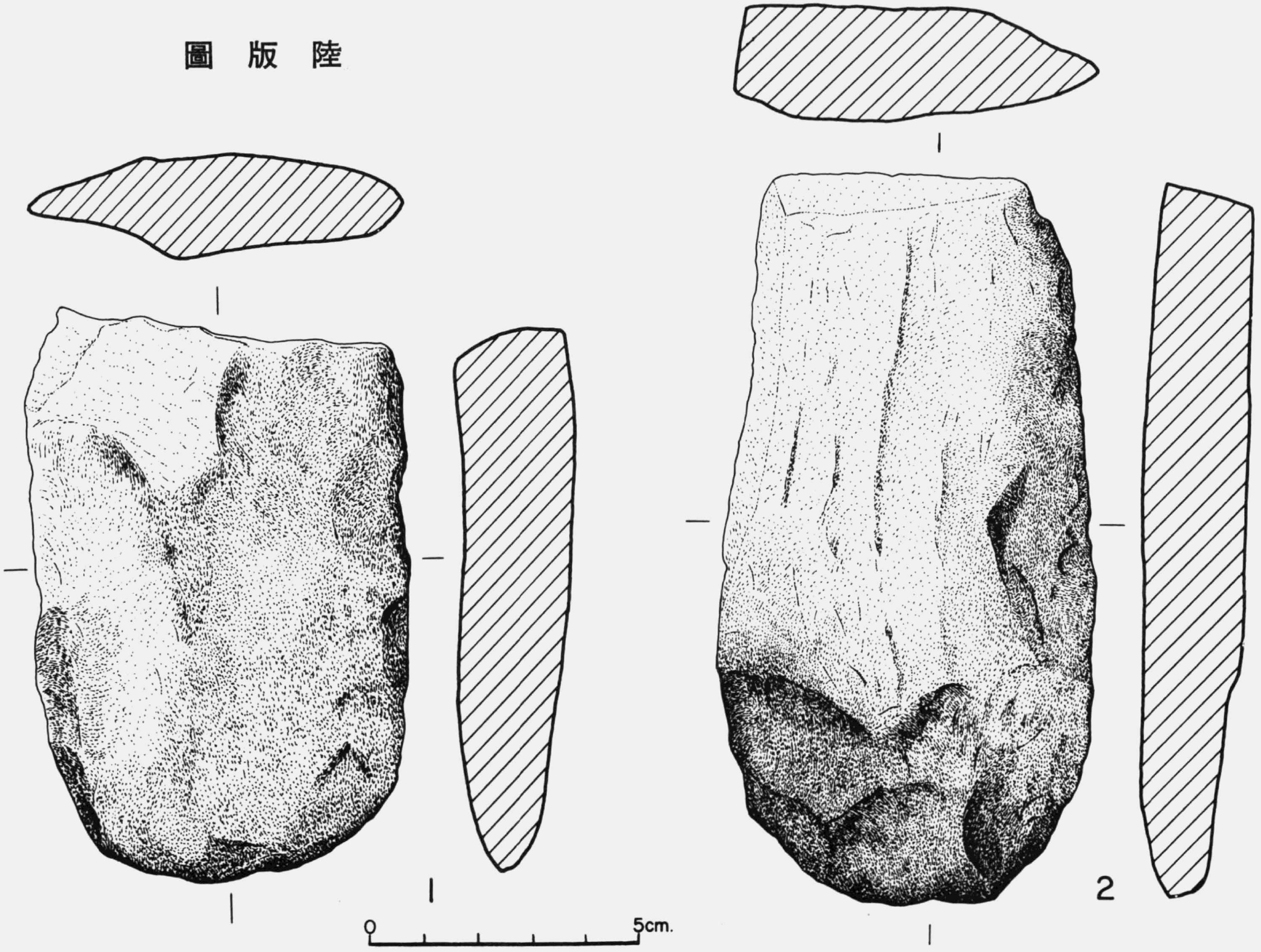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1.弧刃類平頂下寬型 2.弧刃類平頂同寬型

圖版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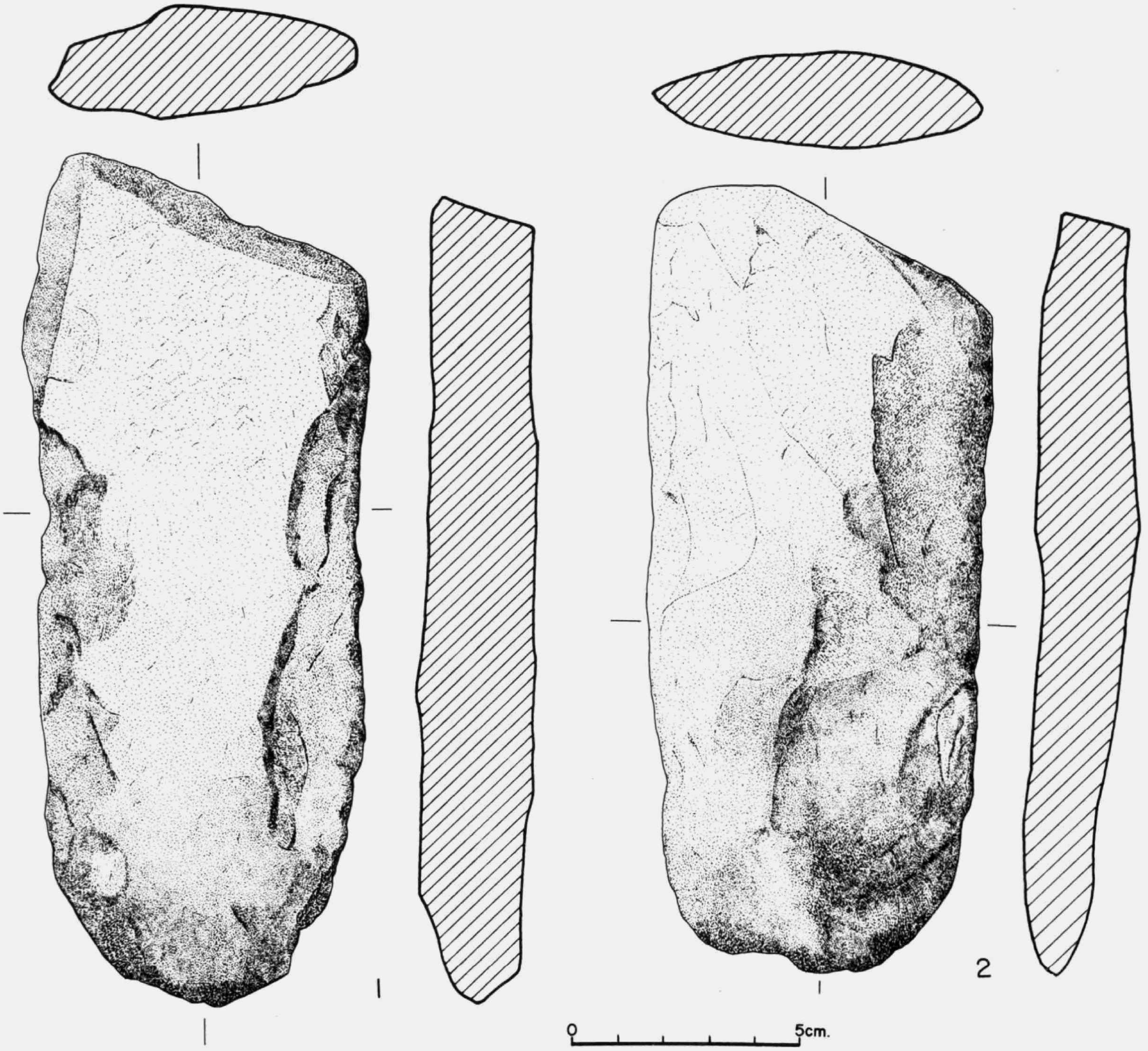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1.弧刃類平頂同寬型 2.弧刃類一般同寬型

圖版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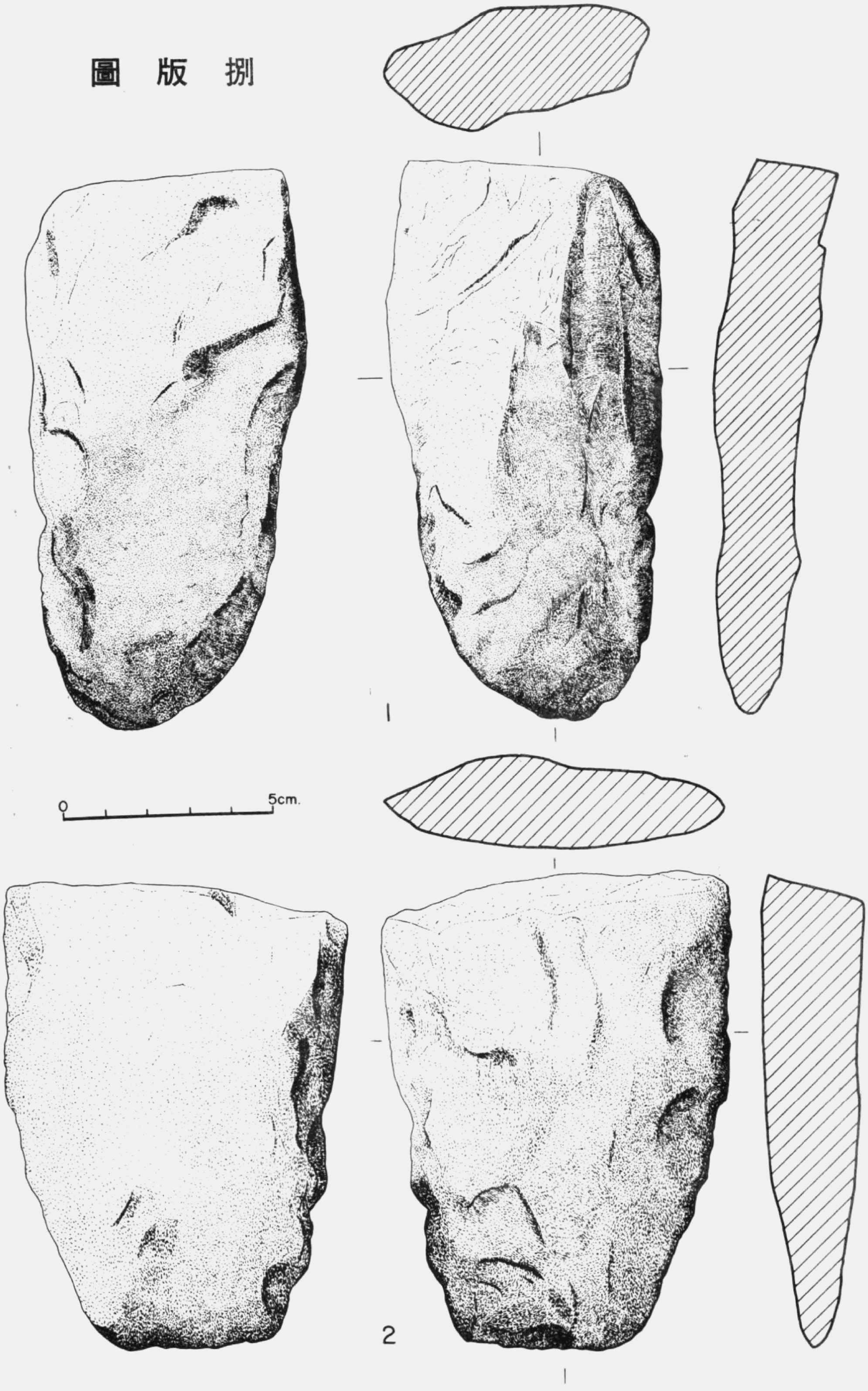
1.弧刃類平頂同寬型打製石斧 2.斧形與刀形複合器

圖 版 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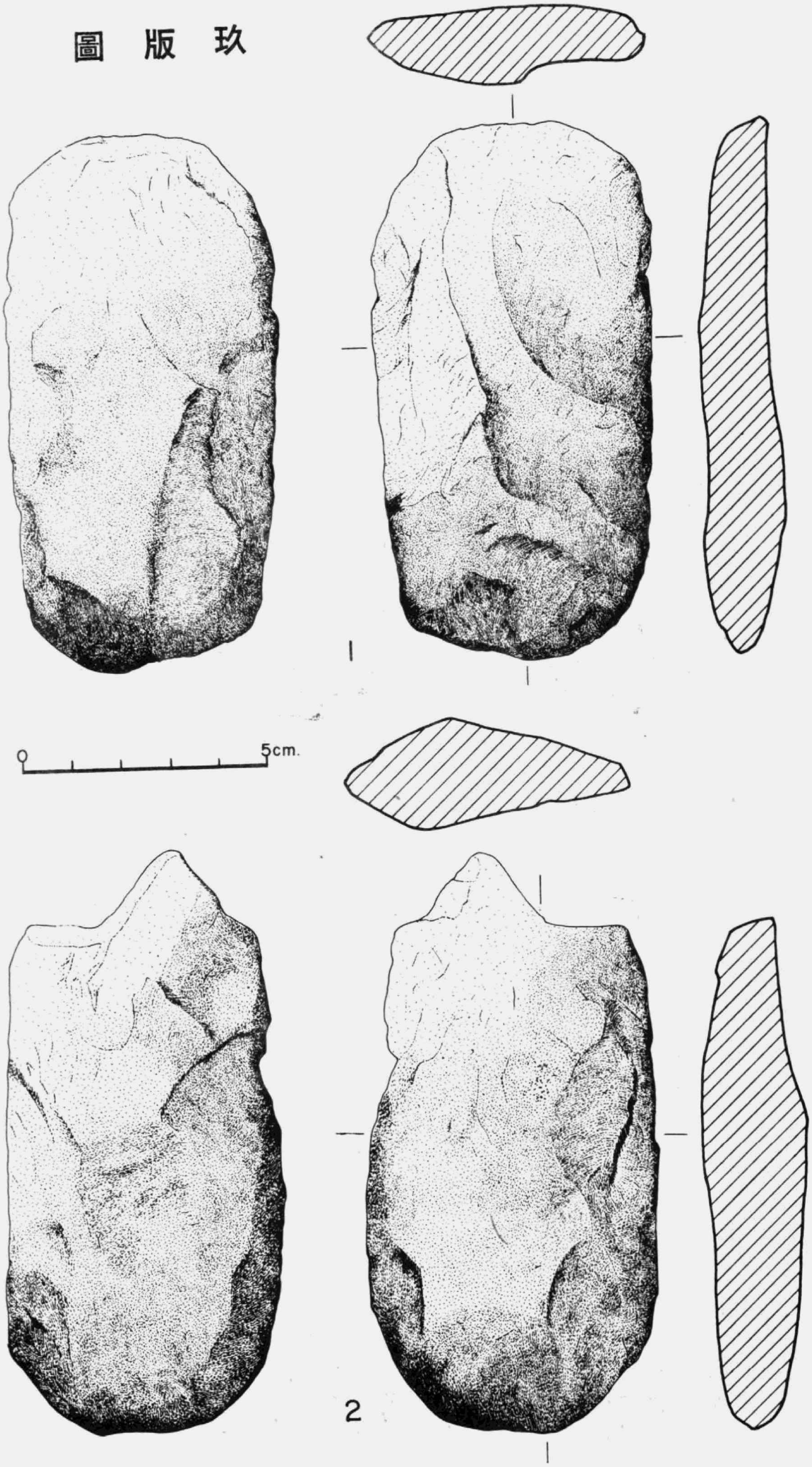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弧刃類平頂上寬型

圖版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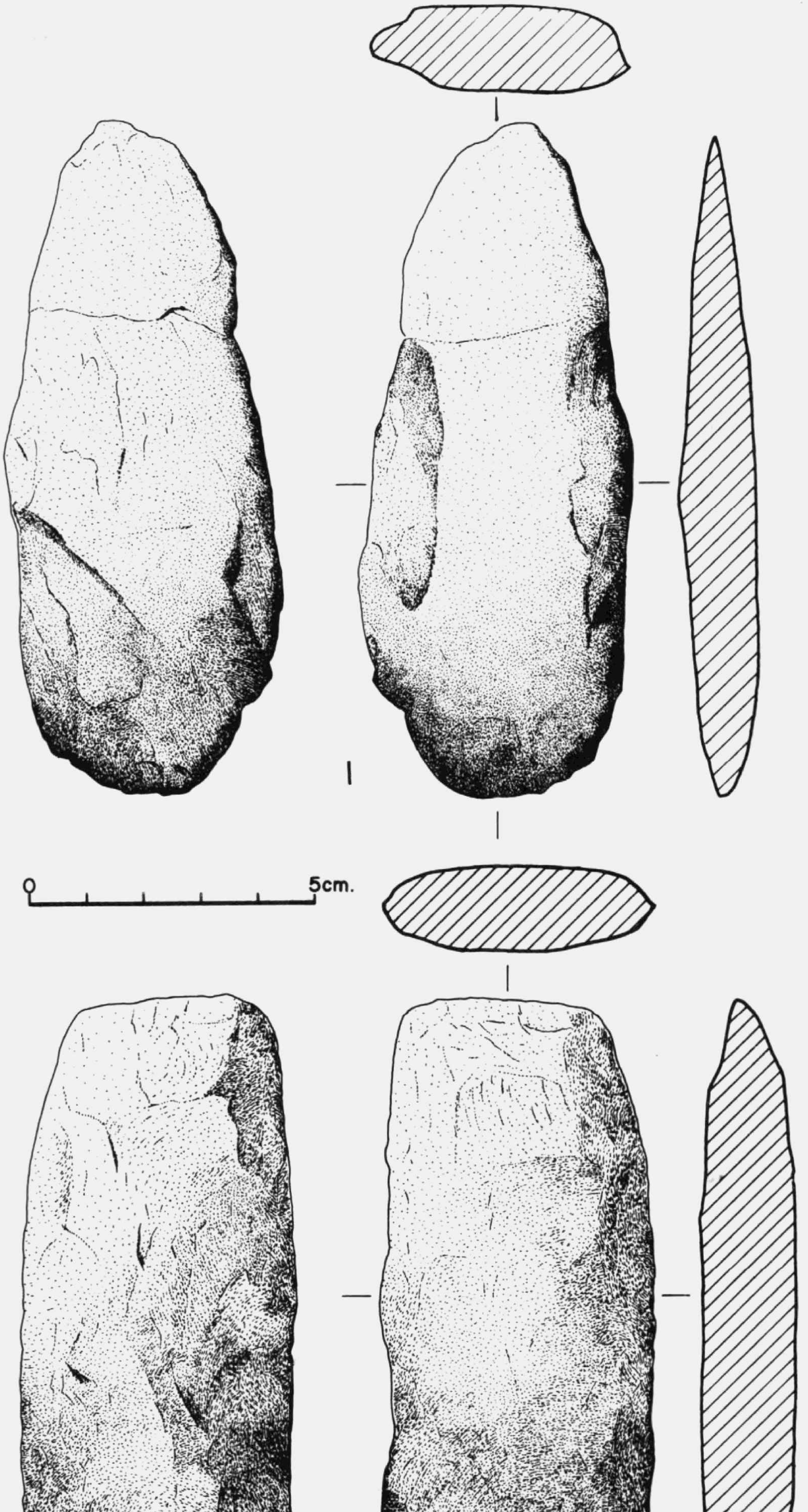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1.弧刃類平頂上寬型 2.平刃類平頂上寬型

圖版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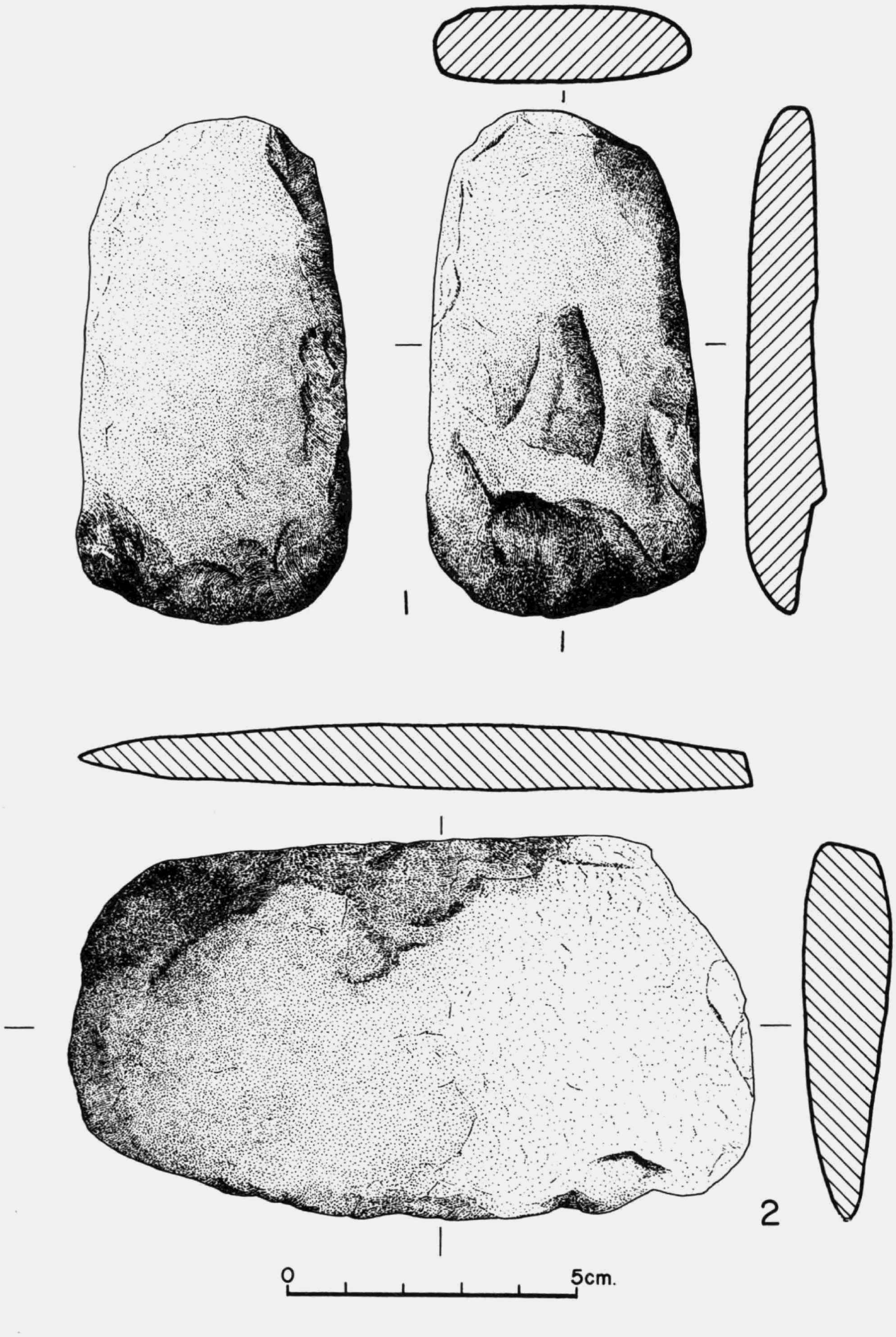
打製石斧：弧刃類一般同寬型

圖版壹零



打製石斧：1.弧刃類一般下寬型 2.平刃類平頂同寬型

圖版壹壹



1. 弧刃類一般下寬型打製石斧 2.刮削器

清境與吉洋

從滇緬邊區來臺義民聚落的調查報告

宋 光 宇

一、緒言
二、義民的由來和聚落建立的經過
三、兩聚落在自然條件上的差異
四、兩聚落在人文條件上的異同
五、兩聚落的經濟活動
六、結語

一、緒　　言

人類聚落的建立和長久生存下去，「適應」是相當重要的條件。這裏所說的適應，包括自然和人文兩方面。自然方面的適應，就是指人類聚落如何利用它所處在的自然生態環境。地表上的自然生態環境各地不同，粗略的分，大約可分成：赤道雨林、熱帶沙漠、亞熱帶、溫帶草原、溫帶沙漠、寒帶、高山等區域。各地的人們爲了生存下去，都對當地自然生態環境做了最佳的利用和適應方式。人不像動物那樣改變自己的身體狀況來適應外在的自然生態環境，而是憑着聰明的大腦，發明了各種文化上的設計，如：穿衣、生火、房舍……等等，利用大自然，創造出適合人羣生活的環境。

人文方面的適應，所牽涉的範圍更廣，是指不同人羣和它的文化之間相互調和，以達成另一種全新的外在與內在結構上的均衡[1]。這種變遷過程常是長久持續的，緩慢的，有所選擇的。

1. Beals and Hoijor: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1971. p. 602.

宋光宇

本文記述兩個安置從滇緬邊區撤退來臺灣的義民的聚落，基本上，就是在說明這兩個聚落如何適應臺灣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這批義民大多是雲南人，大陸淪陷後，投入滇邊反共遊擊隊陣營，轉戰於滇緬邊境。後來，經聯合國的安排，撤退到臺灣。政府爲了安頓他們，選擇一處高山林地和一處河川新生地，作爲他們棲身及農墾的場所。就地理條件來說，滇緬邊境位於亞熱帶，山脈作雁行狀排列，山高谷深，叢林緜密。臺灣也是位在亞熱帶，山脈也呈雁行狀排列，山高谷深。所不同的，臺灣是海島，受太平洋季風影響，而滇緬邊區位在大陸內部，受印度洋季風影響。

從人文條件上看，臺灣和滇緬邊區則是完全不同。臺灣是一個已經高度開發了的地方，加上地狹人稠，能够開發的地區，自明鄭以除四百年來，都已經開發利用。而滇緬邊區則是地廣人稀，叢林茂密之處，根本談不上開發。以農耕而言，臺灣是精耕細作，而滇緬邊區則行原始的刀耕火種式遊耕農業。兩者在程度上相去甚遠。

當義民們在政府有關單位的協助和安排下，從滇緬邊區一下子進入臺灣社會，如何適應新環境就成了最主要的課題。本文的主旨，就是在記述這兩個聚落的義民們如何適應新的環境。

這兩個義民聚落——南投縣仁愛鄉的清境農場和高雄縣美濃鎭與屏東縣里港鄉交界處的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同隸屬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輔導會或退輔會）。清境農場全境是在海拔兩千公尺的高山森林區，而吉洋分場則是在荖濃溪下游河川地上。

選擇這兩個義民聚落做爲調查對象，是基於以下三點的考慮：

一、義民們來自滇緬邊區，以雲南籍人士爲主。他們的妻室有一半以上是屬我國西南邊疆各個邊疆民族。同時，有少數義民本人就是邊疆同胞。這樣的聚落對於臺灣地區的民族學家和語言學家來說，是個很難得的調查與研究對象。

二、義民們原來都是驍勇善戰的軍人，撤退來臺灣後，退役爲平民，但是原來的軍人本色不改。由於曾經同生共死，又在同一單位的輔導下轉業務農。於是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這兩個聚落在臺灣這個大社會中，相比之下，就顯得較爲特殊。這種以軍人爲主體的聚落，卻一直爲當前臺灣的人類學界和社會學界所忽略。

三、這兩個聚落完全是一種移植的社會，從滇緬邊區直接移殖到臺灣，中間只有

短短幾個月的調整時間。他們是如何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生存發展？經過二十年，這兩個聚落卻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面貌。從適應的觀點來看，其中一定有什麼因素存在才會有不同的適應結果。這些導致不同適應結果的因素，是我們急欲知道的。

臺灣的人類學界最先到清境農場訪問的人是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 1899-1981）。她第一次到清境去，是在民國五十一年十月。兩年後，再訪清境。第三次是在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她可算是唯一目睹聚落的建立和發展的人類學家[2]。

政治大學邊政學系所出版的邊政學報，於民國五十五年出版的第七期中，刊載了由林美英執筆的來自雲南各邊疆民族的婦女一文[3]。文中只介紹了各族的一般習俗和婦女服裝，不涉及農場的實際情形。

根據鮑克蘭的報告，本所李方桂先生、丁邦新先生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到清境作語言調查。三年後，本所芮逸夫先生、管東貴先生、楊希枚先生、桑秀雲女士等四人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十日至十四日訪問清境農場。簡報刊於中央研究院院訊第十七期[4]。經這次訪問方才知道在高雄、屏東一帶，還有許多同時來臺的義民。

六十六年五月四日至十二日，本所芮先生、桑女士、李榮村先生、何大安先生與筆者一同到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做了一次戶籍、生活狀況和語言調查。簡報刊於中央研究院院訊第廿五期[5]。民國六十八年五月，筆者單獨前往清境農場調查戶口及生活狀況。芮先生和管先生曾蒞臨指導。隨即一同南下到吉洋。芮先生和管先生先行北返。筆者留下做補充調查。本文就是利用這兩次的調查資料，記述義民聚落的建立，並探究其過程與成果。

二、義民的由來和聚落建立的經過

民國卅八年十二月九日，雲南宣布投共，大陸淪陷。在雲南的中央部隊紛紛向中

2. 鮑克蘭：China Minorities on Taiwan, Journal of China Society pp. 62-70. 1972.
3. 林美英：來自雲南各邊疆民族的婦女　政治大學　邊政學報第 7 期 pp. 22-25, 1966.
4. 管東貴：訪問清境農場的西南少數民族　中央研究院院訊第 17 期 1976.
5. 史語所第四組：訪問高屏地區西南邊疆民族　中央研究院院訊第廿五期 1978.
5. 參看易借玉：昆明的鬧劇　新聞天地第97期，1949；周亮君：滇變身歷記　新聞天地第 102 期．1949；田布衣（丁中江）：盧漢解放記　新聞天地第 105, 106 期，1949；李國輝：昆明事變身歷記　春秋第 13 卷第 1 期 pp. 7-10, 1970.

南半島撤退。大部份順元江而下，進入越南，爲當時統治越南的法國人繳了械，送進蒙陽集中營，後來轉送到富國島。於民國四十二年夏接運來臺。黃杰將軍是這支部隊的領導人[6] 。

另外有一批殘餘部隊 ， 人數不滿千人 ， 退到中緬交界處，和緬甸國防軍發生衝突。大其力一戰，擊敗前來繳械的緬甸國防軍，聲威大振[7] 。 李國輝和譚忠是這支孤軍的領袖。大其力之戰以後，以緬甸景棟地區爲根據地，招納各地的反共力量和陸續從大陸上逃出來的軍人，於民國四十年元月，正式擴編爲「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由李彌將軍出任總指揮[8] 建總部於猛撒。同年三月，李彌揮軍北上，反攻雲南。先後攻克滄源、雙江、耿馬、緬寧、瀾滄等縣。四個月後，因後援不繼，而中共則全力反撲，退回緬境[9] 。 民國四十一年元月二十八日，緬甸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訴，請求友好國家合作，將華軍李彌部隊驅逐出境[10] 。控訴案爲聯合國大會所接受。民國四十二年四月起，中、美、泰、緬在曼谷召開四國會議，商討撤軍事宜[11] 政府爲了保全聯合國席位，遂決定撤軍[12] 。從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七日起，至四十三年五月底止，總共撤回 7280 人[13] 。這批撤回的部隊，編成十個營，納入國軍正式建制[14] 。政府發表聲

6. 黃杰：海外羈情　傳記文學第卷第 2 期至第 11 卷第 5 期 1967.

7. 參看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㈢　春秋第 13 卷第 4 期 pp. 46-50, 1970；吳華：進入緬甸的孤軍　新聞天地第 122 期 pp. 33-34, 1950；田布衣：孤軍喋血大其力　新聞天地第 135 期 pp. 5-7, 1950；柯定思：緬甸國軍撤出大其力　新聞天地第 135 期 p. 8, 1950；柳元麟：我與炳公——悼念李彌上將軍　春秋第 21 卷第 4 期 p. 13, 1974.

8. 李彌於民國三十八年率第八軍入滇，十二月八日盧漢投共時，曾扣留李彌和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引起兩軍攻打昆明，迫使盧漢釋放李、余二人。政府遂發表李彌爲雲南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之職。李國輝卽第八軍二三七師七〇九團團長。因此，以李國輝團爲基幹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時，仍由李彌出任總指揮，李國輝任第一九三師師長。

9. 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㈥～㈦　春秋第 14 卷第 1-6 期 1971；柳元麟：同上；薛幼望：李彌震撼了東南亞　新聞天地第 181 期 1951；史郎因：國軍攻克瀾滄、南嶠，乘勝進軍車里、佛海　新聞天地第 225 期 1951.

10. 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㈧　春秋第 15 卷第 3 期1971；柳元麟：同上。

11. 柳元麟：同上；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㈧～㈨　春秋第 15 卷 4 期至 16 卷 2 期 1971-1972

12. 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㈩　附載游擊總部給參謀總長的電文，以及周至柔總長的覆文，春秋第16卷第 3 期 1972

13. 李國輝：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㈢記載此次撤退的人數近 6,600 人　春秋 17 卷 4 期1972；但柳元麟在我與炳公一文中說是 7.280 人。李柳二人是實際負責撤軍行動的指揮官，因此確切人數尚待查證。

14. 李國輝：同註 15 p. 52；並且見李彌的聲明，詳見註 17

明，宣布游擊部隊不復存在[15] 。

但滇邊逃緬反共的武裝義民，羣起繼續打游擊，自行組織「東南亞人民反共志願軍」，以江拉爲總部，推舉柳元麟爲總指揮[16]。從民國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志願軍部隊爲了生存，就鼓勵三十歲以上的軍官(後擴及士兵)與當地各邊疆民族女子結婚[17] 。據報導人楊沺、馬炳欽、李傳德等稱，主要的婚娶對象，是土司頭人的女兒，一方面可以掩護，一方面可以獲取情報。民國四十七年七月 ， 部隊再度發動反攻 ， 攻入鎮越、佛海、瀾滄等縣境[18] 而在臺海也發生著名的八二三砲戰。此後，中共必欲拔此背上芒刺，遂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動用四個師的軍力，約四萬八千人，配合緬甸國防軍十二營和空軍 ， 圍攻游擊基地[19] 。經過二個多月戰鬪 ， 迫使游擊隊放棄江拉基地，越過湄公河，進入寮國境內。政府爲了避免再起外交糾紛，遂在美國和泰國的協助下，將入寮部隊集中到泰國清邁，再接運來臺灣。從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卅日，先後接運來臺灣共計 4406 人[20] 。

由於在四十三年五月已宣布不再有雲南反共救國軍存在，這次撤軍時，這批「武裝義民」乃是以難民身份接受聯合國四八〇專案的援助 。 所以 ， 當他們來到臺灣以後，政府就疏導其中年齡較長的一部份人員辦理退役，成爲義民，輔導他們墾荒。因

---

15.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日報刊載由李彌將軍爲具名的聲明，全文如下：「民國卅九年二月，余舊部約千餘人，由大陸轉進到滇緬邊區，爾後賴各級官兵艱苦奮鬪，以及滇籍人士次第投效，得以逐漸壯大。民國四十年六月，一度收復滇西耿馬第八縣 ， 當時不堪受共匪壓迫之同胞 ， 相率來歸，力量爲之大增。數年來櫛風沐雨，臥薪嘗膽，無非在求助反共復國，乃緬甸政府不明我意，誤會頗深，竟向聯合國提出控告。聯合國決議通過後，本部官兵志切復國，咸不願撤退。嗣經我政府一再剴切勸導，始獲良好結果。其凡屬於本部所能掌握之部隊，均先後撤退來臺，所有武器亦均携出，本部自今日起，亦不復存在。現本部撤退官兵均已抵臺，深盼政府體念渠等反共復國之初衷，予以編入國軍，對不適服役人員妥爲安置，俾得各安生業，繼續爲反共復國大業奮鬪努力。　　雲南省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李彌中將啓。」
16. 柳元麟：同上；馬克騰：異域下册 1972 ； 胡慶蓉：滇邊游擊史話 p. 196-200 1967；卓元相：異域烽火 1976
17. 報導人楊沺，雲南保山人　上校團長退役，住清境定遠 27 號；馬炳欽　廣東臺山人　少校情報官退役，住清境壽亭 25 號；
18. 柳元麟：同上 p. 14.
19. 柳元麟：同上；田布衣：（甲）滇邊沉默的戰爭　新聞天地第 670 期 1961；(乙) 緬邊游擊隊能被消滅嗎？新聞天地第 681 期；滇緬泰寮邊區喋血　新聞天地第 683 期 1961；洪長同：游擊戰士永遠撤不完　新聞天地第 686 期；謝雄玄：苦戰滇邊十二年　新聞天地第 689 期；卓元相：異域烽火 pp. 151-226, 1976 馬克騰：異域下册 1973。
20. 柳元麟：同上；並參看績伯雄：義胞揮淚別邊區　民國 50 年 3 月 19 日徵信新聞報。

此，國防部會同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等單位，共同協商，勘定幾處可供義民墾荒的土地，計有南投霧社牧場、國有第三十六林班地、高雄荖濃溪河川地、和屏東隘寮溪河川等地，以後分別成立見晴（清境）農場、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和屏東農場。置於輔導會管轄之下。

接運義民的飛機 C-46 和 C-119 降落在屏東空軍基地[21]，義民下飛機後，先到鳳山某軍事學校的招待所暫住一宿。第二天搭乘火車北上，到成功嶺，做較長時間的停留[22]。政府發給各種生活設備，包括面盆、毛巾、鍋子、碗筷、衣服……甚至針線包、奶瓶奶粉等等，社會各界也致贈慰問金。住在成功嶺的三個月中，由於政府積極勸導，有三百多人辦妥退伍手續，正式成爲義民。綜合各報導人所提的說法，歸納出分發農墾及安置其他人員是按照下列原則：（但實際情形會稍有變動）

1. 單身軍官——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精忠新村。
2. 有偶無子女的軍官——分發南投，成立見晴農場的博望新村。
3. 有偶有一個孩子的軍官——分發南投，成立見晴農場的壽亭新村。
4. 家有眷屬三口及以上的軍官——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信國新村。
5. 有眷士官兵——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定遠新村。
6. 單身士官兵——分發屏東，成立屏東農場的汾陽新村。
7. 遺眷和眞正無軍人身份的義民——分發高雄，成立吉洋分場的成功新村。
8. 未退伍的軍官及眷屬——在桃園縣龍潭鄉成立干城五村。
9. 未成年者——進入國軍子弟教養院，接受教育。
10. 繼續在軍中服役者，編入特種部隊。

民國五十年六月，義民們按照安置原則，分別前往指定地點。

分發見晴農場的義民與眷屬共 79 戶，206 人。先到南投縣埔里鎮，暫住在埔里國小與南光國小的教室。九月學校開學後，就搬到大禮堂居住。直到同年十二月底，方始遷入新居——博望新村和壽亭新村。住在埔里的那段時間，男人們每天携帶工具

21. 繢伯雄：來自卡瓦山的游擊英雄　53 年 3 月 24 日徵信新聞報；劉宗周：屏東機場迎義民　53年 3 月24日聯合報。
22. 反共義民遷新居　50 年 3 月 25 日聯合報；成功嶺上訪義民，同日，聯合報

搭乘公路局班車上山，伐木整地，利用砍下的樹木，鋸成建材，搭蓋小木屋。房屋面積相當小，只有五坪半，外加廚房廁所。

分發吉洋分場的有 207 戶，677 人。五十年六月抵達美濃鎮，分別住在美濃國小、中壇國小和吉東國小。九月份開學後，又全部移住高雄市前鎮區長泰鐵工廠的廢場房內。輔導會雇工建屋。同年十二月中旬開始陸續遷入分場的各個新村。五十一年元旦，農場正式成立，由輔導會正式接管。由於各戶人數多寡不一，有多至一家八口的，也有單身一人的，因而分配房屋的原則也就較為複雜。房舍基本上分成兩種，一種是兩坪半一間，一種是四坪一間 。 每戶可分得一分地 ， 包括房屋和四周的庭院在內。實際分配的情形如下：

1. 八口之家分得兩坪半房子四間一排共十坪，算兩戶，給兩分地。共有兩家。
2. 七口及六口之家，給四坪房子兩間，共八坪，給一分地。
3. 五口及四口之家，給兩坪半房子兩間，共五坪，給一分地。
4. 三口之家給四坪房子一間。
5. 單身軍官是兩人配給四坪房舍一間。

各家房舍後面另建廚廁。

義民們前三年的生活尚可。來臺灣時，多少都帶有些財物。來臺後，又接受各界的慰問金，並且還享受聯合國四八〇專案的生活補助。除了供給米、麵粉、麥片、衣服之外，還發給零用金，第一年大口 300 元，中口 200 元，小口 150 元；第二年減少，變成大口 200 元，中口 150 元，小口 100 元；第三年再減少，大口 150 元、中口 100 元，小口 75 元。從第四年起全面停止生活補助，希冀義民從此能夠自立更生。但各種條件配合不當，使這個目標達成的年限往後移了很多。近幾年生活才算眞正安定下來。詳細情形，見以後各章。

義民到農場從事農墾，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分發土地。放給的標準是義民本人領七分地；配偶折半，只能領三分五厘地；孩子再折半，領一分七厘五毫地。各家承領土地的人口數是以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卅一日的人口數為基準。義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不能轉租，也不能買賣，身死若無子女繼承或子女無法親自耕作時，田地由公家收回。

吉洋分場由於全境是河川地，地勢平坦，各家所得的土地較集中。而清境農場位於高山之巔，山勢陡緩起伏不一，在分配土地時，將土地分成四類：

1.菜地——在住屋附近，約有一分地；

2.甲地——距家稍遠些，約有三分多地；

3.乙地——再遠一些，行程在半小時之內，約有三分多地；

4.丙地——距家有半小時以上的路程，約三分多地。

完全用抽籤的方法決定各家所得的田地。

清境農場的義民在最初的四、五年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陡峻的斜坡上開築出可供耕作的梯田來。輔導會貸款三千元，以供建築平臺之用。義民們辛勤的砍掉大樹，挖出樹根，以築平臺。自己忙不完，就僱平地工人，結果工作不理想，疊石而成的擋土牆容易傾倒。那時電力公司正在橫貫公路霧社支線上興建電源保護站，於是就商請電力公司的技術人員代爲測量山坡地，每一分地的工資是600元。依照測量的結果修築梯田，疊石爲牆，勻土入田，每一分地大約做成二十五個梯階，每個梯階橫長約 10 公尺，縱深約 1.5 公尺。民國五十四年發放退伍金，依年資軍階定金額的多寡。幾萬元退伍金也都用來墾地。

由於梨山地區於民國四十八年試種溫帶果樹成功，清境農場一開始就仿效梨山的耕種方式。位置較高（海拔 2044 公尺）的博望新村義民開始種蘋果和梨；位置較低的壽亭新村義民種蘋果，也種二十世紀梨（每家卅棵），亦有人買日本水蜜桃來種。由於蘋果樹生長較慢，從民國五十二年起，在菓樹苗之間，栽種高麗菜，放棄以草木灰爲肥料的辦法，改以鷄糞爲積肥，並學會噴灑農藥。電力公司相當幫忙，帶義民到外地農村參觀，吸取經驗；輔導會也舉辦農業講習。義民們從完全外行的情況逐漸瞭解如何經營農業。

由於博望村地勢高、氣候涼溫多雨，高麗菜長得又大又好，蘋果樹也發育正常。很快的有了收益。海拔低了三百公尺的壽亭情況就差了很多，雨量少，蟲害多，高麗菜結得小小的，又遭蟲吃，外銷越南供應美軍時，遭到退貨。而且壽亭村的丙地，已經到廬山溫泉出入孔道雲龍橋附近，由於缺水，根本不能種植。所以到了民國五十六、七年，壽亭村義民的收益明顯的不及博望村義民的收益。壽亭義民當時平均每戶

每年有萬把塊錢收入，而博望義民由於菓樹已可包青收租和高麗菜賣得好價錢，一年有幾萬元收入。於是壽亭義民蘊釀要求換地，希望把雲龍橋上方的丙地還給場部，另將歸農場直營的牧牛場（海拔 1900～2000 公尺，在博望村下方）分配給他們。輔導會原想將壽亭村遷到福壽山農場對面的華崗，但壽亭義民不同意。民國五十九年底，輔導會方始應允換地，每家配給三分六厘地。六十年著手規劃，年底分配給各家。壽亭義民在欣喜之餘，在三分六厘地上大種蘋果樹苗，也大種高麗菜，更因他們勤勞的澆水施肥，成效比博望村還好。

義民初來時，根本不知家庭計劃，生活略略安定，孩子也相繼出世，家中人口逐漸增多，原有的 5.5 坪小木屋就顯得擁擠不堪，大家都拼拼搭弄個可供孩子睡覺的地方。民國六十一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巡視清境農場後，看到這種情形，決定擴建。將壽亭村一分為二，一半居民遷到清境國小上方，另建定遠新村。房屋面積擴大一倍成十一坪。費用依三對等原則負擔，由輔導會補助一萬，貸給一萬，自籌一萬。新居於六十三年夏天完成，遷入。六十四年博望村改建房屋，由於物價上漲，自籌三萬，貸款五萬。房屋分兩種，甲種造價十萬三千二百元，乙種七萬三千二百元。於六十六年改建完成。

吉洋的義民比起清境的義民來，就顯得缺乏有關開墾和農業經營的概念。當他們到達農場後，才知道是一塊不毛之地，只見連緜的礫石和沙，不見一棵樹木可供遮蔭。飲水也沒有，要到一公里之外的外六寮去挑。這種情形完全不能與滇緬邊區那種濃林密樹、雨水充沛、稻米隨種隨長的環境相比。於是，情緒大壞，一時很難適應。

頭一年的生活可說是安定，有四八〇專案的生活補助，有各界致贈的慰問金，再加上各家多多少少都帶了些首飾財物。因而手頭寬裕，也就沒想到要去墾荒地。第二年的生活就差了些，不過仍可過得去。到第三年。生活就感到困難，私蓄差不多都已花完，生活補助也已按比例減少，少到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生活。義民初來時，他們本身和輔導單位都沒想到要在此長住，總以為三五年內就可以回去，所以談不上有什麼長遠的計劃，何況吉洋義民不知節約渡日，等到手頭金盡，才大起恐慌。從滇緬邊區帶來的孩子，差不多到了就學年齡，來到農場後，生活安定些，在不知節育的情況下，孩子連著出世，形成重大的生活壓力。為了生活，許多義民到附近做工，卻又遭

到語言不通的障礙。

民國五十三年，吉洋才開始分地，分配原則依舊。大家面對無垠的卵石，都感到束手無策，要求輔導會先把荒地開墾成農田，再行分配；輔導會的辦法則是要先分土地，再來開墾。爭執之間，又費了一些時日。等到土地先行分好，而輔導會的經費遲遲不來。此時吉洋義民已經囊空如洗。面對礫石層，不知如何是好。有些義民就自己動手挖石礫，篩取些沙土，但成效不佳。民國五十四年初，政府發放退伍金。懂得運用資金的人，就把退伍金全部用來客土 。 不懂運用資金的人 ， 不多時又把退伍金花光。這時期，義民們推派代表向輔導會及其他有關單位請求協助。

五十三年底，輔導會設法在吉洋架設電線 ， 解決照明問題 。 從五十四年下半年起，由輔導會和農復會共同協助，展開第一次客土工作。但由於對這項客土工作認識不够，只填了一批細砂而已，以致一百多公頃土地得不到效果。這些土地一直到民國六十八年才再客土改良。

從五十四年到五十八年，是吉洋義民情緒最壞的時期。帶來的錢早已用罄，政府的生活補助也已停止 ， 分得的土地又不能種植 ， 家庭負擔因孩子相繼出世而日益沈重，對生活前途感到一片迷惘。毅力不堅的人，就容易走上極端，在這幾年中，自殺案件有十多起。驚動了地方政府、治安單位和輔導單位。五十七年中央黨部派人實地調查，義民們的要求分兩部份，一是要求客土，讓所有的田地都可以耕種；一是增添副業，以開財源。爲上級單位接納。

從民國五十八年起，逐年辦理客土工作。當年，完成客土 45 公頃，平均分入各家田內。所使用的土壤是取自美濃、旗山一帶的良田 。 客土後的田地 ， 義民種植水稻，由於土質好，能保持水份，稻作收成大爲提高。不過由於當時米價偏低，收成剛够自己吃而已。同時也種大豆，收益較好。另一方面，年長的孩子在小學畢業後就到外地工作，賺錢補貼家用到這時候吉洋義民的生活才逐漸好轉。

五十九年又因經費不繼而暫停客土工作，直到六十二年才再行客土，以後數年都在進行著這項土地改良工作。六十八年再去調查時，只剩下原先第一次客土的 45 公頃地等候填入良質壤土 。 至此 ， 吉洋分場所有已開墾的耕地都可成爲能種水稻的良田。此外，又修建排水系統，填高住宅基址，以減少水患；興築深水井，解決供水問

題。並且援清境農場改建房屋的實例，由輔導會依三對等原則貸款分五批改建。無力籌措自備款，且爲貧戶的定遠村 13 戶，由小康計劃款項撥付。所有房舍於六十七年翻建完成。由於原有的房舍面積達一分地，翻修之後，要比清境農場的義民房舍寬敞得多。

在增添副業方面，最彰著的例子是成立「吉洋義民砂石廠」，由省政府社會處於社會救濟基會中撥給七十萬元，購置機械，從事砂石生產。可是規模太小，機器老舊，經常故障待修。砂石廠運作時，正是十大建設次第展開之際。經理人員想向榮民工程處購買已經停用，經整修後仍可使用的機械，以擴大生產，適應市場需求。但由於主管人員有不同的意見，以致擴場不成而停工，再拖兩年，機器損壞，不堪使用。到六十六年底，砂石場終告停業。

清境與吉洋兩地都是經過政府安排而去墾荒的，經過十八年，兩地的表現迥然不同。以下將逐項的討論導致兩地發展相異的種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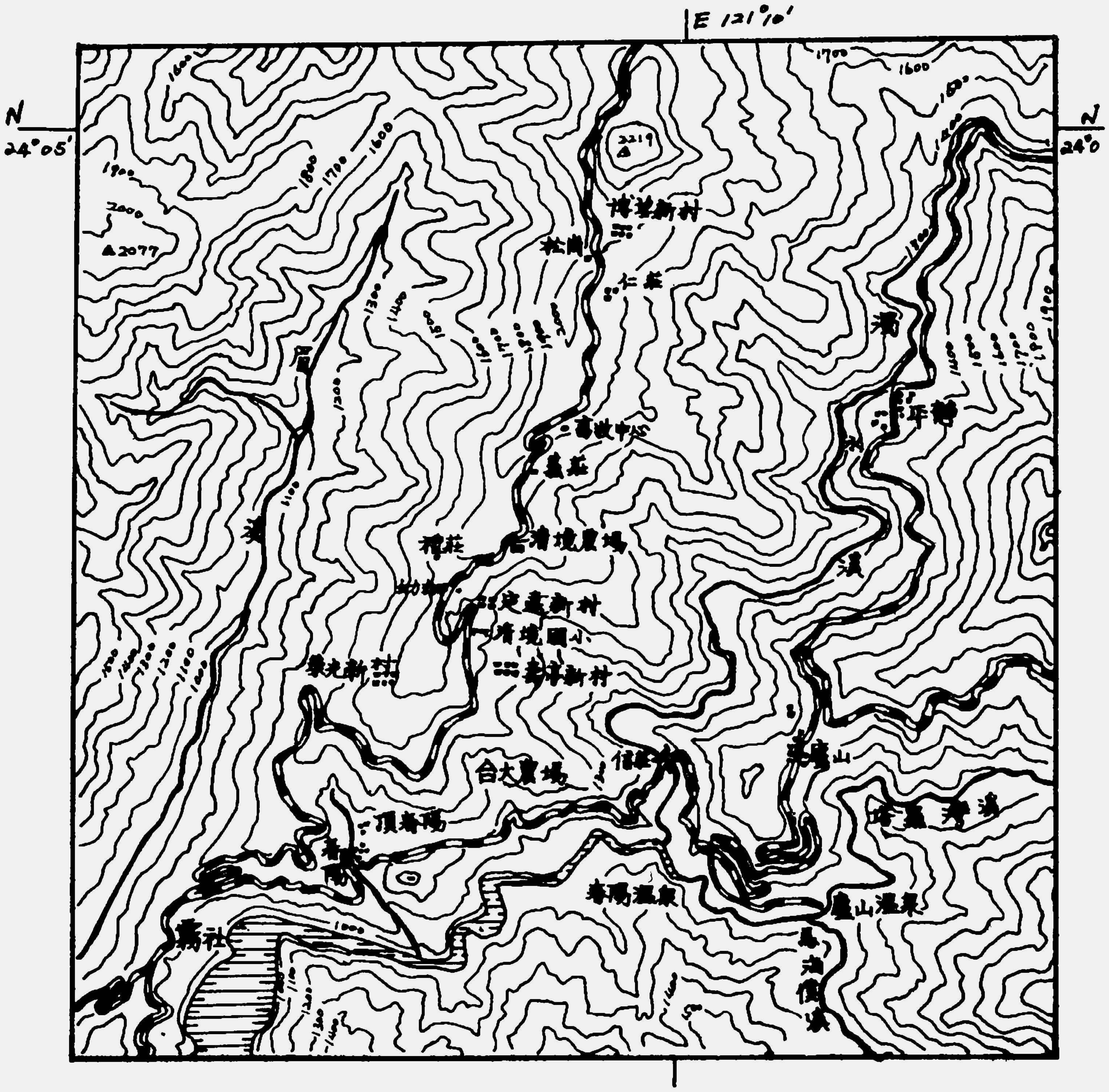
三、兩聚落在自然條件上的差異

(一)清境農場

清境農場成立於民國五十年二月，安置滇緬邊區回國義民和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生產。場址位於中部橫貫公路霧社支線上，約當東經 121°08′～121°10′，北緯 24°02′～24°05′。高度在海拔 1,100 公尺至 2,100 公尺之間正當濁水溪源頭附近。面積有 811 公頃，其中可利用的山坡地有 392 公頃，大部份已逐年開發利用。其餘 419 公頃山坡地，因坡度太大，不適於耕種，其中部份土地作牧羊之用[23]。

清境農場位於中橫公路霧社支線上，下距霧社 8.5 公里，上距翠峰 9.5 公里，距合歡山 24.5 公里（見圖 2）。公路局班車由埔里發車，經清境農場，達松崗（博望新村），每日有六班車；到翠峰，每日有兩班；總共每日有八班公路局班車通往埔里。由埔里可轉往臺中或南投，通至全省各地。翠峰以上，因高度大，人煙稀少，不通班車。冬季昆陽至松雪樓段，常有積雪，普通車輛禁止通行。

23. 見清境農場簡介與民國 65 年該場對省政府主席謝東閔所做的簡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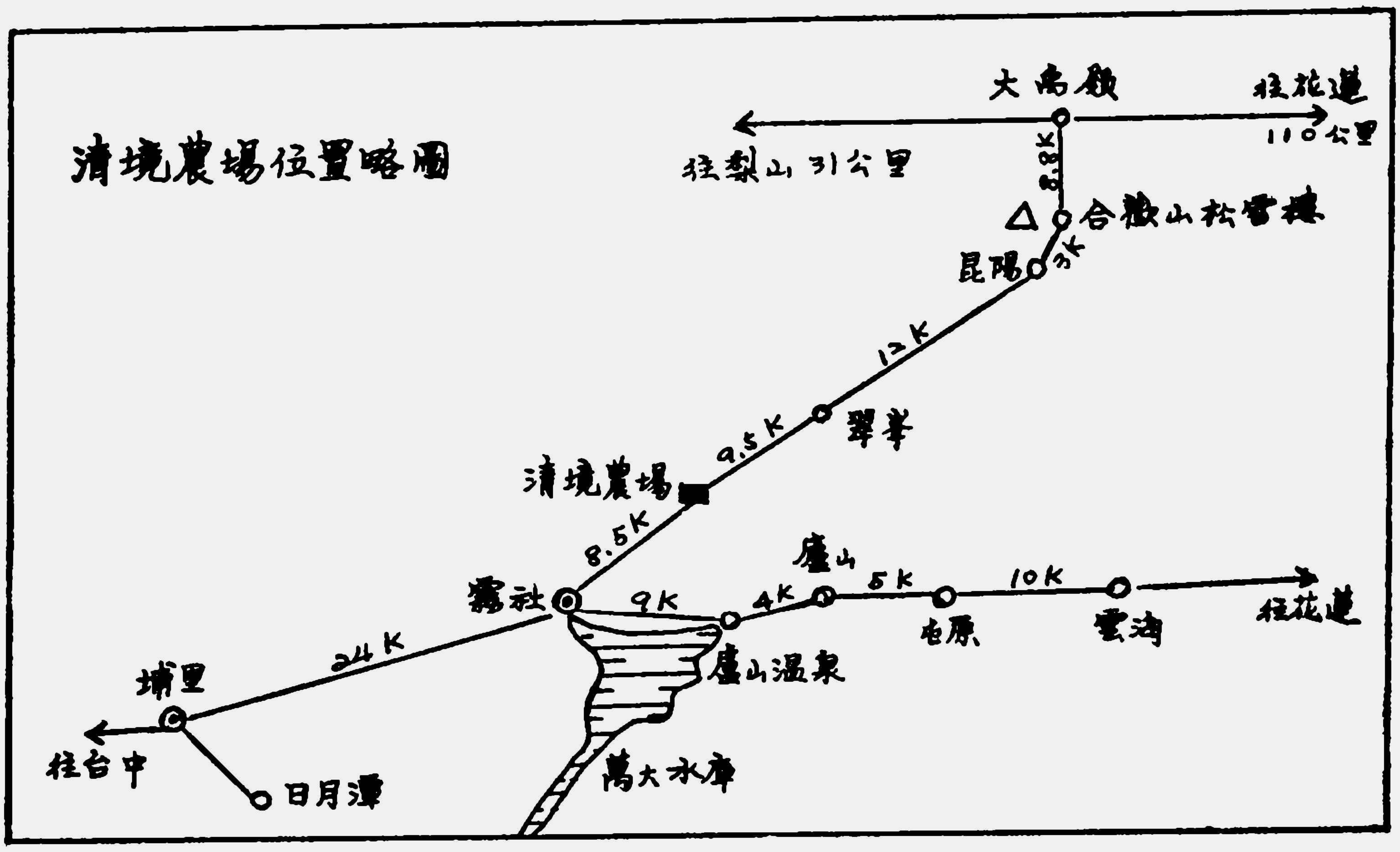


圖二、清境農場等高線地形圖　1:50000

說明：公路　河川　0　1　2 公里

由於農場正好是在中央山脈中，高度甚大。鄰近地區的海拔高度如下：

霧社	1148 公尺	梨山	1946 公尺
清境	1730 公尺	廬山溫泉	1200 公尺
翠峰	2340 公尺	廬山	1460 公尺
昆陽	3096 公尺	屯原	2000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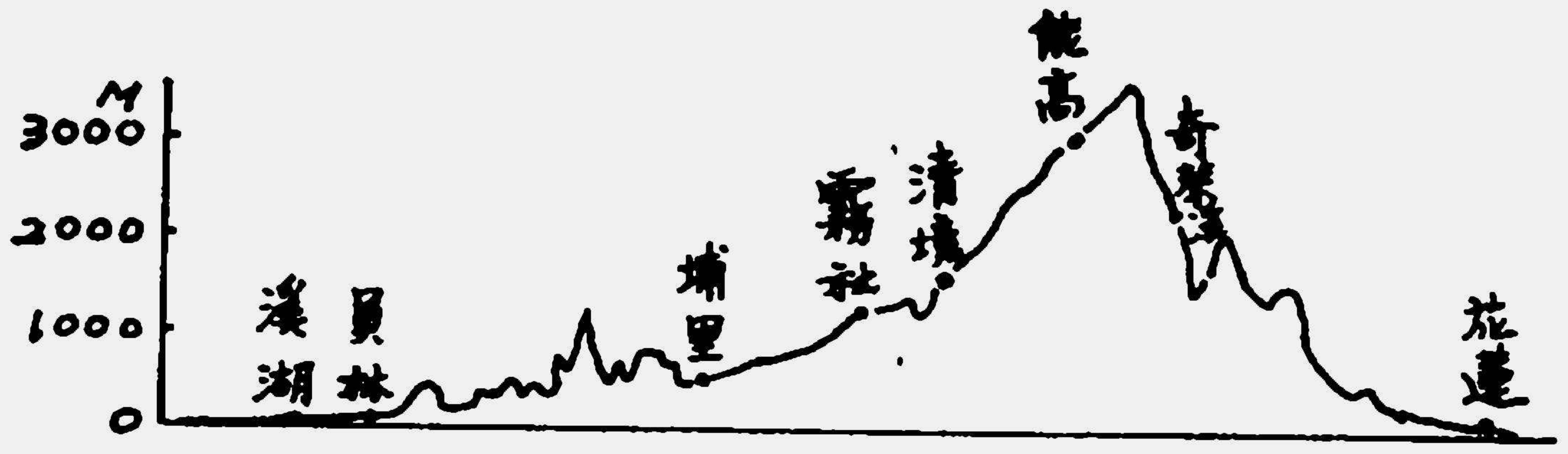


圖二　清境農場位置略圖　　　　　　　　1k＝1公里

合歡山 3416 公尺　　　　　雲海 2450 公尺

農場本身各新村的海拔高度也不一致。博望新村位於 2044 公尺，定遠新村位於1730 公尺，壽亭新村位於 1700 公尺。由於高度不一，致使氣候條件也各村不一致。根據場部觀測站所做的歷年氣象記錄，得知當地年均溫僅 16°C、年雨量達 1481～2830 公厘，可說是涼爽溫濕。詳細氣象資料如表一所示。

就農場的氣候而言，冬季氣溫低且較乾旱，夏季氣溫較高雨量也多。這與它的地理位置頗有關係。清境農場正好位於中央山脈西側腰部（如圖三所示），夏季西南氣流盛行，帶來充沛，雨量。冬季的東北季風雖來自海洋，但因受高聳的中央山脈阻擋



圖三. 台灣中島橫斷面高低圖（高度是水平距離13倍）

摹自于景讓：台灣之土地 頁8

的關係，氣流被迫上升，因冷致雨，沿途洒降。等到氣流越過山峯，就變成乾燥的下沉氣流，致雨的機會大爲減少。清境農場多季少雨，就是因爲它正好位於東北季風的背風地帶。

表一　清境農場氣象資料

觀測站位置 E. 121°1′35″, N. 24°1′4″，標高 1748 公尺。

年度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年均溫 (C)	16.0	14.5	16.1	16.8	16.45	15.85	15.01	16.0
降雨量 (mm)				1696.8	2821.3	2016	2830.1	2576.7
濕度 (%)							71.7	71.7
7°C 以下時數				294	517	1481	422	364
降霜次數	40	45	36		38	35	30	26
下雪	1	2			1	1		

年度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年均溫 (C)	15.9	15.4	15.2	15.75	16.85	15.93	17.74	16.9
降雨量 (mm)	2162.7	1538.2	2804	1481.7	2691	2233	2094	2755
濕度 (%)	73.6	63.6	64.4	71.7	71.7	71.7	62.8	68.1
7°C 以下時	645	474	208	561.5	237	210	283	396
降霜次數	36	21	16	30	6	14	6	5
下雪	1		1		1	1		

農場所屬各新村之間的氣候條件也不一致。一般說來，博望新村因高度達 2044 公尺，已進入溫帶氣候區，年均溫低於 16°C，雨量也較多，經常有雲霧籠罩。壽亭和定遠兩新村，因爲海拔高度稍低，1700公尺左右，在亞熱帶氣候區內，溫度高，雲霧雨雪都較少些。

從圖一，不難看出清境農場全境剛好位於山嶺部位，雨水截留不易，且沒有地下水可供利用。所以，蓄水設備就成了最重要的給水設施。到 65 年為止，已裝設大小水管 8,100 公尺，大小儲水池 82 口，可供儲水 1,245 公噸[24]。各家都建有水槽儲水。壽亭和定遠兩村缺水的情況比博望嚴重，為了取得食用的水源，到村落附近小山澗源頭處，築堰攔水。這種小水源有兩處，在一處崩塌斷崖的背後，通過斷崖時，驚險萬狀。兩村義民在此架設懸空水管，且不時巡視水源。食水所需有限，尚可克服困難取得之。灌溉用水就完全靠天公作美了。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民國六十二年四月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於親自視察後，指示有關單位要徹底解決灌溉用水問題。當下由輔導會撥款新臺幣 7,204,000 元，農復會在中央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經費項下補助新臺幣 9,600,000 元，合計新臺幣 16,894,000元，興建慈翁溪水利工程[25]。慈翁溪在合歡山東峯下，夏季多雨水，多季有雪水，水源穩定。築壩攔水，埋設 22 公里長的管道，引入農場。場方計劃在場部下方建一座大型儲水庫。可是這項工程一再延宕，由於設計不良，排氣設施不足，在試行通水時，管線紛紛爆裂。以致到六十八年筆者調查時，工程仍未竣工。

㈡吉洋分場

高雄農場吉洋分場正位於高雄縣美濃鎮吉洋里與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的鄰接位置上，約當東徑 120°30′～120°33′，北緯 22°48′～22°52′。全境低於海拔 50 公尺，是在老濃溪下游沖積扇的河川新生地上，也就是在屏東平原北側邊緣，再往北去，卽是旗山、美濃山麓丘陵地帶。

屏東平原是南臺灣的第二大平原，略呈長方形，南北長約 50 公里，東西寬約 20 公里[26]。平原東側有一條南北縱走的斷層線——潮州斷層線[27]，沖積成屏東平原的各條河川，如老濃溪、隘寮溪、東港溪、林邊溪……等河川，都橫斷此斷層線而下注，

24. 民國 65 年清境農場對謝主席所做的簡報。
25. 同註 24.
26. 林朝棨：臺灣之河谷地形頁90，臺灣研究叢刊第 85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 55 年6月。
27. 同註 26 頁 89。林氏說：潮州斷層崖位於屏東平原之東側，北起老濃溪之南口，南迄枋寮南方海岸，全長約60公里，形成直線狀之山麓。其高度北部 1,000～1,200 公尺，南部逐漸降低至 400～600 公尺，由屏東平原之比高，北部 600～1,000 公尺，南部 300・500 公尺

因而在斷層崖的下方就形成了許多大小沖積扇[28]。

荖濃溪爲高屏溪的主流，發源於秀姑巒山（3833 公尺）、大水窟山、（3645 公尺）、與玉山東山（3884公尺）。沿潮州斷層線西側，自東北向西南流。它的流路與楠梓仙溪平行，成爲高屏溪的雙子河。荖濃溪流經內英山脈與脊樑山脈（指具有分水嶺作用的山脈，在此指中央山脈）之間，呈現標準縱谷地形。它的流路總長 101 公里（不包括高屏溪部份）。下游部份進入平原地區，堆積作用盛行，河川呈現網狀流路，並形成廣大的沖積扇[29]。

在網狀流路分布的沖積扇上，實地景觀是滿佈大小礫石砂礫。更由於風化程度小，地表上鮮有可供耕作的土壤。吉洋分場的這種地理條件是相當不良的。

就氣候條件而言，當在「熱帶季風氣候區」範圍內。終年高溫，雨量充沛，年雨量在 1500～2500 公厘。且隨季風風向轉換而變化，夏季吹西南風，風由海上陸，再加上颱風，因之雨量集中且多；冬季吹東北風，受中央山脈阻擋，水氣不易越山而過，以致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形成乾季[30]。

由於吉洋分場沒有做氣象記錄。有關當地的氣象資料，祇好參考文獻資料。于景讓對於旗山、里港一帶荖濃溪下游地區的氣溫，曾作如是敍述[31]：

> ……在玉山山脈南部的下淡水溪（現改名爲高屏溪）一帶及東海岸，（冬季溫度）大抵是 17°C 或 17°C 以上……，這完全是因爲東北吹來的寒風，爲玉山山脈遮斷的結果。例如在玉山之南的楠梓仙溪上流的蚊子只，在標高 939 公尺的高處，其十二、一、二月的平均溫度竟達 18°C；其下游的甲仙，標高 273 公尺，是 19.9°C。和楠梓仙溪平行的荖濃溪，溫度大體相同。……（夏季氣溫）就全島而論，平地平均是 27°C，此時並不因緯度如何而發生差別。

關於降雨量及降雨日數，以屏東和旗山兩地於一九三〇年的記錄爲例[32]：

28. 同註 26 頁 90。
29. 林朝棨：臺灣之河谷地形頁90，臺灣研究叢刊第 85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 55 年 6 月
30. 蔣丙然：臺灣氣候誌頁 7，臺灣研究叢刊第 26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 43 年 8 月
31. 于景讓：臺灣之土地頁17，臺灣研究叢刊第 10 種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民國 40 年 12 月
32. 于景讓：同上，頁 173-193，第二附錄引用日人白鳥勝義、小笠原和夫、川上佳孝（1930）合著的臺灣に於ける地理の降雨分佈。

平均降雨量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總計
屏東	12.5	12.5	27.5	66.2	209.4	373.8	573.8	713.3	241.2	30.3	8.7	5.5	2274.7
旗山	12.2	17.4	34.9	82.9	214.3	371.6	410.4	838.0	275.5	43.5	8.0	9.2	2317.9

＊單位：毫厘

平均降雨日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年總計
屏東	3.8	2.6	5.8	8.8	13.6	17.2	16.2	23.2	14.6	7.0	2.6	2.4	118.2
旗山	2.4	2.8	5.4	6.8	10.6	14.8	13.4	19.8	12.0	3.0	2.4	1.0	94.4

吉洋分場正好介於屏東與旗山之間；而靠近旗山，實際降雨情形當不會相差太遠。根據以上的資料可以清楚的看出一年之中，有乾季雨季之分。每年四月至九月正是雨量集中而且豐沛時節。此時多熱雷雨，也多颱風挾帶而來的豪雨。每當颱風挾帶豪雨侵襲時，河水暴漲，淹沒沿河兩岸的田地村落。吉洋分場全境在河川地上，因而水患頻仍。如今在村落外側修築有一道堤防，是用卵石砌成。但是全境地勢低窪，排水不良，還是常有積水不退現象，尤以定遠新村為最。從民國六十五年開始，陸續興建排水系統。

屏東平原在農田灌溉方面的特色，就是大量利用地下水。在平原上，用土法開鑿的自流井數以百計[33]，現今更用馬達抽水，供應所需。吉祥分場在此環境下，當然也鑿井汲水，灌溉農田。目前有深水井五口，負責灌溉全場已開闢的 192 公頃農田，同時也供應鄰近美濃地區的農田。義民們抱怨水電費用太重，可是捨此之外，卻又沒有其他可行的灌溉方式。

四、兩聚落在人文條件的差異

(一)人　口

33. 何春孫：臺灣之地下水地質，收入臺灣之地質頁 112-128，臺灣研究叢刊第 36 種，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國 44 年 5 月

在第三節中曾經提到，安置義民之初，分發到清境農場的義民有 79 戶，206人。分爲壽亭和博望兩村。其中壽亭有 46 戶，140 人[34]；博望有 33 戶，66 人，後來有一戶因妻亡而遷到他地[35]，另一戶於夫亡後改嫁到吉洋[36]，剩下 31 戶。安頓下來以後，人口不斷孳長，以致房舍不够用。壽亭在這種人口壓力下而分村，有 22 戶遷到場部下方，清境國小附近，成立定遠新村。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前往調查時，三個新村的實際人口情形如下：

	壽亭（24戶）	定遠（22戶）	博望（31戶）	總以（77戶）
男	69	62	93	224
女	55	53	78	186
總　計	124	115	171	410
每戶平均人數	5. 17	5. 23	5. 51	5. 23（單位：人）

吉洋分場成立之時，有 207 戶，677 人，分成信國、精忠、定遠、成功四村。以後又陸續有義民分發此地，增爲 232 戶。其中有 3 戶因夫妻雙亡，又無子女而除戶，實際有 229 戶。其中精忠村有單身戶 50 戶。各村實際人口情形如下表：

	信國(53戶)	精忠(27戶)	定遠(61戶)	成功(38戶)	總計（179 戶）
男	176	46	185	124	531
女	173	46	151	102	472
總　計	349	142	336	226	1003
每戶平均人口數	6. 58	3. 41	5. 50	5. 94	5. 55（單位：人）

* 精忠村原係安置單身軍官 77 人，至調查時止，已結婚者 14 人；沒有結婚但認養子女 1 人者 13 人，尙有 50 個單身漢，這些單身漢都外出做工，不住在農場裏，因而刪除不列入平均。

34. 依照分發原則每戶 3 人，應是 138 人，但其中有兩戶是有 2 個小孩，所以成 140 人。
35. 戶長張繼成，雲南人，太太是阿佧，自殺死亡，張繼成本人送外島管訓。
36. 戶長陸文高，雲南人，死亡。太太是傜人，改嫁吉洋精忠新村字國理。

從以上兩地的每戶人口平均數爲人 5,23 與 5,55 人，顯示兩地的人口壓力較大。雖與臺灣全省每戶人口平均數 5.6 人（以 1962 年爲準）[37] 相較，還稍爲偏低一點，但對義民來說，他們等於說是赤手空拳的到臺灣來另闢天地，這樣的家庭人口平均數已是很沈重的家庭負擔。

㈡籍　貫

簡單的說，這批義民大都是雲南人，他們的太太們有一半是滇緬邊區各土著民族。稍作仔細的分析，則可看出其中的多樣性：

清境農場義民本人籍貫分布情形如下：

	雲南	廣東	廣西	湖南	安徽	河南	江蘇	西康	總計
壽亭	19	1	3	0	0	1	0	0	24
定遠	16	3	1	2	0	0	0	0	22
博望	25	1	1	0	2	0	1	1	31
總計	60	5	5	2	2	1	1	1	77

在六十名雲南籍義民中，又以西南部各縣爲多：

地名	保山	景東	順寧	鎮康	緬寧	建水	瀾滄	楚雄	昌寧	景谷	蒙化
人數	10	5	5	4	4	4	3	3	3	3	2

其他如龍陵、彌渡、尋甸、懷寧、元江、箇舊、沼澤、墨江、鎮沅、昭通、蒙自、漾濞各縣只有一人。

他們的妻子大多是滇緬邊區，特別是緬甸景棟的土著民族也有來臺後續臺灣高山族女子爲妻，她們的族別分布情形如下[38]：

37. 陳紹馨：臺灣人口問題，收錄於臺灣研究叢刊「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1969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180.

38. 表中所記清境農場滇邊各族婦女人數，與林美英：「來自雲南邊疆各部族的婦女」（1966政大邊政學報第七期頁 28-30）所記有所不同。林文中記有 55 位婦女，其中擺夷 23 人，果洛泰（傣子）1人，倮黑12人，阿佧 7 人，傈傈 2 人，佧佤 3 人，蒲曼 4 人，傜家 3 人。

	泰語系		儸緬語系			南亞語系		苗傜語系	南島語系	漢語系
	擺夷	果洛泰	倮黑	阿佧	傈僳	佧佤	蒲蠻	傜家	泰雅族	漢人
壽亭	5	0	9	2	1	0	1	1	0	5**
定遠	14	1	4	1	0	0	0	0	0	2*
博望	10	0	4	5	1	3	1	2	4***	1
總計	26	1	17	8	2	3	2	3	4	7

*定遠村的兩個漢族婦女，一位是在臺灣繼娶的操閩南語，有重聽的毛病；一位是雲南建水，但其他婦女說她是紅苗。

**其中一位父爲廣東，母爲緬甸人，依照籍貫法，算是漢人。

**有一人是續弦，有二人是離婚後再娶，有一人是有高堂老母，入村不久就娶當地泰雅女子爲妻。

吉洋分場義民本人籍貫分布情況如下：

	雲南	廣東	廣西	四川	湖南	安徽	河南	江蘇	山東	貴州	江西	海南島	緬甸	不詳	總計
信國	32	9	5	1	1	1	0	0	0	1	0	1	0	2	53
精忠	55	5	2	10	3	0	1	0	0	1	0	0	0	0	77
定遠	56	2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61
成功	15	8	1	3	1	0	0	0	1	1	1	0	3	2	36*
總計	158	24	9	14	5	1	2	1	1	3	1	1	3	4	227

*成功新村有 2 戶無男義民記錄。

在 158 名雲南籍義民中，縣份分布情形如下：

	保山	景東	南嶠	瀾滄	墨江	沅江	鎭康	順寧	建水	騰衝	祥雲	江城	昌寧	景谷	蒙化	雲縣	緬寧	鎭南	臨江	彌渡	龍陵
信國	2	7	0	2	2	3	3	3	2	1	2	0	0	2	0	0	0	0	0	0	0
精忠	9	5	0	4	2	1	1	1	0	3	2	0	3	0	3	2	2	2	2	0	0
定遠	6	3	11	5	4	4	4	1	2	0	0	4	0	1	0	0	0	0	0	2	1
成功	4	0	4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總計	21	15	15	13	9	8	8	5	4	4	4	4	3	3	3	3	2	2	2	2	2

	普洱	雙江	蒙自	耿馬	宣威	牟定	佛海	車里	通海	河西	峨山	大理	石屏	*聯江	*合西	*合漢	*洲溪	*昌臨	不詳	總計
信國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32
精忠	1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2	1	1	1	1	0	55
定遠	0	1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56
成功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6	15
總計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7	158

有＊者是不見於雲南省地圖上的縣名，恐怕是初來臺辦理戶籍時，承辦人員疏忽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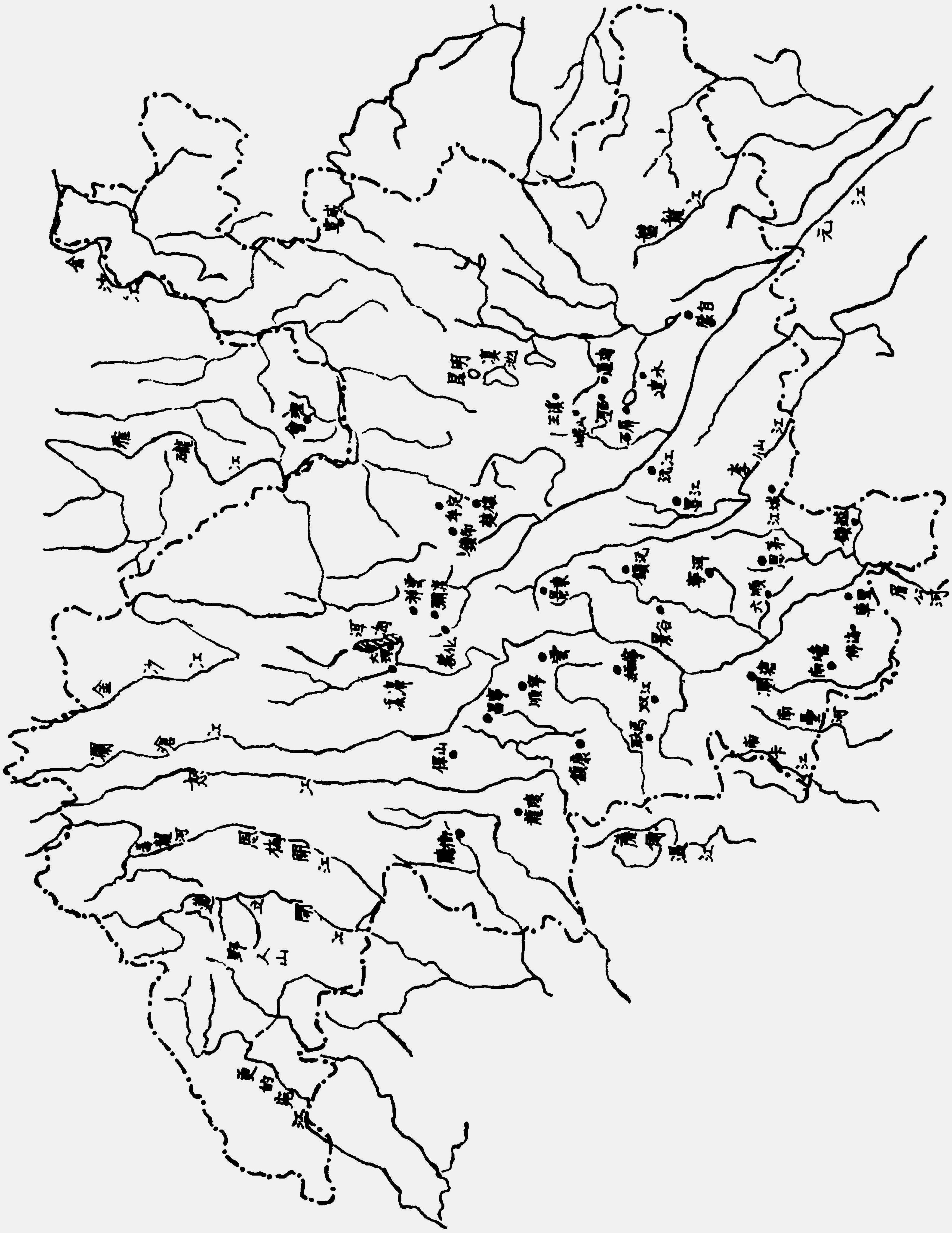
從義民的籍貫分布，看出他們的籍貫多偏重在雲南省的西南部。向來此區對南緬甸的交通，可順怒江，瀾滄江而下一向方便。這樣的地理分布情形，合乎常理。

至於這裏義民妻子的族別籍貫情形如下：

	漢族	泰語系			倮緬語系				苗傜語系		南亞語系		南島語系	總計
		擺夷	傣子	永人	倮黑	阿佧	阿克	傈僳	苗人	傜人	佧佤	蒲蠻	高山族	
信國	26	16	1	0	1	6	0	1	0	0	0	2	0	53
*精忠	6	2	0	0	0	0	0	0	0	1	0	1	4	14
定遠	15	12	1	0	12	7	0	0	1	0	3**	8	0	59
成功	22	8	0	2	1	2	1	0	0	0	0	2	0	38
總計	69	38	2	2	14	15	1	1	1	1	3	13	4	164

*因精忠村原係單身軍官，近年來，始有人成婚，因而使表中數字偏低。

**在定遠村有佧佤女子 3 人，其丈夫亦爲佧佤但報戶口時均登記作漢人，另二戶，男爲佧佤，其妻一爲漢人，一未詳，故總計爲男 5 人，女 3 人。



圖四 義民籍貫有關的雲南縣份略圖

吉洋分場義民本人的籍貫如下：

	雲南	廣東	廣西	四川	湖南	安徽	貴州	河南	江蘇	海南	山東
信國	32	9	5	1	1	1	1	0	0	1	0
精忠	56	5	2	10	3	0	1	1	0	0	0
定遠	56	2	1	0	0	0	0	1	1	0	0
成功	15	8	1	3	1	0	1	0	0	0	1
總計	159	24	9	14	5	1	3	2	1	1	1

(三)年 齡

無論是清境或吉洋，在年齡方面所呈現的共同現象是義民本人年歲老大，而妻子正是壯年，子女又多未成年。這個現象對於兩地經濟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清境農場義民的平均年齡，依民國六十八年調查記錄，義民平均年齡是 60.14 歲，妻子的平均年齡是 43.72 歲。男孩子的平均年齡為 15.52 歲，女孩平均年齡是 15.64 歲。各村的實際年齡稍有差異，如下表所示：

村名	義民平均年齡	妻子平均年齡	男孩平均年齡	女孩平均年齡
博望村	58.00	43.60	13.88	13.88
定遠村	60.50	44.63	15.31	16.85
壽亭村	62.76	43.12	18.02	16.93
總平均	60.14	43.72	15.52	15.64

吉洋分場義民的平均年齡為 57.87 歲，妻子平均年齡為 44.82 歲，男孩平均年齡為 17.71 歲，女孩平均年齡為 16.29 歲。各村的情形如下：

	義民平均年齡	妻子平均年齡	男孩平均年齡	女孩平均年齡
信國村	61.67	46.92	19.56	19.32
精忠村	56.01	33.29	13.24	12.22*
定遠村	57.32	47.82	17.67	14.47
成功村	56.48	51.25	20.36	19.14
總平均	57.87	44.82	17.71	16.29

*（包括領養的孩子在內）

造成這種夫妻、父子之間年齡相差懸殊的基本原因，應當是晚婚。有關婚姻事項，留待下一節討論。成婚晚，生育孩子時間也晚。來到臺灣，進住農場之後，因生活安定，又不懂節育，孩子相繼出世。一般每家都有三個或更多的子女。子女數多，造成家庭經濟上的沈重負擔。這種現象在吉洋分場尤爲明顯。成功和信國兩村是經濟情況較好的，他們孩子們的平均年齡也高。在小學或初中畢業後，輟學就業，補貼家用；女孩更是早早出嫁，女婿往往也是單身來臺的同鄉子弟，婚後住到岳家，成了岳家一大助益。而吉洋的定遠村和精忠村就因孩子年紀小，外出謀生能力小，家庭經濟就較爲困難些。

㈣婚　姻

依第二節所述，清境農場的義民娶擺夷女子者 26 人，果洛泰女子 1 人，倮黑女子 17 人，阿佧女子 8 人，傈僳女子 2 人，佧佤女子 3 人，蒲蠻女子 2 人，傜家女子 3 人，臺灣泰雅族女子 4 人，漢族女子 7 人。吉洋分場義民娶妻的情形是，娶擺夷38 人，傣子 2 人，永人 2 人，倮黑 14 人，阿佧 16 人，阿克 1 人，傈僳 1 人，苗人 1 人，傜人 1 人，佧佤 5 人，蒲蠻 13 人，臺灣高山族 4 人，漢人 69 人。

娶漢女爲妻者，在調查資料中，妻子年齡大致較長，唯獨吉洋精忠村情形例外。這是因爲精忠村義民原是隻身來臺，民國六十年前後才娶鄰近地區如屏東、六龜、美濃等地的漢女爲妻。

娶邊疆民族女子爲妻，大致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一部份中國遠征軍人在滇緬一帶落籍安身，娶當地女子爲妻。民國卅八年底，大陸淪陷後，在緬甸排華措施和中共的壓力下，又再拿起武器，加入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的陣營。這批義民原是第廿六軍以廣東籍爲多，也有其他各省的。妻子多爲擺夷。結婚時間在民國卅五至卅九年之間。

第二種情形是在第一次撤退反共救國軍之後的五年之間娶土著女子爲妻。民國四十三年五月，撤退完成，李彌公開宣稱這支游擊部隊不復存在。事實上，只撤出了李國輝的一九三師和葉植楠的九十三師，總數只有 7280 人。其餘像石炳麟、段希文、蒙寶業、石守敬、馬俊國、馬守一等部隊並沒有撤走。從民國四十三年底起，政府指派李彌的副手柳元麟爲總指揮，在泰緬寮邊界的江拉建立總部，重組「東南亞人民反共志願軍」[39]，往後幾年中，游擊隊爲了能够生存，並求發展，毅然改變以往不准軍人結婚的規定，儘量鼓勵軍官結婚。規定年紀在卅五歲以上，思想忠貞的軍官可以結婚，同時也規定婚娶對象必需是當地土司頭人家的女兒[40] 這種設計的用意有二，一是企圖長久抵抗，利用屯墾方式，達成自給自足的境界，和土司頭人搭上親戚關係，可以減除許多障礙；其次是藉此掩護身份，並獲得靈通正確的情報。前一節所提到的「晚婚」現象，就是指此。在滇緬泰寮一帶，少女結婚年齡普遍提早。吉洋的信國和定遠兩村有婦女結婚年齡記錄，平均結婚年齡是 19.77 歲。最小的結婚年齡是 12 歲。於是，造成夫妻年齡差距大，平均相差 15 歲，在清境是相差 17 歲，吉洋相差 13 歲。再者，當年求婚時，往往帶有強迫性質。在清境的幾位女報導人都說他們是被搶來的[41]，如今，義民本人已經年老力衰，妻子正值壯年。每當丈夫生病住院，就很快的與別的男人同居。在清境，稱這種現象爲「跑外面的」。丈夫死，妻子都改嫁，沒有守節者。

吉洋的成功新村原本就是安頓遺眷。十五戶遺眷中有七戶漢人，八戶土著（計阿克 1 人，擺夷 4 人，永人 1 人，蒲蠻 2 人），全部改嫁。定遠村因夫死而改嫁者 6 人

39. 柳元麟：我與炳公同⑦；卓元相：異域烽火 1976 p. 3-5; 馬克騰：異域下册1972；胡慶蓉：滇邊游擊史話 1967 p. 202, 204；

40. 同註 17

41. 查沁梅：阿佧，住清境定遠 25 號；楊金煥，楊佃的女兒，霧社高農學生。

（倮黑 3 人、擺夷 2 人、阿佧 1 人）。信國村改嫁者 1 人，擺夷。在清境有兩位婦人（擺夷 1，僑家 1）在丈夫死後，改嫁到吉洋精忠村。

全部改嫁的例子中，有兩點共同特徵。第一，後夫都是同時從滇緬邊區撤回來的義民，是漢人。第二，除精忠村外，其他所有再嫁情形，在法律上只能算是同居，因爲他們沒有辦理戶籍登記手續。據主管義民戶籍的吉洋分場技術員吳龍星表示：是因爲寡婦們不願意因再婚而失去義民資格和所有可享受的權利。由於她們再婚的對象多半是沒有義民資格的，依照輔導會的規定，當她們正式結婚後，必需要放棄在吉洋分場的一切權益，歸丈夫贍養。大家都認爲如此則損失太大，寧可同居，不願辦理正式戶籍登記。所生育的孩子要藉助父親認領手續而確定法律地位。

當年在大陸家鄉和滇緬邊區時所生育的子女們，如今已屆適婚年齡[42]，吉洋的孩子們年齡較長，民國六十六年五月調查時，在當時的戶籍資料上， 有51 件子女結婚記錄，各年次的結婚人數如下表所示：

人數 / 年次 / 性別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合計
男	2			1	1	1			1		2	2	2	2				1						15
女						1					3	5	4	2		3	3	2	1	4	2	1		31
合計	2	0	0	1	1	2	0	0	1	0	5	7	6	4	0	3	3	3	1	4	2	1	0	45

*由於戶籍資料不完整，有 4 個已婚男孩，1 個已婚女孩缺少有關記錄。

在 19 件娶媳記錄中，媳婦籍貫是臺灣籍的有 8 件，雲南籍 1 件， 無記錄的 10 件。因而似乎可以這麼說：下一代男孩由於服役、外出就業等關係，社交範圍擴大，擇偶的範圍也隨之擴大。也由於男孩對家庭經濟的負擔較重，結婚年齡比較晚些。

女孩的婚姻狀況，恰好與男孩相反。民國 38、39 年次的女孩大多已結婚七、八年，43 年次至 49 年次者，也有不少人結婚。其結婚年齡要比男孩早了許多，目前情形是國民中學畢業後一兩年內就出閣嫁人。這種情形類似上一代女性的結婚年齡。當

42. 民法第 980 條：「男未滿 18 歲，女未滿 16 歲者，不得結婚。」本文據此項條文爲適婚年齡的標準界線。

時的分場主任楊新傑先生（也是雲南人曾參加雲南反共救國軍， 42 年隨部隊撤來臺灣，海軍上校退役）表示，吉洋女孩的婚姻多半是由長輩做媒說合，對象多半是同時（或民國 42 年）撤退來臺的同鄉子弟或幼年隻身來臺，而今在軍中任職者，年齡約在三十歲上下。婚後，住到岳家，對岳家的經濟頗有助益。

在清境農場，由於當年分發時，是尙無子女者或僅有一個孩子者。所以，到六十八年五月調查時止 ，子女結婚的例子不多 ，只有 13 件。其中博望村 4 件（二娶二嫁）[43] ，壽亭村 9 件（5 娶 2 嫁 2 贅）。各年次結婚情形如下：

	22	36	41	44	45	46	47	48	49	50	
子	1	1	1	1	1	0	1	0	1	0	7
女	0	0	0	1	0	0	2	0	1	2	6
合　計	1	1	1	2	1	0	3	0	2	2	13

娶媳記錄中，民國 22 年次那一椿婚姻別立戶口，不列入場部記錄外，其餘六件，臺灣籍佔 5 件，其中包括春陽泰雅族 2 件（是姊妹）、花蓮阿美族 1 件、以及本省漢人 2 件湖南籍 1 件，師大畢業，現爲埔里宏仁國中教員。招贅兩件，一是雲南籍，一是春陽泰雅族，是前述姊妹之兄。出嫁者隨夫至臺北、臺中、彰化等地居住。

在清境，媒妁風氣不盛，都是自由戀愛而後成婚。贅婿之出現，是由於家中需要勞力。結婚的兒子也都住在家中，也表示家中缺乏勞力。

㈤教　育

一般說來，義民們及其眷屬的教育水準不高。對於下一代子女教育的態度，則清境和吉洋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現象。

在吉洋，信國新村有義民 53 人，其中小學程度者 23 人，不識字者 12 人，初中程度者 8 人，識字程度者 6 人，軍校畢業者 2 人，私塾和高中程度者各 1 人。曾有

43. 依照當年分發原則博望村是無子女有配偶軍官，有兩名義民，在大陸上就娶妻生子，後妻死，在滇邊又續弦，前妻三子長大後也加入游擊隊，同時撤來臺灣，在戶籍上算作家屬，另兩家原先因有子女一人發在壽亭村，後因自己申請撤遷到博望。

一位上校，河南大學畢業，但已逝世。他們的妻子全都不識字。

精忠新村有義民 77 人，不識字者 36 人，小學程度者 27 人，初中程度者 11 人，識字程度者 2 人，師範者 1 人。他們中 14 人娶妻，妻子的教育程度，小學者 5 人，不識字者 9 人。

定遠新村有義民 59 人，其中不識字者 41 人，小學程度者 14 人，識字者 3 人，初中程度者 1 人。他們的配偶現有 53 人，只有 1 人是小學程度，其餘全都不識字。

成功新村有男士 35 人，其中不識字者 8 人，小學程度者 4 人，大學程度者 1 人，缺乏教育程度記錄者 20 人。但是這 20 人中，校級軍官退伍者 4 人，尉級軍官退伍有 2 人，士官兵退伍者 6 人，不明者 8 人。他們的妻子中，不識字者 11 人，小學程度者 3 人(擺夷、阿佧、臺灣各 1)，初級民眾教育班者 2 人(蒲蠻、倮黑各 1)，高中程度 1 人 (緬甸華僑，是吉洋生活程度最好的一家) 。缺資料者 14 人。

		大學	軍校	高中	師範	初中	小學	私塾	民教班	識字	不識字	缺記錄	小計
男	信國新村		2	1		8	23	1		6	12		53
	精忠新村				1	11	27			2	36		77
	定遠新村					1				3	41	16	61
	成功新村	1	2				4				8	21	36
小計		1	4	1	1	20	54	1	0	11	97	37	227
女	信國新村										43	10	53
	精忠新村						5				9		14
	定遠新村						1				52	6	59
	成功新村			1			3		2		11	21	38
小計		0	0	1	0	0	9	0	2	0	115	37	164
合計		1	4	2	1	20	63	1	2	11	212	74	391

從這個統計表來看，吉洋的義民們，男女雙方在教育水準方面，不識字者 212 人，佔義民夫妻人數 391 人中的 54.21%。男女分開檢視，男子 227 中，不識字者 97 人，佔 42.73%；小學程度（包含私塾，識字在內）有 66 人、佔 29.07%；初中以上程度者 27 人，佔 11.89%。在女子方面，164 人中有 115 人不識字，佔 70.12%。若將缺乏記錄的 7.18 人也算成不識字者，則所佔的比率更高達 92.67%。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婦女，她的家庭生活水準也就顯得比較高。

在清境的壽亭新村，有義民 24 人，其中小學程度者 14 人，初中程度者 3 人，不識字者 3 人，識字程度者 1 人，簡易師範者 1 人，「反共大學」1 人，不詳 1 人。他們的妻子有 23 人，其中不識字者 21 人（包括一位僅識緬文者，識字者二 2 人。

定遠新村有義民 22 人，其中小學程度的有 12 人，初中程度 3 人，不識字 3 人，師範 1 人，私塾者 1 人。他們的妻子全都不識字。

博望新村有義民 31 人，識字者 17 人，不識字者 13 人，高中程度者 1 人。他們的妻子，27人不識字，4 人小學程度（這四人都是臺灣泰雅族山胞）。

		反共大學	高中	師範	初中	小學	初識字	私塾	不識字	合計
男	壽亭新村	1		1	3	14	1		3	24
	定遠新村			1	3	12	1	1	3	22
	博望新村		1				17	1	13	31
合計		1	1	2	6	26	19	2	19	77
女	壽亭新村						2		21	23
	定遠新村								20	20
	博望新村					4			27	31
合計						4	2		68	74

綜合吉洋與清境兩地義民的教育水準，可說是偏低的。不識字者佔總義民人數的

39.3%，比率不能說不高。在識字者中，初識字，私塾和小學程度又佔絕大多數。不過，教育程度的高低並不一定表示個人辦事或經營能力的高低，反而是他們在軍隊中所擔任職務的高低，足以顯示這方面能力的差異。

清境的三個新村和吉洋的信國與精忠兩村，如第三節所述，是以軍官為主。細究其中官階的高低情形，則清境的壽亭、定遠和吉洋的信國所住義民，官階較高，多有校級軍官。清境博望與吉洋精忠則多係尉級軍官。軍官原本就是「治人者」，而且當年在滇緬邊區打游擊時，學歷並不重要，個人的領導才能、作戰指揮能力才是最先考慮的因素。這方面能力的差異情形，影響到來臺灣從事農墾的經濟發展情形。

吉洋定遠新村的義民，教育水準明顯的低落，45 人中有 41 人不識字，比率高達 87.23%。這批義民絕大多數是民國 46～48 年，逢中共推行「三面紅旗」政策時，逃離中國大陸的人。原本就是種田的莊稼漢，到游擊區後，成了最基層的士兵或士官。他們原是「治於人者」，對於施展個人能力以謀求生活改善，並不很得心應手。在調查時，很強烈的感受到他們的依賴性。

吉洋成功新村是吉洋四村中生活水準最好的。在調查時，得知該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家是夫妻共同外出工作[44]，這顯示出他們的收益並不完全依賴田地農作收成，外出工作的收入，是他們生活改善的主要因素。該村幾家生活較好的人家，先生都是校級軍官退伍，妻子的教育程度也高些。大家公認最好的一家，先生是少校退伍，妻子是高中畢業。

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程度上，吉洋和清境呈現出很大的差異現象。在吉洋，國中（初中）程度形成了一道很明顯的界線。少數家境較好的家庭、或本身向學，才會就讀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學校；否則在國中畢業後或者肄業，就外出就業。這種現象與吉洋義民本身教育水準和家庭經濟狀況有密切的關係。分場主任楊新傑先生對這種現象有很好的說明：信國國小（吉洋分場的國民小學，隸屬屏東縣）的學生放學後，需要幫忙做家事，照顧幼小的弟妹，很少有時間做功課，成績當然不好；再加上一般義民家境都很拮据，巴不得子女們早點完成義務教育，好外出做事，賺錢補貼家用。

44. 成功村原本以遺眷為主，這些遺眷享有農場使用權，一旦正式結婚，則要放棄土地使用權，以致她們都用「同居」方式另嫁丈夫，以保留這項權利。

下面的表格說明吉洋地區下一代子女的教育情形。信國和成功兩村的經濟情況較好，孩子們讀到高中及高中以上程度的人數也稍多，信國村有 25 人(男20，女 5)，成功村有 33 人（男 19，女 14）。經濟情況稍差的定遠村，則有 20 人（男19，女 1）。在這樣統計數字上看，女孩子在受教育的機會上，要比男孩子吃虧得多。經濟情況不好時，首先犧牲掉女孩的就學機會。此外，早婚是另一項重要的因素。像定遠村唯一上高中的女孩，在國中畢業就結婚，在桃園以半工半讀的方式讀治平中學夜間部，只讀了一年，就不讀了。

		53年（含）以前出生者												54-59 年出生者			60年以後出生者
		大專程度				高中程度				國中程度	小學程度	未曾就學	*記錄不明者	在學讀書	不在學讀書	*記錄不明	
		大學	專科	軍校	師範	高中	高職	士校	劇校								
男	信國	1		2		5	4	8	1	26	3		47	19			
	精忠												9*	3		6	6
	定遠			4		2	4	8	1	42	6		18	34	2	1	14
	成功		1	4		7		7		7	5		16	4		5	15
女	信國					4	1			26	4		64	17		2	2
	精忠									2	2		5*	2	2	9	7
	定遠					1				19	8	3	9	23	1		16
	成功		5		1	4	5			12	8		12	6		5	4
合計		1	6	10	1	23	14	23	2	134	36	3	180	108	5	28	65

*本表以吉洋分場場部戶籍記錄為依據，並曾挨戶查對，惟因義民多有長年在外地工作，子女隨之外出者，或是子女外出謀生就業就學，家人不能確定其目前狀況；甚至有家人根本不知子女行蹤者，統統列入記錄不明一項。

本表以民國 66 年的調查資料為基準修訂而成。

再就程度上看。整個吉洋地區，只有一人通過大學聯考，進入文化學院政治系，六十八年再去複查時，他已考上該校政治研究所。兩年之中，並沒有其他的人考上大學。這個男孩的父親是河南大學畢業的上校，他家中也只有他一人讀書，弟弟就去了高雄的鋼鐵工廠做工。

就讀軍校前後有 10 人，現今在學者 1 人，其餘 9 人畢業多年，顯示後繼乏人。就讀海軍或陸軍士官學校者共 23 人。就讀士校不僅不要繳納學雜費，每月還有 800 元（以民國 66 年爲準）薪餉。這種情形對於收入不豐的家庭來說，相當具有吸引力。

專科這一項是指五專而言，共有 6 人（1 男，女 5），都在成功新村。男孩 1 人，就讀屏東工專；女孩 5 人，其中銘傳商專 1 人、實踐家專 1 人，屏東美和護專 3 人。這是吉洋女孩學歷上的最高峯。

就讀高中和高職者共有 37 人（男22，女15）。成功村有 16 人（男 7，女 9）、信國村有 14 人（男 9，女 5），定遠村只有 7 人（男 6，女 1）。

能夠讀到初中（國中）畢（肄）業，還是拜受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之賜。在九年國教沒有實施之前，吉洋的孩子們許多年歲較長的只能讀到小學畢業，隨後就外出做工。這樣的情形有 36 人（男 14， 女 22）。實施九年國教之後，至六十六年五月止，國中畢業者 48 人（男30，女18）、中途輟學者 11 人（男 8，女 3），尚就讀於學校者 75 人（男37，女38）。至於目前小學階段，只有很少數的 5 人，因本人不好求學而中途休學在家外，其餘都入學。

吉洋義民對子女的教育問題，一般來說，祇是勉強讓他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但是清境的義民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態度，是很關心子女的課業，祇要經濟能力許可，到埔里買房子，讓孩子到埔里的國小、國中上學，甚至有人把孩子送到臺北來讀書，誠可謂用心良苦。

在年齡一節已經提到，清境的孩子大多是來臺定居後生育的，因而年紀尚小，平均只有 15 歲多一點（以民國六十八年五月爲基準）。都在求學的階段，他們目前的求學情形如下表所示：

		軍校	五專	高中	高職	士校	國中	國小	智力障礙	幼稚園	合計
男	壽亭新村	3	1	2	3	9	17	8	0	0	43
	定遠新村	1	1	0	0	17	8	10	1	1	38
	博望新村	1	0	3	1	7	23	25	0	2	62
女	壽亭新村	0	1	4	6	0	11	8	0	0	30
	定遠新村	0	3	3	4	0	8	10	0	1	29
	博望新村	0	1	6	6	0	11	21	0	3	38
合計		5	7	18	20	33	78	82	1	7	240

清境的孩子們讀書上學有習慣集體行動的現象存在。同進一所學校，是很常見的現象主要原因是相互有照應，家長比較放心。五專 7 人，分別是臺中嶺東商專 5 人，屏東美和護專 1 人（此人隨母來自吉洋）、高雄正修工專 1 人；高中 18 人，其中南投高中 9 人，臺中勤益高中 4 人，埔里高中 2 人，豐原高中 1 人，南投中興高中 1 人(此人於 68 年夏考上輔仁大學和政戰學校，目前就讀政戰學校)、開明高中 1 人。就讀高職者 20 人，以霧社高農最多，有 10 人，草屯培英工商次之，有 8 人。就讀國中有 78 人，埔里宏仁國中有 13 人、大成國中 3 人，臺北板橋海山國中 2 人，其餘都依照學區規定，進入仁愛國中，就讀國小 82 人，埔里南光國小有 12 人，其餘依學區入清境國小，至於進士官學校特多的現象，是由於仁愛國中對於保送學生入士校特別賣力的緣故。有 33 人，其中空軍機械學校 7 人，空軍防砲學校 1 人，海軍士校 2 人、陸戰隊學校 1 人，陸軍第一士校 11 人、兵工學校 10 人、通信兵學校 1 人。

從上述情形，不難看出清境的孩子們在求學的際遇上，是比吉洋的孩子們好得很多。當然，在目前臺灣地區的教育水準，鄉下地方要比城市差得多。所以，清境的孩子們在課業成績上是不及城市孩子來得好。

五、兩聚落的經濟活動

在第三節已約略的提及清境和吉洋兩地的經濟發展情形。清境的義民，由於自然條件利於溫帶果樹和蔬菜的種植，加上義民本人經營能力較好，以致經濟情況較佳；反觀吉洋分場，由於自然環境不佳，是礫石遍布的河川地，缺乏壤土，也缺乏水利設施和水土保持工作，再加上義民本身家庭人口較多，經營能力和成就動機稍差，以致經濟情況一直不佳。舉凡臺灣農村所常見的不良現象，諸如：人口老化、勞力缺乏、人力外流、資金短絀等等，都深深困擾著他們。本節針對兩地的經濟情形分別加以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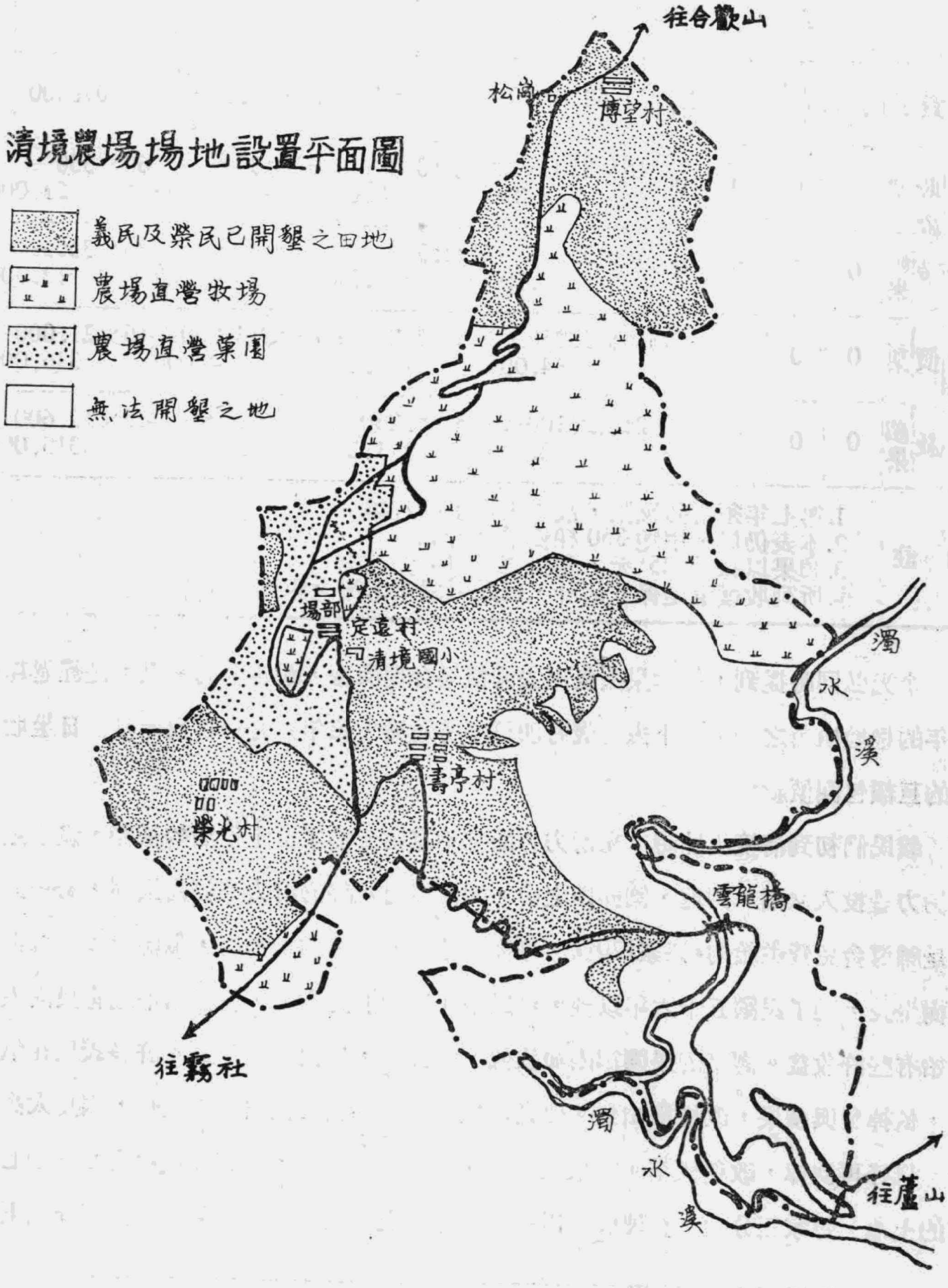
(一)清境——高山溫帶菓菜經濟

清境農場初設之時，正是中部橫貫公路梨山一帶溫帶水果試種成功後不久。由於清境農場的海拔高度、氣溫、雨量等自然條件與梨山地區大致相若，因而一開始就仿梨山的經濟發展方式，栽種溫帶水果，以蘋果和梨爲大宗，其他如日本水蜜桃、桃子、李子等也有種植。

梨和蘋果同是薔薇科梨屬落葉喬木。種植成活後的第三年起，開始結果實，初時產量很少，果實味道不佳，逐年增加產量，第七年起進入盛產期，直到第四十年左右才進入衰老期，產量銳減，不合經濟效益，必需砍伐。可是果樹盛產期的年限，又受種植情形、株距、施肥、修剪枝椏等人爲因素影響而變短。同時，這些果樹的根部會分泌一些毒素，破壞土壤肥力，以致在砍伐以後，無法繼續種植同樣的作物，而要荒廢相當時日才可以再種植。

管理果園是件很忙碌而且投資大的事業。每年除了九月至十一月收成後兩個月落葉時節外，經常要噴洒農藥，防止病蟲害的侵襲。四月至九月收成前，至少要鋤草三次，以免野草侵佔肥料及掩蔽病蟲害。從十一月至翌年二月，利用落葉時期搭建棚架、施肥、鬆土或翻土。一、二月時要補苗剪枝。三、四、五月開花結果時期要忙著施肥，九月忙著收成。

梨山果園的習慣是由地主自己管理五、六年，然後才包租給平地青果商。在前兩年中幾乎是完全沒有收穫的，第三、四年起才有少量收穫，以後逐年增加。余光弘在


清境農場場地設置平面圖
義民及榮民已開墾之田地
農場直營牧場
農場直營藥園
無法開墾之地
往合歡山
松崗
博望村
場部
定遠村
清境國小
壽亭村
榮光村
濁
水
溪
雲龍橋
往霧社
往廬山

環山做調查時，曾對環山的果園投資與利潤列表表示[45]：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投資額			67,600	19,700	29,875	53,875	68,950	81,600	120,725	107,400
收益	收穫量	梨	0	0	0	0	15×350=5,250	20×350=7,000	40×350=14,000	60×350=21,000
		蘋果	0	0	0	0	6 ×350=2,100	15×350 5,250	25×350=8,750	36×350=12,600
	價款	梨	0	0	0	0	16×5,250=84,000	16×7,000=112,000	16×14,000=224,000	16×21,000=336,000
		蘋果	0	0	0	0	25×2,100=52,500	25×5,250=131,250	25×8750=218,750	25×12,600=315,000
備註			1.第七年須搭防風架，故成本高出第八年。 2.本表仍以一甲地 350 棵樹爲準計算 3.蘋果以每斤 25 元，梨以每斤 16 元計算 4. 所列收穫量是保守估計，但颱風嚴重落果之因素，並未考慮。							

余光弘同時提到，無論果園包出去的價錢合理與否，最重要的一點，是經過起初幾年的整地植苗之後，接下去的歲月卽可不勞而獲，每年六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坐收包商的巨額包園價款[46]。

義民們初到淸境現址時，在財力方面都不寬裕。爲了奠定生活的基礎，幾乎是把一切力量投入砍樹、開地、築梯田之中。因而沒有足够的財力來經營果園。第一批果苗是輔導會免費供給的，每家120株。可種三分地。博望的地勢高，氣溫低，適合溫帶果樹生長，到了民國五十六年以後，可以用「包青」的方式，包租給平地青果商人。開始有些許收益。壽亭的果園卻因海拔低、氣溫高，果樹生長不良。許多義民在氣憤下，砍掉梨與蘋果，改種横山梨。但是自然條件又不利於横山梨的生長，因爲太高太冷。只好再砍掉，改種桃李。成果也不佳。民國六十二年，壽亭義民換得畜牧中心上方的土地，每家三分地。整理成梯田後，立卽種上梨與蘋果，心急的人在三分地上種

45. 余光弘：環山泰雅人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調適 1976 臺大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46. 余光弘：同 45

了 150 株。這種貪得的舉動，將來在盛產期中一定深受株距過密，影響結實的困擾。民國六十八年調查時，壽亭和定遠的果樹已達栽種六年開始結果的階段大都已包租，由於是剛剛開始結果，產量不多，品質也差每株包租的代價是 100～120 元。比梨山地區以甲爲單位計價，要精細得多。

目前整個清境農場，包括義民、榮民和場部直營的果園算在一起，種植果樹的種類包括蘋果、水蜜桃、梨、板栗等，共有果樹 76,673 株[47] 。

清境義民的主要收入，是靠夏季蔬菜。根據場部提供的資料[48] ，民國六十五年運銷 250 萬公斤的蔬菜到全省市場 ， 對於平抑菜價很有貢獻 。 主要項目甘藍菜、大白菜、甜青椒、結球萵苣、波菜、豌豆苗等。其中以甘藍菜爲最大宗。生產時間是每年的五月至十一月。

義民初到農場從事農墾時，就學種菜。那時，越南戰事方興未艾，大批美軍投入越南戰場，需要鄰近地區供應生活物資，臺灣在當時也就成了供應補給地區之一。政府特別照顧義民生活，規定清境所產的蔬菜全數供應美軍。可是由於不善耕種，成品不良，而遭到退貨。

清境的田地原是森林，砍伐掉參天古木之後，纔築成梯田。按常理說，新闢的田地，地力一定肥沃，只要用焚林燒柴剩下的草木灰作肥料就可以了。但是，這地方的土壤由於腐殖層薄，肥沃度不够。種出來的菜不好。以後，全部改用鷄糞作基肥，再施以其他肥料和農藥，蔬菜發育才良好。

高度與氣溫對蔬菜的生長也有密切的關係。博望的田地都在海拔2000公尺左右，年均溫在 15°C 以下，蟲害少，雨水多，適合高冷蔬菜的發育，所以，博望義民最早種植甘藍菜成功。壽亭定遠的田地位置較低，年均溫在 17°C 以上，蟲害多，雨水少，灌溉系統缺乏，蔬菜生長大受限制 。 爲了防止蟲害 ， 需要投入大量的農藥殺蟲劑，增加成本開支。由於灌溉用水缺乏，菜圃就成了「看天田」，能否有收成，就看天公是否作美，提供足够的雨量。平時要儘可能儲蓄雨水，在晴天，要辛勤的挑水灌溉。

47. 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報簡報（民國 65 年對省主席謝東閔所做報告）
48. 同註 47

清境義民田地面積是以一甲爲準。博望的田地全部都可以利用，所以他們先在田地種果樹，在果樹苗之間種菜。對果樹而言，前四年需要大量投資卻無收穫的時候，能因種菜而得到一部份肥料供應。等到包青之後，也有人利用枯葉時節在樹與樹之間種菜。果樹開花結果期間，是不能够種菜的。因此，博望義民轉向附近的山胞租地種菜，每種一顆菜要付租金一元。一萬棵菜要三分半地。目前一位義民種菜數量約在五萬棵左右。博望義民生活較優越，一年種一次菜。

壽亭和定遠義民就沒這麼好福氣，由於自然條件差，所種出來的甘藍菜小顆，又多遭蟲咬，賣不起價錢。他們年種兩次（5～7月，8～11月），並且雜種其他種類的菜，如豌豆苗、球狀萵苣（生菜）、甜青椒等等，價格高，產量少的蔬菜。民國六十二年換地之後，在新的田地上，一如博望，全部栽種甘藍菜。

博望由於甘藍菜的產量大，在民國五十八、五十九年間，由場部輔導，統一包給菜商，結果發生了倒賬。五十八年菜商以空頭支票倒去博望義民 60 多萬元，場長楊武去職。五十九年包商李炳榮、田安又倒掉一百多萬元。博望的義民經此兩次嚴重的打擊，家家叫苦，只有到附近做工，賺取一天 52.5 元工資以過日子。種植蘋果最多也在這時候。這兩次倒帳對壽亭的影響不小。

民國六十二年以後，國內物價受石油危機影響，物價波動幅度大。又碰上幾次颱風和水災使得平地災情慘重，山上卻安然無恙。一時之間菜價飛漲，清境義民都因而賺了相當可觀的錢，最多六十萬元，最少二十萬元。但這種機會難逢。由於頭一年賺了錢，盲目擴大生產，第二年碰到平地風調雨順，菜量供應充足，於是菜價大跌，一公斤賤賣到 1.5 元（67 年），賠錢者比比皆是。

鑒於以往倒帳的慘痛經驗，義民不再依賴場部安排，自行與平地包商訂約。在訂約時先收五成訂金，取貨時一次繳清尾款。

以六十八年壽亭、定遠種甘藍菜的情形來看，它的生產成本大致是：

1 斤鷄糞（價格 2.5～2.7 元）可種兩棵菜

1 包(40 公斤）尿素（價格 260 元）可施種 1000 棵菜

1 包過磷酸鈣（價格 130 元）可施種 1000 棵菜

1 包氯化鉀（價格 180 元）可施種 1000 棵菜

初施鷄糞，第一次施用尿素，一分地需 30 公斤；第二次施肥用尿素，一分地 40 公斤；第三次施用混合肥，1 分地 50 公斤。外帶殺蟲劑。請山地人搬運，一工一天 300 元，外加保力達和米酒。如果是向山地人租地，一棵甘藍菜租金一元。粗估一棵甘藍菜的成本約在 5 元。

每棵菜重 2 公斤多，68 年以每公斤 7.2 元包掉，一棵菜可賣到 15 元。種 7 分地，20,000 棵菜，收益爲 30 萬元，成本爲 100,000 元，兩相扣除，淨利爲 20 萬元。這筆錢在十月份收到，要支撐一年的生活費用和明年的投資成本。每月可支用的錢約爲一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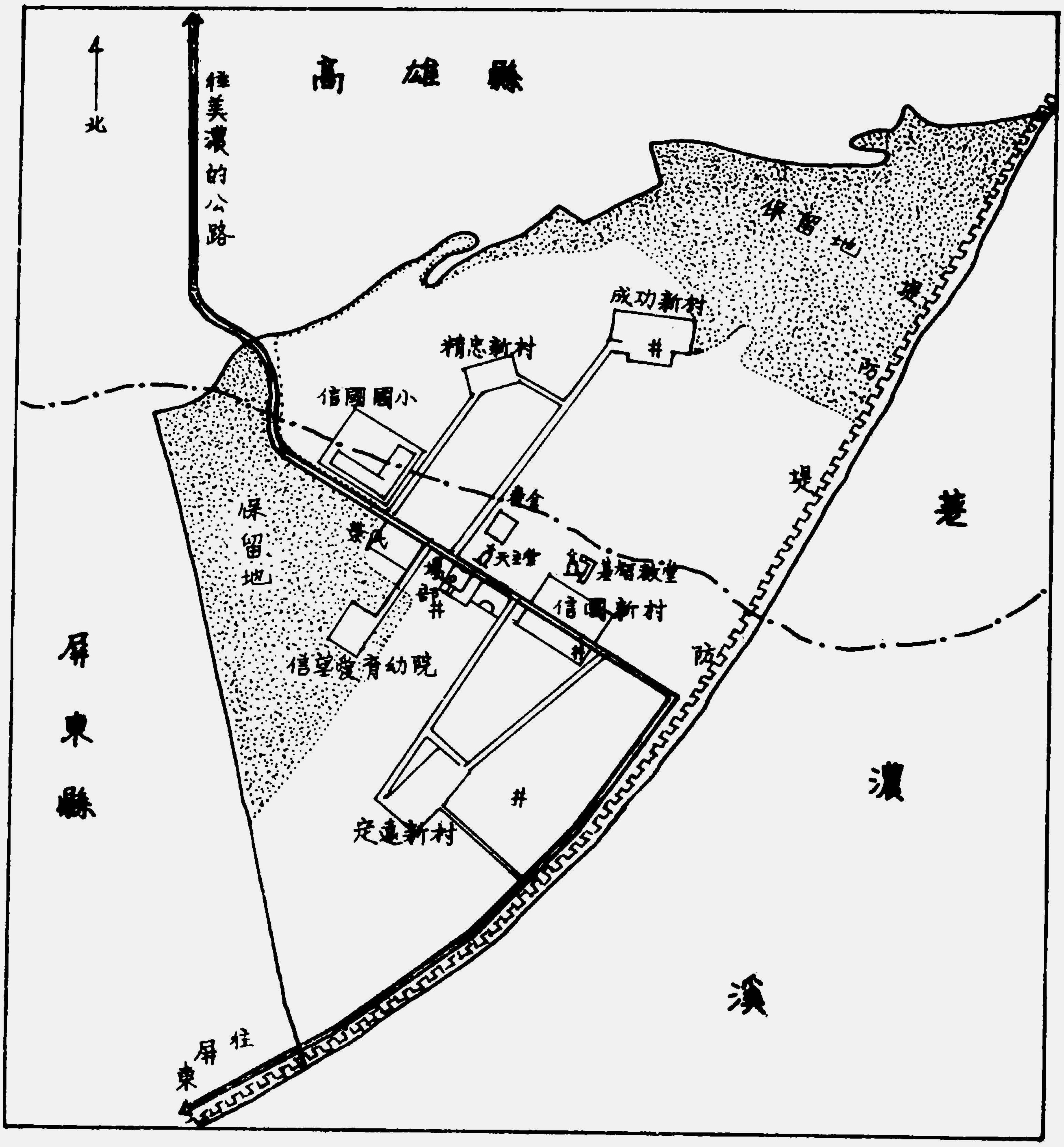
總體而言，清境所能供應的蔬菜量比起雲林嘉義蔬菜量來，是小得很多。而果菜公司除非特殊情形，是不會到此買菜。同時，果菜公司的要求嚴，分級包裝，對菜農而言，幾至無利可圖。所以，義民們較喜歡批售給菜商，價格較好，銀錢往來也較方便。清境的蔬菜確實有調節平地蔬菜供應量的功能。若平地蔬菜產量豐，又沒有意外災害，則此地的蔬菜一定滯銷，聽憑它爛在田裏。一旦平地有了風災水災，蔬菜供需不調，此地的蔬菜就成了熱門的搶手貨，價格飛漲。六十六年就因臺北水災而使清境義民賺了大錢。以此可說，清境義民的經濟對市場價格的依存度相當高。

㈡吉洋——稻米耕作與養豬業

吉洋分場的經濟狀況不佳，自然條件與人謀不臧是兩大主因。分場 59 年的工作報告就坦率的指出：

> 本分場土地原爲老濃溪河床地，石礫遍布，一片荒蕪，進墾伊初，生產條件不良，收不敷出，以致虧損，依靠三年配給食糧之補助維生，因此養成依賴之惡習。尤以幹部之不健全，僅派技術員二人，輔導員一人，以致技術指導不臻理想，管理不善，形成生產癱瘓，意志消沈，生活景況至爲淒涼。至五十八年元月，奉命由輔導會直接管理，五十九年元月歸建（按：仍歸高雄農場管轄）。在此期間，積極整頓。……

改善義民的生活，最基本的工作就是開墾並改良生活所依的農田。分場全境原是大小礫石遍布的河川地，根本沒有可供耕種的壤土。於是土地改良工作成了首要之


高雄縣
往美濃的公路
北
保留地
成功新村
精忠新村
信國國小
保留地
場部
信國新村
信望愛育幼院
定遠新村
屏東縣
堤防
堤防
荖濃溪
往屏東

吉洋分場平面位置圖

務。改良河川新生地的方法有四種[49]：

1.客土：移塡良質壤土，傳統上認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放淤：利用灌溉時，讓水中所含泥沙淤積在田地表面，形成新土壤。

3.施用堆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機質，改善土壤物理性。

4.種植綠肥：種植含氮肥量高的作物，翻土時一齊翻攪，成爲肥料。

吉洋全境由於極端缺乏良質壤土，所以採用第一種改良土地的辦法，進行客土。全場耕地面積有 192,1046 公頃。民國五十四年第一次辦理客土， 完成 99,8193 公頃。可是這次客土工作偸工減料，塡土深度僅 10～15 公分，又是砂質土。五十八年調查時，勉強可用的土地只有 65,6407 公頃，其餘 34,1786 公頃需要增加客土，另待開墾改良的荒地達 95,7493 公頃。

民國五十八年奉准撥世糧（聯合國世界糧食組織）物資 1,014741 日／人份及現金 551,487 元。每立方米土方物資爲 26 元，現金 4 元， 共完成客土 30 公分厚者 38,9440 公頃，土方 116,832 立方公尺， 計款 3,504,960 元 ；完成 20 公分厚者 5,8540 公頃，土方 11,708 立方公尺，計款 351,240 元。共計總工程費 3,856,200 元（不足之數由輔導會付給），完成客土 44,7980 公頃。這次客土收效甚大，平息了義民惶惶不安的情緒，開始對農墾發生興趣。

民國六十三年，再度辦理客土 12,9587 公頃，工程費 155 萬元。六十四年度再完成客土 37,4873 公頃。至此，歷年客土改良的土地面積達 158 公頃，佔配耕面積 192 公頃中的82.2%。剩下 34 公頃半客土地（即民國五十四年辦理客土者），將於民國六十九年中改良。工程款估計要 187 萬元。

客土所需的土方，取自旗山、美濃的農田，是直接可以利用的良質壤土。客土後，義民們在田地上種植水稻、大豆、甘蔗、甘藷、香蕉等作物。據六十三年分場主任楊新傑於是年八月所做的簡報，從民國五十六年至六十二年的收益情形如下表所示：

49. 戴育桐：臺灣東部河川地之改良及經營方法之探討，載於臺灣研究叢刊第 105 種臺灣土地開發之研究頁 193-225 ，民國 60 年

年度	作物種類	面積	單位產量	生產價值		耕作成本	純收益
				總生產量	價值		
		公頃	公斤	公斤	元	元	元
56	大豆	40	1,200	48,000	192,000	160,000	32,000
	水稻	5	2,700	13,500	47,250	42,500	4,750
	甘藷	20	9,500	290,000	87,000	61,000	25,000
	香蕉	19	12,500	455,500	1,322,000	504,500	817,500
合計		84					880,250
57	大豆	41	1,250	51,250	205,000	164,000	41,000
	水稻	4	2,710	12,195	54,877	124,040	20,837
	甘藷	21	10,500	30,405	64,100	36,850	27,250
	香蕉	19	24,500	465,500	1,489,600	522,500	967,100
合計		85					1,016,187
58	大豆	44	1,440	63,360	253,440	191,400	62,040
	水稻	4	3,200	12,800	44,800	36,200	8,600
	甘藷	19	1,215	2,130,850	85,234	65,550	19,684
	香蕉	20	24,650	493,000	1,577,600	522.000	1,045,600
合計		87					1,135,924
59	大豆	64.20	1,572	100,950	504,750	288,900	214,850
	水稻	40.70	4,370	117,859	711,436	376,475	334,971
	甘藷	13.10	13,500	176,850	88,425	59,605	28,820
	香蕉	20.60	25,020	515,453	1,546,359	556,200	990,159
合計		138.60					1,568,800
60	大豆	66.90	1,600	107,040	535,200	301,050	234,150
	水稻	44.60	4,550	202,930	811,720	419,240	392,480

		公頃	公斤	公斤	元	元	元
	甘藷	9.50	15,540	146,630	87,918	44,650	43,328
	香蕉	21.20	27,211	576,872	1,726,230	572,460	1,153,770
合計		142.00					1,823,728
61	大豆	63.00	1,650	103,950	519,750	302,400	217,350
	水稻	45.00	4,650	209,250	1,046,250	432,000	614,250
	甘藷	10.50	16,200	170,100	136,080	57,500	78,530
	玉米	25.00	5,350	143,750	403,125	104,880	298,245
	香蕉	23.00	26,950	619,850	1,239,700	609,500	630,200
合計		166.50					1,838,575
62	大豆	61	1,600	97,600	683,200	274,500	408,700
	水稻	45	4,800	216,000	1,080,000	360,000	720,000
	甘藷	9	21,000	189,000	151,200	45,000	115,200
	玉米	30	4,200	126,000	504,000	300,000	204,000
	香蕉	17	27,200	462,400	924,800	289,000	635,800
合計		162					2,083,700

民國六十五年種植水稻 86 公頃，總產量 329,100 公斤，純益有 890,100 元；雜作 81 公頃，總產量 131,050 公斤，純益 307,550 元。分場主任尹穩健於民國六十七年十月所做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六十七年度農場的生產總值爲 27,461,395 元，義民每人平均每月爲 3,834 元[50]。

基於農田收入實在太低，引發將田地租給附近農民，自己到外地做工謀生的事。租地的代價是分收成穀物的三分之一。爲輔導會所不能同意，於民國六十三年起，嚴格執行強制收回出租土地。至六十四年六月，種長期作物（甘蔗）的田地由承租農民具結，於作物收穫後，將土地交回，種短期作物者全部收回。此後，分場中就出現許

50. 場部所公布的這個數字可信度不高，因爲吉洋義民人口總數是 1053 人。以此數去除全年生產總值，再除 12 個月，平均每人每月爲 2174.26 元。曾去信查詢，未獲答覆。

多廢耕的田地。

在水利設施方面，五十九年以 9,500 元設置田間蓄水池五座，六十年以 160,000 元完成旱作灌溉水利改善工程。六十七年，爭取中央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經費 280 萬元，修建吉洋排水路 6,338 公尺，減除水患。併同爭取上項經費 100 萬元，開鑿 60 匹馬力深水井一口，解決旱季缺水灌溉，受益面積達 50 公頃。修建灌溉水路 1,400 公尺，改善水稻灌溉面積 80 公頃。

義民之中，目前養猪戶都集中在信國和定遠兩村，六十頭猪以上的大養猪戶有六家，其餘的規模大小不一。主要是飼養母猪，繁殖小猪以賺錢。飼猪全用飼料，因而成本高，一旦遇到養猪銷路不景氣時，莫不叫苦連天。六十八年調查時正值是養猪業不景氣的高峯，原先一隻小猪可賣 1,200～1,500 元，當時叫價 200 元都沒人要，就有人把小猪丟棄到河邊，任它自生自滅。

吉洋分場也曾推廣養牛事業。民國六十年，臺灣省政府向全省農戶推廣酪農業，義民們接受農會的輔導，全場共養了一百多頭牛。幾年以後，國貿局以平抑國內牛肉市場價格爲理由，大批開放進口澳洲、紐西蘭的冷凍牛肉。由於售價低廉，很受消費者的歡迎。但國內剛剛起步的養牛事業，卻經不起這樣嚴厲的打擊，一下子就崩潰。吉洋的義民只知道當初輔導他們養牛的農會技術人員不再出現，卻不清楚外界的有利環境已變，養牛事業已慘遭打擊。不過，養牛不必花費太多的成本，放在田野，任牠吃草，倒也撑過這段黯淡時光。國人因消費習慣之故，冷凍牛肉畢竟無法完全取代溫體牛肉。近年來，肉牛價格逐漸上昇。也因此帶給義民們些許財富。

六、結　論

清境和吉洋兩個農場可說是完全出自政府有關單位的策劃和安置，是一種有計劃的移民墾殖活動。臺灣社會原本就是個由閩粵移民所組成的社會。當我們拿清境、吉洋的繁殖過程和臺灣社會的墾殖過程做比較時，可以指出幾點相異之處：

第一，明鄭治臺時期是實行寓兵於農的屯墾政策。「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荷耒以耕[51]。」這樣的屯墾政策是完全憑藉官府的力量。但清

51. 參見臺灣外史。

朝領臺之後，把臺灣視成禁地，禁止閩粵人民渡海來臺。但私自渡海來臺者眾。因而，有清一代對臺灣的開墾工作就變成是民眾自組防衛武力從事開墾。如吳沙開墾蘭陽平原時，就招請粵東客家人爲「民壯」[52]。清境與吉洋的義民原本就是軍人，遷徙來臺之後，原有的軍事組織仍然存在，原先爲長官者自然就成爲聚落的領袖人物。但它不同於明鄭時期的屯墾，只是由一批解甲歸田的退除役官兵所組成，其目的在於安置這批人的生活，而不是爲了開疆拓土。

第二，臺灣早先的閩粵移民所開墾的土地，大體上說來，是平坦肥沃的。雖然客家人所佔的土地要比閩南人所佔的土地貧瘠得多。當這批義民由滇緬邊區撤退來臺的時候，臺灣本島平原及丘陵地帶的開發工作早已完成，所剩下的只有高山區和森林河川新生地。在無可選擇的情形下，清境農場就設在高山之巔，高雄農場吉洋分場就設在河川新生地。

第三，臺灣早期從事墾殖活動者，完全是漢人；而清境與吉洋的義民中，卻帶有我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人士，以女子爲多，增添了臺灣社會在民族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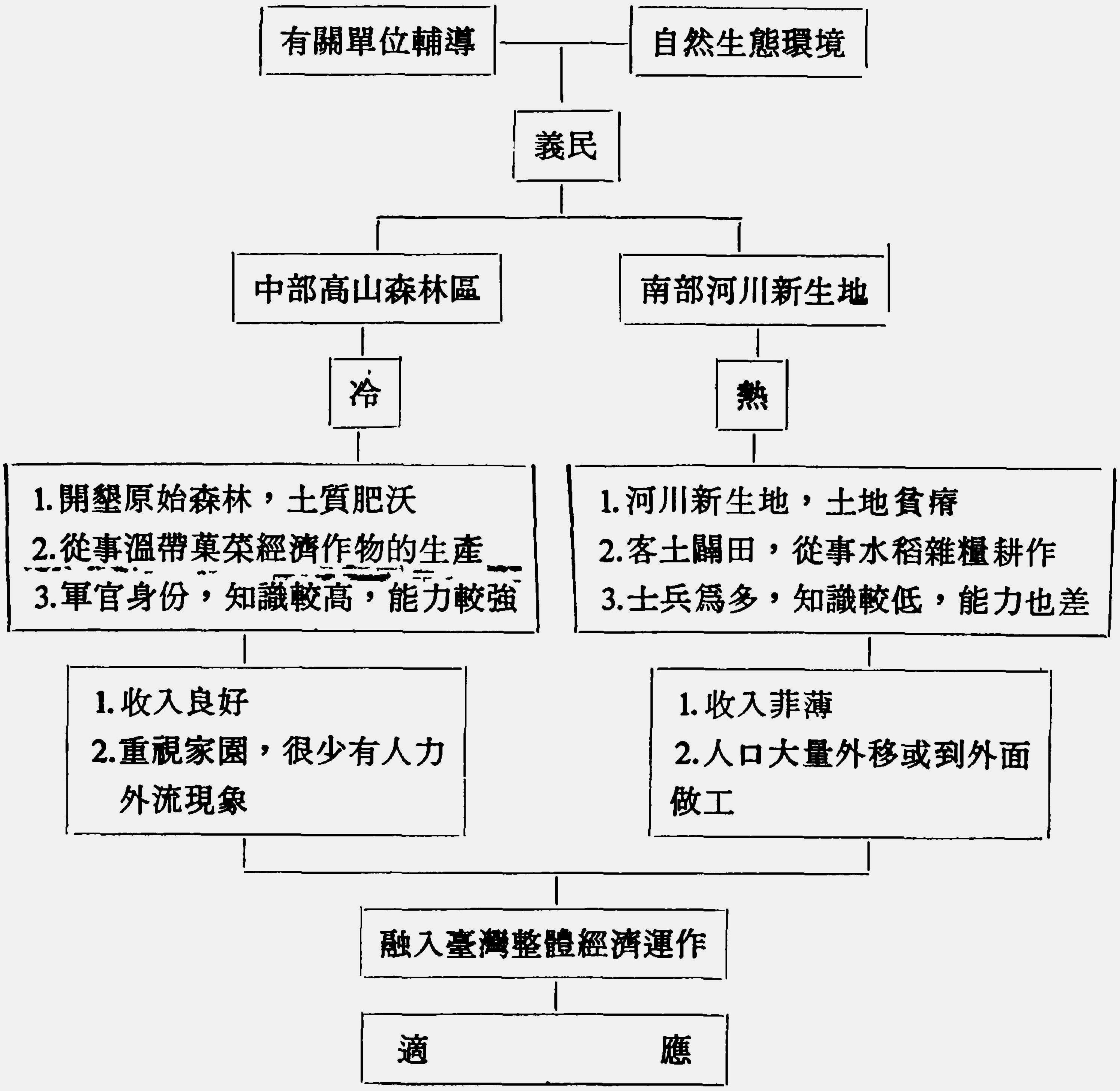
義民來自軍隊，原先的軍事組織和長官部屬關係一直存在，再加上他們的身份特殊，長久以來，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意識範式」(conscious model)[53]。這種範式是指義民對自己社羣，人際關係所產生的意識。在二十年的墾殖過程中，這種團體意識使得義民團體成爲一種獨特的社羣，表現出很強的內聚力，常常一致行動爭取福利。在旁人，尤其是當地的閩南人、山地人看來，他們的確是很特殊的一羣。像美濃鎮公所的秘書就曾說過：「當初確實把義民想像成很難打交道的人，二十年的相處，卻證明當初的想法是錯誤的，」雖然原先的猜疑已經淡化，可是清境和吉洋的聚落裏，很少有閩南人，客家人入居的縱跡。

整個清境和吉洋建場與發展的過程核心，就是一個「適應」問題。在前面提到

52. 姚瑩東槎紀略：「沙所召多漳籍，約千餘人；泉人乃稍入，粵人則不過數十，爲鄉勇而已。初入，與番鬥，彼此殺傷甚衆。」連橫臺灣通史吳沙列傳：「沙乃召佃農，立鄉約，徵租穀，刊木築道，沿山各隘，分設隘寮十一所，曰民壯寮，募丁壯以守，每隘十餘人，或五六十人，晝夜擊柝，行旅無害。……以其餘力拓地至二圍。」

53. 參見 Ward, B. E. “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 The Fisherman of South China” 1965.

過，兩地的自然條件很差，但是目前的情形是清境義民收入頗豐，吉洋義民則較清苦。這又是什麼緣故呢？試著用下面的圖表來說明之。



義民原來活動於雲南西南部和緬甸北部的叢山峻嶺，山高谷深，氣候濕熱，大致與臺灣的氣候相似，因此，在調查過程中，很少聽到有來到臺灣而水土不服的。也就是說，他們能適應臺灣當地的氣候條件。

在緬北，人們習慣上行刀耕火種的農業活動。放一把火，燒出一塊田，開墾之後，種植幾年，地力盡了，就棄之他去。義民本身是軍人，不太懂得農耕；他們的妻子有一半是邊疆民族女子，邊疆民族多行刀耕火種式的輪耕農業。這套農耕技術到了臺灣就派不上用場，只有在農場的指導下重新學習精耕農業活動。在敍述建場過程

時，已經說明了他們是如何學習新的農耕技術。清境的義民在這次學習過程中，有較好的成績，而吉洋義民的學習成績不理想，原因很簡單，吉洋的土地貧瘠，收益不大，義民的耕種興趣低落。清境的土質肥沃，雨水又多，蔬菜水菓的收成好，學習的興趣也就高昂。

這兩個農場的經濟活動就形式而言是屬於農村經濟。Skinner 的理論[54]，把中國傳統的市集分成初級市場、中介市場，與中央市場三個部份。三者之間的關係有如三個相連的環扣。貨物的流通是層層相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交通不便。當我們拿清境和吉洋的經濟活動情形來看，卻發現以往的中國鄉村經濟理論並不適用[55]。其根本上的差異是這兩地的交通狀況比傳統中國農村的交通狀況要便利得太多。賣蔬菜肉類的活動商店——就是以小貨車載著商品巡廻各村落的商人，車上所載貨色之多，數量之大，遠超過傳統市集的肩挑小販的規模——每天定時把貨品送來。家用電器產品的推銷品也常來推銷產品及提供售後服務。義民們也可以搭乘公路客運班車到附近的市鎮取得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而這裏所說的「附近市鎮」的範圍是指埔里、臺中（清境）、屏東、高雄（吉洋）等大都市。

這兩地的農民從農會取得資金流通。大都市的菓菜批發商會直接到清境農場與義民訂立產銷合約。吉洋義民的養猪業也與臺灣本島養猪市場息息相關，並且採取企業化經營。因此，從經濟活動的角度來看，兩農場義民已然脫離了傳統市集形態，步入現代市場供需的經濟體系之中。換而言之，義民農場經營已經融入臺灣地區的整個經濟體系之中。

清境與吉洋只是兩個很特殊的案件，單就它們本身而言，並不能對當前中國農村

---

54. Skinner, G. W.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ies, Vol. XXIV No. 1, 1964.

55. Skinner 的初級市場，相當於蕭公權的「村」或「莊」；中介市場相當於「市」「集」「場」等等。其交易日期每月五日或六日不一；而中央市場則相當於大小不一的鎮。(Hsiao: Rural China 1960: 10-24) 據楊慶堃說，華北和廣東大都五日一期；在雲南，則六日一期爲多。但在貿易繁盛的大鎮，尙仍保持三日一期，或隔日一期的傳統（Yang: 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uping Hsien, Shantung, 1944: 3-10）。清境與吉祥的義民都是滇邊農民，原多來自初級市場，中介市場地區。來臺之後，由國家安置，分別建立農村，俾可安居樂業。各村均有一二住戶以售賣煙、酒、糖果、雜貨爲副業的。可說是初級市場的雛形。但二十年來尙未形成初級市場。因爲交通便利，交易之事都可和中央市場打交道，更無形成中介市場的需要。

社會的活動情形提供太多的理論架構。記述這兩個農場，只是保留下一份可信的資料，提供給往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當作參考之用。

（本文承蒙芮師逸夫、管東貴先生、張以仁先生、何大安兄、黃寬重兄賜讀，並指出錯誤謹此致謝）

附　　載

趙元任先生著作目錄

李　壬　癸編

List of Abbreviations:

ACS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BIHP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KH	科學 [*K'o-hsueh*] Science
KYCK	國語週刊 [*Kuo-yü Chou-k'an*] National Language Weekly
Lg	*Language*
(M)	Musical composition
(Tr)	Translation

1915 a. 心理學與物質科學之區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sychology and the physical sciences]. *KH* 1:1. 14–21.

b. (M) 和平進行曲 [March of Peace, a piano composition]. *KH* 1:1. 120–21.

c. (Tr) 科學與經歷 [Science and experience, from E. B. Titchener, *Text-book of Psychology*]. *KH* 1:2. 130–34.

d. 能力 [On energy]. *KH* 1:2. 145–56.

e. 永流電 [Perpetual current]. *KH* 1:2. 222–23.

f. 永動機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s]. *KH* 1:3. 275–82.

g. (Tr) 無線電 [Wireless telegraphy, by Robert W. King]. *KH* 1:5. 526–34; 1:6. 635–43.

h. 地果圓乎；地果動乎：自轉；地果動乎：公轉 [Three dialogues on the earth: I. Shape; II. Rotation; III. Revolution]. *KH* 1:7.812–23; 1:8.937–49; 1:9.1056–65.

i. (M) 八板湘江浪合調 [Arrangement of the folk tunes 'Eight Beats' and 'Waves of the Siang Kiang']. *KH* 1:7.835–36.

j. 用數 [On the use of numbers]. *KH* 1:10.1111–27.

k. (Tr) 海王星之發現 [The discovery of Neptune, by David Rines]. *KH* 1:12.1359–76.

1916 a. 地船 [Our ship the Earth]. *KH* 2:2.159–75.

b. 說時 [On time]. *KH* 2:6.603–21; 2:10.1083–95; 2:11.1179–86.

c. 飛行機黑夜落地法 [How aeroplanes land at night]. *KH* 2:3.340–41.

d. (Tr) 烟煤之四害 [Four points in the smoke nuisance] [J. O'Conner, Jr.'s article in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87 (Sept. 1915), 244–49]. *KH* 2:8.882–88.

e. 大陵變星 [Algol the variable]. *KH* 2:9.1059–62.

f. Chinese phonetic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1:7.

g. Problems of Chinese language.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Proposed reform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437–43 (April), 500–9 (May), 572–93 (June).

1917 a. 中西星名圖考 [Chinese and Occidental uranography]. *KH* 3:1.42–52; 3:3.250 maps A–H; 3:3.270–308.

b. 紙連環 [Moebius strips]. *KH* 3:1.60–67.

c. 睡眠之衛生 [The hygiene of sleeping time]. *KH* 3:5.603–5.

d. 一百金圓之道德實驗 [A $100 experiment on morality]. *KH* 3:6.707–9.

e. 瞳孔翕張之試驗 [Seeing the effect of change in one's own pupil]. *KH* 3:8.909–12.

f. 催眠術解惑 [Hypnotism explained]. *KH* 3:9.938–49; 3:11.1166–74.

g. 生物界物質與能力代謝之比較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tter and that of energy in the biological world]. *KH* 3:12.1262-65.

1918 a. (M) 偶成 [An incidental idea]. [A piano piece]. *KH* 4:1.xii.

b. 紙坑學跳之迷信 [The fallacy of learning the high jump by using a paper-filled pit]. *KH* 4:2.204-6.

c. (Tr) 七天中三個禮日 [Three Sundays in a week, by Edgar Allan Poe]. *KH* 4:4.391-97.

1919 A note on continuous mathematical inducti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26.395.

1921 First Green Letter. 1-19 p. (Privately published.)

1922 a. 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Textbook for National Language Record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Also the records.]

b. 國語羅馬字的研究 [Study of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國語月刊 *Kuo-yü Yueh-k'an* [National Language Monthly] 1:7.87-117.

c. 五聲的標準 [The five standard tones]. *Kuo-yü Yueh-k'an* 1:8.

d. (Tr)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by Lewis Carroll (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xxxi, 192 p. (Reprinted 1939.)

e. 中國字調的實驗研究法 [Experimental study of Chinese word tones]. *KH* 7:9.871-82.

1923 a. Ten objections to romanizing Chines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8:7.24-9.

b. Principles of romanization.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8:8.17-24.

c. Second Green Letter. 20-60 p. (Privately published.)

1924 a. 語音的物理成素 [Physical elements of speech]. *KH* 9:5.523-35.

b. 那的分化的我見 [How I differentiate forms of *na*]. *Kuo-yü Yueh-k'an* 2:2.

c. 新文字運動的討論 [Discussing the latinization of Chinese]. *Kuo-yü Yueh-k'an* 2.

d. Singing in Chinese. *Le Maître Phonétique* (Paris) 39. 9-10.

1925 a. *A Phonograph Course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xxii, 288 p. [Also pronounced for the records.]

b. Third Green Letter. 61-84 p. (Privately published.)

1926 a. 符號學大綱 [A sketch of a science of symbolology]. *KH* 11:5. 571-91; 11:11. 1477-97.

b. 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辭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particles of Peking, Soochow, and Changchow]. *The Tsing Hua Journal* 3:2. 865-918.

c. 國際音標國語正音字典 [Phonetic dictionar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7 a. 國音新詩韻 [*New book of rhyme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viii, 105 p.

b. (Tr) 高本漢的諧聲說 [‘Theory of phonetic compounds’ by B. Karlgren]. 國學論叢 *Kuo-hsüeh Lun-ts’ung* [Sinological Miscellany] 1:2. 23-65.

c. 倆仨四呃八阿 [On the numerals two, three, four, eight]. 東方雜誌 *Tung-fang Tsa-chih* [Eastern Miscellany] 24:12. 85-88. (Cf. 1936e)

d. (With Ch’ien Hsüan-t’ung and Li Chin-hsi). 政府頒行之國語羅馬字方案 [Official paper promulgating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system]. In 大學院公報 *Ta-hsüeh-yuan Kung-pao* [Repor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1928 a. 中國派和聲的幾個小試驗 [Some experiments on a Chinese style of harmonization]. 音樂雜誌 *Yin-yüeh Tsa-chih* [Music Magazine] 1:4. 1-4.

b. 現代吳語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dialects*, with English summary]. Peking: Tsing Hua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xv, map, 138 p.

c. (M) 新詩歌集 [Songs of contemporary poems]. Words by Hu Shih, Liu Pan-nung, Y. R. Chao, Hsü Chih-mo, et al.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66 p. [Revised ed.,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60].

1929 南京音系 [The sound system of the Nanking dialect]. *KH* 13:8. 1005-36.

1930 a. *An equivalence table between the National Romanization and the Wade System.* Beeipyng: The Society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35 p.

b. (Tr) 最後五分鐘 [*The Camberley Triangle*, by A. A. Milne, with an appendix on Peiping intonation]. Shanghai: Chung Hua Bookstore. 144 p.

c. (Tr)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by B. Karlgren]. *BIHP* 1:3. 345-401.

d. 關於臻櫛韻的討論 [On the rhymes *chen* and *chieh*]. *BIHP* 1. 487-88.

e.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ître Phonêtique* 45. 24-27.

f. Transcribing reversed English. *BIHP* 2:2. 205-23.

g. 廣西猺歌記音 [Phonetics of the Yao folksongs]. *Academia Sinica,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 A, No. 1.* Peiping: Academia Sinica. iv, 189 p.

h. (Tr) 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lama Tshangs-dbyangs-rgya-mtsho, translated by Yü Tao-ch'üan, transcribed by Chao Yuen Ren, with English introduction].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A, No. 5.* Peiping: Academia Sinica. xi, 204 p.

1931 a. [Chinese] Music.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ed. by Sophia H. Chen Zen, 94-111.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 A note on 'Let's'. *Le Maître Phonêtique* 46. 4-5.

c. 反切語八種 [Eight varieties of secret languages using Fan-ch'ieh]. *BIHP* 2:3. 312-54.

d. On using ƀ đ ǥ for unaspirated voiceless plosives. *BIHP* 2:3. 355-57.

e. 捲舌韻的討論 [Discussing the -erh final]. *KYCK* 11.

f. 'E' for middle e. *Le Maître Phonêtique* 46. 23-24.

1932 a. 希臘字母的國音讀法 [How to pronounce the Greek letters in Mandarin]. *KYCK* 25.

b. 注音符號總表 [*General tables of 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Peip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mittee on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1933 a.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BIHP* 4:2. 121-34.

b. A preliminary study of English intonation (with American variants) and its Chinese equivalents. *BIHP* [Special unnumbered issue: Studies presented to Ts'ai Yüan-p'ei on his 65th birthday] 105-56.

1934 a. Basic English Records. Shanghai: Chung Hua Bookstore. iii, 93 p. [Also the records].

b. 連書什麼辭類？[What kind of words are to be spelt together?]. *KYCK* 120.

c.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BIHP* 4:4. 363-98.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Linguistics*, ed. by Martin Joos, 38-54.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57].

d. The idea of a system of Basic Chinese.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1:4. 171-83.

e. (M) 兒童節歌曲集 [Children's Festival Songs; words by T'ao Hsing-chih].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ii, 12 p.

1935 a. 關於蘇俄的拉丁化中國語 [On the Russian system of Chinese romanization]. *KYCK* 159.

b. 劉半農先生輓辭 [Elegy for the late Liu Fu]. *KYCK* 159.

c. 新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New textbook for National Language Records]. Edition A, in National Phonetics; Edition B, in National Romanization.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Also the records].

d. 方言性變態讀音三例 [Three examples of the dialectal nature of abnormal pronunciations, with English summary]. *BIHP* 5:2. 24-53.

e. (M) 江上撑船歌 [Boatman's Song on the Yangtze]. *KYCK* 204.

f. 中國方言中爆發音種類 [Types of plosives in Chinese dialects]. *BIHP* 5:4. 515-20.

1936 a. Types of plosives 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ed. by Daniel Jones and D. B. Fry, 106-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 廣播須知 [What a broadcast speaker should know]. Nank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12 p.

c. (M) 兒童年歌 [Song for the Children's Year, words by Wu Yen-Yin]. Nank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d. A critical list of errata for Bernhard Karlgren's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3:3. 139-51.

e. A note on *lia*, *sa*, etc. *HJAS* 1:1. 33-38. (Cf. 1927c).

f. 長沙方言字母 [An alphabet for the Changsha dialect]. *KYCK* 239. 1-2.

g. 定縣方言改國音的注意點 [Hints for changing from the Ting *hsien* dialect to standard pronunciation]. *KYCK* 243:1.

1937 鍾祥方言記 [The Chung-hsiang dialect]. Chapters 12 and 13 of the *Chunghsiang (Hupeh) Gazetteer*, Nanking. [Separately reprinted in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A, No. 15*, 1939.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viii, 160 p].

1938 文字統一與方言分歧問題 [Problems of unification of writing and divergence of dialects]. 建國平論 *Chien-kuo P'ing-lun* [Reconstruction Review] 1:5. 7-8.

1939 a. 黃自的音樂 [The Music of Huang Tzu]. 大公報 *Ta-kung-pao* [L'Impartial] (Literary Section).

b. Yünnanfu, the Peiping of the Southwest. *Pan-Pacific* 3:2. 6-8; 17-18.

c. (Tr), with Li Fang-kuei and Lo Ch'ang-p'ei) 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by B. Karlgren]. xliv+731+map. Preface by Fu Szu-nien, Kunming. [Reprint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48].

1940 A note on an early logographic theory of Chinese writing. *HJAS* 5: 2. 189-91.

1941 a.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2. 203-33.

b. Review of *Grammata Serica*, by Bernhard Karlgren. *Lg* 17:1. 60-67.

1942 Iambic rhythm and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3. 1-2.

1943 a.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02:2. 63-66.

b. (M) Star-Spangled San-min, a Study in Harmonized Sovereignty. (Privately circulated).

c. Foreword, Introduction to pronunciation. *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American edition, v, ix-xxi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Review of *Chinese Sentence Series Records*, by Walter Simon [Chinese pronounced by C. H. Lu]. *HJAS* 8.364-70.

1946 a.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words. *Lg* 22:1.4-13.

b. A project for legible speech. (Mimeo).

1947 a.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ii, 242 p.

b. *Character text for Cantonese pri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2 p.

c. (With Yang Lien-sheng).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xxxix, 292 p.

d. (Tr)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by Buwei Yang Chao. [With introduction and footnotes by Y. R. Chao]. New York: John Day Co.

e. Report on language education to Unesco. *Fundamental Education; Common ground for all peoples. [Report of a Special Committee to the Preparatory Com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Paris 1946*], ed. by Henry W. Holmes, 234-59.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a. *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iii, 336 p. (Cf. 1956c).

b. *Character text for Mandarin prim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ii, 142 p.

c. (With Ting Sheng-shu, Yang Shih-feng, Tung T'ung-ho, and Wu Tsung-chi).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 [Report on survey of the Hupeh dialects].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vii, 1574 p. +68 maps+map of isoglosses.

d. The voiced velar fricative as an initial in Mandarin. *Le Maître Phonétique* 113. 2-3.

e. 中山方言 [The Chung-shan dialect]. *BIHP* 20. 49-73.

1949 L'efficacité de la langue chinoise comme système symbolique. Translated by Eithne Wilkins from the French: 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mbolic system. *Reflections on our age,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Unesco at the Sorbonne University Paris,* 117-2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 Review of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least effort,* by George Zipf. *Lg* 26. 394-401.

1951 a. 台山語料序論 [Introduction to T'ai-shan texts]. In 傅斯年先生記念册 [Special publication in memory of Director Fu Szu-nien]. 61-66.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 台山語料 [T'ai-shan texts]. *BIHP* 23: 1. 25-76.

c. The Cantian idiolec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poken by a twenty-eight-month-old child.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 11. 27-44.

d. The Chinese languag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8. 538-41.

1952 Chinese. *Collier's Encyclopedia* 5. 167-77.

1953 a. Review of *Chih-shih fen-tzu yüng te pei-fang-hua hsin wen-tzu k'o-pen* [Northern dialect new writing system textbook for intellectuals], by Ni Hai-shu.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3. 337-40.

b. Popular Chinese plant words: a descriptive lexicogrammatical study. *Lg* 29. 379-414

1954 a. Review of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by Roman Jakobson et al. *Romance Philology* 8: 1. 40-46.

b. 方言記錄中漢字的功用 [The function of characters in the recording of dialects]. 朱家驊先生慶祝論文集 [Bulletin of the Academia Sinica] 1. 117-28.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Chu Chia-hua's 60th birthday]. Taipei, Taiwan: Academia Sinica.

c. Notes on speech arch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 2. 87-88.

1955 a. Notes on Chinese grammar and logic.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 1. 31-41.

b. Meaning in language and how it is acquired. *Cyberne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49-67. New York: Josiah Macy Foundation.

1956 a. Chinese terms of address. *Lg* 32: 1. 217-41.

b. Linguistic prerequisites for a speech writer.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8: 6. 1107-9.

c. *Mandarin primer records.* New York: Folkways Records, No. FP 8002. [Chinese pronunci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Rulan Chao Pian]. (Cf. 1948a).

d. Tone, intonation, singsong, chanting, recitative, tonal composition, and atonal composition in Chinese. *For Roman Jakobson*, ed. by Morris Halle, 52-59. The Hague: Mouton.

e. Formal and semantic discrepancie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Chinese structure. *BIHP*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Hu Shih's 65th birthday] 28: 1. 1-16.

1957 a. A note on Chinese scales and modes. *Oriens* 10: 1. 140-43.

b. China—Language. *Encyclopaedia* 538-41.

[Almost = China — Languag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5. 567-71 (1960)].

1958 Review of *Sur l'indêpendance de l'êpithète*, by Louis Hjelmslev. *Romance Philology* 11: 4. 378-79.

1959 a. How Chinese logic operat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1. 1-8.

b. Ambiguity in Chinese.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ed.

by Søren Egerod and Else Glahn, 1-13.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c. (M) Launching Song of 'The Oriental Giant'. (Performed during the launching at Sasebo, Japan). [Words by C. Y. Tung].

d. The morphemic status of certain Chinese ton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4. 44-48. Tokyo and *Kyoto*: Toho Gakkai.

e. Subsyllabic imitation between two Chinese dialects.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4. 126-27. Tokyo and Kyoto: Toho Gakkai.

f. 中國音韻學中的標準問題 [Normative problems in Chinese phonology]. Chung-kuo yü-wen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4: 5. 4-8.

g. 說清濁 [On the terms *ch'ing* and *cho*]. *BIHP* 30: 2. 493-97.

1961 a. 常州吟詩的樂調十七例 [Seventeen examples of chanting poetry in Chang-chow (Kiangsu) dialect, with English summary]. *BIHP* [Special unnumbered issue in honor of Tung Tso-pin's 65th birthday] 4: 2. 467-71. [With 7 pp. music].

b. Graphic and phonetic aspects of linguistic 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Proceedings of Symposia in Applied Mathematics* 12. 69-82.

c. What is correct Chinese? *JAOS* 81: 3. 171-77.

d. 語言成素裏意義有無的程度問題 [Degrees of meaningfulness in language constituents]. *Tsing Hua Journal* (new series) 2. 1-17.

1962 a. 績溪嶺北音系 [Phonology of Ling-pei, Chi-hsi (Anhwei)]. *BIHP*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Hu Shih] 34: 1. 27-30.

b. Models in linguistics and models in general.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1960 International Congress*, ed. by E. Nagel, P. Suppes, and A. Tarski, 558-66.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inese languag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5. 631-35.

1964 a. Translation without machine.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ed. by Horace G. Lunt, 504-10. The Hague:

Mouton.

b. 中國文法圖解兩例 [Two examples of diagrammatic representations in Chinese grammar]. *BIHP*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Chu Chia-hua] 35. 1-5.

c. Some feed-back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n styles of speech. *In honor of Daniel Jones; Papers contribute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12 September 1961*, ed. by David Abercrombie, et al., 38-42.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5 a. (With S. F. Yang). 績溪嶺北方言 [The dialect of Ling-pei, Chi-hsi (Anhwei)]. *BIHP*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Tung Tso-pin and Tung T'ung-ho] 36: 1. 11-113.

b. Russell's Principle of Abstrac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Tsing Hua Journal* [Special unnumbered issue: Dr. Li Chi Festschrift, Part 1] 1-5.

1967 a. Preliminary design for a system of General Chinese. *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478-82.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f. 1976c, 1979].

b.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 *Lg* 43: 1. 92-101.

c. (Ed.)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II. Linguistics in East Asia and South East Asia.* Edited by Thomas A. Sebeok. Associate editors: Yuen Ren Chao, Richard B. Noss, and Joseph K. Yamagiwa. The Hague: Mouton, xix, 979 p.

d. Chemical analogies in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11 October 1966, Volume I*, 447-51. The Hague: Mouton.

e. 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Faculty Research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pril 3, 1967. [Mimeo].

1968 a. *Readings in sayable Chinese.* San Francisco: Asia Language Publications. [Reprinted by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thaca, N. Y., 1974-]. Vol. I: (incl. autobiography 1892-1900), xv+200; Vol. II: Chinese translation of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xi+285; Vol. III: two plays, consisting of adaptations of H. H. Davies, *The Mollusc* and of Chen Ch'üan, *The Wild Rose*, xv+355.

b. 語言問題 [*Problems of langu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iii, 220 p. [Revised edition, 1972. iii, 223 p].

c.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v, 240 p. [French version: *Langage et systèmes symboliques*, tr. by Louis-Jean Calvet. Paris: Payot. 254 p. Spanish version: *Iniciación a la Lingüística*, tr. by Maria Dolores Moreno. Madrid, 1975. 231 p].

d.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xxi, 847 p. [Chinese version: 中國話的文法，tr. by Pang-hsin Ting. Hong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58 p].

e. 中文裏音節跟體裁的關係 [Syllabicity in Chinese and its relation to style and structure]. *BIHP* 40. 519-28.

f. The language problem of Chinese children in America. *Unicorn* [Princeton] 3. 5-14.

1969 a. 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 [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BIHP*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Li Fang-kuei's 65th birthday] 39: 1. 1-13. [Cf. 1969b].

b. 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HJAS* 29. 109-30.

1970 a. 中英文裏反成式的語詞 [Back-formed express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BIHP*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Wang Shih-chieh's 80th birthday] 42: 1. 1-4.

b. 國語統一中方言對比的各方面 [Various aspects of the dialectal contrasts i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9. 37-42. [Cf. 1971b].

c. Som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method. *Method and theory in linguistics*, ed. by Paul Garvin, 15-26. The Hague: Mouton.

d. 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Presented to Shirô Hattor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by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39-51. Tokyo: TEC Company.

e. The Changchow dialect. *JAOS* 90: 1. 45-56.

1971 a. 我的語言自傳 [My linguistic autobiography]. *BIHP* 43: 3. 303-17. (Cf. 1976a).

b. Some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vement. *La Monda Lingvo Problemo* 3: 7. 31-39.

1972 a. With Bertrand Russell in China. *Russell: The Journal of the Bertrand Russell Archives* 7. 14-17.

b. Problems in Chinese-English-Chinese Lexicography.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7: 3. 96-102.

c. Where Chao went wrong in matters of language.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Martin Joos Festschrift] 17: 2. 105-10.

1973 a. 回想我在語言上犯過的錯誤 *Renditions* 1. 128-30. (Cf. 1972c).

b. Chinese as a symbolic system. *Joseph K. Yamagiwa memorial issue, Papers of the CIC Far Eastern Language Institute, Volume IV*, ed. by Richard B. Mather. 1-9. Ann Arbor, Michigan. [=Chinese as symbolic system. In *ACS*, pp. 84-96].

1975 a. My field work on the Chinese dialects.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Project on Computational Analysis, National Inter-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kyo) 2. 3-7. (Cf. 1976b).

b. *Life with Chaos: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 Volume II. 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 First 30 years, 1892-1921.* Ithaca, New York: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xiii, 113 p.

c. Fourth Green Letter. 85-96 p. (Privately published).

d. Rhythm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word conceptions.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7-38. 1-15.

1976 a. My linguistic autobiography. (Revised and condensed version of 1971a). [In *ACS*, pp. 1-20].

b. My fieldwork on the Chinese dialects. (Revised and condensed version of 1975a). [In *ACS*, pp. 26-33.]

c.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General Chinese. [In *ACS* pp. 106-43]. (Cf. 1967a.)

d. The sociopolitical overtones of Chinese place names. [In *ACS*, pp. 144-47].

e. Chinese tones and English stress. [Also in *Dwight Bolinger Festschrift*, ed, by Linda R. Waugh. In *ACS*, pp. 180-83].

f. The phonology and grammar of "skipants" in Chinese. *Academia Sinica Memorial Volume to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pp. 1139-42.

g.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nwar S. Dil.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Fifth Green Letter. 97-102. (Privately published).

1979 (Tr) 中國通字草案[Preliminary design for a System of General Chinese] *BIHP* 50: 3. 425-29. (Translated version of 1967a).

1982 The dialectal nature of two types of tone sandhi in the Kiangsu Changchow dialect. *Tsing Hua Journal* [Special issue in honor of Li Fang-kuei's 80th birthday] (new series) 14. 33-34.

附記：本目錄主要根據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Essays by Yuen Ren Chao* 一書中 Anwar S. Dil 所編的目錄修訂而成。